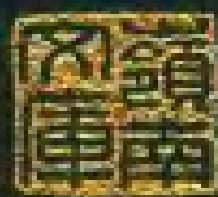


黃增章 著

民國廣東商業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



黃增章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民國廣東商業史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广东商业史/黄增章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8

(岭南文库丛书)

ISBN 7-218-05233-9

I. 民... II. 黄... III. 商业史—广东省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374 号

责任编辑	赵殿红
封面设计	智 达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1
字 数	285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5233-9/F·649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刘斯奋	李兰芳
林 若	陈越平	杨资元	杨应彬	钟阳胜
黄华华	黄 浩	萧如川	蔡东士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朱小丹

主 编：林 雄 岑 桑（执行）

副主编：曾宪志 陈海烈（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恩才	卢子辉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朱仲南	李权时	李达强
李锦全	岑 桑	辛朝毅	张 磊
陈俊年	陈海烈	林 雄	金炳亮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芄子	梁 钊
梁渭雄	黄尚立	曾牧野	曾宪志
曾昭璇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

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序 言

黄增章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本科大学生，时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恰好此时本人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调来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因此彼此相识。黄增章同志为人朴实，勤奋好学，其孜孜以求的精神当时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黄增章同志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民国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本书就是他在长期积累的资料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

广东素以商业发达闻名海内外。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广东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从隋唐至宋的六七百年间，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明清之际，又是中国最早萌发商品经济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农业和专业作坊或手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的足迹不但遍及中国，而且飘洋过海，为广东与中国各地和海外商品的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虽然，在鸦片战

争之后，由于广州一口通商的格局不再，上海迅速取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地位，但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和广东商人进取精神的发扬，广东的国内商品贸易和对外贸易仍然不停地前进。至清朝末年，广东商业重新活跃，贸易额大幅回升，蚕丝、食糖、茶叶、水果等商品依然在国内外市场上保持强劲的竞争力，从而使广东商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直至民国，广东商业在全国一直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

然而，反映广东商业发展历程的学术研究长期滞后，其中对民国时期广东商业的研究几乎付诸阙如，不过是停留于某个时段或某个领域商人、商情的探讨，而未能给人以整体商界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个小小遗憾。

现在，黄增章同志的《民国广东商业史》，至少在笔墨上填补了对民国时期广东商业史研究的空白。

民国时期的广东商业，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不但延续着近代乃至近代以前的广东商业传统，而且饱含以港澳为桥梁、沟通中外贸易的特色。正是香港贸易地位的确立，以香港为中外贸易中转地的广东商业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的广东，是中国最繁荣的商业区域之一。

本书突破一般商业史的写法，既有按时间顺序、商业行业分门别类的叙述，也有按区域商业的相关要素，如商业市场、商业管理与经营、物价与货币、商业团体等方面的横向交代，从而更全面地反映区域性商业构成的各种要素和整体状况。

本书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分述广东商业在民国年间不同时段的发展状况，同时分类叙述各商业行业的情况。根据民国时期广东历史的实际，本书将广东商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1912年~1926年，1927年~1936年，1937年~1945年，1946年~1949年四个阶段；按照民国时期广东商业的特点，着重介绍了粮油、棉丝纺织、饮食旅店、栏口、京果海味、食糖、茶叶、药品、纸张、印刷、笔墨、首饰、百货等行业。这样的时段划分和行业介绍，基本上反映了广东商业发展的脉络和广东商业的地方特色。

区域性商业史的写作贵在使读者对当地的商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样，就要求对构成商业的各个要素加以全面的阐述，并突出地区商业的特点。本书的后五章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商业市场一章，作者从广东全省商业市场的布局，各地区商业市场形成的地理交通条件，市场发展的脉络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各商业市场之关系等方面加以阐述，从而使读者对广东商业市场的整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本书对社会变迁、交通条件的改变导致广东商业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做了必要的探索。以上这些，都是以前涉及广东商业的论著中所欠缺的。

近代以降，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年，广东的商业经营管理模式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状态，新旧交替的过程未完结。但是，新的商业理念扑面而来，大有压倒传统商业观念之势，这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历史状况，要求作者既要当时大量续存的固有商业模式进行客观的叙述，又必须

对新的商业模式的发生发展做出明白的阐述，还要理清新旧两者的关系。本书第六章对此作了努力。

民国时期广东物价的巨大变化与走私活动的猖獗，一直令研究者注目。对此，作者作了联系当时政治经济等实际的分析研究，努力给予客观的回答，认为走私乃是民国时期广东商业的一大特点。

本书文字质朴，资料翔实，且多为第一手史料，又摒除了大量图表罗列之弊，基本上以语言叙述历史，因此减少了一般经济史书的枯燥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可靠性。

当然，本书既然是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作品，那么存在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如对广东商业发展线条叙述方面，略显短缺，各个时段的链接也显得不够紧密，从而未能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有关商业机构与商业团体的研究稍嫌单薄，各商业团体之间的关系和商业团体与政局的关系，似可作适当的补充。

广东商业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民国广东商业史》的选题，十分切合广东的实际。黄增章同志这一专著的问世，无疑对广东历史的研究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值得庆贺。

是为序。

钟卓安

2005年10月25日

目 录

序 言	钟卓安
引 言：清末广东商业形势的演变	1
第一章 在动荡中开拓进取（1912~1926）	7
第一节 稳步扩展的对外贸易	7
第二节 工商业的发展	27
第三节 主要商业行业概况	34
第二章 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1927~1936）	51
第一节 备受压抑和冲击的对外贸易	51
第二节 市场的变化与商业资本的扩展	69
第三节 主要商业行业概况	80
第三章 抗战烽火中的畸形商业（1937~1945）	103
第一节 艰困非常的战时贸易	103
第二节 商业环境的改变与各地商业概况	123
第三节 沦陷区商业	138

第四章 内战摧残下商业的全面破产 (1946~1949)	159
第一节 被窒息的对外贸易	159
第二节 商业环境的短暂复苏与全面恶化	173
第三节 主要商业行业概况	181
第五章 商业市场	199
第一节 商业市场格局的变迁与广州中心市场	199
第二节 各地商业市场	219
第三节 广东与周边省市的商业贸易	229
第六章 商业管理与商业经营	241
第一节 商业行政管理	241
第二节 商业税收	252
第三节 商业经营	261
第七章 物价	280
第一节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的物价	280
第二节 抗战期间与战后的物价	293
第八章 商业团体、从商经验与商业道德	316
第一节 主要商业团体	316
第二节 从商经验与商业道德	335
第九章 海关与走私	353
第一节 海关	353
第二节 走私	362

附 录

一、1912~1930 年各国及港澳地区输入广州商品价值表	385
二、1912~1930 年广州输出各国及港澳地区商品价值表	386
三、1927~1936 年广东进口商品价值表	387
四、1927~1936 年广东出口商品价值表	388
五、广州市外国商店调查表 (一)	389
六、广州市外国商店调查表 (二)	390
七、汕头外国商店调查表	393
八、广州市物品标准调查表	396
九、广东全省各县市镇商会调查登记表	399
主要参考文献	404
后 记	407

引言：清末广东商业形势的演变

广东南临大海，北负五岭，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也是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城市，故虽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各省的货物如苏杭丝绸，江西瓷器，浙江、安徽的茶叶等，依然跨越五岭，水陆兼程运到广州出口。各国的商品如象牙、珠宝、翡翠、染料、工艺品也逐波而来，荟萃于广州，再跨越五岭运到全国各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广州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不再，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取代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其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人侵等，清王朝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和签订屈辱的条约而告终，中国逐渐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西方列强的商品推销地和原材料供应地。巨大的社会变迁也使广东传统的商业贸易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

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不断增多，从沿海深入内地，是这一时期商业发展的特点之一。以广东来说，道光二十三年（1843）被迫开埠通商的广州之外，咸丰九年（1859）被迫开放汕头，之后，光绪初年海口、北海又被迫对外开放，但这一阶段通商口岸仅局限于沿海一带。光绪末年三水、梧州、江门也相继开放，列强势力由沿海城市进入广东腹地，特别是1898年允许外国轮船在通商口岸之间自由航行，广东的商业运输线西江全面开放，对广东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外国和中国的轮船可以在广州、香港、三水、江门、梧州几个通商口岸之间自由航行，上落旅客和货物，大批的洋货和转口土货可以从香港直接运到其他口岸，再由小火轮或木船分运进入北江和西江上游，直达广西腹地以至云南、贵州。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的土货也可以迅速地向这些通商口岸集中，再转运出口。因此，既有利于列强向广东内地倾销商品，也便于他们掠夺廉价原材料。上述的变化从这一阶段广东外贸的进出口数值的变化看出来。

1860年粤海关新关设立之后，对外贸易开始有较正规的管理，通商口岸逐渐有海关报告和海关统计。从《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等海关资料上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前20余年时间里，广东对外贸易总值基本上徘徊于每年2000多万海关两左右，其中进口货物价值在1000万海关两多，而出口数值则略高于进口数值，基本上每年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广东每年对外贸易约有数十万两至数百万海关两的出超。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辛亥革命的20余年时间

里，广东的对外贸易却呈兴旺发达之势，进出口数值快速增长。增长快速的原因包括：香港、澳门与广东达成禁止鸦片走私的协议，在查缉鸦片走私方面进行合作，双方原来紧张的关系得到改善，促使广东与港澳间的贸易额激增；广东在征税上作让步，进口货物只需在通商口岸一次性汇总交纳子口税，便可以自由运到其他地区出售，不必再交税，这对洋货在广东内地销售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相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允许洋轮在内河航行后，引起民族航运业的勃兴，商业运输日趋活跃，导致广东的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1911年，广东进出口总值达到17736万海关两，进口值为9584万海关两，出口值则为8152万海关两，也就是说，洋货开始大量涌入广东市场，广东对外贸易处于入超状态，由此直至民国年间，广东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是巨额的人超，出超的年份极少。

广东的工商业渐趋兴旺发展，从以国内贸易为主转向与国外贸易为主，是该时期的另一特点。随着西方列强军事与经济的入侵，中华民族的前途面临严峻的挑战，广东一批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面呼吁，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外，其他如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何启、胡礼垣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等等，都反映出在民族危亡之秋广东人思想意识的警醒。广东一大批华侨回国投资修铁路，建商埠，开办工厂企业。新宁、潮汕铁路的开筑，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商品集散地日渐繁荣，新式的工业如机器缫丝业、纺织业、火柴业、制革业、卷烟业等工厂的数量迅速

增长，大都与华侨投资有关。民族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广东当地的经济结构，也需要新的原材料，包括部分国外原材料的进口，同时，这些新式工业的产品也需要外地以至国外的商业市场为销售地，因此，广东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进口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鸦片是进口商品的最大宗，但是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末，占进口货值最大的变为粮食和棉织品。广东原为粮食大省，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为著名产粮区。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珠江三角洲的稻田改为桑基鱼塘，或种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或养殖，潮汕平原大量种植蔬菜水果以及甘蔗，所需要的粮食从市场上购买，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所需的粮食越来越多，产粮大省变为缺粮大省。广东纺织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棉纱、棉花，早期印度的棉纱是兴宁县和佛山地区纺织工场重要的原料供应来源，而英国、美国、日本的棉布，美国的煤油，也是广东进口的大宗商品。早期广东的火柴为日本火柴所垄断，但到了 20 世纪初，广东火柴几乎取代了日本火柴的地位。其他如五金制品，也在进口商品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出品方面，茶叶出口历来占据首位，但随着国外茶叶生产的增长，广东茶叶出口已好景不再，生丝逐渐变为广东出口的大宗商品。在机器缫丝之前，广东每年出口的生丝为数有限，远不及江浙生丝，但是 1872 年陈启源机器缫丝厂创办之后，广东生丝质量大为改善，畅销欧美，价高利厚，从

而推动了珠江三角洲丝业的飞速发展，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之后，广东每年外销的生丝都在 2000 万海关两以上。同一时期，也是潮汕蔗糖生产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出口达 100 多万包，主要销往国内北方市场。草席、爆竹、土纸、瓷器等逐渐成为出口大宗。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洋杂货的输入，广东原有的手工工场的产品受到冲击，但是，在竞争的过程中，广东工人对不少洋杂货品种进行仿制和创新，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广货”，并与“京货”合称“京广杂货”，与苏杭杂货齐名，在全国各地有很高的声誉。

生丝、蔗糖之外，农副产品在清末逐渐成为广东出口的大宗商品，蔬菜、水果、牲畜、禽蛋等每年都保持很高的出口额，并持续数十年，这类大宗出口品的销售方向主要是香港、澳门。香港和澳门被租占之后，成为西方列强向我国倾销商品的中转地，因而迅速繁荣，港澳所需的上述农副产品，大都是由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提供。由于地理位置和深水港的原因，港澳也成为广东进出口商品的中转地。广东进口的洋货，除向当地的洋行采购之外，大都是通过香港的办庄采购，出口的商品也大都通过香港的办庄办理。

洋货的大量输入也给广东的商业行业带来新的变化，在与进出口相关联的商品集散地出现了大批为洋行洋商服务的批发商、收购商以及中介性的掮客、经纪等。这些批发商为洋行推销进口商品，收取佣金，洋货通过这些批发商流通到内地乃至外省。收购商则替洋行收购土特产、工业原材料

等，也是从中收取佣金。其他与进出口相关的行业也应运而生。清末广东商界有七十二行之称，就是各行业不断分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模式被打破，广东商业贸易环境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一方而被迫开放市场接受西方的商品，并提供原材料。另一方面，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影响，传统的经济模式发生变化，近代化的民族工商业长足发展，形成以外向型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并为民国期间商业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在动荡中开拓进取 (1912~1926)

第一节 稳步扩展的对外贸易

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军北伐 15 年时间，是广东历史上少有的动荡时期。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但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给广东带来和平建设的局面。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撕毁临时约法，引发了时局的动荡。1913 年龙济光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此人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反袁力量。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场虽然在欧洲，但对于广东出口影响不小，尤其是生丝出口。广东的生丝历来是以欧洲为主要市场，战争使生丝外销大幅减少。1916 年护国战争打响，广东不是主战场，但是驱逐龙济光的战斗波及广东的商业。如龙济光与李烈钧、陆荣廷部在黄沙和石围塘一带对战将近一个月，子弹在白鹅潭上空呼啸。该地是广东外贸船只最集中的地带，此

时商船只能逃之夭夭。随后龙济光又在海珠一带进行大屠杀，导致广州市民大逃亡。龙济光逃往海南后，旧桂系控制了粤局，把广东变成他们的金库，想方设法搜刮。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商业界，各式各样的捐税随之而来。1917年后，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各地支持孙中山的军队来到广东，军费开支增加之外，对商界影响更大的是一些军队占据地盘，以筹办军饷的名义设卡抽税，如滇军在乐昌设卡收钨矿税，每担收税高达大洋5元。1920年底旧桂系被驱逐，广东有了短暂的和平建设时机，可惜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战祸又起，持续到北伐前夕。每逢战事，交通阻塞，商店关门，船只少不了被军队征用，甚至火车也被征用，被迫停运则是平常事。战败者溃逃前大都纵兵抢掠，商业界的损失可想而知。

时局动乱，政权更迭，派生出另一个对商业影响极大的社会问题是匪盗兴盛。珠江三角洲及外海多年来一直受土匪、海盗的困扰。每当广东政局动荡，土匪海盗便兴风作浪。如“1916年4月，广州宣布独立，很快就带来了无数支匪徒的再次猖獗。获悉所有政府军队均已开赴其他地方，他们便占领了许多市场城镇，肆意敲诈，抢劫所有航行于内河的民船……成打的小火轮被这些土匪征用。”“任何一帮海盗征收‘月贡’所开的收据，都能得到三角洲其他海盗的认可。穷苦人不在交贡之列，孤苦者可以从海盗设立的‘中央储金’获得救济，接受救济者就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该地方海盗帮会的成员。”“民国未成立以前，所有大艘香港及出海渡

船，每年缴纳行水 200 元，与贼党收受，便可于各处河道，畅行无碍。今则不然，所缴行水，由 900 元至 1200 元不等。既缴之后，尚有其他贼党，前来行劫，掳人勒赎，实属穷于应付。水路如此，陆路亦然。”^{〔1〕}这是粤海关报告中 1917 年前后的情形。

连年的政局动荡和战乱，是广东时局在这一阶段的特点，但广东的对外贸易却一直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本阶段广东对外贸易的概貌。

1912~1926 年广东对外贸易进出口数值（法币千元）

年份	进口	出口	入超（-）出超（+）
1912 年	141131	115377	-25754
1913 年	174105	136836	-37269
1914 年	175483	112938	-62545
1915 年	153259	119024	-34235
1916 年	154223	139334	-14889
1917 年	156054	133828	-22226
1918 年	147701	131556	-16145
1919 年	155930	160954	+5024
1920 年	143969	157036	+13067
1921 年	232654	187494	-45160
1922 年	275108	216100	-59008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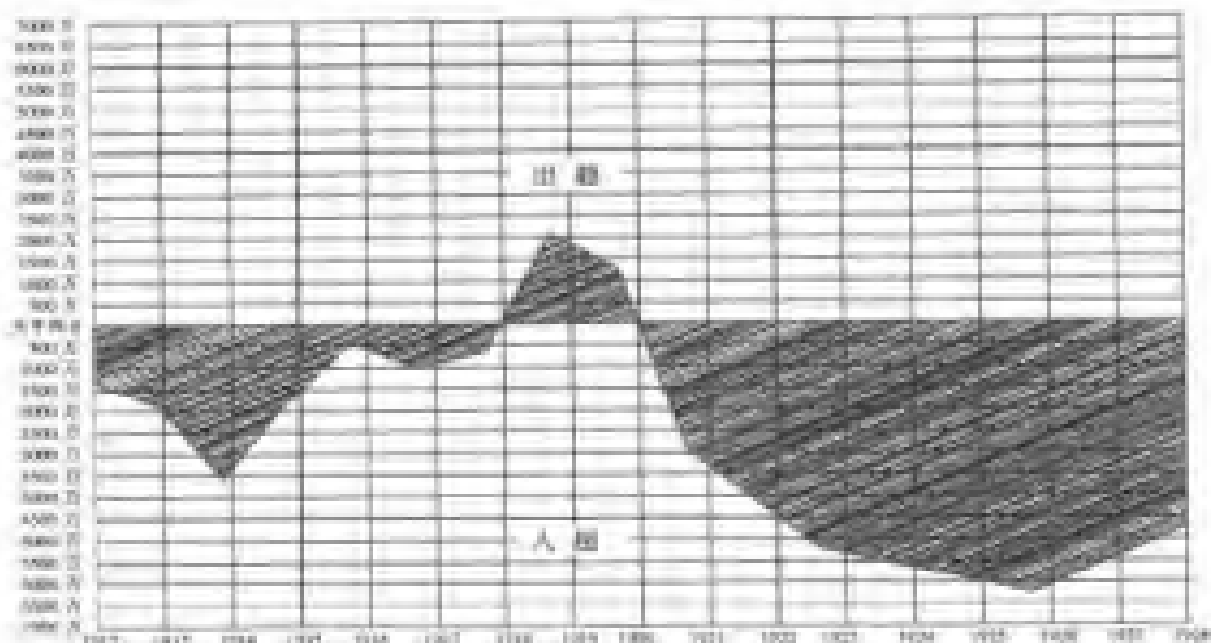
年份	进口	出口	入超(-) 出超(+)
1923年	290671	210526	-80145
1924年	284979	200614	-84365
1925年	204000	126325	-77675
1926年	165330	102363	-62967

民国肇始，千百年的旧秩序被推翻，社会动荡是必然的，但广东的对外贸易所受的影响却很小，贸易总额只比光绪末年略有下降。而1919年和1920年更出现了民国时期仅有的贸易顺差，分别为502.4万元和13067万元。至20年代中期，每年的对外贸易总值几乎都比这一阶段的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难怪外国人对广东的商业在逆境中仍能保持增长表示钦佩。“贸易敏捷，中国各商类优为之，而能占优胜，则以粤省尤为特色者，虽时局或有阻碍，仍能竭力经营，独操胜算。”^{〔2〕}

民国年间广东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绝大部分年份处于入超状态，1919年和1920年有少量的出超，最大出超额也不过2000万关平两左右，这也是民国年间广东对外贸易难得的出超年份了。从民国初年至1918年，各年度入超额都不大，一方面是一些年广东出口贸易呈旺盛态势，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广东工商业界难得的发展时机，在生产 and 出口方面均较前有不小的发展。其后，随着广东经济建设

的起步和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对国外商品的需要量激增，从而出现前所未有的巨额入超。^①

1912~1928年广东全省国际贸易出入超值比较图



进口方面。1912年至1920年的9年时间里，进口总值均维持在15000万元左右水平上，至1921年之后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1920年粤军回粤驱逐旧桂系之后，广东人普遍认为外省人统治广东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企盼已久的“粤人治粤”的时代到来，各方面呈现一片生机。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广州市政建设起步，拆城墙，修马路，建自来水厂、发电厂，1921年公共汽车在广州开始运营。还有，民营工厂也大量增加，这都需要大量的进口物资以推进和维持。于是大量的机械设备进口，还有为加强兵力而大量进口兵工厂设备等等。1925年、1926年连续下降，有几方面原因。其一是1924年10月的商团叛乱，使商业界遭受沉重的

打击。其二是 1925 年的刘、杨叛乱以及东征陈炯明。影响最大的是 1925 年 6 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民国年间，广东的商品进出口极少是由商家直接与外国厂商之间进行贸易，而是主要由设在香港的办庄代理，故香港在广东进出口贸易额中占有绝对第一的地位。省港罢工初期，广州与香港的交通被封锁，使广州与海外商业交往一度受阻。此举显然不利于广州，不久罢工委员会改变策略，8 月开始实行特许证制度，允许除英国之外的船只直接进入广州贸易。10 月开征二五附加税。这种税又称作暂行内地税，除了已经征收特别税的商品如卷烟、洋酒、煤油等，其他普通商品，在原有值百抽五的传统关税之外，加征 2.5%，对奢侈品如化妆品、珠宝等，则加征 5% 的关税。这是广东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的一项举措。

广州虽然取代香港成为两广内河各港口货物集散中心，进出口物资不再经过香港，但广州毕竟无法取代香港，也缺乏深水港。另外，香港居民日常生活的物资如蔬菜、肉类等，主要依靠内地供应，罢工使这部分商品出口中断。其他影响广东外贸的还有诸如反帝情绪的高涨，工人罢工的不断等，都对商业运作影响不小，使大部分洋货的进口都下降。这些都是导致进出口贸易额下降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战争所需物资进口却随之上升，特别是 1926 年北伐前，大量的军需物资如军服的需要，使每一种布匹的进口都大幅增长。

从进口货物的品种来说，这一阶段以洋米谷进口为第一

大宗。广东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省份，在农业上的表现为经济作物的种植比粮食的种植更受重视，从而使广东成为缺粮大省，每年本省生产的粮食，早造只能供三个半月所需，晚造只能供六个半月所需，故必须从国外和其他省份进口大量的粮食。

1912~1926年广东进口米谷统计表⁽⁴⁾ (单位：千公担、法币千元)

年份	洋米谷		占全国进口洋米谷%	国米谷	
	担数	价值		担数	价值
1912年	1211	13291	71.10%	2183	21260
1913年	2376	19445	72.50%	703	6076
1914年	3283	2493	79.60%	876	7572
1915年	4255	31783	83.00%	1017	8532
1916年	5917	43452	86.70%	1763	17270
1917年	4993	36308	83.90%	1229	1217
1918年	3743	30019	88.50%	1281	14064
1919年	936	10980	85.50%	5443	54389
1920年	464	5135	66.10%	3221	31227
1921年	4908	53671	76.30%	548	5504
1922年	8248	83079	71.20%	130	1346
1923年	10366	116044	76.30%	605	6732
1924年	7042	85085	88.20%	2725	33300
1925年	5385	64615	70.50%	1731	19932
1926年	3666	45129	32.10%	45	592

除了1919年和1920年之外，每年进口的洋米谷均超过100万公担。最高的是1923年，达1036.6万公担，价值1

亿多元。是年进口总值为 29067 万元，仅洋米谷进口就占了 39.9%。进口的洋米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就总体而言，越南米约占 60%，泰国米约占 30%，缅甸米约占 10%。另外，国产米谷进口的数量也常常在 100 万担以上。国产米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安徽芜湖米最多，广西米次之，湘、赣等省较少，其原因是运输困难。比如湘米，湖南与广东毗邻，而湖南又以产米著称，但由于南岭所隔，湘米运粤，须先从湖南各地运到汉口，再运往上海，转轮船再运到广东，绕了一个大弯，运费自然也较贵，每百斤约为法币 0.816 元（20 世纪 30 年代的价格）。国产米进口少，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的粮食政策。历代地方统治者都把粮食的管制当作稳定本地区的重要手段，对粮食的出口诸多限制，甚至严格禁止，每当广东需要大量进口国产米时，一些省市便会公布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而粮食歉收时，自然是严格禁止输出。但从总体上说，米谷进口的多寡大体上与广东省和国内粮食的丰歉相关联。北方粮食歉收，则会限制米谷南运，洋米谷进口则相对增加以填补空缺，所以洋米谷与国产米谷成此消彼长之势，但广东还是以洋米谷占绝对优势的地位。

洋糖在 30 年代之前是大宗进口商品之一。仅广州一地，1920 年以前每年进口洋糖价值约在 100~200 万海关两之间，占进口总值的 7%~8% 左右。1924 年达 600 余万海关两，占进口总值的 8.66%。进口的各类糖中，以白糖的数量最巨，约占 80%~90%。食糖进口数量大，与广东人的饮食喜甜有关。白糖进口多，与新式方法制作糖果、饼干和

面包有关。

洋棉布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大宗进口品之一，每年进口值上千万海关两，1926 年达到 11721382 海关两。20 年代初中期广东军事活动频繁，军服行业生意兴隆，是促使洋棉布进口持续大量进口的主要因素。北伐之后，广东军事活动减少，洋棉布的进口也大幅度下降。相对面言，土布业所需要的棉纱进口则由洋纱向土棉纱过渡。洋棉纱受到廉价的上海棉纱的冲击而逐步下降，但洋棉纱与国产棉纱的竞争使广东棉纱市场价格波动很大。1923 年进口棉纱 118043 担，值 5595090 海关两，每担价格为 47.4 元。1926 年进口仅有 46040 担，但价值却有 3323243 海关两，每担价格为 72.6 两。这也表明广东纺织行业处于依赖外来棉纱的状况。

广东所需的燃料长期依靠进口，早期煤油是大宗进口商品，主要是照明的需要，美孚煤油、亚细亚煤油和德士古煤油占据了广东煤油的大部分市场，每月进口均有一二百万加仑。1923 年进口煤油达 27951486 加仑，价值 7541525 海关两，为本时期的高峰。此后受到土制煤油的竞争而逐渐减少。柴油进口量很少，每年只有数千吨而已，主要是各种机械消耗之用。煤炭也是进口大宗，主要是抚顺煤、开滦煤以及鸿基煤等，每月进口少则千余吨，多则六七万吨。每年进口价值均在数百万两左右，1926 年进口量为 726033 吨，价值 5708375 海关两。

此外，钢铁进口在 20 年代初期基本维持在每年 300 多万海关两的进口，洋纸每年也有 100 多万两的进口额。

鸦片进口曾占很大比重。民国元年，仅粤海关进口的鸦片就有 580 万多海关两，占该埠进口总值的 22.27%。民国 4 年之后，逐渐减少，1917 年仅有 30 多万海关两。原因是从此年开始，鸦片被禁止进口，此后海关册中不再有鸦片进口的记录，但鸦片仍由走私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广东。

出口方面。这一阶段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广东出口商品的结构有一些影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欧洲的布匹减少，促使广东许多纺织厂开办，1915 年仅粤海关的棉纱进口就达 9.7 万担，其结果是次年出口的土布增加到 13000 担，创此阶段土布出口的最高记录，其后数年广东土布出口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世界大战促使美国钢铁工业寻求国际市场上的钨砂，于是钨砂第一次出现在粤海关的出口贸易中。1917 年英国政府禁止中国的茶叶进口，使茶叶出口大为减少。1922 年为此阶段出口的高峰，达 21610 万海关两，10 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于此可见商业界于动荡环境中的奋发进取精神。1925 年和 1926 年大幅度的下降，其原因也是如上所述的客观条件的影响所致。

出口商品中，以生丝为第一大宗。这一阶段也是广东丝业最繁荣的时期。下表大体上可以反映生丝出口的情况：

1912~1926 年广东生丝出口概况表⁽⁵⁾ (单位：关平两)

年份	生丝包数	价值数值	占全省出口值%
1912 年	44326	20379991	28.8
1913 年	55093	29059058	34.3

(续表)

年份	生丝包数	价值数值	占全省出口值%
1914年	43340	22954795	38.6
1915年	38509	21142295	29.0
1916年	41593	30975540	35.7
1917年	47549	28826195	35.0
1918年	38701	27365122	33.4
1919年	65590	37785968	38.3
1920年	35467	28968372	30.0
1921年	53765	43458954	37.8
1922年	66098	58472467	43.8
1923年	56420	53815705	41.7
1924年	61405	46287496	37.4
1925年	65403	56705337	73.4
1926年	66679	55855364	86.1

从上表可以看出，生丝在广东商品输出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中1925年至1926年，由于省港罢工的原因，与香港一度断绝经济联系，原本在广东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对香港的贸易停止，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出口基本中断，广东输出贸易额下降了近38%，而生丝则可直接输出欧美，故其在广东外贸中所占的比重陡然上升。1926年10月省港

罢工停止，对外贸易恢复旧观，1927年，广东的生丝出口回复到将近44%的水平。以上仅仅是出口生丝的价值，不包括蚕茧、废丝、丝制品等，如果将这些加在一起，则丝类商品出口价值应占广东出口总值的50%以上。

这一阶段是广东生丝出口的高峰时期，1920年前后，生丝价格昂贵，当时有一个很普遍的比喻：丝绸衣服的价格等于同等重量的纯银价格。^[6]

食糖也是出口大宗商品之一。广东为中国最主要的产糖区，其中又以潮汕地区为最。潮汕地区又首推揭阳，次为普宁、潮安、澄海、潮阳等地。民国之前潮汕产糖旺盛时期，每年出口约达160万包（每包100公斤），民国元年潮糖出口有120万包，每包值10余元。据1922年海关报告，是年全国出口土糖1473426担，其中潮海关出口占958345担，占全国出口量的65%，由此可知潮汕糖业的地位。^[7]但潮汕蔗糖主要的销售地是上海、长江口岸及北方一些地区，民国初年已受洋糖的压抑而呈衰落之势。洋糖主要是来自南洋各国的白糖，以印尼糖为多。另外，英国太古洋行在香港鲗鱼涌设有大型糖厂制造白糖，以内地为销售市场。进口白糖甜味虽不及潮汕糖，但色泽美观，价格低廉，受人欢迎。上海和北方的市场逐渐被香港运去的洋糖所占据，潮汕糖受到排挤。另外，制糖技术的落后是潮糖衰落的又一原因。传统的制糖方法是在糖寮中进行，以牛挽石磨榨甘蔗，以甘蔗渣当燃料熬蔗汁，再使之凝结。在此制作过程中，厂商常常加入壳灰等物，使糖变为黄色或灰白色，目的是更容易出售。但

是，内行人如制作饼饵的商家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洋糖较土糖更纯净更好，洋糖一分胜土糖二分，久而久之，土糖的销路越来越差。当然，甘蔗品种长期得不到改良，也是潮糖衰落的又一主因。1925~1926年，潮糖出口量只有30万包左右，1929年竟然降至10余万包。^[8]

茶叶曾是广东的大宗商品之一，它和丝的出口曾对广东经济有重要的影响。但从清末开始，便受到斯里兰卡、印度等国茶叶的竞争，国际市场价格大跌。民国时期广东茶叶以清远、四会江谷乡及鹤山古劳茶最有名，出口的茶叶以罗定的青茶、鹤山的生茶和揭阳的炒茶为最多。民国初年的出口数尚保持每年100余万海关两，主要销往美国及南洋各国，1923年出口茶叶51192担，价值1397606海关两，1926年44049担，价值1494503海关两，为民国年间出口的高峰时期。

草席是广东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主要产地以海康为第一，最高年产量为500万担。东莞居次，最高年产为40万担。其他地区如高明、高要、海南、清远、三水、四会、和平、兴宁、揭阳等许多地区也有出产。全省总产量最高可达年产596万担。以当地出产的茆草为原料。染色颜料则来自德、美、英诸国，每年进口值约为10余万元。产品分花席、地席、包装席等，外销的草席以花席和地席为主。该业以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方式生产，每年除本省销售外，多运往南洋，也销往日本、荷兰以及英、美、德、法等国。销往国内其他省的很少。20世纪20年代初，是草席外销最高的年

代，海康出产的草席年产约 500 万元。该地出产的包装席 75% 运往日本，用于包装糖和海产品。25% 销往东北和上海，用于包装盐。产品运到赤坎，再转运到香港出口。^[9] 20 年代中期每年出口的草席价值约为 250 万元至 300 万元之间。

土布是广东重要的出口产品，主要是销往外省。在洋纺织品大量涌入广东之前，本省农家副业生产的自纺自织“家机布”足够供给人民衣着之用，还有大量销售到省外。后来纺纱业发展，农户才向纱店购纱回家织布，土布的质量由是大有提高。广州是广东土布生产的一个中心，生产工人约有 10 万人之众。土布销售的中心则在广州市上九路。该处数十家土布批发商，广州和附近厂家生产的土布几乎全部由这些商店收购。佛山平洲的土布则多由女布贩肩挑至市内兜售，再买纱回去发给织户。广东出产的土布以广州所产为最好。广州土布销售主要是水路可通往的地区，如海口、北海、四邑、两阳及汕头，占总额的 50%。省外主要是广西，约占销售额的 40%，其余 10% 则主要销往福建和湖南。^[10] 也有少部分出口到南洋。佛山的产品略次于广州所产，主要销往西江和南路。另一个土布生产中心是兴宁，其生产工人也在 10 万人左右。兴宁土布质朴耐用，产品主要销往福建、江西一带。佛山平洲的土布厂家，有不少是兴宁人前往开设。广东土布业出口最兴盛时期是 1919 年前后，每年生产约七八十万匹，每年销往省外的价值超过 1500 万元。进入 20 年代后便呈下降之势，1923 年还有约 700 万元的出口值，

此后大体上都少于这个数值。

绸缎是出口大宗之一，广东绸缎生产的基地集中在顺德一带，有数千家之多，其余则分散在广州、南海一带。主要是利用当地出产的丝、麻等为原料。薯蓣纱绸是该行业的名产之一，在国内外市场均有很高的声誉，产品大多数运到广州出口。1912年，粤海关出口的绸缎540余万两，占广州全埠出口总值的11.41%。次年增至870余万两，此后徘徊于此数值之间。至20年代初期增至近千万两。1926年出口为8962担，价值10811901海关两，为民国间的出口高峰期。

针织品出口主要是潮汕的抽纱品。民国之前潮汕民间妇女手工艺品主要是戏服顾绣，这项工艺品随着时代进步而衰退，抽纱业取而代之成为当地妇女最主要的手工业之一。全业工人中，妇女占90%以上，全潮妇女从事此项手工业的人数在这一阶段约有50万人之众。此项手工艺最初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传人。19世纪末叶，汕头教会医院的医生赖荷夫人（Mrs. Lyall）^{〔11〕}，也是位传教士，见女教徒经济自立能力弱，于是召集了一批妇女，教她们做抽纱工作，产品都运到美国出售，将利润的一部分给女工们，一部分用于兴办教育，办起了岩光学校。其后，又有一位女传教士在角石教这种手工。抽纱工艺就这样一步步地传开，进而有人专门开设抽纱店铺，招收女工做抽纱，逐渐成为潮汕地区最主要的出口手工艺品。潮汕抽纱工艺可分为抽纱、刺绣、补布、花边、编织等类。在地理上各县又有所不同：潮安擅长刺

绣，潮阳以补布和花边见长，澄海精于绣边及补布，揭阳为抽纱，饶平则是花边及编织。产品主要是手帕、枕头套、床布、女装内衣、餐布、托盘布、头巾、手套、花边等。抽纱的原料 2/3 来自国外，如英国、美国、比利时的竹纱、竹布、白洋布，暹罗的胶纱等。特别是爱尔兰的竹布，用途最广。原料的 1/3 来自国内，主要是潮州揭阳的夏布及丝、绸。

潮汕抽纱经营方式：大多数抽纱是家庭式的手工业。经营抽纱的商家可分为外国洋行和华商两种。洋行经营多半自行进口原料，甚至设计花样，聘请华人代理，这种代理称为二盘代理。二盘代理将原料分发给下一级的代理，一般称为内地代理，或间接工头，这些工头领取原料后，下乡将原料发放给各农户。抽纱女工完工后，将成品交给工头，工头交给代理，代理将产品送到潮安刺绣，最后运到汕头洗涤、烫熨、包装、配送出口。华商经营的抽纱也大都是采取这一方式。但华商经营的抽纱有相当部分是直接出售给各百货商店，或在自设的门市部出售。也有不设门市部，自行办理出口。将原料派放给抽纱店，再派人定期从揭阳、潮阳、澄海等县收购，然后送到潮安刺绣，再运到汕头洗涤包装出口。^[12]因为此行业成本低，广东省当局为了保护这一手工艺，特别给予出口免税的优惠，不少人因此而致富。潮汕每年抽纱的出口额至少都在 500 万元以上，一般都是千万元左右。

土纸曾是广东重要的出口品之一。北江南雄、始兴、兴

化一带盛产竹子（一般是广州泰康路的竹木行先行贷款给家户，再定期砍竹。竹木行将部分竹子直接出口，剩余的则制竹器）。用竹子制纸是当地的主要的家庭手工业之一。竹子除运到广州出售之外，剩余的则用来制纸。土纸主要销往南洋一带。据广东实业厅的统计，20年代初期北江纸经广州出口的每年达300余万元。又如潮安县以手工制染的色纸，每年出口额就达120余万元。

广东水果生产，北部以桃李为多，南部即海南为椰子，中部则以柑橘、香蕉、荔枝、龙眼为多。输出国外的“平均每年值国币二百三十七万余元。其中橘占输出总额百分之四十七，其余占百分之四十九，梨及苹果最少，占百分之四。输往国内各省者，平均每年值国币一百二十三万元。”^[13] 柑橘中以潮州最有名，其中又以潮安蜜柑为最，澄海、揭阳次之。“潮州之柑园统计广达四万亩，每年出产运销于南洋群岛及天津上海东北各地，收入恒达二百余万元。潮属柑农赖以维持生活者，数在十万人以上，前当柑价佳时，十口之家，有柑三亩，则衣食绰有余裕。”^[14] 化县水果主要分橘红和柑橙两大类。橘红主要用于入药，晒干后卖给专门的采集商，大批销往河北、山东及江浙一带。柑橙则由于运输的原因，基本限于广州湾及南路各县，广州、香港也难得一见。香蕉以东莞最多，番禺、增城次之。其他各县也有，但输出以上述三地为主。据有关人员估计，全省香蕉产量在500万元以上。“香蕉市场，以上海为最大，约占全国产量十分之四，广州约占十分之一一点五，天津约占十分之零点五，香港

约占十分之一，其余如陈村、江门及内地各城市约占十分之三。”^[15]

烟草也是广东出口的土产之一，出口的主要是烟叶和烟丝。此阶段广东产烟的县份首推鹤山，年产在 10 万担以上。其中上南芸蓼乡的烟以香醇著名。该地出产的烟大都由当地的烟丝庄收购之后，制成熟烟或生切烟，运销广州、港澳和江门，再出口到南洋和美洲（以三藩市最多）。鹤山之外，则以南雄为多，年产烟叶 8 万至 10 万担之间。价值约在 400 万至 600 万元左右（至抗战前南雄的产量逐渐超过鹤山，最高时年产量将近 30 万担）。产品多制成黄烟丝，销于省内各县，部分被香烟制造厂如英美烟草公司收购，制成卷烟。经营此行业者有广帮和福帮之分。广帮制生烟丝，销于省内为主。福帮则以制熟烟为主，运销云南等地。民国初年，粤海关出口的烟草约在 100 余万两左右，20 年代逐渐增至 200 余万两。1926 年出口额为 230 万两。烟草出口大体上维持在占每年广东出口总额的 2% 左右。20 年代以前，以烟丝出口为多，其后则以烟叶出口为多。

陶瓷在民国初年是出口大宗之一。生产地以潮州枫溪和佛山石湾为主，其中潮州枫溪从事陶瓷生产的家庭式小手工业有数千家之众。生产花瓶、茶具、碗碟、杯盘、文具为多，销往南洋一带。全省出口以瓷器较多，每年均超过 200 万海关两。1923 年出口 512550 担，价值 2667497 海关两。陶器则在 50 万至 100 万海关两之间，1924 年为 187515 担，价值 967004 海关两。

藤器行业除制造椅桌之外，还有藤篮、藤箩、纸篓，以至藤床、玩具等。产品运销国内各省及南洋、欧美各地。出口价值“总在 400 万元左右”，经营此行者以南海的浔峰、泌涌、沙贝及兴宁县为主。约有 4000 余家。^[16]属于半工半商性质。而广州办理出口业务的商家主要集中在泰康路、杉木栏、十八甫一带。制藤原料早期主要从新加坡、马来亚、孟加拉进口，后来则多从台湾输入。欧美及南洋有外国人设专门公司办运广东藤器。

爆竹业曾是广东主要的手工业之一，全省各地均有生产，尤以东莞、南海为最。这种家庭式手工业生产，所需资本少，百数十元即可，所用工人，多为妇女、儿童，工资极低廉，以此谋生者，全省不下 10 万人。清末以来我国输出国外的爆竹，广东居第一位，每年约在二三百万海关两。输出地以越南为最多，新加坡、荷兰为次。但至 20 年代末，本省爆竹生产厂家纷纷迁到澳门，因为本省征收高额的爆烈品专税，印花税也加重。另外，越南的市场逐渐为广西所占领，而本省市场则被源源运来的湖南爆竹所充斥。

阳江漆器民国前已相当著名，英美及南洋一些国家在阳江设行，专门采购该地出产的漆器，每年销往港澳及省内的就有 26 万元左右。

关于广东与各国商品进出口数值，早年由于政局动荡，没有相应的管理与统计机构而失载，各海关关册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按国别来区分广东与各国贸易的准确数据。中山大学有学者对民国元年至 1930 年广州外贸的调查

统计时，对一些国家，主要是英、法、德、新加坡、印尼、泰国等与广东贸易关系较密切的国家，也无法获得完整的资料，不少年份只好付诸阙如。^[17]而香港占广东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实际上，香港进口广东的商品中，除了该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畜产品、蔬菜、水果等之外，其他从广东进口的商品大都转运至各国，也有部分运往内地各省市。由香港本身生产、售与广东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及水产品，其他向广东进口的商品大都是从别国和内地其他省转运的商品。所以香港在广东对外贸易中主要还是起着中转站的作用。这一点从省港罢工时期广东对外贸易统计中可以看出。1925年开始的省港罢工历时1年4个月，是时广州与香港断绝经济关系，广州与香港间的运输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于是，这两年广东对香港的贸易额陡然下跌。1924年香港输入广州的贸易额为4815万两，1925年下降至2606万两，1926年再跌至1278万两，为前所未有。同时，广州输入香港的贸易额也大体相同。1924年广州输入香港的贸易额为8074万两，次年跌至3904万两，1926年降至1799万两。必须说明的是，省港大罢工的时间是从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罢工前曾正常贸易，罢工结束后也立即恢复了通商，才有如上数字。

香港为广东与国外通商中转站的地位，从广东与各国贸易额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来。省港大罢工期间，因香港无法担任原有的角色，而国民政府必须保持商业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供应，也必须尽

量推动商品的出口，故制定了单独对英的策略，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轮船以及不是经过香港的各国轮船，可以直接进入广州。于是，在罢工期间进出广州的外国轮船大幅度增加，各国对广东的贸易额也变化巨大，广东与各传统贸易国的贸易额在大罢工期间大幅提升，而罢工结束后又回复原有水平。如从1924至1927年的4年时间里，广州输出越南的贸易额为27万、233万、1232万、22万关平两；输出美国为9万、63万、85万、2万关平两；输出新加坡为43万、160万、698万、1万关平两。^{〔18〕}其他各国也大体如是，都是在省港罢工前后呈现陡然的剧升剧降。

日本与广东的贸易在民国初年远不及英国，但它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使其与广东的贸易额大幅提升，其后又利用省港罢工的机会，使其对广州的贸易额达到近2000万两的高额。越南大米在广东进口的洋米中占首要地位，但其出口的大米，输入粤东的基本上直接运往汕头，而销往广州一带的大米则多半经香港的办庄转售。

第二节 工商业的发展

清末民初，是广东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随着西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各国力图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使之成为其商品的市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仅体现在商品输出，也体现在资本输出上。广东处于对外交流的前沿地带，所受的影响更深更广。在这一时期，九龙与广州湾的

租借，西江、三水等地被辟为商埠，广东被迫开放的地区从沿海逐渐扩展到内地。内河航行权的丧失使洋轮进入广东腹地，广东原有的商业市场结构因之发生变化。英国取得广九铁路的承筑权，美国取得粤汉铁路借款权和承筑权，都是西方资本输出的例子。

在西方经济侵略加剧的同时，作为我国中西文化交流前沿阵地的广东，早期大批赴海外的华侨，在吸收西方先进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广东的经济建设，对于广东的工商业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投资修建铁路，建商埠，办企业，成为热潮。如潮汕铁路、新宁铁路的修筑，台山、中山等地商埠的兴建，一批机器缫丝厂、纺织厂以及制纸、火柴、卷烟、制药、制革等厂家纷纷设立。从下列的调查资料中可略见民国初年广东工业的情况。

1912~1913年广东手工业作坊与手工工场统计^[19]

业别	1912年		1913年	
	家数	职工人数	家数	职工人数
棉织业	—	—	49	628
制线业	9	103	—	—
织物业	182	4495	36	1669
刺绣业	2	21	—	—
成衣业	91	933	79	800
染房及漂洗业	19	423	40	610

(续表)

业别	1912年		1913年	
	家数	职工人数	家数	职工人数
针织业	12	110	5	125
窑瓷业	642	7912	289	4060
造纸业	96	1657	77	1134
制油及制蜡业	258	2996	111	1344
制漆业	5	48	—	—
火药火柴业	67	2695	4	901
染料颜料业	25	284	10	81
制香烛业	16	237	14	159
酿酒业	24	194	102	1540
制糖业	406	5520	229	2804
制烟业	79	759	43	425
制茶业	10	306	—	—
糕点制造业	9	72	—	—
印刷刻字业	2	14	1	82
纸制品业	6	56	73	2273
木竹藤梭柳器业 ⁽²⁰⁾	32	384	88	2171
毛皮革制品业	40	387	63	619
玉石牙骨介角制品业	7	83	10	99

上表是根据民国政府农商部 1912 年和 1913 年对全国 25 种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调查资料中广东的数字重新编制而成。另外，对于当时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使用动力的情况也有个调查。其中 1912 年广东 2426 间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中，使用动力的仅 136 间，占总数的 5.61%；没有动力的有 2290 间，占总数的 94.39%。1913 年广东 1688 间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中，使用了动力的有 104 间，占总数的 6.16%；没有使用动力的为 1584 间，占总数的 93.84%。

民国的建立，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广东商业的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对中国的商品倾销有所减低，从而使广东的民族工业如造船业、航运业、纺织业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进入民国之后，资本主义机器商品输入日益加快，工业、农业生产者都逐渐认识到机器对促进生产的作用，但这些机器都是由国外进口的，社会的需求促使本省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机器厂，如 1912 年成立的协同和机器厂，1917 年设立的广同安机器厂以及由均和机器厂改组的均和安机器厂等。

火柴工业：火柴业是广东新兴民营工业中的佼佼者，1879 年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开办了我国第一间火柴厂——巧明火柴厂，其后火柴生产逐渐成为广东重要的制造业之一。其他较有名的有广州东山火柴厂、广东火柴厂、民生火柴厂、文明火柴厂等。广东的火柴市场原为瑞典和日本

火柴所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抵制日货给广东火柴业以崛起的机遇，火柴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仅 1920 年，新成立的火柴厂就达 23 家之多。是时，广州的火柴厂有 30 家。广东生产的火柴销路很广，其中广西市场销售的火柴 90% 来自广东。

橡胶制品工业：1919 年，广州成立第一家制造橡胶鞋底的工厂，称为广东兄弟公司。当时牛皮昂贵，而橡胶鞋底便宜，消费者亦以胶底鞋为时尚，使胶底鞋业迅速发展。1922~1923 年，广州生产此类鞋底的店有 23 家，月销鞋底 10 万对，盛极一时。

土布业：在清末洋棉纱大量进口之前，广东的土布织造仍沿袭家庭作坊的手工形式，随着洋棉纱取代土纱，佛山、兴宁两个织造中心逐渐形成，广东生产的土布由此沿西江、北江向西南各省以及湘、赣、闽诸省销售。但广州直到民国初年才有织布厂，并逐渐发展为广东土布生产的一个中心，广州的土布批发中心也由此形成。^[21] 广州的土布厂家大多数在河南瑶头、克家井、芳草围一带，约有 60 余家，其余小北、南关约有 40 家。广州附近的南海平洲及西樵也有不少厂家，也是重要的土布生产基地。1926 年广东实业厅的统计报告说：“查省河织造土布店户，大小合计共三千二百余户，男工一万六千余人，女工六万五千余人，总计约八万一千人之谱。”^[22] 20 年代末渐增至 10 万余人之众。土布生产除了传统的手工织造及木制织布机进行纺织之外，较大的工厂都是用蒸汽机或电动机作动力。有些品种的土布质量很高，

在式样和图案方面采用西式设计，可与西洋产品相媲美，有些甚至胜过西洋产品，如提花布和仿山东柞丝绸。2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广东布料市场国产土布占有较大优势，改变了过去洋布充斥的局面。

针织业：广东针织工业起步较早，道光年间便有了织袜作坊。随着舶来的针织品的增加，在引进针织技术和模仿的基础上，广东针织业在袜、毛巾、内衣等的织造上日渐发达。民国之后，这一行业更有长足的发展，仍以衫、袜和毛巾的织造成绩较佳。特别是织袜业，从1912年至1918年，粤海关每年袜类进口数量约在10万打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州的织袜业迅速兴起，并以其成本低，价格低廉，质量足与舶来品相媲美而成取代之势，洋袜再也无法回复原有的地位，1919年进口仅有3万打，以后逐渐锐减，此后每年仅剩数千打，1920和1925年只有数百打。与此同时，广东生产的袜却在出口上呈不断增长之势。民国初年，每年外销的针织袜不过数千打，1915年增至9000余打，次年突增至3万余打。1920年达10万打之多。此后与洋货成竞争之势，互有消长，但出口一般都维持在4万打左右。^[23]位于广州河南的织袜厂“设备新式，其产品质量优良，在广州及海峡殖民地均易于销售，似乎有可能取代香港和日本货。香港和日本生产的袜子已不再像过去一样大量进口了。”^[24]

家具制造业：在广州一直较为发达，这里主要是指红木家具的制造。采用进口红木制造的家具，如衣柜、椅子、沙

发、床、凳子、花架等，具有非常精致漂亮的外观，畅销海外，特别是美国。而西式家具的制造则是民国以后才大量出现。主要是广州大新公司、先施公司和真光公司。这些公司制造的西式家具均具有一流的工艺水平，油漆精致完美，各方面均可与欧洲制品相媲美。其中大新公司、真光公司的制品主要在本地销售，很少出口。先施公司的产品则大量销往梧州、南宁等地。

先施公司的化妆品很有名气。产品出口至香港及西江各地，甚至运往美洲销售。

本地工业以其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廉而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如火柴生产基本上取代了原先占据广东市场的瑞典火柴和日本火柴。藤制品的市场原来多为日本货，但在此期间，本地产品贸易十分活跃，制造出各式各样的藤产品，有些产品比日本进口的还要好，使日本货退出了广东市场。仿洋货的丝袜、棉袜、皮鞋、皮箱、化妆品等，出口到香港，其价格大约等于同类进口产品的一半。

交通运输：1906年开始兴筑的广九铁路于1911年10月完成全线工程，188公里的路程最初需大约4小时30分钟，虽然如此，毕竟使广州与香港之间的交通大为改善。不过，此时直至抗日战争爆发，这条铁路主要还是用于客运，货运量很小，约占广东与香港间货物运输总量的7%。而轮船仍为绝对主力，约占77%，民船约占16%。^[25]原因是铁路货车少，运费贵，装货卸货较轮船困难等等。另一方面，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没有连接，货物需要在黄沙和大沙头转

运，给运输增添麻烦，这也是铁路货运量难以提升的一大原因。

第三节 主要商业行业概况

此期间广东虽然受到政局动乱的影响，不时的金融小风波也对市场有影响，但这些影响总体来说是短暂的。这一时期广东商业处于平稳发展时期，一些对商业影响很大的百货商店，如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都是在这一时期设立。全省各地市场相对比较稳定，货源比较充裕，多数经营者皆有利可图。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广东当局对于本省商业基本上没有管理可言，所谓管理实际上只是征收各项捐税而已，而捐税又是由各承包商或各行业内部包承包缴，于商业情况自然缺乏调查。即使是广州这样的商业大都市，也是如此。以下资料，是广州市公安局为了加强治安管理，对各警区进行户口调查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商店资料。

1925年广州市各行业店铺间数调查表^[26]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金铺	57	银行	13	汇庄	26
银业	381	保险	27	大押	152
小押 ^[27]	77	新故衣	396	古玩	78

(续表)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收买杂架	408	酒馆	199	戏院	4
茶楼	359	旅馆	171	娼寮	133
影画场	5	游戏场	2	泡水浴房	65
理发	539	荐佣	46	星卜相命	77
中西医馆	528	中西接生	58	炮竹烟火	31
火水酒	61	人寿会	10	车业	52
车辆挑夫	502	屠业	351	牲畜雀鸟	289
生药	222	中西熟药	934	参茸	69
报馆	17	金花纸札	111	纸料油烛	478
花圈	41	度量衡	38	洗衣	127
酒米柴炭	1580	煤炭	105	花生芝麻	68
油糖豆	242	茶叶	122	织造机房	1294
饮食店	577	金银器	496	珠宝玉器	395
颜料	58	寿板衣	106	罗经日晷	8
钟表	117	树胶	9	星牧	30
金锡箔	41	铜铁器	1194	锡器	48
机器	158	瓷瓦器	229	竹器	380
木器	1203	藤器	126	金漆器	49
酸枝花梨	365	玻璃车料	752	砖瓦灰	102

(续表)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石业	112	泥水木匠	826	搭棚	115
油漆	91	天窗	104	鲜咸鱼	297
鲜糖果	548	瓜菜	298	京果海味	221
酱园	101	杂货	915	烧腊肉味	178
豆腐腐竹	213	盐业	72	面粉	132
饼店	234	烟业	451	顾绣栏杆	121
绸缎布匹	476	皮草	39	靴鞋履	994
凤冠帽袜	41	洋货	473	绒线	66
苏杭杂货	100	棉花花纱	146	旗帜伞轿	22
皮革	203	皮箱	89	骨角器	185
铺垫席	60	纽扣	55	象牙	97
灯笼	42	灯色	101	裁缝车衣	755
蚊帐卧具	40	筷业	32	脂粉刨花	26
梳篦	23	眼镜	46	军用品	17
扇业	65	镜业	59	书籍	111
笔墨	115	墨砚	15	联帐	85
印刷	150	裱糊	56	神像	42
生花彩仗	52	写映相	45	雕刻	112
乐器八音	16	租赁器物	35	修整杂物	43

(续表)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行业	间数
山货	83	里纜浆槽	59	蒲打包	86
葵篷菱草	25	税捐	22	信馆	23
代报馆	118	矿务	16	制雪汽水	13
船厂	88	自来水	2	土敏土	9
电气	54	南北庄口	208	土丝行	132
晒水染房	230	厕所	443	田料	47
纸盒布朴	117	教戏馆	17	番枳茶仔	67
毛发	74	货仓	239	美术馆	23
麻业	8	牙科	101	罐头	12
置业	14	公仔人物	7	枢庄	11
航业	26	其他	1941	合计: 31715	

以上是 1925 年广州市 150 多个行业调查统计的数字。原调查所列包括 1924 年和 1925 年两年间广州各警察区店铺数字，由于这两年间增减很少，故仅列 1925 年的数字，从中可以看出广州商业的一个侧面。由于并非行业本身的调查，故于分类上毕竟有欠妥当之处。其他如织造机房，树胶、靴鞋履、皮革、皮箱等，也分列不清。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传统的商业分类方式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并无“百货”的分类。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逐渐进

入中华，广东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头堡，在接受西方商品的同时，学习并对舶来品进行仿制和改造创新，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广货”，其后广东商人在内地的不少商埠开设“广货店”，再进而发展到“京广杂货店”，经营这类商品者大都兼及进口洋货，经营范围包括洋油、洋皂、洋铁皮、钟表、玻璃、针织品、棉织品、化妆品以及地方手工艺品等，通常称为“土洋杂货”店。开始将这类商店称为“百货”店，是20年代以后的事。因此，当时广东的一些新式的百货商店虽然已先后设立，如广州最早的百货公司“光商公司”于1907年在十八甫开业，真光公司于1910年开业，先施公司于1914年，大新公司于1918年也分别开业，但人们仍以“华洋杂货”、“土洋杂货”称呼。

现将各行业在这一阶段的情况简述于下。

米业：米业的经营主要分为四种形式，即米糠行、米商行、米机行和谷栏。米糠行主要是从事大米的采购，因而经营数量巨大，又被称为米埠。此行中以进口洋米为大宗。至于经营国产米进口的商人，又称为三江帮，主要是从芜湖、镇江等长江流域采购大米回广东，做批发生意。广州米糠行全部集中在沙基一带，都是资本较为雄厚的商家，1929年以前是米业最盛的时期，也是利润最丰厚的时期，经营者达100多家。30年代之后洋米开始征税，加上国米进口渠道增加，利润随之较薄，经营此行的商家有所减少，但一般情况下也约有二三十家。米商行则是专门零售的米店，是从米糠行、米机行批量购人大米后零售给消费者。米机行则是碾米

的行业，其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自行购入稻谷，加工后出售；另一种是专门代客加工，多半是代米糠行加工，收取佣金。本行业主要分布在广州市花地河南一带，20年代末有30余家。随着碾米机器的引进和生产，机碾米较传统的碓臼米受欢迎，加工碾米行业在农村地区逐渐发展，就地购买加工更为省事。另外，市区内碾米机噪音扰民，曾广受诟病，故此行业在30年代之后已逐渐在繁华都市里被淘汰。谷栏是指从本省东西北江各属采购谷物，谷栏随着城市发展和米机业转到郊外，也渐渐转达为采购大米，成为“米栏”。米行生意营利高低与农业收成关系很大。大凡粮食歉收，米价高涨，该行便获利丰厚；粮食丰收，米价低跌，则利润微薄。但二三十年代，广东的米价起伏很小。

栏口行：指专门从事肉类、水果、蔬菜批发的行业。广东的肉类行业、水果行业分为栏和店两类。如猪栏、牛栏、鸡鸭栏、鱼栏、果栏等。栏主要是从事批发，是代生产者推销这类农副产品，只收佣金。这类经营方式在一些商业中心城市，如广州市、江门市、汕头市较为普遍，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周边农村出产的农副产品在长期约定俗成的地点形成这类集散地。如广州的猪栏集中于六二三路金利大街一带。水果栏集中于一德路永安约和增沙蔗栏一带。店则主要是零售性质。但经营鸡鸭鹅的则以零售为主，也兼做批发生意。在这一行业中，鸡鸭鹅的生意一向较平稳。猪与牛的生意则大不相同。猪的生意为大宗，因为广东人认为猪肉性平，日常生活中大都离不开它，且一般的年节祭祀和结婚中要用金

猪，还喜吃烧乳猪一类。牛则不同，在西风东渐之前，许多人认为牛肉热毒，食之无益，更有人认为牛为兽，食之有罪，故牛市不旺，市价也在猪肉之下。至于羊肉，广东人只作为秋冬季节的补品，价昂而经营额少。水果的生产因受气候的影响大，有大年小年之分，故生意颇难定数。菜栏则多半是向摊贩批发。

京果海味行：广东人喜欢吃海味，视之为席上佳肴，为酒楼必备，吃咸鱼则是普通家庭的消费。本省海产事业不发达，海味大都从海外进口，特别是从日本进口，历年舶来的海产品为数颇巨，又以咸鱼和鱿鱼、墨鱼的进口数量最大。如1924年广东进口的鱿鱼、墨鱼共146805担，价值4236891海关两。进口咸鱼（不包括咸青鳞鱼）为674295担，价值4225661海关两，数量惊人。^[28]广东人也喜欢吃甜品，饼食亦在其中，京果、糖则为饼行必需品，故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不少，生意也历来较为平稳。京果海味行的生意与酒楼和饼行的关系相当密切。大凡酒楼营业不景气，如30年代，这一行业的生意也大打折扣。但总的来说，这一行业的生意历来不错。海味行在广东经济不景气的30年代初期，其经营也大受影响，但吃海味作为一种习俗，不容易改变，市内虽然疲弱，四乡仍销售畅旺。另外，日本的海产品在广东的销量极大，因此，与日本关系也对本行生意影响不小。广东曾多次发生抵制日货运动，日本海味也是走私品之一。广州海味行业有行、店、家口铺之分。由香港采购海味批发给各店，称为行，又称为大拆家；由行买回后再卖给海味杂

货铺，称为店，又称为小拆家；由海味店买入，再卖给普通人家或乡下的水客，称为家口铺。20年代末，行的营业利润每百元不过四五元的利润，但平均每年至少有50万元以上的营业额，故利润仍相当可观。店的生意则有一分八厘左右的利润。^[29]

糖业：商业行业中，糖业曾是广东的一大行业，原因是广东既是中国的主要产糖区，广东菜系以甜为主要特色，家庭消费之外，茶居茶室、饼店、冰室及糖果店等，都是销售的主要去向，每年耗糖数量巨大，产销关系使糖业在商业界中占有重要地位。20年代，仅广州一地，经营糖的商家就有130余家。此行业中大体上分为经营洋糖和土糖两类。行业中又分为标家、拆家、栏家和杂行4类。其中经营洋糖者为标家和拆家。专门在香港采购洋糖，运回后批发出售，不作零售的，称为标家，此类商家生意额在糖业中为最大。如代太古洋行推销白糖，可获2%的佣金。从标家买入，再转售给城乡各地商店的，是为拆家。栏家则以经营土糖为主，代乡村糖寮推销土糖，只收取佣金，不负市场价格起跌的责任。而经营糖品之外，兼做其他生意的店铺，则称为杂行。20年代中期，广州市约有标家十六七家，拆家80余家，栏家70余家。^[30]30年代初，陈济棠政府为保护本省糖业，实行食糖专卖，对进口糖征收高额关税，经营省营食糖的商家只能收取佣金，而洋糖地位为省营糖厂所产的糖所取代，加上糖精盛行，该行业从此一蹶不振。

茶叶业：民国初年茶叶行业曾是大行业之一，主要原因

是茶叶出口在当时仍占有较高的地位。该行业分办庄、批发庄和零售庄三类。办庄又称洋庄、出口庄等。批发庄是专替茶户推销茶叶给零售商，不负价格起跌的责任，收佣金4%，在零售商那里也收4%的佣金。最盛时，仅广州河南一带就有“洋庄包种茶庄”100多家。经营的除本省的茶叶之外，从外省运进转出口的较多，主要是云南的普洱、安徽的六安、福建的乌龙水仙、浙江的龙井和广西的六堡等较出名的茶种。每年从上述地区进口的茶叶约有600万斤。其中福建茶叶最多。

花纱业：本行业分棉花业和棉纱业两类。专营棉花生意的商人很少，而经营棉纱者也大都兼营棉花。由于广东气候暖和，寒冷的时日短，因而都市中上人家大都用丝棉或骆驼绒，很少用棉，贫困者和乡下人则只求将就，故广东的棉花生意历来都很清淡，市情全年间也很少起伏。棉纱则完全不同，广东的土布织造业较为发达，所需棉纱量相当大，而广东本地的纺纱业很落后，用土制棉纱纺出来的布质地粗劣，故此类纺织原料多半靠进口。另外，西江流域所需的棉纱也主要是从广东输入，故广东纱商，特别是广州的纱商多半是拥有巨资的富商。清末广东从国外进口的棉纱每年约20万包，价值约为6000万元，因需求关系，20年代棉纱市场的行情变化起伏很大，能否赚钱，全靠与上海电讯了解货价起跌，“为牟利之唯一途径”。^[31]

本省每年需要为数颇巨的棉纱，据广东实业厅1926年的调查，进口棉纱都是由上海运来，其中美纱占十分之四，

英日等国占十分之五，而苏杭仅占十分之一。^[32]但染纱所用的颜料，则绝大部分从法国进口，小部分来自德国和日本。清末民初提倡实业，上海一带建起了一批纺纱厂，政府亦采取保护措施，只收正税，免除厘金等杂税，使国产棉纱的运销少受人为主的阻挠。在 20 年代，国产棉纱中八支至二十支的棉纱与进口棉纱相比并不逊色，三十二支以上不及日纱均匀细滑，而四十二支以上国产厂不出品，只能从海外进口。至于广东棉纱的销售市场，广州市场销售方向以广西梧州、南宁、桂县、容县销量最多，其次为北江的韶关、乐昌、南雄等地，再次才是佛山和广州本身。广东省另一个织造中心兴宁所需的棉纱，则基本上是从汕头采购。

布料业：本行业分为洋匹头和土匹头两大类。土匹头经营土布为主，洋匹头则贩卖洋布。其中又有专门经营绸缎者，广州以杨巷一带最为集中。土洋相较，洋匹头业占有优势。清末民初土布织造仍多为人工织造，机织较少。人工织造的土布成本高，售价自然也高，而又墨守成规，款式花色不知改善，远不及欧美及日本花布价廉物美，在市场上不受欢迎。近代以后西风东渐，国人对洋货亦步亦趋，洋布营业蒸蒸日上，而土布业则江河日下。20 年代初，每年进口的洋棉布价值有 1000 万海关两之多，如 1924 年进口值为 11636385 海关两，1926 年进口值为 11721382 海关两。这是因为军事活动频繁，需要大批洋棉布作军用之故。此后广东军事活动减少，对洋棉布的需求下降，每年的进口值也大为减少，大体上维持在每年 600 万海关两左右的进口值。^[33]广

州的土布生产厂民国初年才有，批发店也是民国初年才有，1920年前后，约有土布批发店十三四家，年营业额约400余万元。

蚕丝业：此行业为清朝末年至民国初中期广东对外贸易的支柱行业。清朝末年对外开放以后，广东每年进口数量巨大的大米和工业产品，数额在1亿元以至2亿多元。每年的出口额也在1亿多元至2亿元之间。在出口品中，平均每年生丝的出口约有6000多万元，约占广东出口总值的1/3左右。加上蚕茧、水结（即浮丝）及丝织品的输出，总值为1亿元左右，从上述数字可知蚕丝业的地位了。民国初年是广东蚕丝业的黄金时期，据岭南大学蚕桑科主任、广东“全省改良蚕丝局”（成立于1923年，1930年改称“广东省建设厅蚕丝改良局”）局长、美国人考活（C. W. Ward）20年代初的统计，广东全省以蚕丝业为生的人数达2188600人之多，约占广东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顺德有144万人。^[34]1922年，顺德有茧栈18家，年贸易额1270~1340万元，其是著名商号盛年丰占300万元，桂洲丝业、原记各200余万元。南海、香山、新会等县有茧栈23家，年贸易额600~650万元。^[35]各县的蚕丝大都运往顺德，顺德被称为南中国丝业的中心、广东的银行，其中容奇、桂洲有“小金山”之称。各县的茧丝运到顺德后，绝大部分再运到广州出售。沙基一带有20多家私营丝庄，专门向沙面的洋行出售生丝、水结等。经营方式是由懂外语的中间人与洋商洽谈，成交后付4%的佣金。广州市有另有土丝行百余家。

纸业：经营纸的行业大体上分为洋纸和土纸两行。土纸主要出自北江南雄一带，都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方法制造。广东人开中国机器造纸业之先河，1882年，广州商人钟星溪等人集资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有资本15万元，工人百余人。但广东造纸业始终没有长足的进步。至民国初年，只有佛山盐步和江门有机制土纸出产，但产量很低。洋纸主要来自加拿大、德国、瑞士及日本。洋纸中以加拿大纸纸质较细，在粤较受欢迎，其他各国的纸次之。由于土纸主要出自北江，故有一批广州纸商在韶关、南雄、仁化一带开店经营土纸。在韶关，该行有广州帮和南雄帮之分，其中广州帮主要经营出口。^[36]广州印刷用纸则多用洋纸，但洋纸价格较高。土纸除本省制造之外，也有部分来自江西赣南等邻近县份。南雄和仁化最盛时有纸行30多家。土制纸具有吸水性能好的特点，利于毛笔书写，商店账簿和机关的用纸多用土纸，包装纸也多半使用土纸。由于运输费及厘税过重，以致纸价偏高，20年代的价格每担将近20元。于是，一些不良商人便搜集国外废弃的报纸，运到广东出售。由于这种废报纸只需运费，每担只花数元钱，因而在市面出售的价钱极便宜。平民百姓贪图其价廉，用以作包装纸，甚至用于包食物。这种“商品”的输入，对于土纸又是一个打击。另外，国外的纸业制造商为适应中国人使用毛笔的习惯，也研制出吸水性能强，洁白如其他印刷用纸且价格低廉的洋纸，从而对土纸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土纸市场几乎都被洋纸所占领。该行生意，于军政界及党务机关有绝大关系，因这些机

关用纸特别多，且价格又较对普通顾客为优，特别是经营洋纸的行业，在大革命时期曾相当兴旺。是时广东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宣传声势之浩大，为历史上所罕见，出版了大量的书报刊及单张的宣传品。故北伐之后，该行的生意大为减少。与卖雨帽雨衣一类的山货店相似，都是曾靠军队发财的一类。

药品行业：药品行业分南北行、西药行两大类。南北行主要是经营各种中药药材，药材有相当部分是从上海、汉口、四川等处运来，因而又有上海帮及川汉帮及本地帮之分，将药材运到广州后，再向东西北江及南路销售。由于捐税厘金的重重抽剥，到20年代末，上海帮和川汉帮改变方法，将货物运到香港，从香港直接向东西江及南路推销，而使广州的药材生意大减。但本行的生意可大可小，一般的数人组合开小店，小本经营，亦可谋斗升。西药方面，广东是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因而经营西药的行业很早就有，早期经营西药的商家曾获相当丰厚的利润，如莫伯骥在西关经营西药，赚了大钱，进而弃商从事文化事业，建起了著名的藏书楼“五十万卷楼”。因此行利润不薄，效法分润者多。药品行业中还有专门从事名贵中药经营的参茸行，经营人参、鹿茸、牛黄等，此行的生意境况与社会经济状况关系较密切，若经济繁荣，则获利较丰，否则相反。

注释：

- [1]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 1003、612 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
- [2]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 525 页。
- [3] 图片载于《广东实业之现在及将来》，广东省建设厅编，1930 年。
- [4]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汇刊》1939 年第 1 期第 178 页：“广东省历年国米谷及洋米谷进口数量及价值表”。占全国进口洋米的百分比用广东省粮食会的调查资料“本省粮食调查”中“广东历年洋米谷进口占全国担数之百分比表”，刊于《广州民国日报》1935 年 4 月 2 日至 5 日。前表所用单位为公担，后表所用单位为担。以 1 市担=0.6047899 公担计算，上述两表所载进口数量大体相近。又见：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广州之米业》，1938 年出版。
- [5] 关于生丝出口数量主要有广州丝业研究所、广东省建设厅、粤海关等的报告，数量略有出入。因广东生丝几乎全部从粤海关出口，故各种统计数字相差不大。本表所引数值出自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编《统计月刊》1935 年第 2 卷第 10 期。单位为包，每包 80 斤。价值数引自 1931 年版《广东商业年鉴》的统计数值，单位为关平两。另外，关于广东历年生丝出口价值，各资料也大体相同。而关于广东省生丝出口在全省对外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比，其后各书报刊研究文章基本上都引用《广东商业年鉴》中“广东国际贸易调查”一文中的数字，称民国以来广东历年

出口的生丝均占全省贸易总值的50%以上。包括陈真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191页的“民国元年以来粤丝输出数值表”，也引用上述数字。其实，《广东商业年鉴》中所用的是“全埠直接对外输出价值”，是指广州对外输出的数字，并非全省外贸输出的数字，故“生丝输出价值所占百分数”应指在广州对外贸易输出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并非对广东全省的输出总值的百分比。由于该年鉴在行文中表述“全埠”和“广东”时界定不清，从而引起混淆。随后广东蚕丝改良局的出版物中，均将此百分比数字当作广东全省的数字，从而引起诸多讹误。

- [6]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049页。
- [7] 李耀宇：《潮州糖业之危机》，载《商学月刊》第40期，汕头省立岭东商业学校编，1925年。
- [8] 《调查潮糖报告书》，载《广东建设厅工业试验所年刊》第236页，1930年。另据《广东省商业概览》所载的数字是：自民国元年至九年每年降低至60万包；自民国十年至十九年因受洋糖打击每况愈下，年输量仅7万包。
- [9] 杜衡：《调查海康县之席草报告》，载《广东建设厅工业试验所年刊》，1934年。
- [10] 《广州上布业调查》，载《广东省银行月刊》第1卷第3期，1937年。文中称“至于小吕宋及南洋英荷属各埠，曩昔每有办销，惟近年因人口税重，及限制甚严，销数可谓绝无，即有之，亦为香港厂家所夺取矣。”另据1926年的《广东实业厅公报》“广州土布织席藤器糖葵扇爆竹京果腊味造纸工业调查报告”则称：用花纱织的土布，“全年出货达三百余万匹，输出口者十分之九五，安南暹罗南洋群岛等埠，占十分之五。桂赣

湘闽宁者，则占十分之三，至运往欧美诸国供华人所用者，仅十分之一点五。本省则十分之零五耳。”此为 20 年代中期之数。由此可知 20 年代初中期，广州生产的土布曾是出口大宗，但到了 30 年代之后，基本上退出了国际市场。

- [11] 引自 1947 年《中国经济年鉴·地方经济·广东》。另外一些资料称为爱力氏。在角石传授抽纱工艺的叫耶土摩师奶。
- [1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410~411 页；第三卷，第 495~496 页。
- [13] 《本省水果产销状况》，载《新广东月刊》第 39 期，1936 年。
- [14] 《潮汕两大出产土糖潮柑近年产销状况》，载《中山日报》1937 年 12 月 27 日。
- [15] 《广东香蕉产销调查报告》，载《现代生产杂志》第 2 卷长 12 期，1936 年。
- [16] 《广东实业厅公报》第 1 卷第 2 期，1926 年。
- [17] 黄荫普、麦叔度：《民国元年以来广州市对外贸易之分析》，载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 4 卷第 1 号新年特刊。
- [18] 参见黄荫普、麦叔度：《民国元年以来广州市对外贸易之分析》中“广州输出各国货值统计表”、“各国输入广州货值统计表”。
- [19] 资料来源：根据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432~447 页“全国二十五种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统计”各表中的数字编制而成。在所列 25 种行业中，洋皂烛业无广东的数字。原注云：“二年度（1913 年）以乱事影响，各省工厂不乏歇业，因此填报未齐，或填报过迟，本表未及列入，亦间有之。”
- [20] 椶：即棕榈。
- [21] 广东省银行经济调查室：《广州土布业调查》，载《广东省银行

月刊》第1卷第3期，1937年。此处专指广州的机织土布和土布批发商业，与传统的土布作坊与土布商家有所不同。

- [22] 《广东实业厅公报》第1卷第2期第83页，1926年。
- [23] 国立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广州市社会局调查报告：《广州之新兴工业》第2~3页，1935年。
- [24]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034页。
- [25] 李仲立：《广九铁路通车的回顾与前瞻》，载《经济月报》第2卷第2期第17页，1944年。
- [26]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市《市政府报告汇刊·公安事项报告》（民国十三、十四年）调查材料编制。
- [27] 大押、小押：按押行业。
- [28] 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编《统计汇刊》所载《十年来广东舶来海产农产品进口数值》，1934年第1号。
- [29] 《商业特刊》第3期，第63页，广州市商业会编，1928年。
- [30] 《商业特刊》第3期，第62页。
- [31] 《商业特刊》第4期，第73页。
- [32] 《广东实业厅公报》第1卷第2期，第83页。
- [33] 《十年来广东省洋棉进口之价值》，载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编：《广东统计汇刊》1934年。
- [34] 《顺德蚕丝业的轮廓线》，载广州《国货运动月刊》第2期第20页。
- [35] 《广东茧业调查报告书》，载广东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动态研究》第255~256页，1985年版。
- [36] 庄礼味：《南雄土纸竹的沧桑》，载《韶关文史资料》第19辑，1993年。

第二章 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 (1927~1936)

第一节 备受压抑和冲击的对外贸易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次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随着战争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广东成为大后方，原有的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革命运动局面逐渐平息。由此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广东有了难得的自民国建立以来最为平静的时期。在此期间，除了1928年和1929年的“张黄事变”、“粤桂战争”、“张桂联军”攻粤以及1936年的“两广事变”之外，基本上不再有大的军事行动。以上的军事冲突也只是短期的，规模也不大。政治上虽然风波不断，如宁粤对立等，但对广东的政局无大碍，对商业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是经济建设的良机。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建设是广东历史上发展最快，也是较有成效的时期。按照常理，这样的环境条件，也是商业发展

的黄金时期，而事实刚好相反。从下表可以看出广东在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情况。

1927~1936年广东进出口数值表（单位：法币千元）

年份	进口数值	出口数值	入超数值（-）
1927年	242547	165356	-- 77191
1928年	249345	175947	- 73398
1929年	229488	182343	- 47145
1930年	243918	164654	- 79264
1931年	276243	152035	-- 124208
1932年	314259	92538	- 221721
1933年	269169	94456	- 174713
1934年	156553	82026	- 74527
1935年	150269	75268	- 75001
1936年	130171	84547	- 456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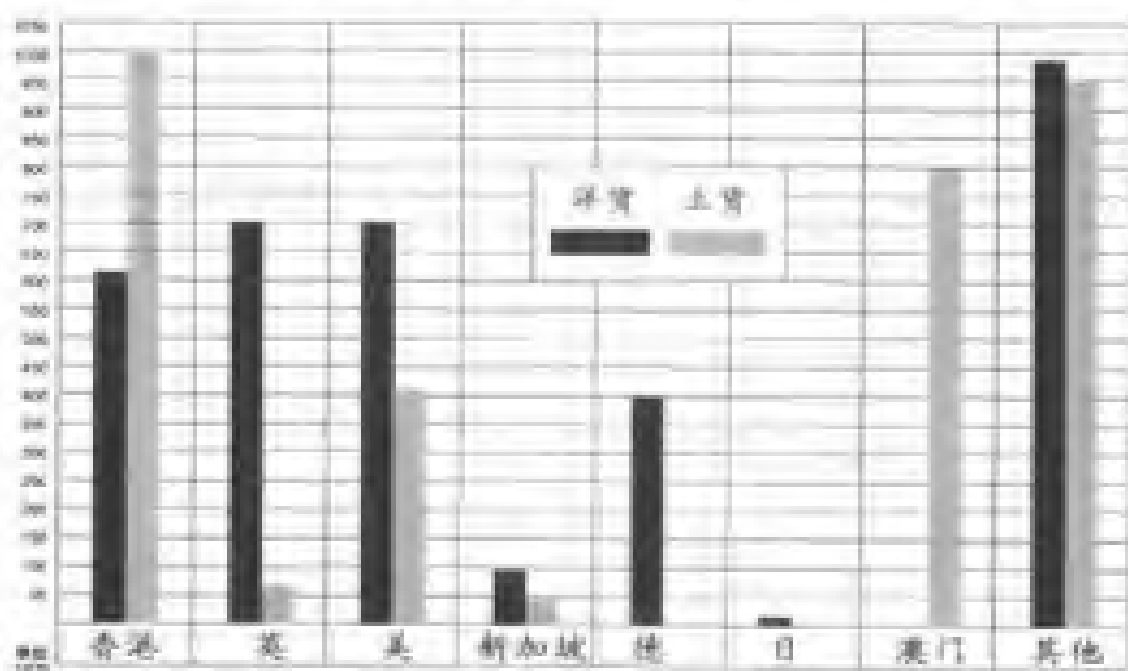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10年进出口对比，前期进口数值在平稳中上升，只是1933年以后才下降。而出口则是成直线下降的趋势，1936年仅及1927年的一半。而这10年的前几年中，广东的商业贸易或多或少还受到大革命时期政局动荡的影响，如一段时间内的粤港交通几乎断绝，英日货受抵制，甚至限制外币在广州流通等。其次，1929年2月开始关税改革，大幅度提高关税，进口货物从长期以来的值百抽五改为按新税制征收进口税，这对限制洋货倾销，保护国货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土货经香港运往其他商埠，不再被当

作洋货处理，即不必交进口税，这些政策都于对外贸易有利，出现这种反常规的现象，主要原因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侵华造成北方政局动荡，对广东的贸易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10年间，头几年进口值还是比较平稳的。其中1932年则达到民国以来的进口最高数值，将近31426万元，其前后两年的进口量也不小。但1932年后，进口额便逐年递减，至1936年达到最低，只有13017万元，为1927年的54%，只有1932年的40%。4年之间，进口量减少了一倍多。1932年广东进口额大增，一方面是因为陈济棠扩军备战，大批军事装备，包括进口一批美国的飞机。据《广州年鉴》所载，1933年全国进口的飞机共612万余金单位，仅输入广东的就有189万金单位，几乎占全国飞机进口量的30%。陈济棠在1929年粤桂战争中认识到飞机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一直致力于增进该集团军的飞机数量，以此作为其独霸南粤的王牌。可是在“两广事变”中，由于蒋介石的分化收买，陈济棠精心筹划并寄予厚望的100多架飞机，一天之间，几乎全都飞到南京去了。与军事工业相关的车辆船艇、油类，在这几年中也大量进口。当然，这几年间正值广东经济建设高潮时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也是造成进口激增的原因之一。1932年，钢铁进口数量达9377257海关两，比大革命期间的进口年平均值得增长3倍多。机器进口为3099645海关两，比大革命期间的年平均值得增长了6倍多。

这 10 年间广东对外贸易的逆差急增，1932 年达到前所未有的 22172 万元，与上述经济和军事建设关系极大，但也与广东开始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出口萎缩有关。从下图可略见进出口不平衡的一个方面。^[1]

1932 年粤海关各国家与地区进出口货比较图



此数年间广东的洋机器进口为历年之最，但仍不能与奢侈品的输入相比。从 1931 年至 1935 年的 5 年时间里，奢侈品输入为 5112 余万元，而机器和生产工具的进口只有 3907 万元，比奢侈品少了 1200 余万元。1931 年奢侈品的进口量约为 1200 万元，以后逐年减少，至 1935 年只有 800 余万元，表面上呈逐年减少之数，实际上奢侈品的进口并没有减少，因为 1929 年以后我国提高关税，对奢侈品征收高额关税，奢侈品成了主要的走私品。比如摄影机、收音机以及贵

重的首饰，在海关账册中基本没有登记，而市面上则是应有尽有。

从进口洋货的性质上分析，以 1934 年至 1935 年为例。这两年进口的粮食、食品类的消费品分别为 6526 万元和 5482 万元，占进口总值的将近 42% 和 37%。面原料及半成品如棉纱、羊毛等纺织材料及煤、矿砂金属等的输入分别为 2088 万元和 2033 万元，占进口总值的 13% 和 14% 左右。成品如棉毛制品、化工、机械及日常用品一类分别为 6621 万元和 7269 万元，分别占进口值的 42% 和 48% 强。于此可见广东成为外国产品倾销地。

米谷的进口在本时期间仍为最大宗，平均每年进口达 6705 万元，占进口值将近 30%，面粉和杂粮的进口量尚未列入在数。下表为此期间广东进口洋米的数量、价值，与进口国产米的数量对比。

1927~1936 年广东进口米谷数量价值统计表⁽²⁾

年份	洋米谷		国产米谷		广州米价指数
	担数	价值	担数	价值	
1927 年	6674	84686	328	4165	102.20
1928 年	5678	72451	1254	16370	97.60
1929 年	4448	62696	685	9733	103.50
1930 年	3095	48825	426	6471	113.40
1931 年	3294	50576	1087	15144	101.53
1932 年	8211	115620	472	4446	95.54

(续表)

年份	洋米谷		国产米谷		广州米价指数
	担数	价值	担数	价值	
1933年	10266	117819	1932	17168	84.20
1934年	5032	45239	1069	7724	74.64
1935年	4941	34585	549	4255	77.95
1936年	2756	14419	2245	20852	104.19

广东每年进口洋米少则数百万担，多则 1000 多万担。最高的年份占全国进口量的四分之三。1933 年进口洋米谷较 1932 年多 206 万担，而价值仅多 220 万元，因为当时价格低落，每担跌落 1.343 金单位之多，约伸毫洋 3.34 元左右。其原因是国外输入地农产品丰收，生产过剩，而国内 1932 年和 1933 年亦是丰收之年，外省运来的米谷也突破多年低迷的状况，达到将近 200 万担，洋米谷不得不低价求沽。另外，也与外汇低落有关。1933 年洋米谷和国产米谷输入达到高峰，对广东农村打击巨大。1933 年 9 月 16 日，广东首开洋米征税，每担征收大洋 1 元，且于次年 3 月 20 日、4 月 15 日和 6 月 16 日连续三个“加二”提高税率，达到每担征税 1.728 元。1936 年，国民政府于 9 月 1 日颁布全国范围对洋米征收进口税，进口米每担征金单位 1 元，谷每担征金单位 5 角。这些措施对于抑制洋米谷进口，鼓励国产米谷向广东输入有所帮助。

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出版的《广州批发物价指数汇刊》

说明：“广东粮食，向不足以自给，其输入额，每年几及一万万元。本市所需谷米，除东北江之增城、马坝等少数产米名区所产丝苗、西粘、大糯等上米运市供少数有产阶级之食耗外，其平民所食所用者，大部分均为由暹罗、安南运人之白粘宣粘等米，其余少数部分则仰给本省余米县份之产米，而芜湖米亦时有运销。本市米价之起落，本省岁时之丰歉，国内土米之输入，固亦足为影响，而其实则几全以洋米人口之多寡为转移。”^[3]

燃料进口方面。这段时期煤的进口仍是以台湾煤、越南煤和印度煤为主，平均每年进口约 56 万吨。本国煤主要是辽宁和山东煤，平均每年约 18 万吨，其中又以开滦煤为最多。本省煤炭的开发迟缓，质量也较差，只占全省消耗煤的 2%。“九一八”事变后，台湾煤停止进口，本省煤才逐渐上升至 12% 左右。柴油进口原本极少，1927 年进口柴油还不到 9000 吨。自 1929 年开始，本省土制煤油业突飞猛进，柴油进口也随之扶摇直上，次年柴油进口量即翻了一番，1935 年进口 155245 吨，是 1927 年进口量的 17 倍多，为柴油进口的历史最高峰。煤油的进口与柴油进口成反比例，1927 年进口量为 20204535 加仑，1929 年为进口高峰，达到 24427456 加仑，此后便受到土制煤油的强力挑战，进口量大减，1935 年仅有 46811 加仑，约为 1929 年的 1/52。

洋糖进口最高为 1930 年，达到 2503350 担，值 25225241 元。次年仍有 16190946 元，此后便大幅度下降，跌至每年仅有 100~200 万元之间。如 1934 年为 1583107

元，仅为1930年进口额的6.1%。^[4]其原因一方面是省政府从1931年开始，实行进口洋糖的专税政策，对进口洋糖征收每担16元的关税，另缴纳7~8毫的捐税，使洋糖成本高达26元，竞争力下降。但根本原因是广东省营制糖工业的飞速发展，本省产糖量大增，而质量并不逊于洋糖。如潮糖自1931年之后，迅速恢复，至抗战前输出量已恢复到100万包。

海产品的输入一直占进口总值的5%左右，除了说明本省该产业的不景气之外，也表明广东人好吃鲍鱼海参一类的珍品，视为筵席上的美味佳肴，已成一种风气。

出口方面，这10年间基本上是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至1935年达到最低点，只有7527万元，为民国以来的最低点，比民国年间出口最旺盛的1922年少了65%。其中1932年是跌幅最大的一年，比上一年度少了5950万元，几乎少了40%，可以说是广东出口贸易最萎靡的一年。如果仅从广东当时的形势来说，1932年广东的政局仍然是相当平静的，“闾阎安堵，景象升平，则为数年来年仅见也。”“生产费用，并未增高；制造方法，且较新颖；交通方面，亦颇进步”。^[5]且1932年前后数年，也是广东最为安定的几年，按常理商业应是相对繁荣才是。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受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贸易形势衰颓，各国高筑关税堡垒，此外，“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侵犯上海，导致广东乃至全国出现空前强烈的抵制仇货的运动，等等，都对广东商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生丝的出口仍为第一大宗，这 10 年出口平均值达 4088 万元，占出口总值的 32%。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仍相当可观，其实这 10 年是广东丝业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期。生丝出口逐年减少。1927 年生丝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将近 44%，而 1936 年仅为 13% 多一点，比全盛时期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80% 有天壤之别。出口的包数 1930 年尚有 68911 包，次年生丝价格锐减，出口陡降至 32283 包。美国是粤丝主要销售地之一，1927 年销往美国的生丝尚有 26140 包，废丝 20899 包，而 1935 年销往美国的生丝只有 123 包，可以说已被摒弃于美国市场之外。生丝价格在鼎盛时期高达每担 2000 余元（最好的丝每担高达 2420 元），1930 年、1931 年的价格在 700~900 元左右波动。1934 年的最低价仅为 235 元，前后悬殊几达 10 倍。可以说，这 10 年中广东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萎缩，首当其冲，影响最大的是生丝的出口。

绸缎、丝绣品、针织品共占出口额的 11%。这 3 项出口品中，绸缎的命运与生丝相似。该产品曾在出口品中占次席，而到了这 10 年末，已降至第八位。丝绣品主要是从粤海关出口，而针织品主要是潮海关出口。针织品中的抽纱品，相对而言较为稳定。潮海关出口的这类汕头特产几占全国该类产品出口额的 90%，主要销往美国、加拿大，及经香港销往其他国家，每年有五六百万元的贸易额，1933 年最盛时，仅输入美国已有 1200 万元，输入英、意、印度、缅甸、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国的数量约为输往美国数值的

30%。总计约 1500 万元之多。⁽⁶⁾ 其余国家如英国及南洋各国，亦有 500 余万元。其后两年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销路呆滞，只有 700 万元左右。但复苏很快，1936 年包括绣花品在内，增至 1100 余万元。汕头经营抽纱的洋行，资本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约有 10 余家，5 万美元以上的有 30 余家。还有一些小资本的。在洋行工作的女工约有 2000 余人，每日工值三角至八角不等。而在家庭内做抽纱品的妇女人数在 50 万之上。

蔬菜、水产品及干鲜果的出口，仍以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新加坡为主要销售对象，约占出口总值的 8%，主要是供给华侨消费。此类产品前两项较为稳定，但水果却大为减少。如潮柑，原因是柑农对栽培方法墨守成规，且受病虫害之困扰。而日本人则在潮汕高价收购柑苗，运到台湾加以培植改良，培育的新产品产量比潮汕本地还高。但蜜柑却无法与原产地相媲美，不过，其外观与潮汕蜜柑相似，消费者难辨真伪，以致潮州蜜柑名誉受损，销量大受打击，加上经济不景气，柑价大跌。如潮州蜜柑最高时每担 80 元，最低也要 40 余元，而 1932 年之后，每担仅值 30 余元左右，最低只有 20 余元。

草席出口多年一直维持在将近 300 万元的数值，1930 年升至 400 余万元，1931 年为最高，“输出国外行销之草席为 35560000 条，价值 6736825 海关两。是年输出之地席数量为 74357000 卷，价值 654344 海关两。”加上其他品种的出口额，价值达 10495973 元，从次年开始，每年出口额剧

降至 300 万元左右。^[7]草席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除经济危机之外，国外对广东草席征收重税也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还是受日本草席业发展及倾销的影响。日本原是广东草席的主要销售地，后来日本到广东购买水草，自行用新方法制作，能去掉草中的咸质，生产出来的草席“图案美化，品质柔润，使我国草席相形见绌，夺去销路不少，故目下我国草席输出，只堪供地席之用而已。”^[8]日本草席之外，还有台湾席，新加坡佳文席以及浙江宁波的龙须席，均加入竞争行列。其另一原因是从事该行业者墨守成规，不思改良，一直沿用家庭手摇木机织造的方式，而宁波等外省织席业却大都改为设厂大规模生产。该行业受上述因素的沉重打击，广东草席业产销均大不如前。如高明出产的包装席，当地出售的价格，长度大小中等者，每千张仅 30 元，下等 20 元，仅为以前价格的一半。“全县每年输出约六百万张，值二十余万元，据当地商人所言，十年前输出可达一百万元。”“高明全县人口不过九万余人，而直接间接靠此为生者达六万人，尤以市镇附近织席妇女几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往年日得工值四毫者，现只得一毫。”^[9]

藤制品在清末及民国初年曾在广东出口产品中占较重要地位，曾经每年保持 400 余万元左右的出口值，至 30 年代，在出口中的地位已逐渐下降，30 年代初期每年出口已减少至 220 余万元。全省藤织店与 20 年代差不多，从业人员近 3 万人。出口减少的原因是受到日本藤业的竞争。广东制藤所需原料主要来自台湾，此时被日本严格限制出口，本地产的

藤条少，导致成本高涨，再加上海外从事此项贸易的公司购买力的下降，洋公司十之七八破产，广东藤器出口因而所剩无几。

土纸的出口量在 1930 年之前，基本上维持在 300 万元左右，此后减少了将近一半。如潮安的色纸自 1927 年之后，在国际市场基本上被日本纸和瑞典纸所取代，“销数减少十分之八，染纸厂往昔约有百余家，近年则陆续倒闭。”土纸产销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除了洋纸的竞争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质量，“本省所产之纸品质甚劣，人多采用京沪及江西运来之上纸。”^[10]虽然政府曾试图提倡用本省土纸，亦无济于事。

土布曾是广东出口的重要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广东土布业发展迅速，最高峰年份的出口额曾达 1500 万元之多。大战结束后洋布卷土重来，土布受压抑，30 年代更落千丈，1933 年出口值仅剩 840 余万元，1934 年和 1935 年仅有 350 万元左右，仅及数年前的五分之一。其原因是受到洋货倾销的压抑。洋布物美价廉，虽然不及土布耐用，但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人民购买力弱，廉价产品自然格外受欢迎。另外，广东土布还受到上海货的打击。上海一带的厂家在受到洋货冲击之时，及时改良生产技术，经过多年改革，其品质已足与洋货竞争，而广东的生产厂家不思改革，生产出来的产品“质劣款旧，更为人所共厌。”^[11]生产出来的土布卖不出去，产品堆积如山，工厂只好停工，以致倒闭。广州市附近的土布厂，在河南的百余家，在西北郊的约

六七十家，男女工不下 10 万人，至此仅剩 30 余家，失业人数约 5 万人。佛山织造厂约 80 余家，工人约 5 万余人，因营业不振，倒闭者约 2/5，失业男女工 3 万余人。东江织造中心兴宁，有男女工 10 余万人，失业约 10 万人。

茶叶出口在 1927 年达到 79691 担的高峰，但价值却只有 1246639 海关两，两年间价格减少了将近一半。其后便直线下滑，出口大幅度下降，而省内的茶税加重，加上厘金、台炮费等重重抽剥，外省及本省鹤山等地的茶商历来都是将茶运到广州出售，此时大都改由香港直接运输出口，最后连广州河南一带的洋庄包种茶庄绝大部分也迁往香港油麻地接货装运。运进广州的茶叶由原来的每年上千万斤剧减至百余万斤，出口数量降至 3 万多担，仅值数十万元而已。1932 年出口为 31319 担，价值 892522 海关两，在广东出口品中已退居次要的地位。茶叶主要是由粤海关出口。以前出口达万担以上的江门关，由于鹤山茶之衰落，出口额减少 60% 以上。盛极一时的茶叶行业衰败至极，只是由于广东人有喝茶的习惯，茶叶行以此为依靠，才得以维持。茶叶业衰落的原因除了外国茶叶的竞争之外，还在于“不能改良品质，且惰于摘芽采苗，惟利其叶之长老，以增重量……手搓足捣，不洁之名，予外茶以排挤之机会……宣传之术，既不及外茶，而装潢亦欠研究，如六安茶之装潢，仿佛如药品。”^[12]

烟草的出口在 1930 年前后，曾经较稳定地维持在 400 多万元左右的出口额，占出口总值的 2.5% 左右。1932 年陡然下降到 130 万元，1936 年竟然不到 90 万元，占出口总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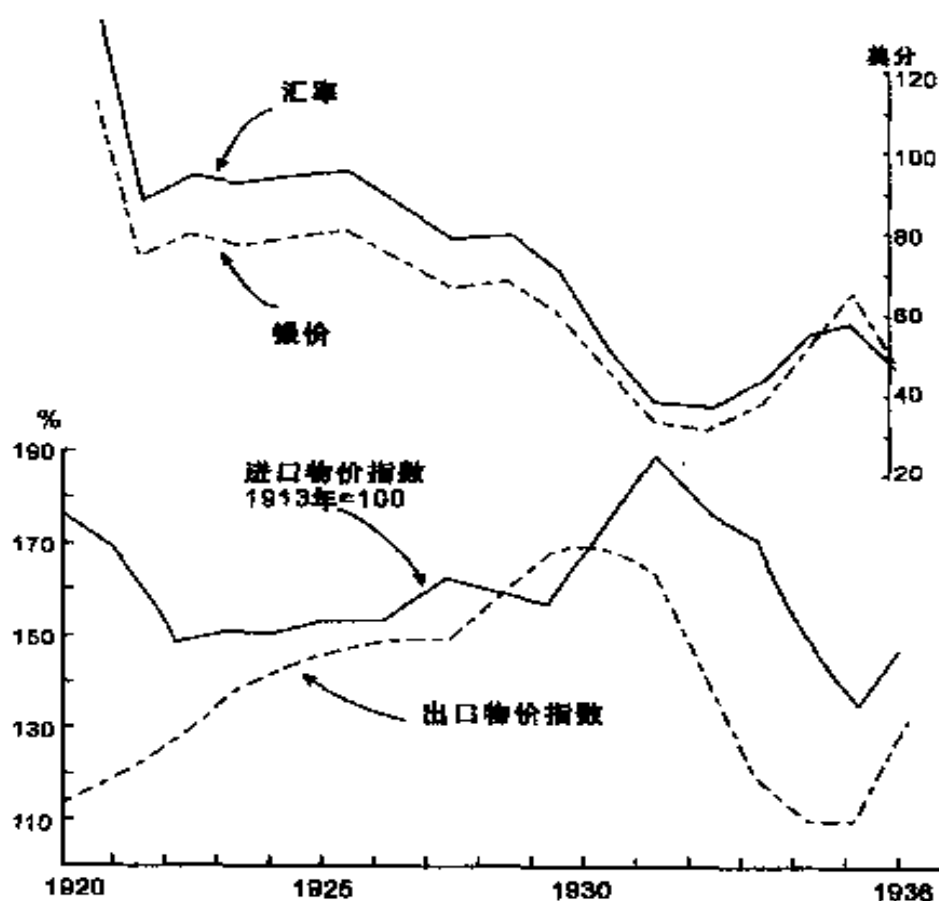
不到 1%。

陶瓷出口也一落千丈，在广东出口商品中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1932 年瓷器仅有 235959 海关两，陶器则为 342206 海关两。两者相加，还不及以前陶器的出口额。潮州枫溪的陶瓷出口竟然不到 10 万元。

钨砂是所有出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列强致力于扩军备战，作为重要战略物资，钨砂自然是收购热门。1933 年 11 月，广东省政府对钨砂实行专卖，钨砂的价格也随之上升。1936 年 7 月每担钨砂为港币 75 元，至年底徘徊于港币 88~90 元之间，可见各方搜求之殷。当年全国钨砂出产，以江西为第一，广东次之，湖南第三。出口则广东占第一。1934 年全国钨砂出口总值为 6315349 元，广东为 5288225 元，占全国出口总值近 84%。^{〔13〕}

造成 30 年代广东进出口萎靡的最主要原因是 1929 年开始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广东而言，经济危机最明显的影响是汇率急剧下降。1920 年每海关两兑换 1.24 美元，此高兑换率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属于不正常的状况。其后数年大体上维持在 0.80 美元左右，1928 年为 0.71 美元，其后开始急剧下跌，到了 1931 年、1932 年，每海关两仅能兑换 0.34 美元，比正常年份下降了一倍多。汇率低不仅严重影响广东的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侨汇在广东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年的侨汇超过一亿元以上，经济危机使侨汇大幅减少，而汇率又长期低迷，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与之相联系的是银价跌落，按常理银价跌落不可避

免地导致进出口价格的波动，出口商品价格应该同样上涨，但是，由于中国无法控制国际市场上白银的价格，而进出口价格又受到洋行的操纵，从而出现了进出口商品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存在巨大的差异，从而使进口商品价格并未因此而高涨，造成国外商品向中国倾销，而中国商品出口受到阻碍的情形。从下图可以看出广东省进出口大幅度萎缩的经济背景。^{〔14〕}



从《中国海关华洋贸易统计年刊》等资料所载的广东各口岸出口数字可以看出经济危机对广东外贸的影响。粤海关在广东各口岸中出口值历来首位，广东出口贸易较好的

1929年，该关出口值约为11700万元，此后数年一路下滑，至1935年，仅有3994万元，5年间竟然少了将近2/3。潮海关出口值仅次于粤海关，1930年是该关出口较好的年头，出口值约为2807万元，其后也是一路下滑，但减少的幅度比粤海关好些，至最低潮的1934年，还有1586万元，至1936年便基本上回复原貌。九龙关的状况最惨，1930年为出口高峰年，出口值约为2735万元，1932年便只剩下333万元，其后数年，都没有多少好转。拱北、江门、三水、琼州、北海等口岸出口数值不大，但或多或少都在1932~1935年间呈现出口低迷的状况。

世界经济不景气，生产过剩，国内消费低迷，各国无不试图扩展国外市场，将工农业产品向外推销。在各国对广东市场的商品倾销中，以日本货的倾销影响最为猛烈。“九一八”事变之后，抵制日货运动高涨，使日货在华南的销售大为减少。为改变这一局面，日货以香港为根据地，大力开展倾销活动。1933年开始，日本对香港的贸易额直线上升，次年日元大幅度贬值，日货倾销更是变本加厉。其商品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如绸布、衬衫、背心、手帕、玩具、煤油等等。其方法主要是将价格降至最低限度，如人造丝绸制成的西装内衣每件只卖8毫，人造丝袜每对只售8仙，远远低于本地同样的产品。于是，一些不良商人纷纷向其订货，改头换面以后，转销广东市场。该国的匹头在广东市场被大量摆卖，一些洋货匹头店更是谎称为上海货或天津货。因为价格低廉，走私也随之猖獗。香港三角码头成为劣货的

总集合地，由于广州方面关卡较严，故走私者多将私货运往东江、南路一带。其中汕头是私货的主要销售地，通过日货商由香港包运，以避免查缉。另外，从福建厦门、诏安等地，用小电船偷运，也是走私的主要通道。走私者集资纠结为集团，以 50000 元为一组，股额一二百元不等。货物运到后立即化整为零。如花绸每匹原价八九元，日货则只卖汕币二元七八角。^[15] 汕头之外，广州湾、高雷钦廉、海南，均因走私而日货充斥。

由于洋货的大量倾销，使本来已滞弱的商业更面临困境，对于本地本国产品，即使价格比平时低廉很多，也不敢买入，以致各行业产品无人过问。产品无人过问，资金周转不灵，更加剧了商业的衰退，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本时期广东进口贸易中，进口额最多的国家仍是越南，主要是大米和煤炭的进口。这是越南与广东贸易的最后高峰时期，粤汉铁路开通后，历来有米难于外销的两湖可以直接将米谷销往广东，国民党政府又采取奖励政策，由粤汉铁路运销国产米谷，运费减半，洋米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动摇，越南对广东的贸易地位也因此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工业日渐发达，正在向世界扩张的美国。

日本在广东的贸易额历来居数一数二的地位，由于发动侵华战争，导致中国对日货的抵制，从而使其对粤贸易额一落千丈。美国则在 30 年代初取代日本对广东贸易的地位，也取代了英国在广东的地位，每年输入额在千万元之上。美国输入广东的主要商品为面粉、汽油、煤油、金属制品、机

械等。如 1933 年，仅出售给广东的飞机价值就达 1801967 金单位。是年广州进口的汽油、煤油、柴油超过 600 万金单位，60%以上自美国输入。而广东输入美国的主要是生丝和潮汕的抽纱，其他商品很少。

广东从香港进口的商品，仍然以该地的水产品和纺织品为多。至于从澳门及广州湾进口的货物为数很少，澳门进口货销售区域仅限于拱北一带，而广州湾的货物主要销往北海一带。

至于广东输出品，输往香港的占首位，主要是畜产品、蔬菜、水果及日常用品（输入澳门的商品也大都与此类似）。也有部分土特产，因要在香港成交，故先运往该地，再出口至国外。出口南洋一带的主要是供华侨所需的药材、爆竹、纱绸、土纸、海味等，故南洋一带占广东出口商品的第二位，仅次于香港。输入美国的仍以生丝和潮汕的针织品为主。至于广东输入英、法、德等国的商品，数值很小。

1935 年广东与各国家或地区贸易概况表⁽¹⁶⁾ (单位:法币千元)

国家或地区	进口		出口	
	价值	百分数	价值	百分数
南洋一带	60831	45.4	15161	21.9
美国	21410	16.0	8184	11.8
英国	19134	14.3	2367	3.4
德国	17367	13.0	1738	2.5

(续表)

国家或地区	进口		出口	
	价值	百分数	价值	百分数
香港	8910	6.7	37439	54.1
日本	5442	4.1	560	0.8
其他	787	0.6	3734	5.4
共计	133881	100.0	69184	100.0

第二节 市场的变化与商业资本的扩展

商业交通的迅速发展。广东的商业交通历来倚重水路运输。东江、西江、北江三条重要的水上运输线组成水路运输网，也使这一带成为相互联系的商业单元区域。而汕头地区则依靠韩江这条水上运输线，使潮梅地区另成一商业地域单元。粤东北与广州商业中心的联系基本上是通过海运来维系。直到这一时期，广东基本建成了联络全省的公路网，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广东的公路建设筹划始于民国元年，成立军路处，筹划从广州近郊开始修筑公路。由于政局动荡，直至1926年秋，全省建成通车的公路只有812公里。进入这一时期后，广东公路修筑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广东省政府对全省的公路交通作了全面的筹划，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分为东西

南北四大部分，划定省道干线 4000 余公里，另规划县道 300 余条，共 12000 余公里。早期修公路曾采用带强迫性的措施，后来又采用官办与民办并行的两种筑路形式。由于政局稳定，筑成的公路渐多，民众对公路运输的便捷和获利也有所了解，1928 年之后，形成各县各乡民众自行筹款修公路的全省性筑路热潮。1929 年，广州开始向四乡开出长途汽车。1930 年 11 月省干线的筑路经费由省库支拨。1933 年 11 月 12 日，经樟木头、惠州至汕头的广汕公路正式通车，改变了广东两个贸易中心城市长期依赖水路交通的历史。

据《中国经济年鉴》所载，至 1934 年，广东已通车的公路有 11204 公里，占全国已通车公路的 13% 强，居全国首位。全省主要的县份都有了公路，不少地方还建乡道村道。1933 年粤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中说：广州“附郭之区，公路如网，交通极便。广汕公路，亦告竣工。盖就大体而论，粤省交通建设之成绩，或非他省所可企及也。”^[17]“本省各江航业，因各属公路，次第落成，轮渡生意，日呈冷淡，计行驶东西北江各航线之轮船拖渡，因营业不旺，支持乏力，而自行停航者，逐日有增无减，故生涯之冷淡，比前数年真有霄壤之别。”^[18]这一点从汽油进口也可以看公路运输的发展。1923 年，广东省进口汽油只有 278106 加仑，值 162406 海关两。1926 年为 455960 加仑，值 238000 海关两。而 1927 年翻了一番多，达 974511 加仑，值 485966 海关两。其中当然与北伐需要大量汽油有关。但 1928 年后仍然逐年大幅上升，至 1932 年已达 5456462 加

仑，值 3381460 海关两。这些年汽油进口猛增，完全是公路运输事业发展的结果。

这一时期航运方面也有不少进步。首先是困扰航运多年的匪盗抢掠的风气大为改善。东西北各江长期以来匪盗横行，航行于江上的小轮船都要置备枪械，雇用卫兵，以防不测。即使这样，客轮货轮被洗劫的事还是接连不断。1928 年开始，广东省政府雷厉风行地在各属展开剿匪，是年下半年，各江河道大为改观，虽然不时还会发生抢劫事件，但较过去已少了很多。

广州市区的内港建设很差，从珠江外海进来的载重的海轮只能在黄埔卸下货物，再经 11 公里的驳运，才能到达广州。出口也是如此，大大地影响了广州的对外贸易。1930 年 5 月开始筹办修筑洲头咀码头，分为筑堤、填地、筑码头、辟路、建货仓 5 项，是年 8 月开工，至 1936 年基本完成。

1929 年开始建海珠桥，1933 年 2 月 15 日正式开放，耗白银 103 万两，改变了市区南北交通不便的状况。当时另一项较为重要的计划是修建黄埔港。从 1925 年开始，广东当局就为实施孙中山将黄埔港建成南方大港的计划而筹集资金和制订规划，后因北伐而中辍，1930 年以后此项工作陆续进行，但因各种原因，直至抗战爆发只完成了部分工程。此外，这一时期对河道的整治也不乏成绩。广东治河委员会和广东水利局对广东水道进行全面勘查，制订多项河道整理计划。主要进行的项目有 1921 年开始的芦苞建闸工程；1931

年陈村水道的疏淤；甘竹滩炸礁工程；1936年的石岐港口河道的整治；1937年的江门河道的整治等，这些工程对水上运输起了一定的疏通作用。

广东省河民船数目及运载价目统计表^[19]（1933~1935年）

类别 \ 年次及价目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每艘每日运载价 (元)	备注
柱艇	4594	4017	7095	1.00	
沙艇	2361	1985	2753	1.00	
货船	5232	4435	6311	6.00	
柴船	743	633	1020	6.00	
横水渡	473	352	572	1.00	
渔艇	1029	801	1535	—	自用
仔舢艇	331	278	508	1.00	
粪艇	215	135	337	2.00	
乡艇	755	561	1108	3.50	
泥沙艇	525	317	556	3.00	
尿艇	174	85	131	2.00	
盐船	309	185	483	8.00	
西瓜扁船	50	56	66	10.00	
娼妓艇	31	28	25	10.00	每日租价

(续表)

类别 \ 年次及价目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每艘每日运载价 (元)	备注
轮船	—	11	—	—	
米舢	137	—	—	25.00	
河船	67	41	84	5.00	
灰船	43	29	37	4.00	
渡船	50	35	90	—	无固定价
厨艇	41	41	48	5.00	
紫洞艇	57	51	67	8.00	每日租价
洋舢板	123	433	236	2.00	
车渡	37	26	29	20.00	
垃圾船	43	34	38	2.00	
楼船	23	23	25	8.00	每日租价
电船	—	13	21	—	
戏船	12	6	16	10.00	
煤船	67	96	136	6.00	
棺艇	16	15	13	3.00	
胥艇	—	1	—	—	
蚬艇	99	200	273	—	自用
菜艇	3	2	4	—	自用

(续表)

类别 \ 年次及价目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每艘每日运载价 (元)	备注
舢	—	144	169	—	
其他	—	24	19	—	
合计	17640	15128	23849	—	

上表所载之外，还有来往于广州与海口、中山、惠州、清远、梧州等地的货轮 63 艘，以及行驶于广州近郊的电船 30 艘。据广东省商业联合会的统计，抗战前，除外国航行于广东的船舶之外，广东本省有 200 吨轮船 20 艘，200 吨以上汽船 623 艘，拖渡 420 艘，共 144039 吨。^[20]

本时期航运方面的重要事件是收回了长期以来一直受外国人控制的航运管理权。在此之前，广东航运大权一直操纵于粤海关理船厅。举凡船舶之登记与取缔、船舶出入查核指泊、发给进出口牌照、船钞之征收、造船造机之取缔、港口码头仓库之修建，以至航道之疏通、河海航道之测量、船舶之丈量及检验、灯塔浮标及其他海上标志的建筑与管理等，均属理船厅之职权。粤海关理船厅据此为欧美航运界大开方便之门，英、法、挪威等国凭借其雄厚的航运实力，几乎统治了广东的航运业。1929 年，建设厅长邓彦华首先向省政府提出撤销理船厅，将其全部职权收回。但南京行政院认为此种变更应全国统一办理，不宜粤方单独变更，故被搁置。

林云陔任省长兼建设厅长后，重提此议。1932年11月7日成立广东省港务管理局，次年开始接收事宜。随后，制定“广东省航政三年建设计划”，对全省航政进行整顿，制订和颁发各种规章制度，斥资扩充广南造船厂和规复黄埔造船厂，组建广东航业公司，在河南原士敏土厂开办航海讲习班，等等。

此外，邮电方面，1927年4月，广州无线电台设立，广州与上海间可互通电讯，对于了解沪市商情，如花纱行业来说，起着利益攸关的作用。1929年，广州与石龙间开通长途电话，1931年与香港自动电话开通。

航空业，1934年，开通的航线有沪粤线：经汕头、厦门、福州、温州；平粤线：经长沙至汉口；粤龙线：经梧州、南宁至龙州；粤北线：经茂名、海口至北海。

近代化工业的发展。民国初年广东的工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虽然有个别属于官营的工业，如广州河南的士敏土厂，于宣统年间开始生产，但日产只有200余桶，后来因时局变动及各种原因，时而官办，时而由商人承包，且屡遭停产。1928年，由于计划兴建粤汉铁路，需要数量巨大的水泥，铁道部要求广东兴建士敏土厂，由中央银行借拨专款300万元，派马超俊负责，建厂于西村狮头岗。该厂于1932年4月建成投产，日产水泥220吨，计1300余桶。由于质量较高，销售颇好，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也逐渐取代了舶来品的地位。该厂投产前，广东每年进口的洋水泥在500万至700万元左右。该厂投产后，1933年，进口水泥便减少了

64%。因为利润高，该厂随即增购两套设备，使生产能力提高到日产 700 吨，1936 年之后，洋水泥在广东的销售量每年只有数万元而已。而且，该厂的水泥主要还是供应粤汉铁路株韶段及湘桂铁路建设为主。

土敏土厂的成功使广东当局增强了发展省营工业的信心，1932 年制订《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将发展省营工厂作为振兴广东经济的重要环节，计划在三年时间里建成省营工厂约 30 间，包括轻重工业。但由于陈济棠政府致力于扩充军事力量，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时间平衡地发展，因而直至他下台，广东只在轻工业建设上取得了成功，建成了一批糖厂和纺织厂、肥田料厂、硫酸苏打厂、饮料厂、麻纺厂。以上工厂中，糖厂的成效最为显著。

广东是中国主要的蔗糖产区，但传统的制糖技术制约了其发展，生产出来的糖不能与洋糖竞争，且浪费巨大。如用旧式制糖，除了制造费用之外，每百担甘蔗榨出来的糖仅值 84 元，如用新式制糖技术，则每百担甘蔗榨出来的糖可值 165.75 元，相差几近一倍。^[21]

1932 年广东省政府从爪哇、台湾引进甘蔗良种，在番禺、惠阳、潮汕推广种植良种甘蔗，后来还扩展到徐闻、琼崖，采取奖励种植的办法。1934 年制订《广东省糖业复兴三年计划》。1934 年及 1935 年共建成番禺市头和新造糖厂、揭阳糖厂、惠阳糖厂、东莞糖厂、顺德糖厂共 6 间技术先进的大型糖厂，总资产达 2000 万元，1936 年这些糖厂共产糖 11800 吨。广东省营糖厂出产的白糖基本将洋糖、特别是国

外白糖从广东市场驱逐出去。此前广东每年进口洋糖总值达到 1000 多万元至 2500 余万元，这些省营糖厂出产之后，洋糖进口最高的年份也不过 200 余万元，一般都是 100 多万元左右，而且进口的基本上都是粗糖。因为本地产的甘蔗不足于供应糖厂的需要，只好从国外进口粗糖，再制成白糖。如广东著名的产糖区潮汕地区，1931 年出口不到 10 万包，实施糖业振兴措施后，一改先前颓势，1934 年出口为 40 余万包，收入 800 余万元，1935 年增至 75 万包，1200 万元，1936 年 80 余万包，收达 1600 余万元。^[22] 产品除销售到沪、汉、津、济之外，更通过招商局与铁路部门的联运，使该地食糖运销到西北。其他厂如纺织厂、肥田料厂，也有一定的成绩。1935 年是省营工厂销售最好的一年，销售额接近 2200 万元，其中糖 920 万元，士敏土 640 万元，肥田料 136 万元，纺织品 50 万元。这些省营工厂以规模宏大，机械化程度高，产品质量好，在全国同类工厂中占有较高的地位，其产品一般都以物美价廉而销路较好，不仅改变了广东市场同类产品洋货充斥的局面，而且远销外地以至南洋各国。现将省营各工厂情况列表于下：

广东主要省营工厂概况表

厂名	地址	安装或开工日期	产品种类及数量
士敏土厂	广州西村	1932 年 6 月	日产士敏土 3000 桶
硫酸厂	广州西村	1933 年 7 月	日产 98% 度硫酸 15 吨
肥田料厂	广州西村	1935 年 8 月	日产磷肥 20 吨、硝酸 18 吨、氮肥 20 吨、硝酸钠 7.5 吨

(续表)

厂名	地址	安装或开工日期	产品种类及数量
纺织厂	广州河南	1933年10月	日产棉纱20包、布950匹、呢绒若干
制纸厂	广州南石头	1937年9月	日产纸50吨
饮料厂	广州西村	1935年12月	日产汽水2500瓶、啤酒5000瓶
麻织厂	信宜	1935年	日产麻包6000个
新造糖厂	番禺新造	1933年12月	日产白糖240吨、酒精25吨
市头糖厂	番禺市头	1934年12月	日产白糖250吨

省营工厂的一个大缺陷是远离原料供应地，如糖厂远离蔗源，造纸厂、纺织厂、土敏土厂均建在远离原料的广州市内，有人讽刺说：当年张之洞在汉阳设铁厂，虽然附近没有矿源供应，张之洞的想法是坐在督署能看到铁厂的烟囱冒烟。陈济棠将省营工厂设在广州市西村和河南，也是为了便于他自己欣赏和向来访者炫耀。

民营工厂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加入同业公会的机器厂有36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2家，估计资本额约为740950元。^[23]主要产品有发动机、碾米机、抽水机、油泵、水泵等。产品除本省外，还销往华南的相邻省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越南、泰国及美洲。1934年至1936年，平均每年营业额约为1125000元。

广东制鞋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新厂竞相设立，互相竞争，加上橡胶价格飞涨，使兴盛一时的胶鞋底业

生存困难。1927年，广州冯强鞋厂学习日本技术，制造胶鞋，获得成功，胶鞋制造业从此大为兴盛，此类工厂纷纷成立。至1931年，广州有胶鞋厂28家，每月生产胶鞋80余万双，主要产品有普通胶鞋、运动鞋、胶底拖鞋以及鞋套、地垫、玩具等各种橡胶用品。产品除本省之外，华南各省的胶鞋市场基本上为广东产品占领。其后数年，经济不景气使销售困难，又受到美国胶鞋的竞争，1933年后橡胶价格上涨，加上同业竞争，产品价格低迷，鞋厂因之纷纷倒闭，产量下降了一半，直至1935年才渐次复苏。粤汉铁路开通后，产品更向华中地区销售。1936年销售额大约有1000万元。销售方式是，销售于省外的多由一德路的南北行代理，销售于本省的多由长寿里的批发店代办。市内各厂大都有自己的发行所和代理店，一些大厂还在通商口岸设有发行所。

这一阶段发展最为迅速的民营工业是土制煤油业。广东全省每年约需要4000万加仑煤油，在本省炼油业兴起之前，煤油全靠进口，主要是美国和印尼的煤油。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等洋公司垄断了广东的煤油进口贸易。1929年，因为金贵银贱，进口煤油价格昂贵，有人研究用已经提炼过煤油的低度柴油再次提炼煤油的技术，获得成功。这种方法使用的设备相当简陋，仅需数千元资金即可生产，成本低，销路畅旺，经营者均获厚利。于是效仿者众，次年1年之间，新设立的炼油厂达160多家。广州之外，潮汕、佛山、东莞、台山、中山、惠州、顺德、韶关、英德等地，均有炼油厂。所炼制的煤油虽不及进口质量好，但适于照明及厨房

应用，更重要的是价格低廉，每罐约 3~4 元。^[24] 由于土制煤油业的崛起，导致进口煤油在广东市场的占有量逐年急剧下降。1930 年土制煤油占广东煤油销量的 27%，洋煤油占 73%，至 1935 年，土制煤油占销量的 99%，基本上独占市场。“土制煤油以轻微之成本，售价低廉，虽引起洋商之在内地设厂，减价竞争，然减轻人民消耗之负担极大。计在内地所制煤油与舶来煤油价格相较，每罐总低二三元，全省消耗煤油每年约八百万罐，而在内地制炼者约占百分之六十，是无形中减少人超约千万元，未始不是土制煤油业数年来奋斗之功绩。”^[25]

除上述之外，至抗战爆发前，广东有缫丝工业 58 家，电汽工业 54 家，榨油工业 37 家，火柴工业 35 家，肥皂工业 23 家，化妆品工业 7 家，皮革工业 3 家。总计全省各类型民营工厂 2000 余家，其中属于新式工厂的 350 余家，全部资产约为 1500 余万元，平均资本额 40000 余元。^[26]

第三节 主要商业行业概况

北伐开始后，广东成为大后方，政局相对平静，商业也平稳发展。但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广东商业的影响巨大。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曾对各省 30 年代初中期的商业情形进行调查。其中对“各省商店营业状况”调查中，详细列述了所调查的 22 个省自 1930 年至 1935 年之间，各年度商业经营与平常年经营状况的对比。其中广东

有报告的次数为 88 次，1930 年的广东商业各行业营业额为平常年的 76%，此后逐年递减，分别是 75%、69%、60%、51%，至 1935 年达到最低点，仅为平常年的 43%。^[27] 以上数字大体上反映出广东商业在经济危机时代的衰落。

从商店数量的和资本额的增减也可以看出商业衰落的情况。1933 年，广东省政府成立调查统计局，对于全省的商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对商业店户新张、歇业及其资本额情况的调查。从此之后，对各地商店的新张、歇业状况有了较确切的数字。从其中的变化可以反映这段特殊时期商业的动态。以下是对广州市商店的调查。

广州市商店新张歇业统计表^[28]

年份	间数		资本（毫券：元）	
	新张	歇业	新张	歇业
1933 年	4164	3362	4282992	3934688
1934 年	4197	4004	6072890	3951230
1935 年	4442	4196	3115949	5203924
1936 年	5609	5341	11138173	5146724
1937 年				
1 月	386	360	291560	278990
2 月	347	468	273335	452314
3 月	491	525	340580	531927
4 月	441	380	279245	323102
5 月	422	394	428959	324410

从上表看，1933年新张商店比歇业商店多792间，但此年经济状况并不好，是处于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小本经营还能勉强维持。1934年新张的商店虽较上年度增加仅33间，而资本额却增加1789898元。是年经营呈好转之势。可惜好景不长，1935年又回到衰微的状态。主要是当时金融动荡，特别是美国的白银政策，导致中国金融激烈动荡，汇市动荡，从而给刚呈好转的广东经济一瓢凉水。1936年新张商店较上年度增加1167间，若以百分比计算，1936年比1933年增长34.70%。从资本额计算，1936年比上一年度增加8022224元，是上年度的3.57倍。虽然歇业也增加了1145间，但却并非大资本的商店。另一方面，陈济棠下台之后，广东政归中央，对于广东的烟赌、星相等行业严加打击，歇业商店以此类为多。据当时对全省50个市、县及56个圩镇的统计，共有大小商号72700户，其中广州、佛山、汕头、江门、海口、韶关、潮州7个市县占了50650户。全省84个县共成立了商会264个，同业公会1677个。^[29]

从上述数字对比，可见1936年广东的商业已呈好转之势。其原因之一是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法币制度，确定了纸币的汇率，稳定了法币对外的汇价，这对于稳定国内物价和促进国内外贸易起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农业丰收，农村购买力有所恢复。另一方面，世界已摆脱了经济危机的阴影，总体形势也大有好转。

本时期商业主要行业经营状况分述如下。

米业：此阶段初期，即 20 年代末，米业基本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利润不薄。30 年代以后，由于银根短绌，周转艰难，米糠行因该行采购数量巨大，不得不经常向银行贷款以资周转，而此期间银行已自顾不暇。此外，米业贸易的行业习惯是现入赊出，故与米糠行有关系的商店如果境况不佳，必然连累米糠行的生意。由于商业不景气，零售商大都欠下不少钱，使米糠行商人有所顾忌，缩减生意。另外，30 年代初期，全国各地粮食大都收成不错，东南亚各国收成也不错，米价不高，也使此行获利不及以前那样丰厚。米为广东人主要食粮，因此米价虽然低迷，收购价也就相对低廉，虽然卖出价不高，仍有利可图。广州零售米商约有近千家，另有 300 家左右则是兼营柴、油、酒等。零售的米店生意也不易做，因为不景气，都市人一洗往日奢华，节省消费，且有不少人无力支付都市生活的消费，搬回乡下去。还有，米糠行大都改变以往赊欠的做法，普遍要交钱后才给米（也有将赊欠的时间从过去的 15 天改为 10 天）。不少店家无法维持而倒闭。但是，本行资本小，各种费用支出少，与其他需要资金较多、风险较大的行业相比，经营此行反而较平稳，故改行经营此行业者亦不少。一些米店为了生存，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如采取送货上门一类的服务，凡购买超过 5 元以上者，不论远近，均送货上门。1935 年花生价格甚低，市面上花生油每斤仅卖 2 毛钱左右。

栏口行：这一时期，广州市肉类市场中，鸡鸭鹅的市场状况较好，虽然市面不景气，市民购买力弱，但对于这类食

品，一般家庭还能维持这方面的开支，且酒店餐馆销路不少。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广东的社会形势较好，农村生产发展较快，虽然米谷一类的农产品受外来商品压抑，但家禽家畜一类的农副产品则受外来因素影响较少，饲养类的产品生产旺盛，鸡鸭鹅一类的产品供过于求，对于饲养者来说，不能不贬价求售，对经营栏和店的商家来说，则买人的价格大廉，自然获利不少。而牛和猪的市场状况则有不同。本 10 年初期，猪栏牛栏都获利不菲，肉店生意也不错。但 30 年代初期，栏和店的生意则完全不同。虽然生猪生牛的价格因供应多而长期低迷，但这类牲畜买进之后，如不能及时卖出，需要喂饲料，而且有生病死亡之虞。因猪牛来得多，卖不出去，经营者间互相竞争，以致价格大跌，以往价值上百元的，此时只能卖五六十元，结果是经营这一行的“各家无不亏折，损失之大，为数十年来所仅见。”肉店的情况则相反。买人的价格比平常低了三成，而卖出的价格仅少了一二成，自然获利可观，“获利之厚，实打破二十年来之纪录。”^[30]进入本 10 年末期，这种现象才渐次平复。1936 年零售的平均价格，鸡价每斤五六毫，鸭三四毫，猪肉每斤五毫半，牛肉每斤五毫。

花纱业：随着国产棉纱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级棉纱本国厂家已能生产，广东每年进口的洋棉纱逐渐减少，而国产棉纱则逐渐增多。此阶段初期，本省进口的洋棉纱主要来自日本，因此，与日本的关系也影响了本行业的经营状况，如 1928 年 5 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广东抵制日货运动激烈，

纠察队对商店和船只开展大检查，凡存有日本棉纱者，一律要交值百抽三十的国货基金，许多商家生怕亏累，及早将日纱降价出售。因禁止日货进口，只能向本国厂家求购，而国产纱本来就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国产纱的价格于是直线上升，如三十二支庄的国产棉纱，“济南惨案”前每包不过366元，到是年10月后，每包售价达456元，5个月之间每包涨价90元之多，^[31]经营者于是又赚了一把。20年代初期，广东进口的国产棉纱大约每年2万余担，价值在700万元至1000万元左右，如1927年，进口的国产棉纱不到26万担，价值1616万元。但1932年达到63万担，价值5844万元。1933年虽然比上年少，不到44万担，但价值却为6238万元，可见国产棉纱的畅销。由于广东省出产的棉纱很少，因此无论国产还是洋货基本上都是进口而来，故该行的习惯是以港币为本位，但这一时期港币价格波动大，故经营状况不如以前。实行法币制度以后，又受到上海汇率的影响。还有，自1929年实行统一税制后，广西方面的织造厂家改为直接向香港订货，以避免重复征税。所以，进入30年代之后，该行生意已远不如以前。

布料业：在此阶段，土布业与洋布业的经营情况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国产布的产品不断改良，花样款式皆大有进步，如仿造外国的秋绒，颇得消费者青睐。另外，由于国产布的主要竞争者日本布受抵制，于国产布的销路不无得益。还有，此期间当局大力提倡国货，对于市场消费有很大影响。大革命高潮过后，广东政局相对稳定，1928年广

州土布全行销售额突破 1000 余万元。1929 年关税自主后，洋布的进口要交纳重税，成本增高，价格也随之上涨。另外，一些进口的产品如人造丝织品，经过数年的检验后，人们认识到这种产品虽然好看，但不耐用。由于上述原因，本时期内，洋布进口大幅度下降，大约比 20 年代初期下降了将近 50%。这样，以前匹头市场洋布占主导地位的现象被颠倒过来，成为国产布占主导地位。虽然 30 年代最初几年，受经济因素影响，销售下降，但到 1935 年货币改革之后，土布业渐次复苏，1936 年广州土布商营业额超过 1300 万元。“全市营土布匹头店，共有百余家之多，全年营业渐入佳境，至营洋货匹头者，多为营土布者兼营之。”^[32] 不过，土布市场所销售的以上海货为主，本地的土布业在都市内已不受欢迎，只有乡下地区还因其耐用而保有一定的地位。但纱绸业却随丝业一道一蹶不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薯莨纱绸，通常都是每尺 1 元或 8、9 角钱之间，但到了 1935 年仅能卖到 0.3 元。原因之一是当地农村经济破产，乡民购买力极弱，其二是受到人造丝织品倾销的打击，主要是来自日本的人造丝织品，织成恤衫笠衫之类，价值比纱绸便宜 2/3，故纱绸价格虽一降再降，在经济艰困的年月，仍难与人造丝织品相抗衡。广州西关一带织纱罗绸缎有 200 余年的历史，在全盛时代有四五千架木机，至此时手工工场大都倒闭，仅存木机 200 余，失业工人上万人。

服装业：服装业分单纯出售服装和出售成品与兼营加工两种经营方式。进入二三十年代后，传统的服式已逐渐被西

式服装所替代，尤其是青年中，即使女子的大襟，外套背心，也趋向西化。因此，洋服装行业一直较为兴旺。另外，洋服行业还有较大的生意门径是军界、政界和学界的服装。在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时代，聚集了大批军事队伍，仅军服加工，已使该行生意生色。北伐之后，军队减少不少，但各县市纷纷成立警卫队，政府部门规定必须穿制服，其制服款式是西装式，且不能自制，必须由服装店统一加工。还有，此阶段广东的学校教育发展迅速，学生界的服装需要量相当大。除上述情况外，一些追求时髦的青年，也以穿西式服装为时尚。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西式服装行业在 20 年代末开始非常兴旺，经营西服的商店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仅广州一市，经营西服的店家就超过 300 家。然而，世界性经济危机随之而来，该行所受影响也不小。高级一些的西装，要花数十元乃至上百元，并非寻常百姓所能消费，如军队警察及机关定制的服装，采用较低廉的布料，款式也简单得多，商家的利润自然也比做西装要少得多。因此，许多专门经营西装的商店倒闭。而成衣店则影响较小，“业此者多为上海帮，联合规定一般价格，索价甚贵，惟摩登妇女趋向时装，斗妍争奇，亦乐于光顾，业此者多能获厚利。”^[33]另外，经济不景导致卖旧衣的行业发达。故衣行在清末民初曾生意兴隆，广州的故衣店最盛时有 150 余间之多，至 30 年代仅剩 50 余间。此行的生意与典当业关系密切，其衣服多半是典当行“拆出”。服装进入典当行时，其价格一般都比比较高，到典当行将衣服转卖给故衣店时，价格也不会低得离

谱，但服装款式日新月异，这类服装悬挂于店内，多半无人问津，最后不得不转售于乡下，此时的价格必然极低，于是商家多半亏折。但是，有些款式的衣服却也能赚不少钱，这就是西装。穿西装追时髦，到了被认为不再时髦时，弃之如敝屣，多半以极低廉的价格送到故衣店。而一些“穷措大”想追时髦，往往到故衣店买西装，此时便可砍一刀。

丝业：广东丝业经过 20 年代的兴旺繁荣之后，至 30 年代初急转直下，进入全面衰败时期。1929 年出口生丝 2464 包，总价值为 8199 万元，占广东出口总值的 45%，是广东生丝出口的最后一个高峰，从此之后，逐年急剧下降，至 1934 年和 1935 年，出口生丝仅为 1138 万元和 834 万元，占广东出口总值的 14% 和 11%。生丝价格跌落更惨，全盛时期丝价最高达每担 2000 余元，1931 年下降至 739 元，1934 年最低价格仅 288 元。据粤海关统计报告，1935 年 6 月生丝的价格每包最低时曾降至 235 元。前后相差几达 10 倍。至此，广东丝业全线崩溃。全盛时期广东全省共有正规的丝厂 299 间，丝釜 306000 多个，缫丝工人 90000 余人。^[34]至 1933 年仅剩 20 间。以广东丝业中心顺德为例，1925 年最盛时有丝厂 325 间（含家庭作坊），至 1933 年仅存 11 间。桑叶价格从每担 10 元惨跌至每担 6 毫至 4 毫 5 仙，根本无法抵偿投资（每担 2 元）的支出。县属缫丝女工 27 万人，失业达 20 万人，工资减少一半以上。一直欣欣向荣的蚕丝区转眼间凄冷萧条，大批失业人员生活无着而流落外地，失业者又以贫苦人家的妇女为主，“故失业之后因无以维持生活，

遂离乡别井而赴广州、港、澳等处为人佣工，或操神女生涯者，几至不可以数计。更查此辈妇女由乡来省寻工之后，因供过于求谋生不易之故，其生活之困苦实有甚于乡间，是故每为一般拐匪所乘，借引荐谋工之名，将各妇女诱拐卖于从化北江各处，其年轻貌美者，闻所值动辄三五百元，一般女工人其轂中而被拐卖者，不知凡几许。”⁽³⁵⁾ 由于丝价呆滞，生丝越积越多，资金周围不灵，靠丝业生存的银庄银号纷纷倒闭。

造成广东丝业衰落的原因除世界经济危机、人造丝的冲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如沿用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育种方法和饲养方法，使蚕茧质量低下；至30年代，沿用继昌隆缫丝厂时代的、国外早已摒弃的缫丝方式，工效低且缫出的丝质量不佳；粤丝胶质重，缫丝时需勤换水，否则污黑不堪，一些厂家认为污黑比干净更重，因此常遭外商质难，只作三等货购买。后来一些厂家认为反正是三等，不如干脆制三等丝出售，从而自毁信誉。从商业上来说，丝庄丝行及厂家通过中间人与沙面的洋商做交易，既难以了解国际丝业行情，也难以了解国外厂家对粤丝的要求和建议。贸易没有组织，各自为政，使粤丝牌号混杂，良莠不齐，且相互倾轧的事屡见不鲜，使粤丝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丝商对粤丝的压迫。粤丝的国外市场以美国为第一，而日本丝也主要销往美国。日本采用倾销政策，从美国进口生丝的比例可以看出来，1929~1935年间，日丝从占82.26%上升至97.84%，而粤丝则从7.5%下

降为 0.51%，1935 年销往美国的生丝仅为 123 包，几等于零。粤丝遭到日丝的压抑，还有更深的背景。设在沙面的三井洋行专门从事破坏粤丝的对外贸易，该行以高价购进，低价卖出的方式，排挤各国丝商，从而操纵了粤丝的价格，并且以劣丝充好丝，仍打着粤丝的牌号，使传统名牌的粤丝信誉扫地。

酒楼茶室行：该行分酒楼、花筵、茶居茶室三种。广州长堤和永汉路一带，酒楼林立，其生意以军政界及商界为大宗。北伐开始后，部队北移，中央政府机关也随后北上，聚集于广东的达官贵人纷纷离粤而去，“秦楼楚馆，因以寂寥”，盛极一时的陈塘花事，饮花筵打水围的时代渐次萎靡，“洋场十里，花事凋零”，^[36]广州酒楼行业失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阔绰的消费者。本来，广东此后社会安谧，对于酒楼行业应是有利因素，偏偏又遭遇经济不景气。还有，政府为节省开销，“禁止无谓宴饮”，尤其禁止公务员花酌，许多公务员即使冒险前往，也提心吊胆，不如从前那样猖獗。与之相应的措施是对花筵征收重税，从而限制了酒楼业的利润。但是，普通酒楼的生意则比高级的要好过些，特别是附设的茶室依旧是生意兴隆，这皆得益于广州人爱饮茶的习俗。酒楼为了招徕顾客，20 年代末期兴起了使用女性作招待员的招数，包括茶室的女招待，从而使各酒店茶楼等饮食行业仿效，增加生意。抗战前，广州的酒楼业才逐渐复兴。相对而言，酒楼行业人员收入相当不错，普通的司理，每个月的工资约为 100~150 元（可购买上等米 11~16 担左右），楼面

普通工作人员每月约为 50~60 元，还有年终的红利可分。而大学毕业生，即使在政府部门当个低级科员，每月也不过百来元。小学校长每月工资也不过是 60~70 元。

因广东人有饮茶的习惯，一盅两件，消磨时光，故茶居行生意历来不错。另外，以经营粉面食品为主的粉面行，其性质与茶居行相似，皆以社会下层为主要对象，由于此行业属于小本经营，大资本者不屑为之，小资本而不熟行者不敢为之，故新开和倒闭的店铺不多。还有，此行都是一毫几分的交易，且都是现金交易，无赊欠之忧，且基本上不受货币风潮的影响。在经济不景气的 30 年代，即使是知识界的人士，为节省起见，亦多光顾，故此行的生意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也还过得去，只是利润微薄而已。据 1934 年初的统计，广州全市的酒楼共 183 家，外省酒菜馆 8 家，茶楼 36 家（次年增到 75 家），西餐馆 9 家，粥品店 48 家，冰室 20 余家，茶室 200 余家，全市食物馆不下 600 余家。其零星小卖者尚未计在内。“年余以来，该项商店新张者多，歇业者少。自世界不景气以还，各行商业，莫不叫苦连天，然在此环境中，竟能超然不受波及，反能图其利者，只茶楼茶室一行。或者因人数日多，一般有闲阶级，无所事事，长日无聊，便借此以消磨终日，亦未可定，不然，何以失业者愈激增，茶楼茶室之生意反日益盛，该行俨然与社会失业人数成正比例矣。”^[37]

旅店业：该行业中分酒店、旅馆、客栈、学旅四种。此阶段广东社会环境大为改善，战事减少，社会安定，旅店业

发展较快。1927年以后，广东新办的中学大学不少，教育逐渐发达，四乡赴城求学的学子大增，此辈在城市多半没有亲属可投靠，只能住宿于学校或旅舍，使学旅和中等旅馆“生意极为畅旺”。由于遍布城乡的公路使交通大为改善，经商及外出的人增多，为该行业的兴盛提供了前提条件。酒店方面，“富人藉此以作休养者有之，经营各种事业藉之作晤谈者有之……而攒营事业，承办捐务者日众，亦藉此为交际地点，故生意极为旺盛。”^[38]还有，“社会愈繁华，道德愈堕落，此必然之理也。本市年来风气日趋繁华，野鹜私娼，遍地皆是，旅馆酒店，可作阳台，市内酒家旅馆生意，泰半仰给于若辈。而一般自由恋爱者，家庭尚未成立，亦往往以此为暂赋同居之所……各下乘客栈，向来生意甚鲜，近亦效法酒店旅馆，召集下乘私娼，勾引苦力车夫等聚集，生意于突呈畅旺。”“学旅旅舍等，时有召集青年学生，商店伙伴等，聚赌麻雀，从中征收抽头。”^[39]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旅店业基本上都生意兴旺。但在随后的经济不景气的年月，则略呈下降，于是皆变换生意手法，以招徕客人。如有些酒店以五折甚至四折，有些客栈“房租连食每天只收数角，加宿免费，并有计每月收租若干者，以便利各机关之雇员无家室者居住。”^[40]1936年的统计，“广州现有酒店三十家，旅店客栈二百零七家，公寓五家，学旅十六家，内有女性学旅二家，统计二百五十六家。”^[41]

印刷业：本行业在大革命时期曾兴旺一时，是时各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竞相出版宣传品，各种出版物如雨后春笋。

进入此时期后，宣传品的印刷陡然剧减。但随后商业广告的印刷相当兴盛。广东印刷业中，石印业曾相当兴旺，该行以印刷彩色画为多，特别是在印制炮竹、香烟、成药的包装纸方面，业务量极大，动辄以百十万计。党政机关的税票、西式簿记、收条、标语等，也为数不少。活版印刷则以印刷书籍及报刊为多。其中小报曾风行一时，后来政府对小报刊出版严行禁止，后来又加重了广告捐的征收，使该行生意减少不少。不过，随着教育事业的兴盛，该行生意仍属平稳。

书籍文具业：本行业分为书籍行和书籍文具行。前者以出售书籍为主，后者以文具和学校用品为主。本行中又分上海帮和省佛帮。上海帮以经营书籍为主，而省佛帮则多兼售文具。此段时期广东的学校教育发展很快，两个行业的生意也盈利不少。在经济萧条的30年代，书籍业相对较为艰难，主要是读者购买力弱，除教科书及杂志外，参考书基本上没有销路，即使是在暑假期间亦是如此。这些书店为了现金周转，不得不折价出售，普通书折价七八折是平常事，最低时竟有一折出售。利润相对丰厚的是书籍文具行，该行以代理日本的文具为最大宗，来货仅一角数分，而学校又少不了这些物品，故平日生意颇旺，获利亦丰。在抵制日货时，则代理英美文具为多，获利相对微薄。与其他行业相比，不致亏折。

笔墨行：传统笔墨业经营毛笔和微墨，自辛亥革命以后，欧风东渐，西方的自来水笔和铅笔逐渐进占广东的笔墨行业，至此阶段，传统的笔墨行业已奄奄一息，广州一些经

营了百余年的老字号如笔行中的陈富元、何大珍笔行，素有“皇帝女唔忧嫁”之称，此时也不得不印发传单，刊登广告。墨店中的詹同文、詹成圭等老字号，也处境相似。相反，自来水笔业则欣欣向荣，学生中除了弃毛笔不用外，更以自来水笔作装饰品，并渐渐成为时尚。国外厂商亦以此为生意门道，生产各式各样的装饰性的笔，普通自来水笔最贵卖八元、十元，此种笔竟有卖至二三百元者。来价虽高，而销路亦广，于是仿造的日本货随之而来，无论何种牌子，均能仿制，外观没有多大分别，而价格只为正品的五分之一，经营日本冒牌货的商家“获利之厚，无与伦比”。^[42] 1935年，陈济棠推行复古，规定《孝经》为中上学校的必修课，又“禁各校学生，用墨水笔写中国字。”^[43] 使笔墨行的经营者经历了短暂的欢喜。

药品行：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本行业生意不及以前，尤其是南北行的生意因多转到香港而大减。另外，由于国人趋于欧化，喜欢用西药，故西药行业利钱颇厚，中药则相反。但西药行业受关税和港币价格的影响。药品行业在此阶段的变化是成药行业发展快，此行是原经营膏丹丸散发展而来，原来多半附属于普通的药材行。膏丹丸散作为单独的行业，数量很少，随着制药技术的发展，中西成药因其方便患者使用而越来越普遍，该行因之独立成为一个行业，专门经营中西成药。至20年代末，广东成药行已超越纯粹经营中药、西药的行业。据《广东商业年鉴》1930年的统计，“现全行中家头共有千数百家，纯用中药者，约占百余家，纯用西药

者，约二百余家，中西并用者，占最大多数，其营业本省四乡及各省外，多有运销于南洋各埠，及英美各地者，全行生意甚大。”^[44]此行与其他药品行业不同的是必须做广告，方能推销新产品，而广告的开支很大，动辄以千元计，而省政府征用的广告捐过重，使该行生意受打击不小。

首饰业：广东各城市大都有金银首饰行，但广州的首饰业则处于主导地位，各地的首饰店大都从广州购货，即使是江门这样的城市也如此。原因在于制作水平的差距。广州的金银首饰行早年有唐庄洋庄之分。以足金和纯银制作首饰者为唐庄，以低金低银或铜质制作首饰或镶首饰者为洋庄。除市区繁荣地带外，金器首饰以中华路、十七甫最为集中。银器首饰店则以第四甫家数最多，生意最旺，第十甫次之。至于以电镀铜质的首饰店，以长寿里为最多。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电镀铜质的首饰大行其道。原因是电镀品以假乱真，成本又极低，且甚悦目，一些喜欢戴首饰以炫耀，又无经济能力购买真品者，均改用电镀首饰作替代品，故经营此行，大都获取厚利。经济萧条，人民购买力低下，再加上世界金价大增，这些因素都对金银首饰业影响很大，以致从事该行业的工人大量失业。但对于老板却未必无利可图，因为金价飞涨，虽然很少人到首饰行买金器，但老百姓生活困难，不得不将手中的金饰送到金店出售。这样，店东不但要收取熔金的消耗费，还可以在转售中获利。“金价飞涨以来，本市及附城各乡落居民，均将金饰熔卖，而本市各金店，收买金饰熔铸而售诸沙面各洋行者，为数实巨。计由去年六月起，

至九月，每月售出金额约在一百三四十万元左右，惟在十月以后，售额大增，每月超过二百万元以上。而十二月份售出金额之数，竟达四百余万元。”^[45] 30年代金银大量外流，于此可见一斑。随后金价波动很大，为经营此行者提供了赚钱的机会，特别是1935年11月我国宣布禁止白银外流，使金价飞涨，而富有者纷纷购买金器，使经营者在各业衰败中获取厚利。据1935年的统计，广州全市此时有金店120余间，倒闭10余间，而新开业者亦相当。可见此行的特别。^[46] 首饰中的珠宝玉器业曾与金业一样兴旺，因为人们曾认为它与黄金一样贵重，有钱时把它当作装饰品，以显示富有，又有保值的作用，必要时可作典卖，换回相当的金钱。但自从镀彩的假玉发明之后，珠宝玉器的价值便一落千丈。因为真假难辨，人们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购买，珠宝玉器的价格由此直线下跌，除少数富有人家仍将其当作装饰品外，普通人很少购买。

百货业：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本行业发展较好的时期，各大百货商店都获利不菲。如大新、先施公司，每天营业额上万元的时候不少，此阶段前期对舶来品提高关税，但此类商品多为国内所不能生产者，而生活稍宽裕者以使用洋货为时髦，故洋货虽然提税，生意仍不见淡，甚至来货价增一成，卖出价增两成，仍有销路。“九一八”事变之前，舶来品以日本货为多，日本货质地劣而外观颇佳，来货价低而售货价高，^[47] 获利之厚自在必然。抵制日货之后，虽然走私人口者不少，但费用要高昂得多，改装成欧美货也难以销

售。另外，是时提倡国货，国产品也日益增多，此类产品大多价格低廉，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国产百货中日用品销路比较流畅。另外，随着经济危机加剧，国外厂家向我倾销商品，百货市场洋货充斥，但价格高昂，经营此行者，只有大百货商店尚可，且只有日用品销售状况较好，故门市虽然拥挤，却是属于参观者多，购物者少一类。即使是先施、大新一类的公司，在经济最萧条的时期，营业额也曾下降近一半，至于小本生意者，则更加艰难。

建筑业：建筑业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是兴旺发达时期。就广州市而言，1932～1933 年全市大小建筑商家达 2000 余家，从事工人约 10 万余人，全市人口每 15 人中，就有一人从事此行业。

戏院戏班：地方戏剧曾是老百姓文化娱乐的主要场所。许多有戏瘾的人，特别是妇女，喜欢看戏听曲，戏班生意曾兴旺一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欣赏水平也不断提高，特别是电影这一全新的娱乐形式的出现，对戏班的生意影响极大。电影情景变幻逼真，有声有色，而票价又比戏院要低得多。其次，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戏班演员对薪酬的要求也不断增加，如粤剧的一些著名“老倌”动辄索价年薪 1 万元以上，戏班负担沉重，不得不提高票价，一些粤剧戏票甚至要 3 元。票价过高使本来就下跌的上座率更是雪上加霜。于是戏院处于两难的境地，到 30 年代，戏剧业在城市里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如广州的戏院只剩下大平和海珠两间老戏院。全市首屈一指的海珠

戏院还不时停演。

电影：此阶段对于电影也是转折时期。20年代末期电影业还是无声电影占据了娱乐事业的大部分市场，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就有“影画院”3间。但此时也正是有声电影进入我国的时期，1930年广州出现有声电影院两间，一时门庭若市，老百姓趋之若鹜。即使在经营萧条的年代，电影业由于不断发展和改良，票价低廉而处于不致亏折的优势地位。

游乐场：广州的游乐场都是著名的百货商店所附设的（内设电影、粤剧、京剧等），如大新公司和先施公司都是在商场内设游乐场，以吸引游客和购物者，开始时票价二角，后来提高到三角、四角，再往后增设摸牌、抛圈、猜谜等赌博形式的游戏项目。各家游乐场中，大新游乐场规模较大，营利也较好。

家私：该行分木制家私、酸枝家私与西式家私三类。木制家私在广东政局动乱的年代曾生意兴隆，因为来往的军队多，驻防迁徙频繁，每到一地，必然要制办大批木制床椅之类。后来学校大增，亦需要大批桌凳台椅。还有，30年代经济萧条，平民百姓只能置办简单的家私，该行也一直以做新婚家私为大宗，由是该行业尚可维持。酸枝家私曾在广东出口中占有相当地位，至此阶段国外已无销路。就本地而言，该业民国初年最盛，是时达官贵人的公署公馆多，这些人多追求奢华的家私，此外，商界的需求也不小。其后战乱频仍，笨重的家私便不受青睐。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行

业才略有起色。至于西式家私，在 30 年代以后，人们的审美观念有所改变，西式家私虽然不耐用，但外观引人，新家庭非此不足以示时髦，机关社团亦莫不以西式家私是尚，因此，西式家私在军政界、商界渐受欢迎，就是学校的书架桌椅，也向西式家私店定做。还有，一些大商店、大机关的装饰，也由西式家私店承包，故此行的利润颇厚。其后由于此行生意前景好，新开业者多，导致除大商家外，其余均利润微薄。

注释：

- [1] 图片载于《广州商业年鉴》，广州市商会编，1933 年。
- [2] 本表的米谷输入数量及价值数值采用 1939 年《广东统计汇刊·广东省历年国米谷及洋米谷进口数量及价值统计表》而编制。米谷数值单位为千担，价值单位为法币千元。广州米价指数为趸售物价指数，以 1926 年为 100。
- [3] 黄荫普、罗剑声、秦粤生编：《广州批发物价指数汇刊》（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丛刊）第 15 页，1934 年 10 月出版。
- [4] 此处是根据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的数字而作的比较，与《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所载的数字数值略有出入。后者所载的数字出自海关统计报告。自从广东省施行食糖专税后，进口糖价格高昂，而广东每年消耗食糖的数量相当大，故食糖成为广东主要的走私商品，大量的食糖进口并没有进入海关的统计册。
- [5]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 795~797 页。

- [6] 《潮汕女手工业的抽纱近况》，载《香港华商月刊》第2卷第5期，1937年。关于1933年抽纱出口总值有1800万元之说，疑为潮汕货币币值导致不同。
- [7] 《近年来本省草席产销日渐衰落》，载广州《国货运动月刊》创刊号，1937年。
- [8] 《本省水产制品暨草织品产销概况》，载《国货运动月刊》第2期，1937年。
- [9] 《高明草席业概况》，载《国货运动月刊》创刊号，1937年。
- [10] 《本省土纸产销概况》，载《国货运动月刊》第2期。
- [11] 《数年来粤土布产销回顾》，载《国货运动月刊》创刊号。
- [12] 《本省茶叶产销概况》，载《新广东月刊》第36期，1935年。
- [13] 黄瑞伦：《历年来广东对外贸易概观》，载《统计月刊》第2卷第12期，广东调查统计局编，1936年。
- [14]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转引自《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505页。
- [15] 君略：《经济恐慌下之本省工商业现状及其救济方策》，载《新广东》第32、33期合刊，1936年。
- [16] 资料来源：《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第4页。表中计算有误，英国进口所占百分比应为14.4。另外，百分比不合，进口部分多了0.1，而出口部分则少了0.1，原因是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所致。进口部分大都是“入”，而出口部分则刚好是“舍”。
- [17]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799页。
- [18] 《本省航业日就衰落》，载《新广东月刊》第21期，1935年。
- [19] 本表是以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编1936年《统计月刊》第2卷第7期的“广东省河民船数目及运载价目统计表”为基础，参考《统计汇刊》1934年第1号《广东省会民船数目及运载价目调

查》而编制。前者调查时间为 1935 年 6 月，后者为 1933 年 8 月。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的调查，由全省港务管理局汇总编制。表中所列价目是 1933 年的价目。仔舢艇：一种载客的船。西瓜扁船：一种驳船，以状似西瓜，故称。紫洞艇：珠江河上的豪华游船。横水渡：行驶于两岸之间的木船。车渡：使用人力脚踏作推动力的木船。

- [20] 广东省商会编：《广东省商业概览》第 23 页，1948 年。
- [2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700~701 页。
- [22] 《土糖潮柑近年产销状况》，载广州《中山日报》1937 年 12 月 27 日。
- [23] 为了避免捐税过重的负担，厂家、商人均对资本实际情况讳莫如深，故申报的数字与实际相差甚远。此项调查中，各厂申报数字合计仅为 148190 元。
- [24] 每罐 50 市斤。
- [25] 广州市立银行经济调查室编：《广州之工业》第 169 页、第 179 页，1937 年。
- [26] 伍顽立编：《广东工业》第 10~11 页，1947 年。
- [27] 王相钦、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 551 页，中国财政出版社，1999 年。
- [28] 资料来源：《广东省银行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
- [29] 引自《广东省志·商业志》第 6 页，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该书未标明此项调查的确切时间，疑为 1934 年的统计数字。
- [30] 《广州年鉴》卷十《经济》第 107 页，1935 年版。
- [31] 《商业特刊》第 2 期，第 13 至 14 页；第 4 期，第 73 页。
- [32] 《粤汉月刊》第 1 卷第 1、2 期，第 48 页，1937 年。

- [33] 《广州商业写影》，载香港《大众日报》1935年3月29日。
- [34] 《广东省商业概览》第12页，广东省商会编，1948年。
- [35] 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第550页，1962年。
- [36] 《十九年各行商业概况》，载《广东商业年鉴》第10页，1931年。
- [37] 《广州商业写影》，载香港《大众日报》1935年3月27日。
- [38] 《广州年鉴》卷十《经济》第120页。
- [39] 《十九年各行商业概况》，载《广东商业年鉴》第11页。
- [40] 《广州年鉴》第120页。
- [41] 《粤汉月刊》第1卷第1、2期，第48页，1937年。
- [42] 《广州年鉴》第121页。
- [43] 《新广东月刊》第34、35期合刊，第144页，1935年。
- [44] 《十九年各行商业概况·成药行》，载《广东商业年鉴》。
- [45] 《十九年各行商业概况·金行》，载《广东商业年鉴》。
- [46] 《廿四年广州商业总调查》，载广州《群声报》1935年12月24日。
- [47] 《广州年鉴》卷十《经济》第117页。

第三章 抗战烽火中的畸形商业 (1937~1945)

第一节 艰困非常的战时贸易

进入 1937 年，广东的政局已相对安定，“两广事变”对广东政局影响不大，基本上没发生战事。随着陈济棠的出走，广东政坛走马换将，蒋介石安排亲南京的广东人取代陈氏人马，这样，既有利于安定人心，又有利于控制大局。是时广东经济形势已较前大有好转，是年粮食丰收，币制统一之后，中央宣布收回广东流行多年的复杂的地方货币，以法币为唯一币制，金融动荡的现象得到改善。外部条件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已逐渐复苏，对广东的出口也不无助益。但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全面对华侵略，对广东的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外贸易因其他对外口岸出口受阻，逐渐向南转移，使广东的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口岸受日本封锁，北方商品输入广东的海上通

道已阻塞，加上战火所及，广东土货进入北方市场也受阻。

战争的到来也使广东的对外贸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原来经上海出口的中国内地商品，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及西南的进出口商品因长江出口被封锁，不得不改由通过刚筑成的粤汉铁路运到广州出口，原来订定的经上海等口岸的进口货物改由香港经广州运入，广州由此成为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进出口岸。当局组织了以战略物资为主的进出口物资的紧急抢运。水上运输方面，轮船昼夜不息地抢运物资，即使在日机轰炸不断的时候，一些轮船如“佛山”、“金山”、“天一”、“广东”等仍于晚上轮流航行。其他小火轮、民船参与运输者，更是川流如鲫。战争爆发前夕开始铺设的黄埔支线将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连接起来，持续 30 多年的关于两条铁路是否连线的争论到此结束。在此之前，广九铁路基本上用于客运，货运量极少，1936 年全路货卡不足 60 辆。即使双方同时对开，每日上、下行运货也不过 1000 吨左右，全年不过 72 万吨。但是，1937 年经广九铁路输入的货物量为 300 余万吨，输出量为 200 万吨，于此可见当局为战略运输所做的努力了。是时香港、九龙各仓库货积如山，而广州河南凤凰岗的太古、怡和洋行的仓库，以及白蜆壳与黄沙一带的仓库，无不货物堆积。通过广州湾和澳门两个租借地口岸转运到香港出口的货物也不少，但最主要的进出口岸是广州和九龙。随后，日本海军加紧对广东沿海的封锁，又不断轰炸粤汉、广九铁路和广州市。在不断遭到破坏的同时，也在当局的组织下坚持随炸随

修，极力维持这条沟通海外的运输大动脉的畅通。另一方面，作为铁路运输补充的公路运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极少数的几种商品之外，广东传统的出口大宗商品几乎都有增长。1937年广东的出口额较上年增加了4552万元，进口额也增加了4985万元（这些数字只是民间贸易的进出口统计数字，不包括国防战略物资的数字）。又据香港出入口署的统计，输入香港的蚕丝、桐油、茶叶、矿砂、蛋品、猪鬃6种商品，抗战爆发后12个月比抗战爆发前12个月，增加了5478万港元。

1938年日军南进锋镝渐渐逼近，日舰加强对珠江口的封锁，华籍轮船无法从珠江进入广州。2月份我方封锁珠江，珠江航行全线停止。1938年10月11日，日军在惠阳澳头登陆，21日广州沦陷。汕头、广州湾、澳门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进出口。出口商品方面，这一阶段从汕头运往香港的货物以果品、茶叶、油类为大宗。经澳门运往香港的以鱼类、蔬菜、土布、丝和丝织品、矿砂、烟草为大宗。经广州湾运往香港的以牲口、粮食、桐油为大宗。进口商品方面，从香港经澳门运入内地的，以大米、面粉、煤油、花生油、香烟为大宗。从香港经广州湾和汕头运入内地的，以煤油为最多，其次为布匹，再次为车辆和交通器材。^{〔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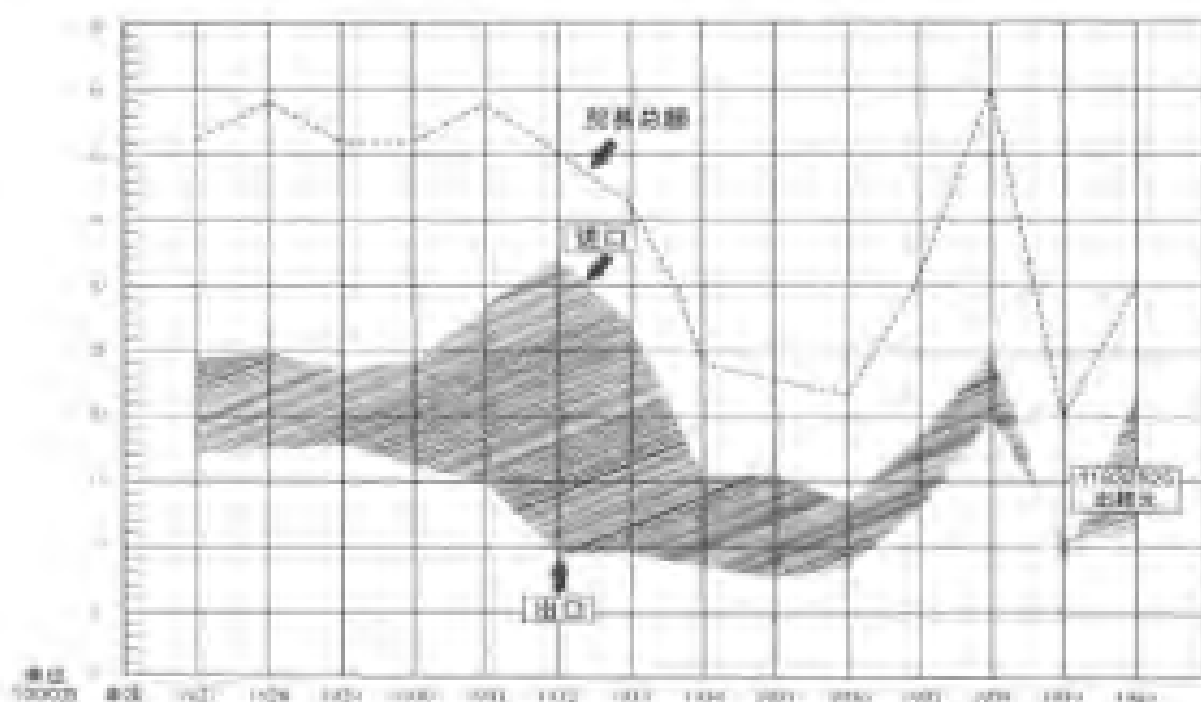
1939年是广东进出口低迷的一年。本年度广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处于全局动荡之中。日军占领广州之后，曾试图继续沿粤汉铁路北上，攻占韶关，打通粤汉铁路，经过第一次粤北会战，挫败了日军北进的企图，而广东

直到 1939 年 2 月才确定以韶关为临时省会。由于日军出人意料地从惠州登陆，原有的以珠江为中心的布防形同虚设，广东省当局仓皇应对，从广州撤出时大批工业设施无法及时运出，汕头又于是年 6 月陷于敌手，加上整个广东军事动乱，是年进出口处于低谷就不足为怪了。

1940 年 5 月第二次粤北会战之后，因是时日本正在推行南进战略，在粤的日军已无法集中大量兵力进攻粤北，此后数年敌我双方处于对峙状态，粤北抗战后方也有了相对安定的局面。而当局为了开通对外贸易，开辟了数条贸易通道，其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有经惠州—沙鱼涌—香港的贸易通道，作为东江方面进出口的干线。这一时期，是广东对外贸易最艰难的时期，敌我之间的经济战逐渐激烈。敌军为了破坏我方的贸易，采取了各种办法。如派飞机对贸易通道进行轰炸，进而派兵攻占宝安，再攻占中山，企图切断我方陆路与澳门的联系，还派人进驻广州湾检查我进出口物资。陆路的军事行动之外，也从海上对我海口贸易集中的地区展开骚扰和抢夺物资。这种以破坏和抢夺物资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在 1941 年最为频繁。如 2 月 4 日，日军水陆并进，海上从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进占淡水。陆路从深圳沿沙深路进占龙岗，抢夺物资外，更主要的是切断东江国际贸易通道。3 月 3 日，日军同时从海上骚扰南路的海康、北海、电白、阳江和台山，所到之处，肆意破坏盐田，抢掠货物。这次突然性的袭扰共抢得煤油 1365 罐，桐油 247 罐，菜油 3000 罐，花生油 220 罐，铁钉 2500 斤，钢铁 15 吨，盐 1000 包，砂

糖 6250 斤，棉 215 匹，汽车零件 7 箱，米 90 石，麻绳 60 捆，以及碎铁、木材、竹料、食料等大批物资。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日军这次军事行动的用意所在。随后，日军又采用相同的手法，突然进攻海丰、陆丰、惠阳等地。^[1]在香港沦陷之前，敌我双方在惠阳、博罗及海陆丰附近的大小规模的战斗经常发生，大都是围绕贸易通道这一目的而进行。

广东省对外贸易进出口货物按年总值比较（1927—1940）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广州湾随之沦陷，澳门为葡萄牙租借地，虽然葡萄牙在战时为中立国，但实际上被日本人所控制。而一些沿海的小口岸如神泉、汕尾、阳江、广海、电白等12个小卡口，原来并非直接对外的口岸，因为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日本军舰对我贸易通道诸多骚扰，为加强对外贸易，于此年8月实行对外开放，准许

外轮停泊与上落客货。但是，日本军队对这些港口的轰炸和骚扰也随之而来，太平洋战事之后，这些小港口的对外贸易基本停止。广东与国外的贸易基本中止，所余的只是与其他省市之间的贸易。1942年1月1日成立的曲江关成了广东最主要的海关。

1937~1942年广东进出口贸易价值比较表(单位:法币元)⁽³⁾

年份	进口价值	出口价值	贸易总值	出超(+)/入超(-)
1937年	180023123	130064949	310088072	(-) 49958174
1938年	253303333	199089073	425392406	(-) 54214260
1939年	92649108	104731672	197380780	(+) 12082564
1940年	216835653	113377823	330213476	(-) 103457830
1941年	441754465	208995106	650749571	(-) 232759359
1942年	592496536	281050756	873547292	(-) 311445790

就广东进出口贸易在全国的地位而言，1937年进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8.88%，出口占15.52%。1938年进口贸易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的28.58%，出口占26.11%。1939年进口仅占6.95%，出口占10.2%。1940年进口占10.70%，出口占5.75%。1941年1至9月，进口占18.36%，出口占6.81%。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7年广东对外贸易总值比上一年度增加了将近1亿元，其中出口额激增将近45%，为1931年以来的新高，说明广东的对外贸易终于摆脱了数年低迷的

状态。其原因除了当年广东政治经济形势均较前一阶段稳定之外，抗战军兴，刺激了进出口的活跃，这也体现在 1938 年的进出口贸易增加的数字中。1939 年进出口值均大大低于平常年，除上述原因外，当时沦陷区的对外贸易中止，特别是粤海关基本上停止运作，进出口已非太平时代可比了。1940 年和 1941 年贸易额似乎不少，但倘若扣除货币贬值的数字，则实际贸易大幅度减少。不过，在贸易通道不顺畅，运输等各方面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有这样的成绩，说明人民和商业界人士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从地区和国别比较来说，1937 年广东与香港的贸易占总值 23.63%；次席的美国有 15.28% 多一点；其后则是德国，占 10.65%；第 4 位和第 5 位的越南和英国接近 10%。进口则是美国以 16.91% 占第一位；德国以 16.11% 占次席；其后是英国、越南、泰国；香港仅占 3.84%。但出口方面，出口香港为 6639 万元，占出口总值的 51.05%，高居榜首；美国以 13.02% 居次席；其后是新加坡、越南、印度。

1938 年香港与广东的贸易占广东是年贸易总值的 30.01%，较上年度有所上升，而广东对香港的出口贸易达到 12643 万元，占广东出口总值的 63.50%。香港对广东的出口仍维持上一年度的水平。美国和德国仍是广东进口的大户，美国占 22.30%，德国占 21.34%，均比上一年度有较大的提升。但广东对美国的出口下降至 8.56%，德国仅有 4% 左右。

1939 年外贸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其中香港与广东的贸

易额继续大幅上升，已占广东贸易总值的 37.15%，进口则猛增至 16.67%，出口则占 55.38%。另一个最大增长点是澳门。此前数年澳门仅占广东进出口总额的 1%~3%，但是年猛增至 14.36%，仅次于香港，占广东出口总值的 20.33%。与美国的贸易处于第三位，但贸易额也在下降，进口值占 12.10%，而出口美国的数值仅占 5.78%。当然，下降最多的是与欧洲方面的贸易，德国占进口总值的 7.08%，出口仅有 0.15%。

1940 年，广东出口商品的销售地更加受限制，在当年 113377823 元的出口总值中，香港占 42121567 元，广州湾租借地 41791599 元，澳门 19245956 元，三地共 103156122 元，占总值的 91%。之后美国为 8180155 元，印度 1824324 元。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1938 年，广东出口商品销售地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遍布世界各地，但到了 1940 年，只有 20 个国家和地区。^[4]以上变化根本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加上海上运输不如过去通畅，广东商品出口受阻。而战争也使港澳对内地的依赖不断增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舶来洋货主要输入地香港、广州湾很快就沦于敌手，澳门也受制于敌，广东对外贸易主要是与湘、赣、桂、闽等省的省际贸易，未沦陷的一些小港口如汕尾、海康等卡口，并非国际贸易港口，贸易量有限。另外，广州、汕头等口岸已为日本人控制，并陆续开展对外贸易的运作，故当时广东实际上有两个进出口系统。

1943~1945年广东进出口贸易比较表^[5]

年份	币种	进口价值	出口价值	贸易总值	出超(+)入超(-)
1943年	法币	570177060	34017259	604194319	(-)537159811
	中储券	240886797	267089935	507976732	(+)26203139
1944年	法币	542972680	79947303	622919983	(-)463025477
	中储券	1114277324	1195844232	2310121556	(+)81666018
1945年	法币	3960075800	455596230	4415672030	(-)3504479570
	中储券	1749659033	2953732732	4703391765	(+)1204073709

进口商品种类方面。米谷仍为广东进口的第一大宗商品，1937年进口洋米谷为35698117元，占进口总值的将近20%，次年略有下降，占12%。1939年将近14%。1940年仅占4.3%。不是当年广东粮食增产，而是原来米谷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如泰国、越南基本上不能再对华出口米谷，而另一主要来源，即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是自顾不暇，何况海上通道也不如过去那样畅通。另一方面，粤汉铁路的全线开通使国产米输入广东的情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国产米主要来自安徽一带，湘米、赣米输入较少。粤汉铁路的开通，湖南的米谷能通过铁路直接进入广东，不必如过去那样假道汉口、上海。湘米运粤，一般是在长沙和衡阳集中，装火车运到广州、韶关，政府对国产米输粤有特别优惠的政策，规定运费减半征收，每担约0.48元，比原来取道长江水运每担0.816元，便宜多了。故此以后湖南向广东出口的大

米，约占广东进口国产米的一半以上，其次是皖米、赣米和桂米。另外，抗战期间广东粮食需求与战前也有较大的变化，广东全省粮食生产的消耗情况是，广州、汕头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商品生产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广东缺粮最严重的地区，而抗战后方属于商品生产程度较低的地区，粮食原本基本上可以自给。一些特殊的地区，如粤北，因成为广东战时省会，人口突然猛增，才导致缺粮严重。但粤北紧靠湖南、江西两大产米区，陆路交通又非往日可比，于粮食运销尚可维持，战时广东当局以增强农村粮食生产为要务，故除1943年广东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导致饿殍遍地之外，其他年份饥馑严重的时候不多。相比之下，沦陷区的缺粮更为严重。

抗战前后广东粮食产销概况表⁽⁶⁾ (单位：市担)

年份	粮食产量	消费量	缺粮量
战前	139648534	159243805	19559271
1941年	103724753	115350830	11626077
1942年	102811441	109249145	6437704
1943年	98462140	103376460	4914320
1944年	109118484	114049175	4930691
1945年	101673627	138299800	20923001
1946年	117376799	148740970	31364171

矿物油为进口第二大类，进口量全面大幅度提升，包括汽油、煤油、润滑油等本省所缺乏而战时运输和生产不可缺

少的物资。尤其是汽油的进口，1936 年仅有 374 万元，1937 年将近 800 万元，1938 年达 1305 万元。1940 年矿物油的进口几乎是米谷进口数值的 1 倍，达 1745 万元。钢铁与机器零件在抗战初期进口品中也占重要地位，1937 年和 1938 年进口额都在 1800 万元以上，但 1939 年以后，已大为减少，大体是受战事战略物资出口的控制所致。战前广东进口的大宗商品，如糖、海产品、纸张均退居次要地位。就是棉、毛、麻等纺织品，在战争爆发之初只能居于次要地位。随着其他战略物资进口困难，以及华中地区对广东贸易的小规模的恢复，这类容易运送的商品才逐渐复苏。其中棉织品进口多年处于低值地位，1939 年仍只占进口值的 2.8%，1940 年则占 23%，为广东是年进口的第一大宗。

出口商品种类方面。丝业在经过数年的改良品种和改革制丝技术之后，生丝质量大有提高，出口也摆脱低迷状态，在 1937 年的出口商品中重新成为第一大宗商品，出口数值达 12186991 元（仅为生丝的价值。若包括废丝，则为 14869024 元，占出口总值的 11.4%）。生丝价格也涨至每担 670 元，为 1933 年以来的最高点。销路也非常顺畅，几乎是供不应求。各丝厂产品还没有出厂，就已经被预购一空，主要销往越南、印度和法国。1938 年广州落入敌手之前，生丝出口仍保持强劲的势头。日寇入侵使生丝出口戛然而止，但是年出口额仍有 9906063 元，这也是民国年间广东生丝出口的最后一个小高峰。1939 年只有 1429164 元。由于当时珠江上不准商船航行，出口的生丝基本上是通过邮包寄

往外洋的。1940年有所回升，有6436931元（含废丝）。

刺绣品居1937年出口额的次席，达到10402791元。而上一年度则只有72829元，增长了13倍。1938年的出口数值仍有10500069元。但其后则大幅度下滑，1939年只有5438403元。抽纱品的命运也与刺绣品相似，1937年出口7269360元，为上一年度的将近3.5倍，与刺绣品合计17672151元，加上其他编织针织品，共18118827元，占广东当年出口的首位。1938年抽纱品的出口还有增长，达到8561289元。1939年却只有3278693元，减少了500多万元。虽然如此，上述两种编织针织品仍居广东这两年出口商品的第三位。以潮汕地区为主的这两种手工艺品，1938年还能增长，说明在日本入侵潮汕地区之前，当地妇女为生存而作的努力。但是到了1940年，上述两种曾占广东出口大宗的手工艺品在广东省大宗出口商品（100万元以上）的调查统计资料中，已找不到踪迹，可见汕头的陷落对当地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

钨砂在1937年的出口值与刺绣品相当，为10293308元，而上一年度只有1391864元，增长了6倍多，价格也随战争形势发展而不断攀升。1936年7月钨砂在香港的价格约每担75元港币，至年底则在90元左右徘徊。1937年开始急剧上涨，是年6月，已增加了将近一倍。后来因香港存货太多，至10月份时才下跌，但“岁阑之际，复欣欣向荣”。^[7]1938年出口值狂升至41430822元，占广东是年出口总值的近21%，是1936年的近40倍，于此可见战争使各国

对战略物资的搜求不遗余力。但 1939 年只有 7696398 元。这是因为当时广东水上贸易通道基本上堵塞，广东当局又对钨砂出口的检查非常严厉，这种沉重的商品在陆上运输不容易。1940 年钨砂的出口值仅为 3992566 元。实际上，钨砂是战时最主要的走私物资，利润丰厚，走私的数值应比上述数字更多。

供应香港、澳门的蔬菜水果出口量相对稳定。1937 年蔬菜出口为 6930329 元，其后每年均在 600 万元以上。水果 1937 年为 4865131 元，此后数年略有上升。而家禽家畜则大幅度上升。1937 年出口的家禽尚不足 100 万元，其后直线上升，1938 年为 1771609 元，1939 年猛增至 5589040 元，1940 年家禽家畜出口值占广东出口总值的首位，达到 22857987 元。这一数字的变化说明，战争开始之后，从其他国家进口到香港的商品，尤其是食品受到海上运输阻碍的影响，不得不从内地增加进口以求补充。也说明港澳对内地的依赖性。

其他出口商品。药材、草席的出口基本上维持在 200~300 万元左右。纸张约有 300 多万元，但 1940 年减少了近一半。茶叶、烟草出口在 1937 年较以前大有改观，超过 100 万元的出口量。其中茶叶的出口在 1938 年曾达 6923899 元的新高峰，可惜次年出口所剩不到 1%，只有 517807 元。烟草则减少至 100 万元之下。最悲惨的是曾为广东出口大宗的绸缎和土布，1937 年两者出口还有百万元之数，而 1939 年绸缎出口为 281017 元，土布为 427019 元。1940 年，匹

头及纺织品全部加起来只有 3516635 元，与全盛时期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推其原因，全在于受战事的影响。1937 年 8 月 31 日，6 架日本飞机从珠江海外的航空母舰起飞，对广州首次空袭之后，频繁轰炸粤汉、广九等交通线并不时对广州发起空袭。1938 年初空袭渐多，5 月份之后更是频繁、大规模地对广州及周边地区实施轰炸，轰炸的目标主要集中于铁路、工厂和政府机关，导致大批工厂被炸毁。人民相率离开广州一带，有钱的逃往香港，无钱的走避乡村，工厂被迫停工，商品生产销售自然无从谈起。绸缎、土布出口锐减，其主要根源就在于此。与之处境相似的其他制造品如靴鞋、火柴、爆竹等。所以，随着战火向华中华南蔓延，进入 1939 年之后，广东出口的货物基本上局限于食品、原材料一类，工业产品出口微乎其微。从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广东在抗战初中期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1937~1940 年广东出口商品分类价值比较表（法币元）⁽⁸⁾

1937 年			1938 年		
商品名	价值	本年位次	商品名	价值	本年位次
编织针织品	18118827	1	矿砂	42548124	1
蚕丝	14869024	2	油、蜡、烛	25816218	2
矿砂	10985316	3	编织针织品	19450052	3
油、蜡、烛	8688360	4	蚕丝	12145513	4
蔬菜	7629171	5	牲畜	10430654	5
五金及矿物	6882148	6	蛋类	7624807	6

(续表)

1937年			1938年		
商品名	价值	本年位次	商品名	价值	本年位次
牲畜	5634765	7	蔬菜	6937429	7
木竹草棕制品	5566824	8	茶类	6924266	8
匹头及纺织品	5336916	9	五金及矿物	6902183	9
果实类	4865131	10	鬃、毛、发	6490142	10
药材及香料	4727955	11	果实类	5817465	11
鬃、毛、发	3939737	12	木竹草棕制品	5403803	12
纸类	3167254	13	匹头及纺织品	4526607	13
化学品	2294289	14	药材信香料	4447415	14
金属制品	2707452	15	纸类	3547786	15
其他食品	1995891	16	兽皮	3203689	16
陶瓷类制品	1959694	17	陶瓷类制品	2733857	17
鱼介海产品	1755308	18	蔗类	2540399	18
1939年			1940年		
商品名	价值	本年位次	商品名	价值	本年位次
牲畜	20824767	1	牲畜	22857987	1
油、蜡、烛	13116004	2	油、蜡、烛	18683496	2
编织针织品	8949630	3	五金及矿物	13568873	3
矿砂	7989410	4	药材及香料	8032374	4
蔬菜	7116399	5	蔬菜	7062493	5
果实类	5978953	6	蚕丝	6436931	6

(续表)

1939年			1940年		
药材及香料	5701305	7	矿砂	3992566	7
木竹草棕制品	3386519	8	木竹草棕制品	3444633	8
纸类	3355690	9	匹头及纺织品	3516638	9
蛋类	2408793	10	果实类	2417254	10
陶瓷类制品	2121908	11	茶类	2090288	11
燃料	1802158	12	蔗类	1983383	12
鬃、毛、发	1783399	13	燃料	1945672	13
匹头及纺织品	1774197	14	颜料及染料	1831436	14
蚕丝	1697839	15	陶瓷类制品	1770214	15
五金及矿物	1693191	16	蛋类	1566239	16
颜料及染料	1335282	17	纸类	1488371	17
子仁	1107624	18	糖类	1094466	18

贸易路线：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一些主要县份被日寇占据，珠江主航道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广九铁路更是支离破碎，广东原有的国际贸易通道被切断。但是，广东有漫长的海岸线，有许多港湾可作为对外贸易的通道。另外，省会北迁，贸易通道也必然为这些改变而变化。为保持对外贸易的畅通，保证战略物资的运输，当局与商民另辟贸易通道，当年的主要贸易通道有：

1. 曲江到沙鱼涌线：曲江—马坝—大坑口—薪江—官渡—龙仙—曲塘—杉木坳—忠信—灯塔—南湖—河源—惠阳—鱼沙涌。全长 579 公里。其中曲江至灯塔用汽车，灯塔至河源人力挑运，河源至淡水民船和挑运兼用，淡水至沙鱼涌为挑运。

2. 曲江至乌坎港线：曲江—灯塔—曾田—龙川—岐岭—五华—河口—横流渡—河田—河口—陆丰—乌坎港。全长 579 公里。其中曲江至五华为汽车运输，其余为人力挑运。

3. 曲江至汕尾线：曲江—龙川—蓝口—紫金—公平—海丰—青草滩—汕尾。全长 541 公里。其中龙川至蓝口可用船运，之后仍为挑运。

4. 曲江至阱洲线：曲江—梅县—高陂—葵坑—溪头—黄冈—阱洲。全长 715 公里。其中曲江至梅县 475 公里用汽车，梅县以下部分地区可用民船，余为挑运。

5. 曲江至广海线：曲江—英德—清远—三坑—三角塘—四会—莲塘—山田—高要—洞口—尖石—三埠—台山—水南—莲花墩—广海。全长 609 公里。其中曲江至三坑可船运，三坑至高要为人力挑运，其余部分可用船运。

6. 曲江至阳江线：曲江—高要—洞口—河头—春湾—阳春—阳江。全长 634 公里。其中河头至春湾需用人力挑运。

7. 曲江至广州湾线：曲江—高要—白珠—安塘—云浮—留洞—平塘—罗定—沙满—大平—合水—东镇—

信宜—龙头—茂名 化县 上蒙—黄陂。全长 944 公里。其中高要至茂名多用牛马车和人力车运输，茂名至上蒙可用民船，余下为挑运。

运输价格：一般来说，水运费用最低，次为挑运，最贵是汽车运送了。10 公里水运每担为 4 角至 8 角，挑运为 1 元至 1 元 5 角，汽车约为 3 元 2 角。^[9]

以上贸易路线中，曲江至沙鱼涌线最为紧要。此线是通曲江的最为便捷的国际商贸线，1939 年 9 月开通后，大量的军火、汽车、矿物油、化学制剂、棉纺织品及其他日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后方。钨砂、桐油、土纸、茶叶等出口物资也多半由此运往香港，再转运出去。因此，此线开通之后，便成为日寇的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与我军展开过多次争夺。1941 年 2 月，日军从石牛湾登陆，占领沙鱼涌，此线被日军完全切断。

广东海关对外贸易在战时变化较大。至 1941 年年底香港沦于敌手为止，广东的 9 大常关中，处于沦陷区的有广州、汕头、江门、琼州 4 关。为我方控制的有九龙、拱北、三水、雷州、北海 5 关。其中三水关处于游击区，经常受日寇骚扰，无法正常贸易，其余在我方控制的各关虽然经常受到日寇的骚扰，但我方商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各关贸易额几乎都比战前有很大的增长。

下表的数字反映了战时广东外贸的变化，为对比而增加了 1936 年的数字。1941 年的统计数字为上半年的数字。

1936~1941年广东出口贸易按关别价值统计表^[10] (单位:法币千元)

年代 关别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广州	42487	63846	106693	5322	15564	28666
九龙	6245	16645	30656	6429	16449	26832
汕头	23224	33515	37553	34250	234	0.183
拱北	2954	3698	7937	20073	10986	—
三水	280	188	213	—	—	—
江门	3242	4766	4404	1381	—	—
雷州	1717	2324	5720	18566	68818	514628
琼州	2915	3509	4267	1644	1322	120
北海	1482	1574	2546	17067	4	156
合计	84546	130065	199189	104732	113377	570402

民国广东9大常关中,广州关(即粤海关)进出口量历来为最大。抗战军兴之后,各关贸易额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广州沦陷前,广州关、九龙关的进出口贸易突飞猛进。“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长江口岸被封锁,广州成为最主要的进出口岸。是年10月的进口额为战前同期的两倍。广州关贸易额突破亿元大关,接近广东生丝鼎盛时代的出口数值。而1938年10月以后,广州外贸基本上就停顿了,若非如此,应该可以创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历史新高。

九龙关与广州关的情况相似，但广州关是以出口急剧增长为特点，九龙关则是以进口额激增为特点。1938年贸易达到3066万元的历史最高值。^{〔1〕}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的接轨以及公路运输，使北方货物能直接运往香港，进口商品也可以直接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内地。1939年日军占领了该关处于边境上的分卡，使该关贸易一度受阻，随后被迫退出，该关贸易重新兴旺。

广州、江门两关失陷之后，拱北曾一度成为珠江三角洲商品集散地，1939年拱北关的出口额仅次于汕头关，是1936年的6倍多，也比上一年度增多将近2倍，是该关出口的历史最高记录。但随后经常受到日军空袭和登陆骚扰，1941年贸易基本停顿。

在未沦陷的各口岸受到日寇封锁贸易通道和频繁骚扰的情况下，雷州关在战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该关进出口的物资，既可以通过曲江至广州湾的水陆联运进出，更大量的是经过桂南，再经湘桂线或水道运入粤北。1940年第一次桂南会战后，日军侵占西南的军事行动暂时结束，经雷州关进出的物资也明显增长。1940年，台山分卡改属该关，水东分卡也重新开放，对该关的贸易增长起了促进作用。1939年雷州关出口额是1936年的将近11倍，1940年更达6882万元的历史最高，是1936年的40倍，独占当年广东出口贸易的鳌头。1941年上半年进口值为16938万元，出口值为51463万元，仍居各关之首。

与国内其他海关相比。进口方面：1937年上海列第一，

天津第二，九龙、广州、汕头分列第三、第五、第六位。1938年上海、天津仍列前两位，九龙第三，广州上升到第四位，汕头仍列第六位。1939年上海、天津仍居前两位，汕头仍居第六位，广东其他各关均在10名之后。出口方面：1937年上海第一，天津第二，广州、汕头、九龙分列第三、第六、第八位。1938年，上海、天津、广州列前三位，汕头上升为第五位，九龙上升至第七位。1939年，广东只有汕头列第七位，其他各关均在10名之后。

第二节 商业环境的改变与各地商业概况

从1937年8月31日6架日机首次空袭广州开始，广东各地，尤其是广州不断地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此后4个月，仅广州一地，因日机轰炸和时局动荡而倒闭的工商业厂家达1760余家，经济损失160余万元。^{〔12〕}面对形势的不断恶化，关于广东省营工业是否内迁的问题曾引发一番争议。由于机器搬运不易，内地原材料供应不便，加上当时广东省政府财政拮据，政府需要工业收益来维持，故行政院决定不迁徙。沿海吃紧时，政府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敌军突然在惠阳登陆，当局仓皇失措，将部分重要机器炸毁，除设于吴川县下山村的麻织厂和惠阳糖厂的设备外，其余悉数沦于敌手。

广东的民营工业在1938年敌骑侵入之前，已达2000余家，具有新式工业规模的有347家。兹列表于下：

广东抗战前新式民营工业概况统计表^[13]

类别	家数	资本总额	工人总数	备考
机器工业	21	740950 元	655	生产 5 匹至 224 匹马力各种柴油机，农用抽水机，碾米机等。
火柴工业	35	601500 元	3510	除少数有发动机设备外，其余均为手摇机。
缫丝工业	58	30242 (丝车数)	37695	
橡胶工业	17	1138000 元	3528	大部分在广州，此为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统计数字。
肥皂工业	23	159200 元	160	大部分在广州，此为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统计数字。
碾米工业	62	563845 元	429	
煤油工业	6	284400 元	191	汕头、北海各厂未计入，此仅为广州市的统计。
榨油工业	37	137300 元	3466	仅广州市的统计。
电器工业	54	6765600 元	不详	发电容量 27804 千瓦。
玻璃工业	2	25000 元	不详	
皮革工业	3	503000 元	不详	
化妆品工业	7	35000 元	不详	
合计	375	10935795 元	49234	

由于民营工业多在沿海地区，日军突然而来，广东军方防守不力，以致这些工厂十之八九来不及迁徙，或被敌所占，或毁坏无遗。总计广东工业的资产损失约值法币 3000 万元。^{〔14〕}

广州、汕头沦陷之后，广东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商业中心，也失去了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粤北工业基础落后，省会北迁后，连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供不应求，导致物价狂涨。为改善日常生活用品紧缺的状况，1939 年至 1940 年间建设厅系统设立了电池厂、肥皂厂、制纸示范厂、机器制造厂。广东省振济会建有缝纫厂、砖瓦厂、木工厂、牙刷厂、肥皂厂、火柴厂、制纸厂等。以上工厂规模都很小，总资本额 565891 元，工人 98 人，年生产总值 1553634 元。其后建设厅又建有面粉厂、化工厂、纺织厂、织造厂等。以上工厂主要建在曲江，少数在连县。

1940 年 2 月成立的战时贸易管理处（1941 年 9 月改为广东企业公司，1942 年再改为广东实业公司），1942 至 1943 年间建起粤利肥料厂、粤强印刷厂、粤德制药厂、粤昌机器厂、粤华交通器材厂等。广东省银行也办有中兴制革厂、中伦纸厂、中正榨油厂、农产品加工厂等。这些厂分散于韶关、坪石、乐昌、连县等地。但这些厂共同之处是资本少，机械化程度低，大都为手工操作，以及原材料不足、设备简陋、人才缺乏等。以上这些工厂所出的产品，其销售大都限于本省，只有少数品种如火柴，仍销往桂、赣、湘。另外，由于向后方撤退的船舶大都吃水较深，而各江上游的船

只本来就少，因此，增造浅水船和木船对缓解运输压力至关重要。1940年初设曲江造船所，以建造木船为主，兼造浅水小轮船。

民营工厂方面。据建设厅1940年的调查统计，本省抗战后方59个县份共有工厂474间，资本总额1293866元，工人2387人。产品局限于火柴、纸、玻璃、片糖、肥皂、食油、土布等日常生活用品。电力厂只有4间，机器厂3间。

交通运输方面。为应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两广事变”之后，连接粤汉与广九两条铁路，并与黄埔港的水上运输相联系，是此时期广东交通工程的重点。1937年1月，黄埔港开埠工程继续进行，新建的黄埔港与铁路相连接的黄埔支线也同时开工，由黄埔港经广州市石牌（与广九线相接）至西村（与粤汉线相接），全长24公里，8月22日开始通车，并实施水陆联运。此条路线的开通，不仅为商业运输，尤其是对抗战物资的紧急输入，起了重大的作用。

陈济棠治粤时代广东公路运输以东南为重心，粤北的公路寥寥无几，且大都是为了应付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配合对江西苏区围剿而修筑，由军人管理，小部分由地方人士集资兴筑。这些公路都极简陋，“于舒适与安全两事，无暇顾及，即桥梁亦为竹木便桥，山洪一发，即有断桥之虞”。这些公路是：南雄到曲江的南韶线，130公里；曲江至连县的韶连线只筑了数十公里便废弃；韶关至坪石90公里，通湖南郴州，因有粤汉铁路而未作商用；曲江至仁化54公里；粤赣

线，南雄经大庾岭至江西赣县，广东境内约 30 公里，以及南雄至江西信丰的南信线。^[15]以上就是粤北全部公路了。进入 1937 年后，则改为以西北为重心，特别强调加强与邻省的交通，原因在于战争形势日益紧张，为备战而不得不为之。是年赶筑韶关至大庾岭，韶关至连县，三水至四会公路。战争爆发后为改变粤闽交通而赶筑大埔至福建和平、上杭等路。将广州至云浮的公路扩展到广西，后称为粤桂公路。新修清远至花县、四会，增城至从化等公路。以上公路在广州沦陷前大都竣工。

1938 年广州弃守时，为遏止日军对内地的进攻，当局下令大规模破坏公路，总计被破坏的公路达 10000 多公里，仅存东北部和北部的几条公路。同年底赶筑连县至广西贺县、韶关至坪石两条公路。两次粤北会战之后，着手修复一些被毁的公路，逐渐形成以曲江为中心的战时公路运输系统：

北路干线 2 条：

第一干线：曲江起经始兴、南雄，由此再分为东、北两路，东路至江西信丰，北路至大庾。

第二干线：由曲江起经东昌、坪石至湖南宜章。另一支线由坪石经宜章县境至连县。

西路干线：由曲江起经乳源、连县、连山至广西贺县。

东路干线 4 条：

第一干线：由曲江起经翁源、连平、龙川、五华、兴宁、梅县、蕉岭至福建边境。

第二干线：由兴宁起经平远至江西边境。

第三干线：由龙南经坝子接江西虔南。

第四干线：由忠信经和平至江西定南。

以上公路全长 2305 公里，后增至 2491 公里。它是广东抗战后方陆路运输的大动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时重要商品的运输，主要是依靠这些公路。如广东是缺米大省，原来所依赖的循水路运来的洋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国产米供应，在广州沦陷后，已不可能。而政府迁韶之初，粤北人数急增，粮食短缺严重，广东省政府紧急设立“国米营运公司”，专门在南雄设站接收江西大米，并与江西省工商管理处战时贸易部商洽每月交 1 万包大米的购销事宜，但由于当时北路第一干线没修好，无法将米运入粤北，只好紧急从湖南另行购买。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广东所缺粮食完全依赖湘、赣、桂，基本上靠公路运输以补不足。另外，内地特别是湖南所需要的食盐基本上是靠广东供给。广东食盐分别从南路和东路运往粤北集中。南路先集中于四会，再经清远北运。东江方面则基本上靠公路集中于粤北，再运往其他省。运入粤北的所有商品中，以食盐为最大宗，每月少则数万担，多则数百万担，价值在 1 亿元以上，多则上 10 亿元。除了在粤北县份销售外，全部运往湖南。还有，广东与广西的联系，历来都靠西江这条运输大动脉，战时日军为切断这条运输线，1941 年 2 月之后反复与我争夺处于北江与西江交界的芦苞，因此，新修的北路第二干线与西路干线成为与桂省交通的要道。

抗战期间粤北与粤东的交通主要靠东路第一干线，即韶关至兴宁、梅县的公路，1939年1月便恢复通车，运输非常繁忙，一般每天约有300~400辆汽车奔走在路上，可知它负担之重了。也因此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加上修路之初为赶时间而没有顾及质量，以致刚通车几个月，便三步一坑，五步一洼，最严重的时候，40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一个星期也到不了。其补充措施是从曲江到大坑口用船运，上岸后挑运到岐岭，再转用木船或汽船沿梅江运到梅县、大埔等地。另外，有了其他干线，商品来源可从江西和福建运来，供需情况才有所改观。第三次粤北会战之后，广东省不少机关撤往平远大柘带，也是有这些公路为基础。

水运方面：广州沦陷前夕，广东航政局向梧州撤退，下令广州及珠江中下游的船舶向各江中上游撤退。1939年组建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在梧州设总社，肇庆设分社，并规定原定期航行于三水以上的轮船、拖渡、驳船一律参加服务社。该服务社的业务以军运为主，也兼及客货运输。抗战后方的食盐相当大部分依靠广东沿海的供应。广东盐务局在阳江和广州湾设盐务所，监督食盐的生产与收购，这些地区生产的食盐大部分是通过西江运入内地。

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处于沿海地区的城市不时受到日本飞机轰炸，以及敌军舰在海面游弋的威胁，大批商家酝酿向安全的地区转移。此后，随着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部分城市的沦陷，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商人纷纷向内地转移，粤北韶关、南雄，粤东梅县、兴宁，粤西西江沿线各重

要城镇，都是商户骤增，从而改变了广东商业原有的布局。现将当年一些主要地区的商业概况分述于下。

韶关商业：韶关为战时广东省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品需求量巨大。作为战时商业中枢，在沟通广东抗战后方与湘、赣、桂等省的商品需求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市进口的商品，食盐之外，以汽油、煤油、面粉、棉纱、布匹、西药等为大宗。汽油从香港和广州湾及肇庆输入，每月输入约 10000~30000 罐，价值约为 200~600 万元。其中约半数供应本地，半数输往湖南。煤油来自肇庆地区，每月输入约 10000 余罐，值 100 多万元。其中约有一半输往湖南。面粉主要来自湖南，部分来自香港，每月输入约有数十万至数百万元。棉纱来自香港或广州湾，每月由数百万元至上亿元不等，主要在本地销售，部分销往湖南。布匹来自香港或广州湾，广州湾的来货要先运至桂林，再经湘桂线转粤汉线运入。每月输入量由数百万元至数亿元不等，其中三分之一在湖南销售。西药来自香港，经芦苞或东江一带运入。每月输入约值数百万元，三分之一再输往湖南。

韶关出口的商品，以黄豆、中药、纸、大米、猪、桐油为大宗，多半为转口输出品。其中黄豆、中药、桐油由湖南输入，再运往东西江各地。大米和猪部分来自湖南，也销往东西江一带。纸则是本地特产。每月输入的商品中，以大米、猪和黄豆为最大宗。大米每月约有 3 亿元，黄豆和猪各在 1 亿元以上。^[16]

韶关本身是在抗战期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此前在广东各区中属于商业落后地区。这一点从商家的情况也可见一斑，加入同业公会的商家，战前仅有 184 家，而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达到 994 家，^[17] 还有相当多未加入同业公会的。可以说，抗战使韶关商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商业得到飞速发展。正因为韶关作为战时贸易中枢的地位，战局的变化对它的影响也巨大。1941 年 2 月沙鱼涌失陷，最主要的国际贸易交通线中断，对韶关的运输业、旅店业，甚至汽车零件业、百货业、布匹业等与商品进口相关的众多行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棉纱、布匹、工业燃料、纸烟、西药等来源短缺，投机者疯狂抢收囤积，外省商人疯狂抢购，商家趁机高抬物价，以至价格狂涨，韶关商业一时间十分混乱。^[18] 另外，由于战时运输困难，加上燃料短缺，东线运输受汽车运价高涨的限制，西线交通则受水道运输不时受阻（即日寇对芦苞等水上运输孔道的骚扰），使韶关市场在不断的涨价中波动。1942 年之后，韶关商品中波动较大的主要是棉花、棉纱、油、盐等依靠外地输入的商品，特别是棉纱，战前湖南棉纱基本靠广东输入，此时来源稀少，市场需求大，故在所有舶来品中，最为商家所求购者即此。进口油类虽然也是商家搜求对象，但由于进口基本上停止，经营者不肯轻易将存贮的稀有品出售，又受官家限价的严令，故大都偷偷进行地下交易，价格奇昂而不可得。而粮食、肉类、蛋类等外省输入的各类商品价格则受衡阳、桂林市价的影响较大。

现将战时韶关重要的商业行业概况简述于下。

食品类行业：经营米谷杂粮的商家战前有 19 家，至 1941 年底增至 66 家，次年增至 90 家，其中 2 家为碾米店，70 家为小规模的小米店。米谷业由于当局实行粮食统制和限价，虽然粮食市场营业旺盛，商家也难于获取厚利。但由于东西江运输时有阻塞，且受各地粮食收成、价格的影响，经常处于波动中，商家也每每趁机囤积和提价。食盐的情况与粮食相似，此行在抗战爆发前为末业，没有专营商店，抗战中特别是自由交易阶段，此业发展为百业之首，即交易量处于首位。后来政府实行专卖，盐务局定价，商人只能赚取佣金而已。韶关的食盐来源分东场盐和西场盐两种。前者来自粤东或惠博等游击区，后者则从西江和北江而来。运韶的盐以东场盐为多，由于游击区食盐来源不稳定，而由兴梅地区运盐则受运输困难影响，另外，当局规定由兴梅运盐到韶关销售，须搭运公盐 1000 斤，且只给很少的运费补偿，营业者将这部分“损失”转嫁于顾客，使盐价高昂。据 1942 年 10 月的统计，韶关运盐和卖盐的商家共计 171 户，总资本为 10744000 元。京果海味行业为韶关数量最多的行业，从原有的 49 家增至 210 余家，商品主要来自江西、东北江各属。海南岛未沦陷之前，也是韶关京果海味的主要来源之一。

衣着类行业：太平洋战争前棉纱布匹是韶关商界最大宗的商品之一，主要是从事采购舶来品，转售给湖南、广西的客商。因各地的土布织造中，自产的棉纱质量极差，要使织

出的布更有市场，就不得不用上等纱，或在土纱中掺入进口棉纱，外省织布厂家驻韶关的人员极力搜求进口棉纱，不论价格如何，以致纱价飞升。1942年10月9日，20支纱每担为37000元，11月11日，已达54000元，次年5月限价时，仍为97000元左右。这种纱本属“杂牌货”，价格尚如此猛涨，其他细纱更是价高难求。此后虽然粤北纱厂纺出的棉纱大有改进，无奈出产量太少，市价在很长期间内都在不断上扬。1943年之后42支纱基本上没有供应了，32支纱较好的牌子都在12万元之上。限价时约在15万元左右。经营布匹的商店大都兼营日用什货，战时发展至98家，平均资本约七八万元左右。太平洋战事前，布匹和洋什货多来自芦苞和兴梅地区，绸缎则多来自浙江金华。普通布每尺约10元，战事开始后立即狂涨，数月之间，已翻了两番多，小支牙膏也要30多元，经营者大都获利不菲。军服行业在战争年代重新得到很大发展，由战前仅有1家，发展至16家。因为获利丰厚，以致效尤者众，商店增多，进而影响利润。鞋业由2家发展至55家，需求多，货物来源充足，“有欣欣向荣之象”。

酒楼茶室与旅店业：此行业是当年韶关最为兴旺的行业。战前该地居民稀少，生活不富裕，人民没有上酒楼的习惯。省府迁韶，机关团体接踵而来，不仅市区内酒楼茶室林立，连市郊也增设店铺，甚至市区河面上的茶艇也顾客常满。酒楼茶室从6家发展到108家。省政府为了提倡节俭，下令不准再增设酒楼，并规定酒楼营业时间不得超过晚上

10时。茶室也营业旺盛，但随着抗战步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民生艰困，饮茶被视为耗时费钱之举，1942年底省当局下令取缔茶市，进而是禁止夜间卖点心，但市民工作之余无处消遣，多半到茶室消磨时光，于是茶室依旧兴旺。经营者只是改变方式营业，如点心由原来一碟两件售1.5元，变为每碟一件，售1元。太平洋战争后茶楼随居民向市郊扩展，此行业资本多者约七八万元，少者数千元而已。旅店业也极一时之盛，从战前的13家增至98家，资本在数万元至10余万元之间。早期住客中近80%为商人和司机，可见商业和运输的繁盛。太平洋战事爆发后，香港及各地华侨归国人数急增，因市区房屋不足，不少人被迫租住旅店，使旅店有供不应求之势。有资金者趁机在市区或市郊广设旅店。1942年12月，单人房每晚要10元以上。其后由于商业萎靡，来韶客商减少，获利不如从前之厚。只有上等旅店，仍旧客如云来，获利可观。

西药业也是获利极丰厚的行业之一。由4家增至24家。资本最高者约为5万元，最低者1万元左右。西药采购于香港、广州湾等地，但此时期采办西药的并非都是经营本行者，而是一些拥有较多资本而暂时充当水客的人，以及一些由口岸归来的人顺便携带。但国外来的西药很少，大都是上海新亚药厂的产品。相比其他行业来说，在淡水、沙鱼涌失守之后，与这条交通线存亡息息相关的行业受到沉重打击，而依赖香港等地进口西药的行业虽然一定程度上也受影响，西药轻便，容易携带，非其他笨重的商品可比，甚至可以从

航空进口，价格虽然高，卖出也贵，故影响不大，但自从太平洋战事爆发后，西药来源困难，行业便受致命的打击。相比这下，中药店则资本少，在 10000 元至 1000 余元之间，共 42 家。药材来自川、黔、湘等省及清远等地，一般不受战事发展影响。

汽车运输行业：抗战初至 1941 年初沙鱼涌陷落前为该行业的黄金时期。该行业公会以辆为单位，有 120 个会员，即 120 辆车，每辆半新汽车约值 10 余万元。运输以东路第一干线最多，特别是赴老隆接淡水运来的进口货。其次为赴南雄、赣州、浙江金华。汽车零件业因各地的运输大都依赖汽车，公路运输繁忙，从 2 家增至 40 家。转运行业从 3 家增至 104 家。以沙鱼涌陷落为界，东线运输因进口剧减而大受影响，至 1942 年底前后才开始部分复苏，主要是盐运及杂粮运输，1943 年 5 月份，兴韶线上东行运货每担运费为 400 元，西行则近千元，营业收入可观。由于汽油已不易得，汽车燃料以木炭、酒精为主，约占 70% 以上。但汽车零件难以买到，每条轮胎索价 24000 元以上。

战时韶关也成为文化中心，众多学校迁入该地，需求大增，经营文化事业的商家顿时发达了许多，印刷业从 4 家增至 29 家。1942 年底有书籍商店 28 家，文具店 20 余家。广东书籍文具历来依赖外来商品，太平洋战事使书籍文具来源短缺，求过于供，而经营者亦大多资金不足。

在各行业均受太平洋战争影响时，建筑业则十分发达，究其原因，一是人口大增，二是日本飞机经常轰炸破坏，建

筑行从原有的 17 家发展至 67 家，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更发展至 113 家，平均资本约在三四万元左右。

兴梅地区在抗战以前工商业均不发达，1938 年以后因未受战火燃及，一些沿海的商家，特别是潮汕地区的商店迁到该地，而使商业有所发展，可以说几乎每一行业都比战前有所增加。如梅县的花纱布匹业，由战前 30 余家发展到 40 余家，百货由 40 余家发展至 60 余家。油、粮店各增加 10 余家，纸店增加 20 余家，书店由 10 家左右增至近 20 家。该县的一些著名商号如陈富源、元盛经、南生公司等，抗战初期均有较大发展。该地区进口货以洋杂货、煤油、西药、布匹为大宗。出口商品主要有烟叶、陶瓷、纸、茶叶、土布等为大宗。汕头未沦陷以前，大批进口商品经此运往粤北、湖南及江西、福建一带。而当地油粮食品所缺部分，战前有相当部分靠洋货进口，汕头沦陷后，则大都依靠福建、江西两省输入。因公路运输困难，只有极少数是从韶关运来。如汕头沦陷后，从香港进口的商品经惠阳、揭阳、老隆、饶平运入，但运输困难，除部分民船运输外，主要靠挑运，太平洋战争之后，货物来源日渐短缺，人民购买力越来越弱，各业自然呈日渐凋零之势。

处于大小北江及西江交汇处的芦苞，战前是无足轻重的地方，战争期间由香港、澳门、广州湾输往韶关的货物，大都要经过这里。由于水运孔道的地位，广州沦陷后成为商品中转站，占有重要地位，到此办货的省内外客商每日至少有一二千人，而到此挑运的苦力也有数千人至上万人。因此，

该地的旅店由战前的 2 间突增至 24 间。水上客艇由数十只陡增至 500 只以上，大多是从广州、西南、河口一带的艇户迁来。由于不时受到空袭，客商宁愿住在艇中，以方便疏散。也正因为船艇多，水上的流动商贩很多，多半经营汽油、煤油、洋杂货、食盐、布匹等，日间在离市区 2 华里的河边林中，夜间则移到市区河岸，这一形式的商业每月营业额估计在 30 万元以上。由敌占区运入的商品主要是食盐、汽油、煤油、布匹、洋杂货等，用民船或汽车运至靠近麻车、佛山等地后，再挑运到芦苞，也有由四会运入。每日运到芦苞的盐就有五六万斤，汽油约 100 瓶，煤油约 600 瓶。由于靠近广州，因而经营由广州偷运而来的洋杂货、布匹等行业利润最为丰厚，常可获 3 倍的利润。^[19]米谷则从曲江等后方县份运入。1941 年 2 月之后，日军试图切断这一贸易中转地，与我方反复争夺，芦苞此后曾数度陷于敌手，商业因此被摧残殆尽。

肇庆地处西江中游，西通梧州，南通高明三埠，西南经新兴、阳春、阳江通广州湾，北经四会、清远通韶关，故于商业上处重要地位。特别是芦苞受到敌人反复进扰之后，肇庆作为沟通南路的商业地位更加重要。该地商旅辐辏，以旅馆业最为发达，房租有一日三改者。其次为运馆业，此行业在该地为前所未有，因商品北行西行多为水运，而西南方向则多为陆运，人力挑运为主，需要专门的机构组织。中央政府所设的复兴公司在肇庆设有办事处，专门收购由广西、湖南等地运来的桐油等，以及由广州湾运来的汽油、机械零件

等战争物资。因为靠近广州，运输方便，以及敌我经济战的原因，该地走私极其猖獗，且基本上都是纠帮结派的大规模的走私，也使此地成为走私货销售的主要地点，“洋货及京果海味业亦相当发展，该两行商业，主要销售品，几全为敌货。”^[20]

梅菪处于通广州湾之要点，广州及汕头关沦陷之后，广州湾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进出广州湾的货物大都经过梅菪，故成为南路的一个商业要地。

三埠：即开平的长沙和台山的新昌与荻海，处于港澳、广州湾、肇庆之中间位置，在广州沦陷后，此三地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转运地，特别是江门、中山被敌占据之后，香港、澳门的商品可通过水上运来，而后陆路运到肇庆一带，转入后方。故办庄（即代客购运商品或承接货运）业特别发达，长沙办庄战前 16 家，1940 年增至 50 余家。太平洋战争之后，三埠作为对外贸易商品转运地的地位不再。

第三节 沦陷区商业

1938 年 10 月 21 日，日本侵略军进入广州市。广州市原有 120 万居民，此时只剩下不足 10 万人。平民百姓大都转入乡下避难，而有产阶级大都匆忙逃往香港、澳门。日军从惠阳登陆到进入广州，仅花了 10 天时间，沿途基本上没受到什么抵抗，广州周围的守军也是仓皇而逃。局势变化之

快，完全出乎意料，导致大批物资没来得及搬迁。广州一时间成了抢劫者的天下，工厂、商店等地成为抢劫主要对象，抢来的物资被当街摆卖，名贵的酸枝椅每张仅售2角，酸枝凳售价1角，布衣服每件2角，绸缎衣服售1角，中华书局大号《辞海》每套仅售1元。

随着战争在广东各地扩展，在太平洋战事之前，广东沦于敌手的县份有南海、番禺、顺德、新会、东莞、增城、花县、中山、从化、三水、博罗、宝安及汕头、南澳等地，这些县份有部分处于游击区状态。还有一些县份有部分区域被日军占据，如澄海、潮安、潮阳即是。敌伪将这些地区称为“和平区”。

日本人为了尽快恢复城市商业运作，1939年1月5日成立伪广州市商会，由植子卿任会长。但沦陷区的商业，包括广州市在内，恢复得很慢，到1939年夏，即使是广州市，商业活动也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主要原因是商人大都已逃走，而日本人为控制货物搬迁，在各交通要道均设岗哨盘查，对商业活动带来很大障碍。为了吸引商人回归复业，日本人采取各种宣传措施，并以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公告，限令业主必须于布告之日起1个月内，携带房屋地产契据，回市重新登记，否则取消业权。然而，大部分商店业主都已逃离，即使有留守人员，也不可能持有地产契据，导致登记者寥寥。后改为契据不在市区的，由商会或殷实人家出具证明，也可以先行登记。另外，对市内商业活动也放松了一些，规定广州市内各商店货物往来，要先报请商会发给证明，即可

在市区内自由运输。以上这些措施，对商人回城市复业和商业贸易的重新开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不过，虽有种种措施，复业的商家仍然很少。到 1940 年底，广州市商会下属的同业公会只有 30 多个行业（战前为 160 多个行业），基本上是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衣、食、住、行、医药等相关行业。

日本人占领广州后，首先控制了粮食、食盐、煤、煤油等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物资，再由伪维持会与商会配给指定的商店，按规定的价格发售。而普通商人只能从事较次要的行业，如蔬菜、果品、饮食、交通、药材、旅业等的经营。其后，日本人控制了各类主要商品的输人和配给，由在广东的日本商人组织“物资配给组合”，广东市场为日本人所占据，成为日货的天下，如三井洋行控制杂粮、燃料、酒类及清凉饮料、纸的输人与配给。福大公司负责米谷的输人与配给。棉、丝布的输入配给由东洋棉花公司控制。土木建筑材料、机械器具由大仓商店负责。出光火水公司专营汽油、煤油等。

第二次粤北会战之后，广东的战事处于拉锯状态，双方只有局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而日本人正实施南进战略，需要安定占领区。战争的相持给商业复苏予较好的机会。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更主要的当然是人民不可能长期坐困愁城，必要的物质必须尽快补充，于是，城乡之间的物资贩运渐次恢复。广州商人可以经常下乡采办米粮、蔬菜、生猪、三鸟、柴、药材等生活必需品。

1940年8月，伪广东省政府成立，1941年冬，日军将有关商业管理的职权逐渐移交给伪省政府。是年11月成立广东省物资配给委员会（后并入广东省经济局），广州、汕头及各县也成立此类机构。省物资配给委员会由建设厅长、广州市长、警务处长、商会会长等组成。汕头市物资配给委员会则由市长主掌，各县的物资配给委员会由县长执掌。此机构负责对区内物资进行监察，在辖区内设置检查站，如广州市周围要道上设有26个检查站、所，配有54名检查员和160名经济警察，对一切与战争有关的物资都实施监控，包括粮食、盐等。随后又颁布了物资移动条例等律令，限制物资的贸易和运输。限制银行、钱庄的汇兑业务，宣布携带法币为非法。对商店、商号进行了严密的登记，包括商号的印鉴。对商店的货物进行严密盘查，商人领取搬运证明，必须由物主按买卖契约，核对印鉴，由物资委员会发给证明。违反者，轻则罚钱或没收货物，重者坐牢。

1941年12月8日，日本进攻香港，25天后占据该地。1942年新年刚开始，日本人就开始驱赶非香港居民离开香港，开通番禺市桥、东莞太平、中山唐家湾、新会江门几条航线。日本人采取这一措施，一则因为是时香港本身居民达到180万，在战争中失去贸易中转地的地位之后，对于占领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其次是大量滞留香港的广东人，多半是有产阶级，驱赶这批人回乡，有利于各地的经济复苏。1942至1944年，沦陷区商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另外，交通也不再处处受封锁。是时，新宁铁路和潮汕

铁路被日本人拆毁。根据曲江广东省银行经济调查室的调查资料，1942年前后日伪地区的交通状况是：广九铁路客货运可以通到石滩，军事运输则通至石龙（广九线曾于1943年12月全线通车）。广三铁路军事及客货运输均可通到三水。粤汉铁路只能通到新街。敌伪能控制的公路约为500公里，大都是零散的路段，最长是由石岐至关闸的公路，全长62公里左右。这些公路分别给一些运输公司经营。水上运输方面，成立有广州内河营运组合及广东航运同业组合，其轮船定期或不定期行走于香港、澳门、江门、中山、斗门、太平、南头、容奇以及广州附近的水网地区，客货皆运，在运输行业中以此为主。航空方面则只载日伪公务员，不载普通客人，更不载货。

日本占领者对物资的控制非常严格。他们将物资分为5号，实行全面的监视和管制。第1号为武器、弹药及其原料、动力设备、汽车及配件等，为禁制品，非经日本特务机关批准，不得移动。第2号为矿产品、桐油、树胶、禽畜毛等，为统制品，仅限于日本昭和通商会社等5家商社可以移动，并须有驻广州的日军总动员班（宗道部队）的证明。第3号为受限制的物资，包括汽油、煤油、机械油、皮革及制品、米、面粉、生丝、鸦片等。其中米谷、食盐、鸦片设有专营机关。其他经日军有关机构认可，可以运输，1943年3月改归省物资会管理。第4号有杂粮、动植物油、棉布、糖、蜡、食料品、杂货、家禽家畜、蛋、茶叶、木材、竹、木炭、酒、烟草、染料、药品及材料、水泥等。这类商品经

申请和商会的证明，在一定数量内可以自由运输。第5号为陶瓷器、蔬菜、水果、青草、干草、禾草、肥料，属于可以自由搬运，无需领证的物品。

日本人在广东对一些物资进行强迫收购。如规定所有生丝，必须销售给三菱和三井洋行。皮革被列为军用物资，日本占领军当局组织有“皮革资源统制组合”，继而组织“广州市皮革同业公会”，专营皮革运销，规定每个会员每月必须向日军提供1000张以上的生皮，广州市内所有生皮，必须以“公允价格为准”，销售给日军。^[21]

广东蚕丝业至1937年已逐渐走出了低谷，生丝价格从1933年平均每担380元港币，至1937年已升至600元。在历史上，广东生丝与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是对手，但是，日本人占据广东的蚕桑生产基地之后，则希望利用广东这一传统的资源为其战争服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与美国还处于互相利用的阶段，日本生丝仍占有美国的大部分市场，日本人希望广东的生丝生产能有所恢复，并对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为此，曾对当时的生产状况进行调查，以下为日本蚕丝专家对广东当时蚕丝状况调查后所得出的数据。

广东省蚕茧及生丝产量比较^[22]

年代	茧产量（担）	生丝产量（担）
1926年	498005	99601
1939年	96000	15760

广东生丝输出数量比较^[23]

年代	机制丝输出数量 (担)	生丝输出总数 (担)
1937 年	19604	26347
1940 年	2064	6171
减少%	88.1	76.5

但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在美国的市场乃至其他传统的生丝市场基本上全部丧失，广东的生丝生产也随之遭毁灭性打击。

沦陷区的货币。日本侵略军进入广州之后，即强制居民使用军票，日军在华南发行的军票印有“广东”字样，至1940年1月，发行了450万元。军票与法币的兑换率，在日军人广州之初被定为1元军票换2元法币，换3元广东省毫券。1939年11月的市场平均价，每百元法币在广州只能兑换59.50元军票，在汕头则为65.50元；1940年9月30日，在广州市场能兑换64元的军票，均为全国各沦陷区中的最低价格。^[24]日本在广州的台湾银行、正金银行、华南银行从侧面维持军票的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票也在香港流通，后来香港被宣布为日本领土，才得以取消。1942年6月汪伪政权发行中储券，作为其“法定”货币。7月24日，伪政府宣布禁止使用法币，停止法币兑换中储券，8月1日禁止港币在广东流通，军票才逐渐退出流通市场。

沦陷区的对外贸易。广州沦陷前后，珠江被封锁，广州

与港澳之间的来往基本断绝。只有英籍“佛山”号仍不定期地航行于两地之间，但只限于运送外籍人士及必要的生活物资。1939年2月，开始有日本人办的广东海运株式会社的“广东丸”轮船来往于广州与澳门之间，初期仅限于运载日本人。不久，华人经维持会的证明也可以搭乘。是年夏秋间，广州伪商会奉日本人的命令，以私人名义组织贸易公司，与日本在香港的商业公司之间进行对换贸易，广州公司的货物运到虎门大铲海关附近，交给日本商人，由对方在香港代卖。香港日商的货物由广州公司运到广州代售，而后互相结算清账。因为穗、港双方在物资上有互补的需要，不久，经日、英双方协商，改为互相派员跟货监督发卖，再进而不断扩展此项业务，参加这项贸易的公司有70余家，更进一步发展到代其他商家运输发售，但此属“非法”贸易。从广东运往香港的物品还是传统的品种，即蔬菜、家禽家畜及肉类、蛋品等，由香港运人的是粮食、洋杂货等。

日本占领香港之后，为调剂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物资，由日本特务机关批准，粤港在香港举行经济联络会议，商定双方贸易协定，从1942年7月开始，以3个月为期试办物资交换。交换地点，与香港的交易以广州、江门、宝安三地为限。广东以蔬菜、生猪、鸡鸭、鱼肉、水果等，换取香港的棉纱、布匹、洋纸、药材、油墨、车胎等。定额粤方每月输出额为军票80万元（其中广州为50万元，江门20万元，宝安10万元），港方每月军票40万元。随后将此办法延用于与澳门的贸易。与澳门的交易以中山县为限，每月

输出澳门限于 33 万元军票。澳门向广东的输出，以军票 30 万元为限。伪广东省建设厅拟订了与港澳间贸易章程 5 章 27 条，对每月输出入物资的品种，每个品种输出和输入的价值，均有规定。

由于是官定的以货易货，负责输出输出和输入的商贩也是由官方指定，当与港澳贸易的章程公布之后，声称各商家可以申请，于是申请者达 60 余家，最后批准的只有 16 家，其中广州 10 家，江门 3 家，宝安 1 家，中山 2 家。这些商家组成粤港澳商业同业公会，商定货物在港澳发售的价格。1942 年 8 月 16 日开始对香港输出发证，10 月开始对澳门输出发证。

与香港的 3 个月贸易试办期，成绩不尽如人意，如广东的鸡鸭类实际输出只为计划的 1/10 左右，鲜鱼为 1/5 强，柴薪则分文没有。原因是日本人对货物控制过严，要办理各种手续，极其繁琐。包括对船只航行的控制，导致船期不定，而大部分生活物资都是不能久存的，拖延时日的手续使这类贸易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另外，香港对广东的输出物资还要有广东的输入许可证。第二期的 3 个月，虽然对办理手续等进行简化，这类贸易延续进行，贸易仍无人改观，日本人只好放松控制。从 1943 年 1 月开始，凡持有香港方面证明文件的帆船，可以驶入广东省河各地收购土产，并须经海关所在地照章完纳税金。广东方面商家也可以在港澳就地购买商品。另外，原规定只有经批准的商家才能进行港澳贸易，这时也改为经申请批准，可以加入。虽然作了改进，但

实际是在广东的日本商人以及经伪广东省政府批准的中国商人，才可以从事这项贸易。香港方面也是经总督部许可者才能经营。也不再限定交易地点，即香港和澳门可以与广州、宝安、江门、中山贸易，为此开设有江门与香港、宝安与澳门间的航运。第6期还增设市桥为贸易点。

以上政策使困顿多时的粤港贸易有长足的进步。从第四期贸易协定开始，即1942年4月开始，增加中山向澳门的输出额，每月增至40万元，对香港增至100万元。输出和输入的商业家也有所增加。1943年底之后，这项贸易逐渐扩大，规定的贸易品种、限额均根据需要而有所增加，参与贸易的商业家，特别是广州商家，有大幅增加。中山、江门则基本上不变。宝安则曾有较大增减。因日本人对商家的检查非常严密，稍有违规，就会受到严厉处罚，甚至撤销许可证。贸易期限也从过去的每3个月审核一次改为半年审核一次，再进而延长至1年。

总的来说，广东与港澳的贸易是在日本人授意、指挥、审定和严密的监控之下进行的。每一个贸易时段即将到期之前，都要对下一阶段各地之间进出口货物的品种、贸易额以至参与者等等，重新审查一遍，做出规定。其目的除战争需要，对战略物资进行控制之外，也是对各地民需用品的监控和调剂。如有时广州因物资紧缺，原定输出港澳的生猪、鸡鸭、蛋类，也暂时被禁止输出，改由江门、中山等地输出。待广州方面的物资略有充裕，再行批准出口。

与战前广东和港澳之间的长期贸易状况相比，以及香港

尚未沦陷时的贸易状况相比，广东沦陷区与香港、澳门的贸易在 1942 年之后，除了输出品种有相似之处外，贸易额处于反常的状态。首先是广东对香港的输出远远超过香港对广东的输出。以 1943 年为例，此时是战争相持阶段，广东日伪政权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是年 10 月份，除江门未计之外（江门输入香港总值为 320366 元，香港输入江门为零），广东输出香港总值为 12794761 元（中储券，下同），而从香港输入的总值只有 3323714 元，仅为广东输出的 1/4 强。其中新会输出 32 万元多的瓜菜、水果、蛋类、山货等。宝安输往该地的除上述货物外，还有大量生猪、生牛、柴薪、木材、木炭等，总值达 3354112 元。而香港输入宝安的仅为咸鱼 114981 元，对新会输出则为零。次月，广东输出为 15717128 元，香港输入只有 4960929 元。这与战前对香港贸易的高额逆差全然不同。另外，输入品种也不同，以咸鱼、烟草、杂货为最大宗，其他则为中药材、纸类等。战前最大宗的货物洋米没有分文，对广东工商业影响很大的棉纱输入，也少得可怜，10 月份为空白，11 月份全部棉制品加起来也不过是 32805 元，为咸鱼的 1/20，不及烟草的 1/40。香港是广东对外贸易的最主要的中转站，战火纷飞，且为日军所控制，外来商品几乎断绝，本身出产又很少，商人自然只好坐困愁城了。进入 1945 年，香港对广东的输出更少，1 月、2 月份对广州输出为零，而是时广州对香港尚有 4000 多万元的输出。

广东沦陷区与澳门的贸易则刚好相反。战前广东与澳门

的贸易额大大少于香港，且对澳门贸易的顺差也很大。1941年，澳门输入广州的货值只占广州进口总值的2.98%（香港为12.09%），1942年，澳门猛增至21.78%，香港却下降为10.21%。除江门未计之外，1943年10月，广东沦陷区输出澳门仅为7187897元，而澳门输入广东为29798194元，为广东输出的4倍多。次月，广东输出澳门为6449648元，澳门输入广东为20082466元，为广东输出的3倍多。而且输入品种和数量都比香港多，特别是矿物油、五金及制品、布匹、棉制品、化学品、树胶及制品等较重要的货物，都是香港所不及。这是因为澳门的地位与香港有所不同，澳门为葡萄牙所侵占，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中立，虽然澳门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但毕竟还有零星的贸易进行，而香港已被宣布为“日本的领土”，不再是自由贸易的市场了。

广东沦陷区与其他各国家与地区的贸易。1941年，广州进口总值中，泰国占首位，为29.53%，主要是大米的输入。香港居次，为12.09%。第三为东印度，占7.49%，主要是砂糖的输入。1942年，澳门输入占首位，为21.78%，泰国、香港地区、越南分占第二、第三、第四位。广州输出方面，1941年以澳门为首，占59.01%，印度占8.14%（其中印度、越南、泰国，是1941年广东沦陷区直接对外贸易的仅存的3国，次年与印度贸易亦中止）。香港地区只占5.03%。1942年，澳门地区和越南分别占广州输出的37.31%和27.53%。^[25]太平洋战争之后，广东与外国的贸易除日本之外，基本上都是被日本人侵略的东南亚国家。广东

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进口商品绝大部分为粮食和杂粮类。严重缺粮的沦陷区不能不再寄希望于越南乃至菲律宾等国进口粮食。

广东沦陷区与国内其他省市的贸易，大体上局限于沿海的口岸，主要是上海、厦门、青岛、天津、台湾等地。输入物品主要是中药材、咸鱼、食料品、非铁金属、纸类、纤维类制品等。输出主要是纸类、中药材、麻包、果类及其制品、生丝（平面丝）、洋品杂货、蔬菜、非铁金属等。这些贸易的金额都很小。如与上海的贸易，广东历来都仰上海棉纱的鼻息，可是这一段时间，上海基本上没有余裕的棉纱输给广东，金属制品、工业用品等，也输出很少，倒是中药材为最大宗，食品类居次，与广东货物的互补性比战争前大为降低。

1943年，广东沦陷区经济已到了相当艰难的地步，这从如下调查可以看出来。因为物资紧缺，为加强控制，也为了各县市之间进行物资调剂，伪广东省经济局曾对各地经济进行过较详细的调查。根据其调查资料“潮汕和平区经济概况·重要物资需求状况”表和“番禺县经济概况·消耗物资”表所列数据，择要列述于下。

1943年潮汕沦陷区与番禺县每月人均生活资料状况表^[26]

物品名称	潮汕地区（人均需求量）	番禺县（人均需求量）
大米	13斤	12斤
面粉	9两	2两

(续表)

物品名称	潮汕地区 (人均需求量)	番禺县 (人均需求量)
豆类	5.7 两	5 两
花生	5 两	5 两
油	1.9 两	3 两
盐	1.5 斤	5 两
糖	1.5 两	2 两
柴炭	8.4 斤	20 斤
火柴	1 小盒	1 小盒
杂粮	—	15 斤
咸鱼	2.6 两	—

上表是经济调查人员估计的两地人民每月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并非实际消费量，实际消费量并不能达到上列水平。如表中潮汕地区人均每月大米消费量为 13 斤，但当时潮汕沦陷区生产能力只能提供每月 6.5 斤的大米，尚差一半的数量要从外地运入。在当时陆路不通、海运艰难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近乎孤岛的潮汕沦陷区的物资支援问题。表中所列潮汕人所需物资中，除火柴之外，其余均缺一半以上。1943 年初，潮汕沦陷区人口约 140 万，比沦陷前少 100 万人左右，战前兴旺发达的抽纱业完全停顿。可能（只是可能，而不是可以）输出用于交换的最大宗商品为纸、柴炭和野菜，而且前两项还是从封锁线外，主要是闽西运入，总余额不过约为 400 万元中储券。该区所需物资，大米 50% 依

赖东南亚，其余为上海和厦门。棉纱 90%，化肥 100%，其他货物 70%以上，均依赖上海。在海上运输艰难的情况下，货物的输入极为困难。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用日本人本身的话来表述，也许最有说服力了。1944 年 2 月 8 日，在粤的日本陆军联络部长矢崎应广州商工会议所的邀请，在国际俱乐部谈话中说：“现在最麻烦者当是汕头，潮阳有八成人吃番薯度日，甚至番薯亦不易吃。”^[27]是年大旱，潮汕饿殍遍地，仅潮阳海门达濠镇一地，死亡便有万余人，占当地人口的 1/3。

因为人口密集，又是传统的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粮食的种植被经济作物种植所取代，故珠江三角洲和潮汕三角洲成了广东粮食最短缺的地区，相当大部分的粮食依靠外来补充。战时交通困难，特别是进入 1943 年之后，日本人在海上已不占优势，也无余力从事海上的商业运输，但粮食问题又是至关紧要，成了占领者最头痛的问题。除了短期曾由日军军舰保护下从越南等地采购米谷之外，洋米和国内外省的米谷来源基本断绝。据伪政府粮食局估计，广东沦陷区人口约 500 万，粮食生产能力每年约为 16 亿斤，不敷数量约为 5 亿斤。

商业各行业经营状况。米粮业除传统的碾谷和贩运行业之外，城市内另有一种是配给商店。其余基本上靠乡下采购以至强行收购来解决城市米食问题。汪伪政权设有主管粮食的专门机构粮食局（此机构曾多次更改名称），其职能除颁布推行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之外，还包括主管粮食采购、定

价、配给等。粮食采购曾给商人承包，规定必须完成的收购量，超过部分可以自行处理。而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改为由专员在各县、区强行收购。1942年8月，广州市开始公务员米粮配给制，12月全市实行米粮配给。配给商必须有资本定额，交保证金和两家以上的粮商联保。日本人、军警和公务员、平民各有不同的配给店和配给量，价格也不同。开始配给当月的标准是：军队人员每日12两；警察10两；市民6岁以下6两，6岁以上8两；囚犯8两。1943年4月青黄不接时期，军队人员12两；警察8两；市民4两；囚犯6两。10月，军队人员、警察均提高到16两，其他人员不变。^[28]

前期日本人曾对粮食采购运输有严格限制，后来为缓解城市粮食紧张，允许商人凭证采购和运入广州市，但米谷必须卖给配给店，也可在同业内部买卖，所取利润不能超过5%。配给店自行收购的粮食出售，利润不能超过4%。糖除了本省生产外，外来糖主要来自台湾。猪肉以往主要来自山区和湖南等地，沦陷区本地生产少，据汪伪《中山日报》报道称，广州“查现市上猪牛肉售价，较前高3倍有奇，开本市肉类价空前未有之记录，一般中下阶级市民，以当此米珠薪桂，对于高价之肉类，大都浅尝辄止，颇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慨。”^[29]

米谷商生意受限制，到底还有利润可赚，柴炭商则完全没生意。广州的煤炭绝大部分靠舶来，主要来自台湾。1943年之后，日本人在海上处于劣势，船只常被美军击沉，海上

商运几乎停止。日本人尽力开采广东沦陷区内的煤炭，但只限于军用和军工生产，连广州发电厂也只好用米糠发电，以致米糠也要“统制”。全市经营煤炭者，除两三家自行开采之外，剩下 20 余家买卖煤碎，来源是贫民从海滩轮船卸下的煤渣，收购后卖给酒楼茶居。广州市中等人家战前每人每日烧柴 1 斤 10 两，每月约需 50 斤，沦陷期间柴炭织应远不敷所需。此时广州柴商约 30 家，小店约四五百家，柴之来源，依赖番禺联和、长安、长平，东莞石龙，增城新塘及禺东东圃。柴种类以榄木最多，荔枝木次之，松、柯为最少。^[30]榄树要多年才能长成乔木，此时却成为灶下之尤物，可见“薪桂”之不虚。柴贩从四乡收集来，用车运送，沿街贩卖。沦陷之初，广州的柴和木炭的主要供应地是从化，后来该县山区被日军凤部队占领，山木承包给台商砍伐，出售给日本军队。木柴市场价，1937 年平均每担约为法币 0.6~1 元，1942 年为平均每担中储券 10 元，1943 年 6 月为 50 元，1945 年 8 月，每担约为 14000~15000 元。

广州市花纱业的主要原料棉花和棉纱，由日本商人从上海各华人纱厂中购买运入，以规定的价格配给花纱商店和机织衫袜业的厂家，由于经过较长期间的停业，故在各行业中，以此行较为有利可图。另外，因洋布输入极少，土布以经济耐穿再度占据市场，取代洋布的地位。旅店业约有一流大酒店 5、6 间，中下旅店 70 余家。五金店 300 余家，大部分为小买卖性质。因汽油紧缺，汽车亦改烧木炭。家私业因日军入侵之初，居民四散，家私损毁不可胜数，而此物又为

生活所不可或缺，故在市民不得不回城的 1939 年、1941 年前后，家私业曾随之兴盛，加上学校复办，亦需大批桌椅之类，故随后木材来源稀少，价格高昂，生意虽少，亦不无微利可图。为迎合新成家者的需要，特别开家私翻新业务，也是开财源之一途。舶来化妆品已成奇货，一支唇膏，一盒香粉，动辄数百元，本地生产的化妆品取代了舶来品的市场。建筑业约 400 间，2 万余人。电器业是最冷清的行业之一，一是进口电器少，无生意可做；二是电力短缺，最严重时要用电糠发电，故电力被“统制”，任何电器店，不得代客户装电器，该行由此全线崩溃。

相比之下，在广州的日本商人的处境自然好得多，据 1943 年初的统计，是时侨居广州的日本人约 12000 人（不含军队），从事小本经营的商店数量如下：

1943 年初日本人在广州经营的商店统计^[31]

食料品店	23 家	洋服绸缎店	6 家
钟表眼镜店	9 家	单车店	5 家
燃料店	13 家	鱼肉类店	14 家
电气器具店	11 家	药材店	16 家
化妆品店	8 家	影相材料店	9 家
糖果店	28 家	家庭用品店	5 家
文房具店	5 家	印刷店	6 家
洋服呢绒店	11 家	百货店	4 家

日本人经营的商店的商品来源主要来自广州各类“组合”的货物配给，还有部分来自日本国内。服务对象主要是在广州的日本士兵和侨民。其后，为了“决战”的需要，这些商人纷纷向军需军用的工商业部门转移。

注释：

- [1] 邝荫泉：《抗战后广东贸易回顾》，载《广东一月间》1941年7月号。
- [2] 林习经：《抗战四年来之广东贸易》，载曲江《新建设》1941年第6、7期合刊。
- [3] 资料来源：《历年广东经济建设统计》，广东省建设厅编，1947年。单位法币1000万元。
- [4] 《近年广东土货出口价值输出口岸及运销地名统计表》，载《广东省银行季刊》3卷1期，1943年。
- [5] 资料来源：《历年广东经济建设统计》，广东建设厅编，1947年。
- [6] 《历年广东经济建设统计》，广东建设厅编，1947年。
- [7]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813页。
- [8] 本表根据广东省银行经济调查室的统计资料编制，仅取前18位。参见《广东省银行季刊》第2卷第3期《近四年来广东大宗土货出口总值暨分类价值比较表》，1942年。
- [9] 《广东经济年鉴续编》第10章《贸易》第30页，为1941年6月调查所得的情况。
- [10] 本表数字取材于《广东经济年鉴》第16章《贸易》和《广东经济年鉴续编》第10章《贸易》。

- [11] 《中国贸易年鉴》所载：九龙关 1938 年 1 月进口为 2700 万元，2 月为 3200 万元，3 月为 4020 万元，此数月进口额几为上海进口的 2 倍，与《广东贸易年鉴续编》所载数字相差甚远。原因是当时大量的进口商品，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商品进口并未经过海关。其他各口岸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
- [12] 云盈波：《战争爆发前后之广州工商业》，载《贯彻评论》第 2 期，广州贯彻评论社，1938 年。
- [13] 资料来源：伍顽立编《广东工业》第 33~34 页。其中榨油工业资本总额中有 3 家不详。资本合计中未计人丝车数。工人数量统计中，火柴工业有 24 家不详，煤油工业有 48 家不详，榨油工业有 1 家不详。
- [14] 伍顽立编：《广东工业》第 12 页。
- [15] 《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年刊》C3~C5 页，1937 年。
- [16] 《广东经济年鉴续编》第四章《商业》第 158 页。
- [17] 《广东经济年鉴续编》第四章《商业》第 158 页。根据“曲江商业统计”的数字，以下各行业家数，无特别注明者，皆指 1941 年 12 月的统计数字。资本额则为 1942 年初的调查数字。
- [18] 《太平洋战事发生后韶关工商业动态摘要调查》，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1942 年。
- [19] 《芦苞经济情况》，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1 年。
- [20] 《广东经济年鉴续编》第四章《商业》第 117 页。
- [21] 沈传扬：《广东省皮革业管理之经过》，载《建设季刊》第 1 卷第 1 期，第 14~15 页，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建设季刊社编，1945 年。
- [2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4 卷第 69 页。本资料为日本人的统计资料，原题为《广东省蚕茧及生丝产量战前战后比较》。

- [23]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第70页。
- [24] 江干之译：《日本军票在中国使用之回顾》，载广州《经济月报》第2卷第4期，1943年，广东省经济局编。
- [25] 参见潘英夫：《广州港与南方贸易》，载《经济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1943年。此文节译日本人的著述，表中的一些数字并不完整，当是译者有所删节所致。
- [26] 陈胜彝：《论日军侵粤对广东经济之影响》，《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参见《经济月报》第1卷第1、3期，1943年。
- [27] 《经济月报》第2卷第3期，第96页，1944年。
- [28] 何惶常：《一年来之广东粮食》，载《经济月报》第2卷第2期，1943年。
- [29] 《一年来之本市各行商营业调查》，载《中山日报》1940年2月15日。
- [30] 《过去一年来广州之商业》，载《经济月报》第2卷第4期，第73页，1944年。
- [31] 资料来源：《决战下广州日商的动向》，载《经济月报》第2卷第4期，1944年。此文译自日文《南支日报》。但此调查并非完整的数字，比如1943年底，广州典当行业共有商家24家，其中日本人经营的就占了11家，而此调查表中并没有典当行业。日本在穗的大洋行也未列入。此调查资料当是为着“决战”的需要，对一些准备和可能向军工军用行业转移的小商家的调查。另外，日本人在粤有“工业运营统制会”的组织，加人的企业至1944年8月3日止，共有81家，不在以上之列。参见伪广东建设厅《建设月报》1944年第1卷第1期《广州日侨之工业》。

第四章 内战摧残下商业的全面 破产（1946～1949）

第一节 被窒息的对外贸易

1945年8月，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人们希望在战争废墟中收拾残余，重整旗鼓。受战争胜利的激励，广东工商业呈全面复兴之象，1946年3月，政府开放外汇市场，更刺激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1946年广东进口总值法币12031186万元，折合4500万美元，占全国进口总值的8.01%。出口总值为法币6727458万元，折合2430万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6.32%。人超5303728万元，占全国人超总值的4.87%。进出口总额将近1876亿元。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巨额的数字，但即使以保守的物价指数5000倍折算，相当于抗战前币值的3750万元，只及1936年进出口贸易额的1/6强，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外贸易兴旺发达时期更不可同日面语。

1947年进口总值为法币153286946万元，折合美金约6900万元，占全国进口额的14.35%。出口为法币159914910万元，折合美金约5800万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5.08%。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以法币计算，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出超额达法币6627964万元。但是如果换算成美金计算，则是进口额高于出口额1100万美元，这是因为进出口汇率差距所致，故广东进出口贸易实际上是入超。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只及1936年对外贸易总值的1/3强。

1947年广东进出口比上一年度大幅上升，占全国进口的百分比上升了6.34%，出口则上升了8.76%，可说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广东从自由贸易改为许可证制度，但与上海等地相比，却又宽松一些。上海限制外货进口甚严，商家不易领取输入许可证，于是上海商人纷纷到香港采办货物，先将要进口的货物运到广州，再转运到上海，于是，1947年3月以后，广东进口商品呈强劲势头，3月份为782亿元，4月为1204亿元，6月份将近2000亿元。但7月之后，因实施输入分配制度，上海商人往广东进口货物，应占广东的进口额，上海商人无法再钻政策的空子，于是广东的进口增长数字不及以前。

出口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前两个月呈萎靡不振状态，都与出口限制、金融动荡等相关，3月之后，英美市场上对桐油的需求量大，广东桐油输出随之突增。输出人临时管理委员会广州办事处成立后，广东对外进出口货物不必再向上海申请。还有，政府为应对2月金融风潮，紧急提高汇率，2

月 16 日将汇率从 3350 元一下子提高到 12000 元，与黑市价相近，出口商也愿意到银行办理结汇，从而刺激了出口业务。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3 月份的出口额比 2 月增加 2 倍有余，达到 420 亿，4 月再提高至 710 亿。其后 5、6 月仍维持这一水平，是年出口最高值为 10 月份，达 3113 亿元。

1948 年，广东的进出口业务再呈繁荣兴旺的景象，是年 1 至 8 月份，广东进口净值为 1637408500 万元，折合美金约为 13648000 元，占全国进口额 8.63%。出口净值为 3357186300 万元，折合美金约 22259000 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 19.69%。出超额 1719777800 万元，约合美金 8611000 余元。同期，全国出超达 1914865000 万元。^{〔1〕}出现这一变化，并非广东的经济形势好转带动进出口业务的兴旺，恰恰相反，广东的经济不断恶化。出现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是战争形势的变化。是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由全面进攻变为全面防守，再进而节节败退。随着战火南移，使华中一带物资大量集中汉口，再向广东转移，土布、棉花、生仁、豆、药材等货品大量经粤汉铁路南运，以致广州货仓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以前大量北运的五金、洋什、西药、洋纸、化学品等逐渐减少。

进入 1949 年之后，战争南移加速，国民党政权垮台已成定局，金圆券信用惨跌。3 月，不得不改用关元作本位，规定每关元值美元 4 角。南京、上海解放后，华南金融更加混乱。6 月份，金圆券在广东几同废纸，港币支配着广东市场，在广州流通的港币估计有 3 亿元，广州已沦为香港的附

庸。是月，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终于寿终正寝，配额办法随之取消。7月份发行银元券，但其命运也与金圆券相似，随着国民党的垮台而最后变为废纸。以下为1949年1月1日至广州解放时广州对外贸易的数值。

1949年1月1日至10月14日广州对外贸易概况表

出口货值	进口货值
金圆券 10167040000 圆	金圆券 340797000 圆
美元 41898083 元	美元 10001841 元
银元 10867296 元	银元 13246516 元
以上三项折合美元 27241416 元	以上三项折合美元 12957166 元

从国民党政府全面败退到政权易手，广东的进出口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从上表可以看出一个侧面。在这不足10个月时间里，广州出超达到14284250美元，比进口总值还多。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临近解放，北方的有钱人纷纷将物资运逃；随着天津、上海等进出口港的易手，大量的出口物资运到广州出口。例如猪鬃这一传统的大宗出口货物，1948年经广州出口的仅有3897公担，而1949年为16156公担，是上年度的4倍多。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经广九铁路及200吨以下的民船运进的商品都在九龙关或拱北关交税，从而使粤海关进口数值下降不少。

战前与战后广东进出口主要货物对比表

	1937 年	1946 年
进口	米、咸鱼、羊毛、煤油、润滑油、铁条、煤、肥料、印书纸	汽油、煤油、柴油、棉花、金属及制品、电器材料、面粉、咸鱼、水泥、树胶皮及制品、油脂类、西药、颜料、洋纸、肥田料、凡士林、化学品、藤、麻织品、洗衣枱、腊及胶、糖、苏打粉
出口	生丝、桐油、锡砂、禽毛、果菜、纸伞、草席、地席、烟叶、锡	土纸、桂皮、桐油、茴油、家畜、禽毛、爆竹、草药材、果菜、竹及竹器、木板及木器、废铜、铁、神香、咸菜

从上表可以看出，八年的战争使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有了不小的变化。抗战前，广东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生丝，1946年几乎在对外贸易商品名单中消失。广东蚕桑基地珠江三角洲经日寇的蹂躏，元气大伤，据广东省农林处 1946 年冬的调查，是年全省桑田面积不过 31.7 万亩，蚕户仅存 15.5 万户，能开工的工厂 10 余家，内销生丝约 22000 余担，尚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至于其他出口商品，仍然摆脱不了以原材料为主的出口格局。

进口商品方面。广东每年从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口数千万海关两数值的米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广东的粮食来源，经过大战的洗礼，粮食生产有所进步，进口米谷也主要来自国内。其他进口商品则主要是美国货。

1946~1947年广东进口商品货值分类统计表^[2] (单位:法币万元)

品种	年份	
	1946年	1947年
本色棉布	2874	3816
漂白或染色棉布	41495	156541
印花棉布	1673	1311
什类棉布	5247	14102
棉花、棉纱、棉线	1348493	3605353
其他棉制品	26692	43985
亚麻、苧麻、火麻及其制品	186582	6243405
毛及其制品	165835	1695616
丝(人造丝在内)及其制品	500	277686
金属及矿砂	656102	15017555
机器及工具	71979	1872631
车辆船艇	190891	2819714
什项金属制品	181505	2576554
鱼介海产品	411818	2513802
荤食罐头食品、日用杂货	226872	771751
什粮及什粮粉	1103504	2783909
果品、子仁、菜蔬	157375	58990
药材及香料	285171	1560446
糖	5303	3910
酒、啤酒、饮料	1245	14730

(续表)

品种	年份	
	1946年	1947年
烟草	18330	95909
化学产品及制药	760161	31444416
染料、颜料、油漆、凡立水	395674	14398432
蜡、皂、油、脂、腊、松香	3182261	30520557
书籍、地图、纸及木造纸质	1037572	14835324
生皮、熟皮及其他动物产品	113306	668935
木材	642	271457
木、竹、藤、棕、草及其制品	110006	1632958
煤、燃料、沥青、煤膏	59475	347034
瓷器、搪瓷品、玻璃等	75099	1832257
石料、泥土及制品	85304	328747
杂货	1112237	25454935

上表所列进口货，1946年高居榜首的是油脂腊胶类，达3182万元，其中主要是煤油、汽油、柴油等。棉花、棉纱、棉线居次席，是时解决衣着问题的纺织工业需要大量的棉织品原料。什货居第3位，什粮及什粮粉第4，纸和书籍印刷品列第5，第6是化学产品及制药，金属及矿砂居第7，鱼介及海产品、染料颜料与药材香料分列第8、第9第10位。1947年，占进口额最大的是化学产品，超过3144亿元。其次是油脂腊胶类，也有3052亿元。什货居第3位，

金属矿砂居第 4 位，纸和书籍等印刷品居第 5，染料、颜料类第 6，第 7 位是麻类及其制品，第 8 位是棉花、棉纱类，其后是车辆船艇、什粮和什粮粉，分居第 9 和第 10 位。两年之间进口量按比例减少最多的是棉花、棉纱类，从上年度的第 2 位转眼间退居第 8 位。另一方面，广东建设最需要的机器和工具类 1946 年仅为 71979 万元，居第 21 位，1947 年增至 187 亿，居 13 位，算是有所进步。粮食类的进口，与战前历年均稳居首位相比，1946 年粮食进口尚居第 4 位，1947 年退居第 10 位，是年广东粮食问题严重，自然与此不无关系。

1948 年上半年，进口商品仍以油脂腊胶类占首位，将近 9615 亿元，居次席的是金属与矿砂，为 6676 亿元，第 3 为杂货，以下依次是化学产品及制药、麻类、纸类、染料颜料类、车辆船艇、机器及工具和棉花、棉纱类。可见广东进口商品始终未能摆脱消耗品、奢侈品占统治地位的格局。

1949 年进口方面品种以棉纱、棉花、棉线类占第 1 位，主要是国产棉纱。上海解放前夕，该地生产的棉纱不仅不再对广州禁运，而是抢运到广州来，一些上海原来的订货也改从广州进口，但是到广州解放前夕，这类棉类原材料又从广东抢运出外。进口第 2 位的是原油、柴油、汽油、煤油类。第 3 位是米谷、面粉及杂粮。其他进口商品中，金属制品、化学产品及制药、染料、颜料都是大宗进口货品。

出口商品方面。与进口消耗品、奢侈品占统治地位相对比，广东战后出口的货物仍是以原材料为主。

1946~1947年广东出口商品货值分类统计表⁽³⁾ (单位:法币万元)

品种	1946年	1947年
动物及动物产品	849428	44668707
生皮、熟皮、皮货	29170	409605
鱼介海产品	107502	4003893
豆	27621	2711032
什粮及制品	24383	261321
植物性染料	30103	874937
鲜果、干果、制果	403774	4539375
药材及香料	757181	2959945
油、蜡	1220254	50395248
子仁	75428	1132064
酒	11103	16043
糖	12132	2246281
茶	22582	668880
烟草	49007	91936
菜蔬	588931	5098690
其他植物产品	106781	1750422
竹	85634	824346
燃料	224330	1483354
藤	2603	79826
木材、木及木制品	182034	1903126
纸	336353	2756472
纺织纤维	199521	798113

(续表)

品种	1946年	1947年
纱线、编织品、针织品	177457	4629450
匹头	158340	9382772
其他纺织品	86609	2636420
矿砂、金属及金属制品	216620	6586307
玻璃及玻璃器	3352	406394
石、泥土、沙及其制品	168731	2336198
化学品、化学产品	65027	795775
印刷品	44	32376
什货	501212	3441904

上表所列广东出口商品中，1946年列首位的是油脂类，高达122亿元，主要是桐油的输出占很大比重，其余是生油、豆油等。居次席的是动物及动物产品，也有将近85亿元，主要是供应香港、澳门的家禽、家畜等。第3位是药材及香料，第4位是菜蔬。居第5至第10位的分别是什货、干鲜果品、纸、燃料、纺织纤维和木材与木制品。1947年居前两位的也是油脂类和动物与动物产品类，分别高在5039亿元和4466亿元。第3位是匹头，第4位是矿砂、金属及金属制品。居第5至第10位的分别是菜蔬、编织针织品、干鲜果品、鱼介海产品、什货、药材及香料。针织品中广东的线衫裤在省外享有盛誉，冬夏两季在外省有很好的销路。毛巾、绒线及棉织品在西南各省中，仍以广货为号召。

纱绸仍保持过去供不应求的形势，即使在上海，也常常不足以应市。战后广东纱绸虽未如以往在世界市场上享有盛誉，但在国内市场还是抢手货。也因这一缘故，加上蚕农度日不易，造成战后广东蚕丝业很少制造生丝，而是以造土丝为主，以致出现印度、法国商人到广东采购生丝，广东无货供应的现象。当时人们认为蚕丝界这一行为是“朝种树夜锯板”的短视行为，其实是为生计所迫。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广东出口商品在总体上仍然摆脱不了出口原材料为主的状态，桐油、矿砂等国际市场较为走俏的商品仍占出口大宗。另外，供应香港、澳门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家禽、家畜、蔬菜、水果以至柴、炭等，仍在广东出口商品中占很大比重。而战前广东出口界足以自诩的生丝出口在战后微乎其微。1947年出口的纺织纤维，包括生丝、麻、棉、羊毛，总值不到80亿元，占出口总值的0.49%，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仅生丝出口就占整个广东出口总值40%左右，真有天壤之别。其他传统的出口商品，如草席、扇以及烟、茶等，均出口很少。纸类出口虽然有所复苏，但出口的纸张基本上都是土纸，是作为加工高级纸张的材料，供外国加工之用，制成高级纸张后还是运回中国销售。

1948年广东出口商品中，占首位的是动物及动物产品类，包括猪、牛羊、鸡鸭、蛋以及猪鬃、鸡鸭鹅毛等，高达20061亿元。上年度居首位的油腊类退居次席，说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桐油的需求不再如过去那样殷切，而豆油、生油并非广东的特产。棉线、棉纱、抽纱、麻纱居第3位，战

后广东纺织工业较战前有所发展，是这类产品出口增加的一个主因。居第4、第5的是供应香港、澳门为主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其后是矿砂与金属制品、什货、鱼介海产品和药材香料以及纸。

1949年出口品种占首位的是猪鬃，一些原来从上海出口的，现改为广州出口，甚至空运来穗，转运出口。第2位是油类，包括桐油、菜油、茶油等。第3位是矿砂、金属及金属制品，以锡、钨、锑为多，都是经香港运到国外。其他出口货物主要是竹及竹制品、药材、皮革、糖、柴、蔬菜、布、爆竹、焰火等。

战后对外贸易关系国家和地区的变化，可以从下表中看出来。

广东对外贸易关系国家和地区及进出口数值对比表⁽⁴⁾ (单位：法币元)

年份 类别 国家和地区	1936年		1939年		1947年4月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香港地区	6462140	40468250	15553185	57998037	617491.6万	6544444.8万
英国	17430158	2297104	13096415	232128	523522.5万	253.9万
德国	15352988	411755	6607663	145465	1056.4万	无
美国	19948502	10872586	17907967	6052165	976312.6万	14232万
法国	2734281	2106597	243287	62220	51625.5万	无
澳门地区	686707	3222865	7144318	21292597	147607.5万	314387.3万
日本	6723294	467188	305035	290	72878.7万	无
新加坡	2313751	6214471	1836595	5762881	746475.3万	141318万

(续表)

年份 类别 国家和地区	1936年		1939年		1947年4月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印尼	10279678	502005	4682638	22249	52174	无
越南	12014951	7358975	6432307	1674023	42701.6万	1020万
泰国	15454436	3067404	9646148	2449061	29040.8万	62995.4万
印度	631359	3708857	1023855	27682	243083.5万	无

上表清楚地反映了广东战前战后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美国从3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取代长期在华南占贸易优势地位的英、法、德、日的地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法、日等国在广东的贸易已今非昔比，美国对粤贸易额则稳居首位。从上表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广东出口贸易的局限，输出地主要是华人华侨集中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对香港、澳门等地和新加坡之外，对战前的主要贸易关系国基本上都是逆差，战后则连新加坡也存大巨额的逆差。而对西方工业强国的贸易，战前战后格局大致相当，都是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广东成为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工业产品的输出地。甚至对印度的贸易，也从战前为数不小的顺差变为国外商品的销售地。

从各个口岸进口总值对比来看，1946年中国进口贸易中，上海关占第1位，广州关居次，天津关第3，九龙关第4，青岛关第5，汕头关居第6位。1947年九龙关居第2位，广州关居第4位，拱北关第6位。1948年上半年，广州关

居第 2 位，九龙关第 3，汕头关第 7 位。

出口贸易情况，1946 年全国海关仍以上海关居首，天津关居次，广州关与汕头关分居第 3、第 6 位。1947 年九龙关居第 2 位，广州关居第 3 位，汕头关居第 6 位。1948 年上半年，九龙、广州、汕头三关分居第 2、第 4、第 6 位。下表可以看出广东各海关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战后广东对外贸易关别比较表（占全国百分比）⁽⁵⁾

关别	类别	1946 年	1947 年	1948 年上半年
广州	进口	3.13	3.39	4.19
	出口	8.75	7.96	6.80
九龙	进口	2.51	7.84	4.02
	出口	2.02	14.17	10.21
汕头	进口	1.37	1.29	1.71
	出口	2.81	1.69	2.31
拱北	进口	0.21	1.54	0.83
	出口	0.92	0.36	0.94
江门	进口	0.24	0.07	0.05
	出口	0.21	0.18	0.07
雷州	进口	0.30	0.11	0.14
	出口	0.62	0.41	0.08
北海	进口	—	0.11	0.01
	出口	—	0.31	0.16
琼海	进口	—	—	0.04
	出口	—	—	0.08

第二节 商业环境的短暂复苏与全面恶化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工厂陆续迁回广州一带。但战后日伪工厂的接收却是一片混乱，中央资源委员会、军政部、粮食部、广东省政府所属的一些机关都接收了部分工厂。1946年经过重新划分，广东的工业分为国营、省营、民营三大部分。国营工厂主要是接收日本人在广东所办的工厂，如机械、水电、化工、矿冶，其他如卷烟、制纸、制鞋等工厂则大都售给民营。原省营工业规模最大的市头、新造糖厂设备已荡然无存，造纸厂设备被日本人搬走。战争使广东经济元气大伤，财力物力严重不足，器材缺乏，资金周转不灵。是时省营工业全部资产共约15亿元，战前则为3500万元，但相当于1946年的1714亿元，两者相差百余倍，可见省营工业之衰弱。是年省务会议决定将经营性的工业划归实业公司，是时官股约10亿元，商股仅1亿元，动力仅为战前的1/3。各厂生产能力低下，士敏土厂产量为战前1/3，纺织厂为1/2，只有顺德糖厂的情况稍好。

民营工业方面。1947年全省约有民营工厂2000余家，至是年11月，已登记的只有近千家。

广东民营工厂统计⁽⁶⁾

(甲) 广州

织布厂	229家	印刷厂	157家
成药厂	132家	修船厂	89家

针织厂	73 家	机器厂	64 家
酿酒厂	38 家	化妆品厂	29 家
玻璃厂	26 家	烟丝厂	25 家
榨油厂	23 家	火柴厂	15 家
石印厂	14 家	碾谷厂	14 家
煤油厂	10 家	饼干厂	6 家

(乙) 顺德

制糖厂 45 家

(丙) 汕头、东莞、罗定、高要、饶平、潮安 6 县

火柴厂 7 家

合计 996 家

已登记的民营工厂中，具有新式规模的工厂只有 344 家，以糖业、火柴、橡胶、卷烟、炼油、纺织等行业为多。资本以东莞宏业糖厂最多，有 12 亿元，其余能达到 10 亿元的很少，平均资本额在 1000 万元以下。工人最多也不过二三百人，普通都在数十人左右，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虽然如此，但在复员之初，各厂都呈蓬勃发展之势，可惜昙花一现。1946 年 6 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工厂所需的原材料日趋紧缺，物价狂涨，工厂生产便开始衰落，至年底，倒闭的工厂至少在一半以上。

织布业是战后广东各行业中恢复最快且有较大发展的一个行业。战争使各国工业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恢复尚需一段时间，一些战前在广东倾销纺织品的国家如日本，已今非昔比，给广东战后纺织业的勃兴提供了前提条件。1946 年上半年统计，仅广州就有织造厂 900 余家，布机 25000 架，其

中使用电力的有 1000 架。每天织 30 码的棉布 15000 匹以上，营业总收入约为 6 亿元。^[7]但到 6 月份，上海限制花纱运粤，纱价高涨，工资高扬，加以上海布大批运粤，香港限制土布外销，使本地产的布销售呆滞，工厂由减工而渐至倒闭，能保存下来的不及 1/4。

卷烟业也是战后发展较迅速的行业之一，仅广州一地，大小烟厂便在百家以上，各家获利极大。1946 年 6 月之后，洋烟大量涌入。如果洋烟能正常纳税输入，土烟尚可在价格低廉方面与之抗衡，无奈充斥市面的洋烟大都是走私进来的，土制香烟由此受到沉重打击。国产品捐税过重，质地欠佳，敌不过价廉物美的走私洋烟。烟商不断呼吁政府严查走私的洋烟，但私货如洪水猛兽，此堵彼开，防不胜防。到 1947 年初，能勉强维持的不到十分之一二，广州烟商仅存 18 家。

橡胶业也曾是广东主要的民族工业，抗战前各制造厂家均加入了同业公会，互相协调生产，既防相互竞争，自相残杀，也可以相互监督，以防粗制滥造。故广州的橡胶产品偶然出现有粗制滥造的产品，会立即受到同业的检举，公会立即要求该商家改正。战后情况不同，仅广州地区，1946 年初就有 300 余家，但有动力设备的不及 1/3，大都是家庭手工业形式，由有动力设备的工厂加工原材料，再以手工制作。是年初各地交通恢复，湘、鄂、黔、滇、桂各地客商来粤订购者络绎不绝，生意一时间似极红火。另外，战后广东橡胶产品也大有改进，在原有胶鞋、玩具等产品基础上，已大量生产自行车车胎和汽车轮胎以及胶线等，且有很大的市

场潜力。然而，该行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进口，由此被1947年2月开始的金融风潮压得透不过气来，常常造成卖出所得的钱还买不回所需的原材料，停工的工厂达百余家。好不容易捱过了淡季，到了秋季旺月，订货者纷纷前来，却又碰上原材料短缺。而家庭手工业形式的商家大都小本经营，资金短少，碰到这种情况，只能降价销售。为弥补损失而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产品混入市场，使外地客商有苦难言，也损害了该行业的声誉。是年下半年之后，橡胶行业便呈不景气状态。

火柴工业是广东的传统工业，1947年上半年广东火柴尚畅销湘、赣、桂、滇、黔等省，只是因为铁路货卡少，无法大量输出。到了下半年形势逆转，由于进出口受管制，原材料无法得到供应，而且交通状况恶化，变成外省市场无货供应，工厂无原料只好停工的现象。其后，广西火柴工业有长足的发展，广东的火柴不但难以进入该地，而且还要承受来自广西同行的竞争，几十年来广东火柴统治西江流域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

其他各行业也有相似之处。总而言之，复员之初民营工业之所以一度振兴，是因为战争胜利激发人民的热情，物价虽高，人民尚能忍受。随着内战爆发，美国货的倾销，物价越来越高涨，社会购买力则越来越弱，加上产品的缺陷，从而使企业日渐凋敝。到了1948年，广东的经济形势更趋恶化，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出现吃光、卖光、逃光的凄凉景象。从下表可以看出民营工业全线崩溃的境地。

1948年广州民营工业生产状况表⁽⁸⁾

业别	全部停顿%	局部停顿%	全部开工%
针织	30	60	10
电池	20	50	30
化工	20	70	10
印刷	30	50	20
橡胶	20	60	20
漂染	25	55	20
煤油	20	60	20
锰铅炭业	20	50	30
机器	15	70	15
土布	19	67	14
榨油	15	58	27
碾米	无	4	96
玻璃	31	50	19
机织	22	47	31
石印	5	16	79
制钉	2	11	87
化妆品	20	65	15
卷烟	2	15	83
饼干	无	50	50
火柴	35	65	无
汽水	5	95	无
肥皂	5	65	30
成药	无	65	35
油漆颜料	3	57	40

以上为 1948 年 2 月份的调查资料。记者称：“在目前，更是惨相毕呈。如煤油制造单靠油渣，玻璃制造靠着收买些破玻璃片，碎酒瓶。胶厂靠着收拾点破烂橡胶制品来重新‘吃吃回锅肉’。但能吃吃这‘回锅肉’的还真算运气呢！”

潮汕抽纱业的衰落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例子。抗战前潮汕从事抽纱生意的洋商 22 家，华商 70 余家。年产手巾约 300 万打，床布、餐布、枕套、被面等约 175 万套。战后有商家 65 家，1946 年输出的手巾仅 15 万打，各式台布 10 万套。1947 年输出手巾 25 万打，各式台布 25 万套，与战前有天壤之别。从从事抽纱工作的人数看，战前汕头市从事抽纱洗熨装饰工人有 5 万人。潮安县直接以刺绣维持生活的工人为 15 万人，以此作为补助家用的 10 万人，共 25 万人。揭阳县抽纱拼花工人人数与潮安大体相同，也是 25 万人。潮阳县补布花边工 10 万人。澄海县花边工 10 万人。普宁县抽纱拼花工 6 万人。总计各县直接以做抽纱维持生计的共 48 万人，靠做此工间接补助家用的人数为 38 万人。1947 年，汕头从事洗熨装饰抽纱的工人仅有 6000 人，另有 1 万名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无工可做。潮安的绣花工有 3 万人，20 万原来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无工作可做。潮阳县补布花边工 3 万人，有 10 万人无事可做。揭阳拼花抽纱工 5 万人，20 万人无事可做。澄海县 2 万人做花边，8 万人无事可做。总计只有 13 万 6 千人有工可做，59 万原来的抽纱工无事可做。^[9]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资金不足，爱尔兰的原料麻布没有恢复输入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1948年的省营工业却是另一番景象，呈现一派兴旺发展的势头。土敏土增添了两套设备，生产能力达到了战前水平。纺织厂纱锭接近2万，产量较上一年增加了50%。还着手筹设新工厂。出现这一怪现象的原因是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大批原来投资北方的资本改为投资华南地区，以作为观望地带及外逃跳板。国民党也开始注重“后方”建设，将大批美援投入广东。此外，严厉的经济管制使民营工业濒临破产，而省营工业却有许多特权和优惠。还有，民营工业的衰落又为它扩大了原料的来源和销售市场。

商业运输方面。复员初期广东省只有汽船107艘，电船163艘，机动帆船48艘，拖渡92艘，普通帆船372艘，各项船舶共计13671吨，比战前少102368吨，损失75%以上。^[10]由于公路在战时遭到严重破坏，修复尚需时日，而船舶则可以通过建造、修复和购买等方式在短期内迅速复苏。广东水网如织，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全靠舟楫之利，因此，战后广东船舶运输发展极快。“航运业更形蓬勃，东西北江及港澳四乡船只来往不绝，航行工具，除电船与拖渡外，有机动帆船，系以飞机头或汽车头改装者。水陆交通运输业，无论行走何线，一律获取厚利。”^[11]

1946年广东各江船舶统计表^[12]

港别	轮船	电船	帆船	拖渡	木船	其他	合计
广州港	813	1800	1046	834	—	—	4493
东江	7	106	394	—	228	10	745

(续表)

港别	轮船	电船	帆船	拖渡	木船	其他	合计
西江	144	248	813	-	651	731	2587
北江	45	8	215	-	2214	2047	4529
韩江	21	60	114	-	3079	300	3574
南河	6	8	57	-	1375	-	1446
南路各江	103	195	1929	-	2935	896	6058
琼州各江	2	20	288	-	55	210	575
总计	1141	2445	4856	834	10537	4194	24007

1947年上半年交通状况尚可，但已开始逐渐进入萧条时期。经济恐慌，商业衰退，货运量大为减少。一些商品受统制而不能自由运销，如粤闽、粤沪航线历来以运输棉纱、布匹等为大宗，实行统制后，航运业随之生意清淡。又如省港间的运输，自从进出口贸易办法实施以后，货运量暴跌，甚至于客票也只能卖出一半左右。另外，经济恶化使民营航运业难以为继。1947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的时间里，捐税、码头费、工力费、维修费等开支上涨了三四十倍，汽油、柴油、煤炭价格也上涨了数十倍，成本在通货膨胀中大幅增长，但运价一直受到政府限制。其后，货币疯狂贬值，而航运业的周期都较长，普通航线一般要数天以至十天半月一个周期，这样，收到的运费由于货币币值一天数贬，到结算时往往已贬值很多，从而导致商家亏损严重。还有，1947

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匪盗为患，广东各江河道重回过去情景，抢劫事件成家常便饭，北江 50 多条电船，大多数被迫停航，东西江则是“匪派”横行。

公路运输方面。战后广东公路首先紧急修复的是衡粤港线（即原韶坪公路向两端的延伸，上通湖南衡阳，下通香港）及通汕头的公路，供张发奎、余汉谋部赴广州、汕头接收之用。另有几条供军队之用的公路也修复较快。在此之后，公路修复极其缓慢，1946 年一年之中只完成了 1000 余公路的修复，原因之一是经费拮据和官僚办事效率低，另一个原因是货币不断贬值，而工程用料价格却不断攀升。广东公路处不得不申请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拨赈灾米，以工代赈来修复公路。至 1948 年年底，修复的公路共 6826 公里，不及战前广东公路总长的一半。1947 年广东发生特大洪水，冲毁了 1300 多公里，还剩下 5234 公里能勉强通车。其中民营约占 70%，共 3320 公里。到 1949 年广东解放前夕，广东公路同其他行业一样，可称之为满目疮痍。大部分都已毁坏，如广州至韶关的公路，只有广州至花县一段较完好，其他部分基本瘫痪。至于新修复的公路，只有广州至海安的公路较好，主要是为在广东的军队、官员向海南岛撤退而准备。

第三节 主要商业行业概况

受战争胜利刺激，抗战胜利初期广东商业界人心振奋，

无不试图重振旧业。经营进出口的行庄复员后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广州的行庄大都集中于一德路一带，以经营土产、杂货交易为最大宗。1946年广州各行业中，也以纱商的生意最好，全年营业额达到90亿亿元。这是因为是年广东的民族工业中，以纺织业复兴的形势最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另外，广东纱商的经营业务中，从上海等地运来的棉纱，在本省销售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向云南、贵州和广西销售。内地对棉纱需求量大，决定了该行业的地位。其次是金商业，全年营业额为62.4亿亿元。以下前10位的依次是卷烟业、药材参茸业、南北药材经纪业、碾谷业、纸商业、米粮业、猪栏商业、糖面什粮商业。华洋百货业只有1128万亿元。^[13]昔日被称为“大行头”的生丝、茶叶、盐业，已退居不为人注意的地位。但是，是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商界经营状况却绝不相同，上半年百业兴盛，下半年则是全面萎缩。其原因是上半年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开放外币市场，而社会的需求也给商界无限的生机，各行业无不悉心经营。然而，是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广东虽然离战场尚远，但经济环境已大不如前，加上废除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以及外汇管理制度的变化、物价起伏无常等，从而形成半年和下半年截然不同的商业现象。

1947年伊始，商业界依旧锐意拓展业务，以求冲破压抑凋零的局面，不料开春（2月）即出现金融风潮，其后金融动荡就未曾稍息，但总体而言，生意仍能勉强维持。广州市场是年初各江来货堆积如山，货价肖利，市面畅流，一德

路行商上半年赚了三四亿的不在少数。下半年刚好相反，各地货价差距不大，而往来开销不少，客商时常赚不到钱，反而要折本。客商少，各行商只能自行办货。货价起伏无常，运出的货经常卖不出去，行商蚀了又蚀，可是9月之后，黑市港币从7000元法币兑换1元港币，一路狂升至30000元法币换1元港币。到12月再发金融狂潮，波及事关民生日用的米、油、布匹等最基本的物资，价格持续上升。1947年1月至10月，米价指数上涨了13倍多，至12月增至18倍多。工人生活费指数1至11月增至10多倍。物价上涨，意味着币值的不断下跌。在此形势下，商业界无不小心翼翼，稍不留意，卖出的货物可能会买不回同样的原材料。于是，各行业不得不将出售的物品价格尽可能抬高，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减少货物出售，或只限以港币议价。于是，有货物的商家尽可能囤积，有钱的不肯投资工商业，而是转向从事金融投机。从此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据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所载，是年广州市120万人中，至少有5万人完全没有饭吃，靠求乞生活。15万人必须接受救济，才可以生存下去。失业、半失业，吃得半饱半不饱的人，至少有30万至35万人。^{〔14〕}广州市平均每天有10余具路尸，荒月更达到平均每日20余具。

另外，社会经济的全而恶化导致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民不聊生必然导致铤而走险，匪盗横行祸害商旅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货物由产地运至销售地，沿途不得不缴纳许多“保护费”，即使商旅裹足，也增加了成本，进而使物价更高。从

柴炭运输的情况可见一斑。20年代北江柴船要缴纳许多费用，但大都是厘金与当地保安部门的勒索，40年代末则大都是土匪在作祟。“柴炭因土匪堂口多抽行水，站之〔站〕要照缴，由西或北江运货来市，中途总有三四十的堂口要孝敬使费，故此货价比成本贵三四倍。”^{〔15〕}

广东第二大商业都市的汕头，战后的街头行人寥落，给人以“万户千门尽劫灰”之感。工商业凋零，不及战前1/10，全市19万人，汽车不满10辆。每逢节日，必有数家大商家倒闭。汕头商人深感经商困难，原因除货价涨跌、汇率动荡等与各地相似外，另有当地的一些特点，就是利息太高，日息徘徊在5元左右（即每万元日息50元）。另外，潮汕地区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产品多半运销外省及东南亚市场，因而海上运输对潮汕地区的经济影响极大。但是，战后汕头的运输已不像战前那样是轮船包括洋轮进出频繁之地，而是变为绝少有轮船来往。1933年，汕头有太古洋行堆栈89处，怡和洋行堆栈53处，当地商人在北海旁自办的堆栈六七十处，皆货物山积，战后这些堆栈皆荡然无存。^{〔16〕}本地原有的船只80%在战争中化作乌有，战后初期汕头只有机帆船和小汽船，没有大型海轮，招商局的轮船则被征调忙于军运，而海轮并非像江河木板船那样容易建造或修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潮汕商家为了开拓商业，只好将旧木船改造成机帆船，行驶于香港、厦门、台湾附近地区，但这种船只毕竟难以抵御大风大浪，曾经发生几起沉船事件。潮汕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难以复苏，很大原因在于受运输的制

约。后来虽美国轮船逐渐取代太古、怡和等公司在潮汕的航运地位，但随着形势的变迁，军运取代商运，掣肘中的汕头商业始终无力振作。

1948年商业形势每况愈下，北方资金大批南下，国民党在华北、东北的战事接连失利，且战事在短期间内还看不到停止的迹象，于是北方资金开始大量南流。国民党政府曾下令限制每人每日携带人穗的金额，但游资仍大量涌入广东。海关和金融管理局曾于一日之间缉获“非法”携带的法币达四五百亿元。这些南下的游资在广东除疯狂从事金融投机之外，还大量吸收黄金、外币和重要物资北运。另外，江浙豪门巨贾也纷纷在广州开设百货商店、贸易商行等。一些外来的商人，如沪帮、湘鄂帮在广州设店营业的，几乎都在暗中做汇兑和炒买炒卖。这些南移的游资在广东兴风作浪，刺激物价，而后悄然离开，转到港澳去了，留下满目疮痍的市场，等待广东商人去补救。

物价不断狂涨是1948年广东经济的死结。有所谓“望天叫价也赶不上涨价”，商家怕出售货物，因为“卖出买不回”，甚至连原材料也买不回，许多商店采取各种方式以避免开门营业，或尽量减少营业时间。据业中权威人士估计，是年广州市商界正当营业者，80%以上是亏了本，能勉强盈利者不到20%。许多商家被迫暗中将店铺转让。略有资产的商人，大都以买卖黄金、美钞作保值办法。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代替已形同废纸的法币，同时实施蒋经国“借人头平物价”的政策，命令全国各地市场以

“八一九”那天的物价水平为基准，各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长期冻结，不得变动，并责成当地主管严格执行，违反者商店吊销执照，商人送刑庭审判，货物没收。随后上海数名富商违法被枪毙，一批人被通缉。广东商业在肃杀的大气候中全面萎靡，各商场每天的营业额比平时减少了40%左右，有些商店一天没有一宗生意，书店一天没卖出一本书，杂货店一天的收入，不够伙计们当天的伙食。限价政策使大多数商店只能在成本之下的价格出售物品。市场上出现许多反常的现象。如卖猪肉的，只准每人买几两，而且不准问价，如果你硬要买公价的，则给你搭骨头等。卖米糖油豆的商店则多以“卖光了”或“被客人定货了”等言词推却。经济管制使许多正当经商的商人成了罪犯，而从事投机、走私、炒地皮、干经纪的却总是在赚钱。管制导致生产进一步萎缩，市场进一步混乱，抢购之风日炽，广州许多商店用各种方法逃避开门营业，有些在门口挂“内部装修，停止营业”的牌子，有些公司尽可能缩短开门时间。以卖内衣著名的新光公司门口，从上午10时至下午3时，都挂“午膳时间，暂停营业”的牌子。但是若被查出，货物将被没收，还可能被判坐牢，于是，有大批货物的商家纷纷将货物转移到乡下。至10月下旬，广州市场已是极度沉闷，一方面黑市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经济警察不断地抓人。处于夹缝中的工商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据行业人士估计，在此阶段停业的商店，金饰业占全业的80%，油糖杂货业占40%，花纱布匹业占50%，11月1日，国民

党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限价。

从“限价”到“断流”，再到“抢购”，最后不得不“解冻”，物价如同坐直升飞机，也像不可抗拒的洪流冲毁了人们的心理防线，行商聚集的广州一德路，这些以往经营大宗生意的商家，因为店租、租税、工资、伙食杂用等不断增加，而资本在金融浪潮中却不断减少，从限价到11月中下旬，就有30多家不得不进行倒闭改组。一家即将关门的纸店经理说：“我们成十万元的资本，现在仅有几十把纸。”^[17]

金圆券发行之初，广东商场还出现一个怪现象：由于新货币大都是5元、10元的，1元的很少见，给市场交易带来不便。其后法币回收时限快到时，广东商场曾出现严重的辅币荒。为此，各商家自行设法：如公共汽车商自制3角、5角的代用券；江村的茶楼，将废烟盒拆开，写上金额，盖上茶楼的图章，便当作辅币使用，而该地的村民，竟然也乐于使用它；芳村居民则将法币的币值改为角数，当作辅币流通；新会南乡茶楼自行发行茶券；中山的米商自印米券。在广东的许多县份都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辅币，在商家之间及部分村民市民中当作货币一样使用。

1949年，商业由全面萧条进入瘫痪状态。在解放军渡江前后，眼看国民党江山不保，为避免损失，商人们纷纷将货物运往乡下，或运到香港、澳门。在粤海关报关出口的货物与日俱增。5月之后，广东海陆各运输线都不再是为商业运输服务，而是成了国民党败逃运输线。

当然，并非所有行业在动乱的年代里都不景气，一些行

业如酒楼茶室、旅馆业、家私业、百货业及娱乐行业，在1947年下半年之后都渐呈兴旺，实由北方“难民”南逃所赐。这些南逃的基本上都是达官贵人、巨贾、富户，带着黄金美金南逃，购买力特别强，且享受成性，从而带动了一些行业畸形发展。在广州，新出现了一些规模宏大的百货商店和酒楼，如安安大厦、美华大厦、迎宾大厦等，汉民北路出现大型家私商场，豪华家私都销售一空。娱乐场院里几乎像是繁华盛世，晚晚座无虚席。

下面将各行业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米粮油业：广东战后粮食收成较好的县份有番禺、中山、东莞等，经营粮食业务的主要在石岐、石龙、市桥，而以广州为集散地。缺粮较多的除广州之外，以台山、开平、鹤山、顺德及潮汕、南路等地。1945年秋季广东水旱并作，粮食收成不好，而湘、桂本身自顾不暇，安南、暹罗米尚未恢复采购，故米粮价居高不下。面粉类因为茶楼、饼饵、面食店激增，生意极为红火，无论机制或人工磨，均供不应求，业此者皆获厚利。其后粮食运输稍复旧观，不过，战后各地粮食生产供应却难恢复旧观，故不少地区对粮食外运采取控制措施。1946年初广东因上年度粮食歉收，粮价波动极大，粤北大米每担不过27000多元，而广州则要大约36000余元，故粤北也采取限制米谷南运的措施。特别是春荒时期，各地米价狂涨，广州市零售米价达到每担9万元之高，造成恐慌。是时广州市米粮商业公会成立，为稳定粮价，公会协同政府成立粮食市场，一面派人到芜湖采购，一

面将市内粮食运到各缺粮县份接济，同时采取平抑粮价的措施。是时湖南刚好实行粮食禁运，经多方活动，才将采购的5万担米南运接济。1947年2月金融动荡，带动米价急涨，该会发动批发商，从2月21日开始，一连三天平祟，使粮价归于平稳。1946年广州米粮商业公会会员1099家，其中批发商约190余家，多集中于六二三路、大同路及东堤一带。零售及经纪粮商700余家，经营杂粮面粉者百余家。由于政府对粮食实行严格控制，故商家所获利润并不高，一般来说，从事湘米贩运的商家利润略厚。此外，粮价上涨的时期，如1947年2~3月间，商家在涨风中获利不少。其后政府采取平祟措施，力压米市，商家只能满足于图小利。但是年秋季广东洪涝异常严重，政府无法征收到足够的粮食以压市价，商家在粮价狂涨中获利不少。油价在1947年2月金融风潮中以“跳栏式”增价，从每斤1万元增至4万元，平均每天升价4000元。

栏口行：该行业经营的大都属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物品，虽然可以三月不知肉味，但蔬菜仍是基本上每天不可少的物品。故城市里经营此行的历来都不会很差，但也没有发大财的可能。此行以代客买卖，收取佣金为主，因战后物价高涨，故佣金的收入也不少。不过，此行的行规是必须招待客人食宿，伙食费飞涨、房租飞涨，对经营者是不小的负担。最要命的是按惯例必须货到给钱，而经营者多半资金不充裕，每逢有大批货到，不得不借高利贷。“据记者调查所得，新堤有猪栏数家，与三数菜栏营业稍旺者，竟每月纳息

达千余万之钜。此等高利贷，殊属惊人。故以上各栏营业表面颇有可观，但骨子里多无大获厚利，只称平稳。”^{〔18〕}

京果海味行：以舶来为主的海味在战后不如战前生意好做，原因是运输不如以往方便，来源减少，以致价格奇昂。价格既高，在民生凋敝百业凋零的年代，除达官贵人暴发户之外，日常问津者寡。销路呆滞，生意冷淡，自然难言利润。

盐业：战争结束到 1946 年初，广东盐商曾风光一时。是时淮盐及其他省的盐尚未南销，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区纷纷到广东采购食盐，粤盐独占这些省的食盐市场。而此时省际贸易运输较战时大为改观，运输方便。而本省的盐场，如汕尾、南路的盐也改变了前期因运输而难于销售的状况。故盐商可谓无往不利，有如“天之骄子”，经营食盐的商贩也从 60 余家增至 300 余家。可是好景不长，1946 年 2 月之后盐业便由盛转衰。原因之一是盐税不断加重，从 2 月至 5 月每担由 2425 元逐渐加至 6900 元。盐税的缴交方法，原来的规定是盐商到盐场购盐，运入仓库后一个月内交清，但 5 月之后则须在购盐之前交清盐税，才可以发给起运证。其次是对粤盐的限制，是年 5 月财政部规定粤盐销湘，每销 100 斤粤盐，卖方买方均须同时搭销 100 斤川盐，超过部分照同样数目搭销。还有，粤盐在此前可以运销湖南任何地区，此后则最北只可运至衡阳。另外，粤盐运湘最高时每月有 12 万担，此时规定限制在每月 4 万担之内（1947 年改为每月 8 万担）。以上政策，导致广东盐商风光不再，至 1947 年初，

经营者减少至百余家，皆处于了无生气之属。广东 10 万盐工，也纷纷处于失业境地。粤盐的处境并非仅影响到该行业，还影响到广东与湘、赣、桂的省际贸易，因为湖南的米谷，广西的桐油，江西的钨砂，多半由盐商运盐到彼处销售之后，再采购运回广东。粤盐外销受挫，于这些地区的货物南销自然不无影响。

衣料业：战后初期，因棉纱货少价昂，织造厂家购买力弱，故棉纱业一时难于发展，但从事棉纱贸易的商家却是利用货物紧缺的时机，利用资金，买空卖空，操纵市价，是时广州纱商的势力仅次于黄金买卖者，此为战后初期广州商界一大怪现象。^[19]其后棉花棉纱的营销也不如战前正常，主要是上海、香港等地对此类商品的进出口时有限制。如经济部组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于 1946 年 10 月开始，对输入华南的纱、布实行控制，规定输往华南的纱、布以 1936 年及 1937 年输入数量为根据，再参照目前国内各地生产量的比例而定，由其核定每月输出的种类、花色及数量等。由于输入有限，为减少同行竞争的损失，1947 年初，广州该业 170 余家同业会员在西荣巷设立行业内部的花纱交易市场。布匹行业生意虽不及花纱业兴旺，但由于市价起跌，也有不小的利润。

服装行业：战后服装行业大体可分为普通服装、军服、洋服、女装、内衣 5 类。服装店除出售成衣外，代客加工也是其主要业务。服装业与当地的经济环境有密切的关联，战后广东的经济环境每况愈下，该行业也属于艰难维持之列。

由于物价通胀，金融动荡，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交货时的价格，是接货时所定成本的一倍以至数倍，因此造成亏本者屡见不鲜。1946年初广州新开张服装店50余家，至年末关闭30余家，于此可见服装行业经营状况了。

丝业：战后生丝贸易与战前有天地之别。与战前相似的是贸易方式，各厂生产的供出口的丝基本上是先运到广州的丝庄，再由这些丝庄办理运到香港出口。也有部分直接运到印度销售。1946年广州经营生丝出口的只有4家，全年出口生丝2500担，只及广东生丝出口高峰时期的1/30左右。出口水结2万担左右。1946年生丝价格最高为每担港币6000元，最低为港币3000元。运往印度的生丝每担8000元左右。水结则在每担250~350元左右。

金银业：战后该行业较战前更为兴旺，主要是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从事黄金买卖，炒买炒卖者多，其利润非其他行业可比。1948年下半年之后，游资大量南移，这些官僚巨贾除大量购买货物之外，也大量购买金银，是年“双十节”之后，到金器店购买金器的豪客很多，他们不问价格如何，只问货物有无，只要你肯卖，他就照买，以致这些店的老板被买怕了，集体关门三天，讨论如何对付。到10月13日重新开门时，金店将一些贵重的金器藏起来，铺面只摆些玉器、珠宝、戒指、耳环之类。在抢购风潮时期，商家不愿开门营业，但又担心被查处，于是商店用各种取巧的方式关门回避，如广州上九路最著名的张丽珍金铺，门口贴出一张讣告：“举家返乡奔丧，暂停营业。”^{〔20〕}

百货业：抗战期间东西贸易中断数年，舶来的洋杂货成稀罕品，故光复之初颇受垂爱，美英诸国货纷纷运来，可是普通人家购买力弱，将其视作贵族品、奢侈品，故市道黯淡。另外，此货走私品极多，私货摊贩充斥市面，对各商店的正常营业造成了严重影响，销路已远非战前可比。

电器业：此行业随着科技发展及都市化而逐渐发达，但各地城市普通电力不足，影响其经营。如广州市因电力不足，使用电器取暖和烹调经常造成电路中断，于是曾多次禁用此类电器，许多电器也因电力问题而卖不出去，经营者莫不叫苦连天。此行业中，一些专营商店却获利不菲。如1946年广州市专营光管的商店少，是年下半年该市电力改善，有两家经营光管的商店据说获取了上亿元的暴利。

纸业：抗战期间，北江、东江的纸业生产基本保有原来水平，甚至产量更多，但销售渠道因失去了穗、港市场而大不如前。战争结束使土纸的销售重获生机，加上航道通畅，于是东、西、北江山区的土纸蜂拥而出。福建纸也循东江而来，在旱季则由汀州经赣州、南雄运到曲江，再转运广州。江西定南、龙南等地的纸也纷纷运来。来源充沛，销售也畅旺，中山、江门以及香港、澳门等地，需求量均大，一时间土纸业有洛阳纸贵之机遇。1946年春夏之间，虽受到洋纸的冲击，但土纸外销尚可。是年广州经营纸业的商家166家，其中经营土纸的占130家，可知此行经营状况不差。至于洋纸行，因交通运输原因，初期来货略少，而川、滇、湘、桂来粤采购洋纸者络绎不绝，故早期盈利相当可观。其

后洋纸渐多，价格随之而降。至于本省纸厂的纸，只有江门纸厂的纸以价格相宜而堪与洋纸抗衡，业务算是畅旺。

酒楼茶室业：是光复初期生意最为畅旺的行业之一。复员伊始，亲友聚首，各界联欢，都是平常的事，而商旅往来，谋事恳谈等，大都假借酒楼茶室，故食肆大都座无虚席，食客常满。1946年广州有酒楼茶室327家（其中水上有24家），职工近万人。资本较雄厚的高级酒楼主要集中于长堤、太平南、上下九一带。该行业中的普通司理，每月工资都在百万元以上（可以买上等米25担左右）。一般的应侍每月也有40万元左右（可买上等米12担）。而政府单位的高级主管每月不过25万元。但该行业的捐税沉重，全市每天饮食捐税880万元，分配给这300余家负担。如大同酒家每天35万元，大三元每天32万多元。但是，社会消费力薄弱，酒楼各出高招以吸引顾客，或装饰门面以求富丽堂皇，厅房求其宽敞舒适，雇佣女招待务求其娇娆善媚。1947年之后，酒楼茶室业务可称蒸蒸日上，大体上北方战事日炽，南行的人越来越多，资金向南转移，食客盈门，使经营此行者不因物价腾飞而生意下跌。据《中国经济年鉴》所载，是时广州大小酒楼茶室餐馆在300家以上，每日饮食消费数以10亿元计。新开设的长堤“大同酒家”，太平南的“钻石酒家”每日营业额在千万元之数。“大三元”50万元一席的酒席，光顾者大有人在。各家都捞到油水满面。

旅店业：抗日战争后期，各地旅店业均奄奄一息。皆因经济备遭摧残，社会毫无生机，商旅裹足。战后漂泊的民众

回归，商旅往来频繁，旅店客栈生意一时生机蓬勃，新店纷纷开办。广州市的酒店客栈复员时仅有百余家，转眼间数目已翻了一番。1946年下半年，酒店普通客房，每天要五六千元，客栈每天也要二三元。旅业老板荷包肿胀，笑逐颜开。其后虽然经历了一段较为平稳的时期，但1948年之后，南来的人越来越多，旅店业也成为少数利润丰厚的行业之一。

药品业：与战前相似，中药主要来自四川、云贵等地，而运输方面远不如战前。交通不便，来货困难，而药品价格不得不随着物价而不断上升，平民百姓购买力缩减，对药品的需求自然是得过且过。另外，税收却与物价一样不断增加，征收数目超过了实际营业额。该行本属小本经营为主，于此形势下只能勉强维持而已。至于经营西药的商店，战后初期西药少，价格昂贵，商家于此获利不小。其后英美药品源源而来，价格随之下跌，生意虽好，但利润颇微。

印刷出版业：战后初期，当局对于新闻出版的控制尚未严密，各种报纸、期刊纷纷面世，故印务局一时兴旺发达，在广州西湖路尤其集中。后来该行业与其他大多数行业相似，只能于艰难中挣扎。

建筑业：八年抗战，广东全省遭毁坏房屋建筑物无数，人人皆以为战争造成空前破坏，战后建筑业应当极其兴旺。然而建筑材料价格高昂，而元气尚未恢复，民生凋敝的时代，平民百姓只求聊避风雨而已。故建筑商所做生意，大兴土木者极少，多半是小修小补的工程。不过，有不少建筑商

乘复员重建之机，集合巨资，以买卖或代修理店铺房屋为名，以租金作抵偿。无钱而房屋店铺必须修理的人家，不得不订立廉价租赁合同，以低廉租金将房产交给此类建筑商修理房产。而建筑商则在修理房屋店铺之后，以高价出租，赚取高额利润。战后城市房租居高不下，此辈操纵是个中原因之一。1947年下半年之后，由于北方资金大量南下，南来的“大亨”们多半要置些产业或购买房屋，在房屋修葺和转手买卖中赚上一笔是平常事，而且都是港币交易，给工人的工值又奇低，自然油水不薄了。

家私业：该行业在战后初期，经营普通家私的店家营利稍好，这是因为战后元气未复，普通人家受购买力的限制。但在1947年下半年之后，行业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是一些高档的如酸枝家私生意特别好，广州汉民北路一带的家私店集中了该市最名贵的家私，也是富豪太太们时常问津的地方。

注释：

[1] 《经济建设》第4卷第1期，1949年。

[2][3] 资料来源参考吴一欧：《战后广东对外贸易检讨与展望》，载香港《经济周刊》1949年第2卷第1期。吴清泉《广东对外贸易的回顾与前瞻》，载《经济建设》1947年第5期，广州经济建设出版社编。

[4] 资料来源：吴清泉《广东对外贸易的回顾与前瞻》，载《经济建

- 设》1947年第5期，第13页。
- [5] 资料来源：《广东省工商经济概况》第3、4页，广州工商经济社，1949年。
- [6] 资料来源：根据1947年《中国经济年鉴·地方经济·广东》第89页的资料制作。原统计数字有误。
- [7] 《商业年鉴·工商业概况》第9页，广州市商会编，1947年。
- [8] 资料来源：乙愚：《工商业的暮春》，载香港《经济周报》第2卷第6期，1948年。此为1948年2月的情况。
- [9] 参见《两广工商经济特辑》第103页“战前抽纱工业概况”表，第104页“战后抽纱工业概况”表，工商部广州工商辅导处编纂委员会编，1948年。
- [10] 《广东商业概览》第24页，1948年。
- [11] 骆楚森：《光复四月来广州商场之回顾》，载广州《大光报》1946年1月3日。
- [12] 资料来源：《历年广东省经济建设统计》，广东省建设厅编，1947年。原题为“本省各江现有各类船舶”。
- [13] 《广州商场年鉴·各项统计·广州市各行商业贸易统计》，此为广东省建设厅提供给英商访华团的参考资料中的统计数字。
- [14] 《广州商场年鉴》第97页。
- [15] 光华社记者李伯：《卅六年度工商业回顾》，载广州《建国日报》1948年1月4日。
- [16]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第4~5页，1949年线装版。
- [17] 林燮寰：《广州商业现况及其前途》，载《穗商月刊》第1期第14页，1948年。
- [18] 《广州工商业年鉴·商业概况》第21页，工商出版社1947年版。

- [19] 骆楚森：《光复四月来广州商场回顾》（二），载广州《大光报》1946年1月2日。
- [20] 林燮寰：《游资南流、抢购与涨潮》，载香港《经济周报》第7卷第16期，1948年。

第五章 商业市场

第一节 商业市场格局的变迁 与广州中心市场

广东濒临南海，海岸线绵长，港湾港口多，河流纵横交错，水网密布，干流及支流达 600 多条，内河通航里程在 13000 多公里。拥有面积达 11000 多平方公里河网的珠江三角洲是广东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广东内河商品运输最繁忙的地区。西江是广东与广西的输血管，广东与云南、贵州的商业往来也依靠这条大动脉相维系。北江航运能力虽不如西江，但在一口通商的时代，北江衔接我国北路进出口货物的陆路运输，两湖、江西及北方各省商品跨越大庾岭运到广州，进口商品也循这条路北上，其地位不言而喻。东江虽然宽浅多沙，但沟通了粤中区与粤东的商业联系。韩江则是粤东主要的交通孔道，沟通韩江三角洲与粤东北及赣南、闽

西的商业往来。上述的水运条件使广东绝大部分地区可以通过船只运输货物，只有南路地区与粤中区之间没有内河可以沟通，该地区的商品运输基本上只能依靠牛车、手推车和肩担等方式运到珠江三角洲，再转船运往其他地区。

以上的环境形成了广东自古以来的商业地理的基本格局，即靠近大江大河有舟楫之利，且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商品集散地的商业中心城市，如号称广东四大商业重镇的广州、佛山、陈村、石龙，以及粤东商品吞吐口的潮州、汕头。而一些地区虽然是地区的政治中心，但交通条件差，其商业地位还不及境内的一些圩市，如增城县，增城县城的商业不如新塘圩。新塘圩地处东江边，水运便利，货物川流不息，往来货物以油、盐、糖、布匹、洋什货等为大宗，有正式商店 200 余间（1934 年）。而县城则只有商店 100 余间，以一、四、七为圩期，每逢圩日，村民赴圩买卖，颇为热闹，圩日之外，则冷冷清清。但是，随着陆运的日益发达，到现代之后，汽车运输的能力远非慢悠悠的木船运输可比，县城以其公路交通要冲的地位，夺回了它的商业地位。又比如封川县（现属封开县）县城的商业也远不如靠近西江的江口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自然是台山、开平与三埠之间的商业关系了（下文叙述）。

近代特别是民国期间，是广东商业地理发生变迁的时期，导致其发生变化的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与运输方式的进步。

20 世纪之初到 30 年代，广东的交通运输条件有长足的

变化。首先是广九、粤汉、广三以及新宁铁路、潮汕铁路的修筑。特别是粤汉和广九铁路，对广东客货运输的改善起了较大的作用。其次是 20 年代末开始的全省性的大规模修筑公路，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覆盖全省的公路系统。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商品流通无疑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会改变商业市场的状况。比如石龙镇，处于东江水道的要冲地位，在沟通粤东腹地与粤中区及港澳之间的联系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是广东四大商业重镇之一。但是，随着广九铁路和公路的修筑，表面上看石龙的交通更为发达，更方便货物往来，但实际上往来的货物已不是水运时代必须在石龙中转或停留，而是“过而不留”，该镇的商业地位也随之下降。

不过，铁路和公路虽然对商业市场有影响，但在当年，这种影响并非关键性的。铁路货物运输受客观条件因素的制约，如车卡、装卸设备等，也受运力的限制，这是民国年间广东铁路货运量始终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公路更不用说，从车辆到零件、汽油润滑油等都依赖进口，运费高昂，自然影响了它的运输功能。另外，铁路与公路基本上都是沿着重要市镇而修筑，因此，对以水运作为商品流通主要渠道的广东来说，能改变商业市场格局的主要还是靠水上运输状况的改变。确切地说，就是以机械为动力的轮船取代了千百年来以自然和人工动力的木船，导致商业市场格局的变化。

以恩平为例。恩平县处于广州通往南路和雷州半岛的咽喉，在陆路尚无公路，而木船又在海浪巨涛而前显得无比脆

弱的年代，南路和雷州半岛的货物大都是用牛车运载，长途跋涉运到该县税厂后街一带出售。该地商人收购后，再用帆船运销各地。税厂街市一带的商业也历代经久不衰。随着西方列强东侵，洋轮船的到来，海上运输逐渐取代了牛车运输，南路的货物不再用牛车而是用轮船或大型帆船运载，税厂街市的商业由此一落千丈。然而，牛车辘轳声虽然消逝，而大批的牛群依旧悠然东来，南路和阳江、阳春等地的牛都集中于恩平第 11 区出售，哪里于是乎变成粤中区最大的牛市，“牛江镇”的知名度取代了税厂后街。这样，虽然其他行业今非昔比，但县城的旅店业仍然兴盛。可是 30 年代初公路干线修通，随后有水陆联运服务，往来客商也没有必要在县城停留了，于是旅店业也随之衰落。

恩平税厂后街商业地位的变迁只是轮船运输引发广东商业市场变化的开始，真正对广东商业市场有根本性影响的是轮船在广东内河自由航行之后。

鸦片战争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洋人的轮船只能航行于沿海几个通商口岸之间。随着清王朝对外一个又一个屈辱条约的签订，被迫开放的口岸越来越多，从沿海进入内河，如江门、三水、梧州，洋轮也由沿海进入广东内河。这样，传统的木船运输的劣势日益明显。虽然清政府曾极力保护木船运输，对洋轮船的行驶路线也作限制，但落后毕竟要被先进取代。1898 年，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开放内河，外国轮船可以在非通商口岸的沿海和内河自由航行。这样，除了在无法行驶轮船的水域，木船仍能存在之外，传统的木

船运输逐渐被轮船运输所取代，在广东内河航运而言，更多的是小火轮拖带木船这一水上运输形式。这种船舶吨位小，资金要求不高，航线可长可短，航商只要有一艘船即可开业，广东的民营航运业由此迅速发展。

新的运输形式加速了商品流通的速度，拉近了商业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商品流通的一些中间环节，从而对原有的商业地理格局造成影响，一些传统的商业市场，甚至商业重镇因之衰落，其中最典型的是佛山与陈村。

佛山与广州、陈村、东莞石龙号称广东四大商业重镇，即使在其手工业渐渐衰落的年代，佛山在广东的商业地位仍然稳固。佛山被称为西江、北江下游的锁钥，广东货物的吞吐总口。清朝末年之前，清远以上的茶、纸，赣西湘南的土产杂货，粤西 70 余县的米谷牲口，皆沿西、北江而下，以佛山作集散地。商业之繁盛，连广州的商家都在佛山设分店。其后，广三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开通，特别是水上运输的改善，对佛山商业是致命的打击。在 1898 年清政府颁布《内港行轮章程》之前，航业商人经营的轮船要受到各种限制，包括轮船数量和行走路线，木船仍统治着珠江三角洲水上运输。1898 年颁布的新章程则取消了一切限制，只要缴纳了规定的餉项，民营的轮船也可以自由地行驶于各地之间，这样，对于水网地区的运输业有巨大的影响，广东的轮船运输业由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也正因为轮船行驶较快捷，西江、北江等水上运输的木船原来需要在佛山中转，自从轮船运输兴起之后，很快就取代了木船的地位，而原来水

运中转地的佛山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进入民国后，佛山的商业迅速衰落，广州商人在佛山开设的分店纷纷迁回广州，至20年代，这类商店已全部迁走。30年代初，记者在调查佛山商业状况后大为感叹，称曾极盛一时的工商重镇，“其没落可怜之态，殊足惊人。往昔号称四大镇之佛山，只可目为一大村落而已。”^[1]

陈村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商业地位改变的原因与佛山相似。陈村离广州水道30余里，水运发达，也号称广东四大镇之一。该地商业以食油、咸鱼、白糖、咸货、米谷和纸为最大宗，即使是广州这些行业的商人，也在陈村采购，以上六种货物的行情，以陈村的行情为标准。在轮船不能自由行驶于内河的年代之前，周围的商民都到陈村采购。清末民初，该处仅拖船就有200余艘，^[2]水道帆樯林立。但是，自从轮船可以在广东内河行驶之后，原来到陈村采购的商人百姓，可以乘轮船直接到广州采办，一日之间，往返迅速，无须再在陈村停留。广东商品来源也有所改变，食油多来自山东胶州和莱阳，高州的油业受挫，农民改种竹子。咸鱼业则受香港、澳门竞争，该处捕捞、腌制均方便，更不用交厘税等，陈村咸鱼业完全倒闭。白糖则受洋糖冲击。至于北江、东江来货，可以直接进入广州市，在陈村停留，反而多费时日。于是陈村的商业地位好景不再，该地商人眼巴巴地看着过往的商船扬长而去，不胜“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之叹。唯一兴盛不衰的是晒薯蓣，因为地势低洼，水质好，晒出的薯蓣纱堪称一流。

佛山、陈村等商业重镇的衰落更加巩固了广州市作为全省商业中心的地位。广州为广东商业中心，也是我国西南各省国际贸易的总吞吐口和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首先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广州处于东、西、北三江的汇集处，处于广东水运网的中心地带，水运的发达是广州历来商业发展的基础。广东大部分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对广州市场的依赖性都较强，即使是江门、中山等粤中区商业市场也是如此。这些地区邻近香港、澳门，洋米、洋面粉、五金器材、洋杂货等均可以从香港、澳门直接进口，但这些地区的商家无力直接与其他国家和国内其他地区相互贸易。与本省其他地区的贸易，也因为交通制约，许多商品只能从广州中心市场转运获得。比如江门号称“小广州”，可知其商业地位，但该埠所需的一些外地商品，如上海的棉纱，苏杭布匹，东北大豆及其制品，云、贵、川的药材，北方的水果，大都是从广州市场购入，再销售于邻近各县。江门经营绸缎布匹的商店在30年代约有50余家，其货物大都从广州上下九的布庄采购，一些长期经营的商店，可以凭本店的货单和专门的采购员从布庄采购大批布匹，有时还可以长期赊入。

然而，在珠江水系覆盖范围之外，广州的商业辐射仍力有不逮，至少可以说其影响力受交通的限制。如粤东地区，在没有全省性地修筑公路之前，汕头的商业可以说是自成体系，基本上无须依赖广州的商业交流。汕头市本身与国外一些地区有单独的商业贸易往来，又有不少的外国轮船公司在汕头经营海运，故该地所需的商品对广州市场的依赖很少。

从广州进口的商品较大宗的是水泥、纱绸及部分针织品。从另一角度说，即商品的互补性受到限制。另外的缺陷是，韩江水系的上游，如兴梅地区的大部分商品进口则溯江而上，韩江航运能力又远不如珠江，上游的运输能力更差。随着广九、广三、粤汉铁路的修筑，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全省公路网的形成，水运与陆运的互补性对商品的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兴梅地区所需的花纱布匹，作燃料用的油脂以及药材等等，可以直接从广州经水陆联运运入。抗战期间，经惠阳、海丰、老隆等地以水陆联运的方式将港澳物资运入粤东北，是当年广东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

广州中心市场对其他商业区域的商品辐射，从棉纱贸易可以看出来。广州经营花纱的商人在当地商业界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在通讯不发达的民国初年，广州纱商每天与香港、上海花纱市场电讯交驰，了解纱价的变化而调整市价，其市场价格变化也影响了其他商品价格的走势，于此可知其地位了。具体表现为广州花纱影响广东以至西江流域，包括云贵，一些时期还包括湘赣的一部分的纺织业。因为进入民国后，用传统方式生产的土布“人见人厌”，已没有销路，而在土布织造中掺入细纱，织出的土布则大不相同。广东纺纱能力差，洋纱和沪纱质量好，故纺织界不能不仰赖于进口棉纱。广东土布织造业算是较发达的行业，而各地厂家所需的棉纱，基本上是从广州购进。但广州纱商所经营的棉纱，本省所销的还只是30%左右，大部分销往广西、云南、贵州、湖南一带。广州光复南路、上九路一带，是该行的集中地，

也是外省及本省的织造厂商经常造访的地方。至于广东其他市场，直接从上海购进棉纱，再转售其他地区的，除汕头市场外，几乎没有。

1926年之前，因为是由各行业的行商承包税收，也由各行业自行管理，广东对于商业的情况还没有作过详细的调查，只是治安管理的需要，由公安局对各警区的店铺进行调查，以便于管理，才有较准确的数字。1925年，广州市商业店铺为31715间，此为广州市公安局的调查数字。据1930年出版的广州《市立商业学校九周年纪念专刊》所载的“广州市商业分类表”，1928年4月广州市的商店总数为33928间，商人67000余人，占广州市总人口的8.3%。而据1935年出版的《广州年鉴》所载，是时广州全市的店铺为22178间，资产为40461455元。1947年出版的《广州商场年鉴》所载1946年广州市商家的统计，是时广州总人口为1178084人，其中商业人口为212278人，约占总人口的18%，商店21075间。

从上述数字看，广州商店最多的年份是1928年，有3万多间店铺，而被称为繁荣一时的30年代，商店还较20年代少了1万多间。这里可能有两个因素。首先，1932年至1935年是广东省经济不景气时期，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商业萎缩，大批商店倒闭，商店绝对数字减少是全国各地皆同的现象。其次，这种商店绝对数字减少，正是商业在经营不景气条件下互相竞争的结果，即商业资本的兼并，小商店纷纷倒闭，如1928年商店33928间，从商的人数却只

有 67000 人，也就是说，每商店约 2 个人，这是传统家庭式经营为主体的小商业。数年之间，情况有很大改变。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来。

广州市所属同业公会会员资产统计表^[3]

公会名称	地址	主席	商店间数	资产总额	使用人数
金业	中华南路	植梓卿	58	330650 元	354
土榨油麸	西兴街	黎 耀	36	141300 元	326
青砖窑业	永隆里	林泽坡	17	17000 元	210
山货竹器	泰康路	陈质卿	49	44100 元	318
钱银找换	惠爱东旧仓巷	谈国英	49	99900 元	279
印刷业	十八甫新街	曾拔庵	54	49500 元	800
北江纸张杂货	新基西中约	冯陶侣	12	182680 元	174
毛笔业	永汉北	罗哲甫	27	29000 元	328
豆业	海关右街	冯 显	17	236500 元	222
汽车业	永汉南	罗以逵	30	49350 元	317
按押业	状元坊	麦景畴	168	1060000 元	1409
报关业	兴隆路	陈百练	82	337500 元	667
猪栏业	金利大街	容达朝	24	163301 元	301
土枳梳打业	太平南嘉南堂	麦英甫	40	57200 元	257
瓷器业	一德路西善街	陈节之	53	196000 元	303
金属矿业	沙地街	冯纪桓	23	82000 元	822

(续表)

公会名称	地址	主席	商店间数	资产总额	使用人数
煤油类业	十三行	何湛泉	40	104500 元	315
米糠发行	六二三路	韩卓甫	41	296900 元	452
鞋业	泰康路	关勋伟	81	82600 元	467
粉面茶点	旧仓巷	王受之	138	86300 元	1304
红砖瓦盖窑	厂后街	李拔然	12	14000 元	391
酒楼茶室	二围街	冯 侠	142	182400 元	3363
玻璃樽业	丰宁路	李澄波	26	18100 元	190
石业	泰康路	周五秀	58	18400 元	333
影相业	羊城巷	梁亦澄	32	70500 元	239
京果海味发行	浆栏路	郭 富	53	154181 元	571
麻业	西善里	陈铁山	7	35000 元	220
橡胶业	太平南	罗 宏	17	189500 元	2225
长途汽车	西濠路	赵再华	11	70500 元	410
钨矿业	南堤大马路	程鸿轩	40	111700 元	402
肉业	拱日西路	黄 成	122	162233 元	848
咸鱼业	永兴通津	赵燮宸	13	48000 元	170
鲜果咸货	维新路	李月生	79	491810 元	711
柴栏业	黄沙仁佑里	黄达卿	11	38900 元	105
茶叶业	扬仁南	黄载堂	63	274399 元	544

(续表)

公会名称	地址	主席	商店间数	资产总额	使用人数
建筑业	麻行街	夏玉庭	668	96300 元	?
下级饭店	带河路	罗庆元	80	40800 元	550
影画院业	龙津东路	卢少棠	18	49500 元	369
鲜鱼栏业	泮塘鱼栏大街	胡颂棠	14	73400 元	226
纱绸布匹业	上九路	陆泽农	83	829284 元	711
制造面包西饼	一德东路	招拔群	23	49100 元	470
华人卷烟	西堤大马路	熊少康	14	230000 元	321
铁道运输	黄沙沙地街	何怀民	14	62250 元	128
绸缎业	下九路	冯星垣	38	324700 元	382
水泥业	靖远路	吴渭生	20	36500 元	121
烟业	一德路	伍桑垣	12	68355 元	84
花生芝麻杂粮	沙基东中二巷	郭泽农	31	535000 元	371
烟丝业	太平沙通津	区述韩	74	219900 元	452
砖瓦灰业	维新南路	梁湛燎	95	119800 元	439
帐联业	长乐街	陈杰卿	20	24700 元	204
新旧土洋杂木	河南南华中路	梁耀屏	81	299252 元	624
下河盐业	太平沙	赵静山	54	1060567 元	1861
米业	大同路	张铁军	199	150800 元	1083
洋染料业	太平桥	黄卓亨	32	137200 元	316

(续表)

公会名称	地址	主席	商店间数	资产总额	使用人数
故衣业	板箱巷	陈公佳	81	123120 元	411
米机业	六二三路	韩卓甫	10	80900 元	335
出口洋庄丝业	清华里	岑国华	14	109416 元	301
铜铁铅锡	六二三路	仇启光	62	93400 元	292
煤业	河南宝恕大街	霍盈之	36	221869 元	366
伞业	十三行永隆街	阮桂潮	48	102700 元	398
纸业	海珠路	李绍舒	154	47615 元	1053
南北经纪	贤乐里	李文基	39	332600 元	357
化砂玻璃	光复中路	林展棠	28	38800 元	652
玻璃镜货	状元坊	陈显之	11	78800 元	387
熟药丸散	濠畔街	李继文	161	552600 元	1404
织造土布	光复中路	童直孚	106	92300 元	944
奥加可业	棠栏路	何辑屏	11	20300 元	94
丝线业	鸣谦里	冯紫阁	23	64361 元	296
茶楼饼业	大新西路	陈青选	89	488350 元	1664
上海绸布发行	杨仁南崇俭街	陈宝琳	38	501727 元	228
干饼业	光复中路	谭揀池	46	48170 元	366
蒲包业	永汉南路	邓伯绳	14	39800 元	218
华洋杂货	一德路	黄醒魂	35	133330 元	313

(续表)

公会名称	地址	主席	商店间数	资产总额	使用人数
机器业	一德路	陈桃川	29	45500 元	238
土洋颜料	一德西路	关品三	36	296000 元	327
酱料凉果	洗基东	高月亭	58	122317 元	449
银业	西荣巷	陈蔚文	130	3882471 元	216
商办银行	西堤广东银行	陈善明	13	1615000 元	160
洋服业	广大路	陈 永	82	48150 元	468
炮竹业	长乐路	陈香邻	17	45750 元	243
旅店业	靖海二马路	袁子云	179	590700 元	2796
牛皮鞋料	民庆新街	吴 泉	102	168200 元	626
杉业	圣心路	尹业基	125	89500 元	787
海沙石仔	东堤大马路	何少琦	74	49820 元	378
京果海味杂货	海珠路	潘永和	75	101330	539
生鱼栏业	联兴横马路	李勋甫	23	130750 元	339
花纱业	兴隆路	崔勉余	28	228267 元	326
西药业	太平南嘉南堂	梁维初	38	308400 元	351
机制电器	海珠路	汤明山	19	44850 元	689
轮船杂项	西堤二马路	董继昌	24	42960 元	316
航业	海天四望街	谢仲篪	194 艘	185000 元	2601
打包业	靖远路	陈昭日	22	14320 元	317

(续表)

公会名称	地址	主席	商店间数	资产总额	使用人数
腐竹业	泰康路	江彤阶	18	33600 元	325
卷烟代理	西堤大马路	劳汉洲	68	39500 元	334
寿枋业	光复北路	李朴樵	20	58100 元	387
土洋匹头	扬仁中	林冠五	57	208150 元	397
生药参茸	上九路	李晓军	151	984280 元	1515
糖面业	联兴路	袁丽泉	97	476622 元	762
薄荷如意油	龙津东魁星巷	黄季言	32	132400 元	378
玉器业	天成路贤乐里	吴本生	30	94500 元	316
机织衫袜	长寿西路	陈荆鸿	21	38700 元	315
电镀业	海珠路	黎露初	46	22480 元	343
酿酒业	容安街	陈祝三	145	349970 元	718
土制煤油	太平南嘉南堂	杨作甫	166	1319400 元	1667
土造火柴	太平南路	王谓波	16	469900 元	313

表中所示，广州商业各行业不再是平均每间店两个人的情况了。不过表中所列各商店资产情况，则并非实情。因为资产额与税金密不可分，特别是当时广东还是实行税收承包制，并没有真正推行营业税，各行商都是根据商店资产而定税额，故商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少报瞒报。

因货物运输的需要，早期广州的商业繁盛的地域大体上是沿珠江河岸逐渐形成的。由于广州内港的原因，西关成为商业贸易区和富商巨贾居住地，设立了众多的商店，形成上下九、第十甫商业区。而惠爱路、汉民路一带，是历代南下官员们在天字码头弃船登岸，进入广州的主要通道，也逐渐成为商业区。进入民国之后，随着修筑从沙而到大沙头堤岸，20年代开始的拆城墙开拓马路，西关已无隙地，商业区向东扩展，西濠口、长堤一带建起了众多的高楼大厦，广州最大的百货公司，最高级的酒楼旅店，基本上都在这一带。此外，大沙头是广九铁路的终点，也是私货充斥之地，1934年省政府将其扩建成为新的商业区。

广州市各区商户统计^[4]

区别	陈塘	前鉴	西禅	海幢	南岸	长寿	沙河	汉民	蒙圣	大东	芳村	逢源
户数	2615	183	898	299	3	2441	17	1784	343	400	125	296
区别	惠福	德宣	西山	太平	东山	黄沙	洪德	东堤	小北	沙面	靖海	
户数	1855	777	133	3331	190	566	372	962	612	23	2851	

总计户数：21075

从行业角度看广州商业界，民国年间广州市商业最有实力、影响最大的行业，在20年代及此之前首推丝业，其他长期占重要地位的主要有米谷业、花纱业、药材业、糖面业。酒楼业、旅店业、五金业、金饰业也实力相当雄厚。

从总体上说，各行业都有传统的经营区域，这些经营区域是根据交通运输条件，接近产品生产地等而长期形成的。比如米谷业中的老大原为米机业，进口洋谷、国产谷碾成白米出售，库存动辄过百万元，因为进口稻谷的关系，米机业本来是集中于白鹅潭一带，后因噪音扰民，被迫向周边地带如沙河、河南一带转移。六二三路、大同路一带则被称为米埠，从广州四周贩运米谷的栏家集中于此。糖面商店全市各处皆有，但老字号集中在一德路、海珠南，以及仁济路、梯云路一带。糖是广东的大宗商品，而早期的澳洲面粉，后来的美国面粉，为广东众多的茶室酒楼提供原料。从北方和粤西来的食油、豆类，也是该行的主要商品，故此行生意，与米谷业相颉颃。大体而言，凡属经营粗、重的商品和批发行业，大都靠近珠江边。

广州商品批发最集中、最出名的要数一德路。该地在沿江堤岸修筑之前，以石室为中心，东至维新路（今起义路），西至太平路（今人民南路），这一带是珠江三角洲蔬菜和水果的集散地，有大批的果栏、菜栏，但最主要的商品还是以全省及外省农村为销售对象的海味、山珍，以及如糖、菜干、火柴等可以经久存放、不易霉烂的商品，主要是食品、副食品、干果类。一德路是商家云集之地，每日前往该地采购的商人摩肩接踵，其商品吞吐量之大，据说常因金融风潮的变动，数天之间，赚钱和亏折可达数千万元之巨。

下表为广州各行业聚集地的大体情况：

广州市商业行业集中地一览⁽⁵⁾

业别	集中地	业别	集中地
米业	六二三路、大同路、东堤	油业	梯云路、一德路、仁济路
文房用具	汉民北路、西湖路、教育路	盐业	抗日路
纸张	天成路	豆糖杂粮	一德路、海珠南、仁济路
印刷	西湖路、九曜坊、教育路	京果海味	一德路
古董	文德路	生果	一德东路
象牙	大新路	洋酒	沙面、长堤
玉器	大新路、长寿西 39 号玉器圩	土烟	中华南路
化学原料	光复中、太平北	南北药材	新豆栏、光复南、水月宫街
铁器	大德路	花纱	光复南、上九路
雨伞	故衣街	丝绸	上九路、高第路、杨巷路
柴	如意坊、时敏路、河南尾、大同路、黄沙、带河路、龙津路、永兴街	布匹零售	杨巷路、高第路
土布	上九路	故衣	中华中、海珠南、文昌路、龙津路

(续表)

业别	集中地	业别	集中地
杉木	如意坊、大南路、东沙角	什架	惠福西路
杂木	河南同福路、永兴街	皮革	濠畔街
酸枝 家私	下九路西来初地	鞋	上九路、丰宁路
杂木 柚木 家私	惠爱西、文明路	顾绣品	状元坊
山货 藤竹 草席	泰康路	汽车 零件	太平北、丰宁路
牲口	新堤	船上 用具	南华东路
狗猫	惠福西路	新书	汉民北路
鸡鸭鹅	兴隆路	旧书	文德路
爆竹	抗日路、长乐路		

上表所列只是指各商业行业最集中的营业区域，方便顾客，特别是外地顾客在广州大批量购进货物。也有一些具有特色的商业经营区，如高第街是以小商品荟萃而遐迩闻名，太平南一带的地摊业则以光怪陆离声名远播。

地摊业在抗战之前也存在，但只限于小资本小商人所为，从事摊贩行业者少。如传统的卖旧衣服的板箱巷，在清朝咸丰年间便集资建有会所，称有“有恒堂”，俗称故衣圩，给专门从事该行业又无力租店铺者开设档位。地摊业在抗战期间却迅速发展起来，是时广州的大百货公司都受到破坏而不能营业，而一般商人又无力自建或租赁商铺，地摊摆卖还可以逃避各种税捐，许多失业者和香港沦陷时的归侨，为了生活而干此行。当时流行的摊档多半是摆卖旧衣服。据1943年底的调查，每天上午7~11时，仅龙津路的珠秀坊、锦华康公直街等地，就有临时摊位600余档，手持衣物企立街头，向顾客兜售者数百人。中午12时至下午6时，由中华中与惠福路口至大新路口，沿路有140余档，惠福路与维新路口起至丰宁路口，有80余档，文昌路300余档，街头兜售者300余人。其余不限地点临时街头摆卖者200余档。另外，德政路、河南、西关聚麟街、平宁大街等处聚集的摊档，被称为“天光圩”，约有摊档1300余档，街头企立者500余人。³⁶³战后广州地摊以太平南最为有名，由西濠口延伸到一德路口。其次如中华北路、龙津西路也属于“摊头阵地”。与战时相比，是时地摊业有简单装修，划分了不同商品的摊位，而后公开招摊贩承租摊位开业。地摊商经营的商品80%为洋杂货，当然，走私品在这里大行其道。战后这些摊贩有不少是太太小姐们经营，顾客们通常认为这些人的服务比大百货公司的服务员的态度要好，她们的收入也是相当不错。

第二节 各地商业市场

粤东商业市场：在汕头正式开辟为商埠之前，粤东地区以至福建西部的出口货物都必须运到广州出口，山长水远，水陆交通工具并用，甚不方便。清咸丰十一年（1861）汕头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其后设立潮海关，汕头的贸易地位因此而有根本性的变化。潮汕地区之外，兴梅地区、惠州西北部以至福建西部的货物出口，都不再经广州出口，而是循韩江运到汕头出口，汕头由此逐渐成为广东第二大商务中心，成为独立于广州之外的另一个进出口中心，也是上述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此外，上述地区众多的来往于国内外特别是前往东南亚的华工、华商，都是经汕头出海，华侨的汇款，也自然都是聚集于汕头。汕头的海上运输业也随着开埠而兴旺发达，具有远航能力的帆船在最盛时有 1000 多艘。

汕头开埠之后，国外商业机构纷至沓来。汕头外马路集合了众多的洋商。其后日本人占领台湾，以地域优势在汕头扩展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垄断了汕头市场。战后欧美国家商人卷土重来，但日本商人仍占压倒性优势，从附录《汕头外国商店调查表》可以略见一二。

本国商业资本也随着汕头商业发展而不断扩展。至 30 年代，逐渐形成了“四永一升平”、“四安一镇邦”和小公园三大商业群。据调查统计，1933 年，汕头市共有商行 3441 家，共分 55 行，资本 5768 万元，平均每家商号约 1.7 万

元。年营业额约为大洋 69220.8 万元。是年汕头港进出轮船 2681 艘，港口吞吐量 675 万多吨，占全国港口货运量的 8.67%。仅次于上海、广州，居第三位。对外贸易方面，与西贡、曼谷、新加坡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厦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 15 个城市和粤东、闽西地区 34 个县有贸易往来。^[7]

海上航运是汕头商业的命脉，汕头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路线，按习惯分为北港线和南港线两条贸易线。所谓北港线，即循海路北上与各省市的贸易路线，主要的口岸有上海、天津、营口、平庄、芝罘、芜湖、汉口以及相邻的福州、厦门，大宗货物为土糖、纱、刺绣品、水果、陶瓷、土纸、酱料等。北线进口的大宗商品都是生产生活所需的物品，如东北的大豆和豆饼（主要从营口输入），芜湖的大米，上海的面粉、棉纱、肥田料，天津和汉口的青麻等。潮汕平原大量种植甘蔗、水果和蔬菜，需要大量的肥料，在使用化肥之前，每年从东北进口的豆饼达 200 万块之多。进口的大米一般都在 200 万包左右，最多时达 400 万包（每包 80 磅），芜湖输往广东的大米，大多数是销往潮汕地区。南港线则是向南，与广州、香港、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出口品主要是蔬菜、生果、抽纱、刺绣品、土纸、陶瓷、竹器等。如运往新加坡的生菜、椰菜、萝卜，运往泰国的椰菜、大菜等，多半供不应求。运回的大宗商品主要有越南和泰国的大米，新加坡的木材，香港转口的洋货和当地的一些小工业制品，广州的水泥、绸缎等。

汕头出口商品的相当大部分来自潮汕之外的粤东其他地区和福建西部地区。如汕头经营陶瓷的商店上百家，而陶瓷除当地枫溪所产外，大埔高坡陶瓷占相当大部分。土纸，包括神纸，是汕头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但当地所产很少，大多数是从福建汀州、上杭一带运来。汕头与粤东各地的商业往来，大体上是依靠韩江、榕江、练江等水路相联系。如兴梅地区的大埔县，处韩江中游，其市场范围主要是潮汕平原、梅县、兴宁、老隆以及福建永安、上杭等地。因运输方便，与汕关中心市场的关系紧密。该县所需的洋布、棉纱、食盐、洋什货、海产品、药材等，主要来自汕头市场。因山多田少，人多地少，所产粮食不足所需，进口的国产米和洋米大多是经汕头由韩江运入。经营纸类、陶瓷的商家在大埔也可算是“大行头”了，但主要是收购商品而后运到汕头销售。如数十家纸行，专事收购从福建永定、上杭、汀州、湖雷、坎头、连城等地出产的土纸。其他如闽西出产的菌类、茶叶、竹、烟叶等，也有专门的商家收购，再运到潮汕发售。陶瓷商上百家，除收购高坡陶瓷外，也收购江西景德镇陶瓷。本地所需的商品，如肉类、蛋类来自江西的不在少数，土布来自兴宁。粤东另一商业重镇梅县在韩江水系上游，在粤东客家地区是个商业中心，因处于内地，工业不发达，商业经营在不少行业中仰赖广州和汕头的输入，如棉纱、洋什货、海产品、煤油汽油类的油脂品以至食盐等等，转销邻近县份和闽、赣边境。抗战期间，汕头沦陷区的商店迁入不少，商业曾繁荣一时。

粤中区商业市场：粤中区的商业中心市场处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河道纵横，以江门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为中心，是广东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侨乡。该地的商业重镇有二：一为江门，二为三埠。其中江门的商业地位在民国时期较三埠有过之而无不及，30年代全盛时期，有大小商店3000余家，曾有“小广州”之誉。

江门处于潭江下游，光绪三十年（1904）设立海关，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水陆交通均极便利。水上与香港、澳门、广州可通大轮船，是潭江流域与上述商业中心的交通枢纽。陆上有全长100多公里的新宁铁路（抗战初期被毁），20年代后期筑有新鹤、新开、江佛等公路，可直通广州。溯潭江而上，可入四邑腹地，故被称为四邑之咽喉。因交通便利这一因素，江门是以商品集散、转口为其商业特征。进口商品主要有大米、煤油汽油等油脂类、布匹、五金、洋什货、西药等。出口商品中，当地出产的主要是葵类、水果、烟丝，外地过境出口的主要是从西江运来的桂类（桂皮、桂油等），北江运人的竹木、土纸等。

因为是商品转运、集散这一商业特征，故江门商界以从事批发的谷栏、米糠行、果菜栏、咸鱼海味栏、油糖栏等为大行业。各行商店林立，但从事批发的各行在市区内都有传统的地域。如米糖行、南行（专门经营椰子、槟榔等海南特产）在堤东；谷栏、菜栏在堤西；九八栏（经营油脂、糖、纸、豆、肥料等，因经营方式中有“退九八”的行业习惯，

故称)在长堤;木竹和鱼栏在竹排头;咸鱼海味市场集中在仓后路,等等。江门为四邑一带粮食的集散地,本地米谷主要来源于万顷沙,新会的九子沙围田以及陈村、西江等地。洋米来自香港,各行派有“买手”驻在香港购买米谷,销售去向除四邑各地外还销往鹤山、顺德一带。洋米进口在最鼎盛时期,每日进口在500吨左右。油、糖、豆、纸、肥料主要来自雷州、梅菪、水东、两阳一带。江门又是广东食盐主要的转运地,珠江口以西,雷州、电白、恩平等地盐场出产的食盐,基本上集中于江门,每月约达10万担,除四邑销售之外,沿西江运到四会、梧州进入广西,沿北江运到清远、英德、韶关,以至湖南。江门商业界有“五穷六极七翻生”的说法,即每年5月、6月虽然市场清淡,甚至萧条至极,但到了农历七月中元节,或最迟至中秋节,凉风乍起,便是商贾云集,樯帆林立,商场处处一片繁荣小康的景象。

江门虽然商业繁盛,但在不少商业领域还得仰广州中心市场之鼻息。以抗战前为例,江门各批发行业生意虽旺,但资本普遍都不大。如谷栏的商家,在江门商业界算是资本最雄厚的了,但资本最大的也不过20余万元,每间谷栏每月最高营业额不过15万元左右。其他较有影响的行业如旅店业、当押业资本最大的也不过是10万元左右。^[8]在广州,米机业大都有上百万的资本,经营洋米谷的商家一般都有五六十万资本,才能使经营灵活。因为资本不够雄厚,无力大批量从内地各省市采购货物,因此,江门的一些商品不能不从广州转购,如上海的棉纱,苏杭布匹,都是从广州转购运

来。因为上述因素，江门商业与广州商业相比，只能是处于从属地位。

江门为四邑咽喉，三埠则被称为四邑的心脏。所谓三埠，即台山的新昌、荻海及开平的长沙。三埠在四邑中心，鼎足于潭江两岸，水陆交通均可称四通八达。据1947年出版的《广东商业概览》所载，是时新昌有店铺700余家，16个商业同业公会。荻海400余家店铺，也有16个同业公会。长沙有200余家店铺。三地均设有商会。上述三地的货物，洋货大多从香港和广州购入，油、糖、纸、豆多半从江门及广州运来。三埠的地位仅次于江门。粤中区其他许多地区的商业，则多仰赖三埠。如邻近的恩平县，在地理位置及交通运输上不及三埠，其商业也从属于三埠。该地所需的布匹绸缎、土洋杂货、肥料等货物，均来自三埠及广州湾。恩平旅美的华侨众多，在汇水不低的年代，居民生活可称小安。为振兴当地商业，该地人士试图与三埠争雄，曾在1930年和1931年集资建均安、江洲两个市镇，其中均安市已建成商店百余间，正式营业的约80间。可是不到3年，只剩下二三十家还勉强营业。原因是交通和传统商业习惯等方面，均无法与三埠抗衡。江州市镇的建设也因此不敢重蹈覆辙。

该地区其他县市商业远不如上述地区，如中山县，民国时期为模范县，地位特殊，也靠近港澳，但不具备商品集散地的特点。它的商业往来，对内主要是广州，对外则是澳门。

粤北商业市场：粤北在民国之前属于地广人稀的较为闭

塞的地区，其商业以北江为依归。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年代，各省出口货物经北江运输入广州，故处北江上游的曲江为通商要津。五口通商之后，特别是轮船运输发达之后，各地出口商品改由海上运输，不再走北江入广州，北江水运由此衰落。在粤汉铁路贯通之前，粤北商业大体局限于向广州和粤中区输出农副产品，其中又以土纸和烟为大宗，广州则向粤北输出洋什货、五金、布匹等。东、西、北方向与邻省的贸易，由于南岭所隔，商业往来有限，曲江的商业活动与较偏的南雄不相上下。据粤汉铁路经济调查队的调查，1932年曲江的商业资本总额仅有454万元，是年营业总额约为4000万元。而南雄的商业资本总额高过曲江，为474万元，营业总额只有约3075万元。由此可见曲江商业的局限。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贯通，抗战初期修筑通湖南、广西、江西的数条公路，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商业环境。加上通粤东、粤西的公路的修筑，1939年广东省会迁入，人口骤增，曲江由是成为全省的商业中心，全市商店曾达到7000余家。从下表中加入同业公会商家数字的对比，可以约略窥见抗战前与抗战期间商业变化的一个侧面。

曲江抗战前与抗战中同业公会商店家数对比表⁽⁹⁾

同业公会名称	抗战前	抗战中	同业公会名称	抗战前	抗战中
西药业同业公会	4	24	旅店业同业公会	13	98
鞋业同业公会	2	55	印刷业同业公会	4	55
谷米同业公会	19	66	什货业同业公会	49	210

(续表)

同业公会名称	抗战前	抗战中	同业公会名称	抗战前	抗战中
屠行业同业公会	2	24	板木业同业公会	10	49
酒楼茶室业同业公会	6	108	军服业同业公会	1	16
汽车零件业	2	40	建筑行业	17	67
绸杂行业	42	83	转运行业	3	104
陶瓷行业	10	21			

作为广东战时商业中心，曲江担负着全省战时生活、生产必需品的采购、存储、交流的任务。而战前和战时抢修的以曲江为中心的公路以及西、北江水上运输，加上粤汉铁路，成为战时的输血管。省政府北迁，政府人员大换班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湘赣购运粮食以维持军民食粮，从沦陷区抢运储藏的物资，组织大批人力车辆从惠州、汕头、广州湾抢运物资。是时曲江进口的物资主要是汽油、煤油、棉纱、布匹以及食盐等。这些商品除当地及附近县销售之外，大部分运往湖南，交换回大米、生猪、黄豆、药品以及桐油等，再销往东江、西江、南路各地。

南雄是战时仅次于曲江的商业中心。在香港未陷落之前，一些重要的物资可用飞机直接运入南雄。但南雄贸易的重点是江西，并通过江西购进华东地区的物资。如从赣州购进白糖、布匹、金华火腿和瓜子等。南雄的土纸销往曲江和赣州，烟叶销往衡阳和桂林，香菇销往曲江等地。

1945年初日军攻陷曲江，对当地工商业进行大规模抢

掠和破坏，省政府东迁。是年8月抗战结束，粤北商业盛况不再。但是无论如何，30年代中期以前的闭塞状态已一去不复返。

粤西商业市场：民国时期粤西商业不发达，广州湾被租借给法国，设有雷州海关，但没有形成如香港、澳门的贸易地位。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交通不发达。当年陈济棠为了改善交通落后状况，曾采取强制的手段修筑公路，规定公路路线所经过的地区，无论何种情况，两旁的土地和建筑物都必须交修路费。结果是公路虽然修成，而公路运输费用高昂，远不如水运低廉，故粤西和南路出产的货物如油、糖、豆、草席、牛皮、爆竹等，大都是通过海船运到香港、澳门及广州湾出口。销往内地的也大都运到江门，再转各地。另外，广东出口商品输出欧洲的不多。这从广州湾的对外贸易额可以看出来。1933~1937年雷州关进口年均值仅为113.4万元，仅占广东全省进口年均值的0.6%。出口略多，约占2.1%。该地区商业曾有短暂的繁盛时期，这便是抗战期间，即1939年至1941年间。从广州沦陷开始，广州湾在广东进出口港中的地位显著提高。1936年广州湾全埠人口仅7万人，1941年增至15万人，前往采购的各地客商川流不息。1939年进口总值为1936年的11倍，次年增至40倍，高居广东各关之首。大量的煤油、汽油、棉纱、布匹、西药及其他战时必需品，以人力车、牛马车、船和汽车联运的方式运到曲江，大量的棉纱、布匹通过桂南运到粤北。

战时广州湾及相邻商业区虽曾有过繁荣，但都是短暂

的，因为基本上是过境商品，本地商业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从梅菪的商业活动可以略见一二。是时梅菪称为市，据通往广州湾的要点，是粤西较有规模商业市镇，该市商业以布匹、洋货业、竹木器业、纸料业、油糖杂货业及米谷业为主，但商业资本都不大，据 1941 年的调查，各行业中布匹洋货业和竹木业资本最多的不过 2 万元，全年全行业营业总额，前者不过 500 万元，后者不过 100 万元。纸料业和油糖杂货业资本最大者为 1.5 万元，其余都在此之下，可见其商业规模之一斑，且商业经营范围大体上在广州湾和周边地区。

民国时期广州湾、梅菪一带被称为南路，而被称为粤西商业要地的是肇庆高要地区。该地据西江中游，水上交通便利，与广州相近，往西通梧州可进入广西各地，南通高明三埠，北经四会、清远可通曲江，南经新兴、阳春、阳江可通广州湾。交通虽佳，但在抗战前而言并非要津，商业并非很发达。抗战军兴，此地于商业运输上成为通广州湾和广西的孔道，特别是在芦苞被日军侵扰和占领的时候，该地成为货物重要的中转地，客商如云，以致常常住不到旅店，旅店价格曾有过一日三变的情况。因运输广州湾的货物需要大量的人力，运馆业也应运而生，每天上千以至数千人的夫力进出该地，无怪旅业兴盛了。当地也是敌我经济战的地区之一，当地销售的洋货和海味京果品，大都是从广州运来的日本货。而我方从敌占区购运的物资，也有相当部分是经此地内运。

第三节 广东与周边省市的商业贸易

广东处于五岭之南，五岭之北属于长江水系，五岭之南属于珠江水系。由于两大水系背道而驰，故南北商品流通，不得不先溯江而上，在不能水运之处，舍舟就陆，将商品搬上岸，循逶迤崎岖的山道运输，到可以再次水运处，重新装船，五岭成为广东与中原沟通的一道障碍。在近代海上轮船运输发达之前，广东与中原的联系，除了海上的通道之外，主要有如下 3 条道路：一为经西江走灵渠入湘江水系，二为骑田岭郴州路，第三条为大庾岭虔州路。灵渠水道由西江溯江而上，进入灵渠后要贮水使船节节上升，故于商运来说，极不相宜。骑田岭郴州路和大庾岭虔州路都是要溯北江而上，在曲江转入北江的两条支流，即通江西的浈水和通湖南的武水，再由水道转陆行进入赣、湘腹地。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年代，北江水系是与湖南、江西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贸易的重要通道。浙江、江苏、安徽的生丝，江西、安徽、福建的茶叶，大都是先运到南昌、赣州，再跨越大庾岭，循北江运到广州出口。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上述地区的商品可以直接经上海、福州等地出口。《天津条约》之后，随着九江、汉口等地的开放，特别是香港转口贸易地位的形成和海上轮船运输的兴起，湖南、江西及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的运往广东的商品，可以直接经汉口、九江、镇江等口岸经轮船转运，不必

费时费力且有几分“冒险”地走骑田岭郴州路和大庾岭虔州路，北江水运由此渐渐衰落。但是，相邻地区的互为补充的贸易则世代延续。

然而，随着陆上运输的进步，即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的进步，广东与相邻省份的贸易方式又有所改变。30年代初与后来修筑的粤北公路系统，大都利用原有的驿道。如粤湘线是在骑田岭郴州路的驿道基础上修筑，而粤赣线，即南雄经江西大庾、南康而至赣县的公路，就是在大庾岭虔州路驿道的基础上修筑。不过，由于陆路运输要受各种条件制约，故民国年间广东与周边省份之间的商业往来，水运条件便利的省份之间，贸易往来仍然较以陆运为主的省份要密切得多。故两广之间的贸易，较广东与湘、赣、闽之间的贸易要密切得多。

与广西的商业贸易：广东与周边省份的贸易中，相互之间最密切，贸易额最大的莫过于广西了。辽阔的西江水系覆盖广西绝大部分地区。广西近千条具有航运功能的河流中，约有五分之四的河流汇入浔江、桂江，再经梧州进入广东境内。西江水量充沛，河道宽阔，具有良好的航运条件，就两广间经济联系来说，这条运输线被称作粤桂“输血管”，一点也不过分。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水路运输是交通的重心。正因为这一利便因素，长期以来，特别是轮船统治西江运输之后，两广就如同一个地域单元，民国年间，两省在政治、军事领域的相互关系曾达到相依相存的地步，而经济上的关系更源远流长。

从明末开始，广东的商品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两广间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广西成为广东商品的推销地和原料的采购地，大批广东商人经西江进入广西。“在广西过半的地方，广东商人抵达之时，也就是圩镇经济的发展之时；广东商人势力推进之处，也就是圩镇经济发展之处；广东商人较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圩镇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广东商人竟成为发展广西圩镇经济的主要商人集团力量，以致明清民国时期广西流行着‘无东不成市’的谚语。”^{〔10〕}这一时期广西圩镇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最靠近广东而地处两广出入口的东部圩镇，经济发展程度最高，规模最大；而由此往西，随着地理距离的延长，圩镇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规模则相应递减。由于东来的广货和东出西货都是由相对靠近广东的圩镇组织的，因而越靠近梧州一带，贸易的机会就越多，生意买卖越大，赢利总量越大，因而广西圩镇经济形成“无市不趋东”的结构。^{〔11〕}

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在广西经营的主要是广东的手工业、农副业产品，如绸缎、布匹、瓷器、海味及杂货等，同时收购米谷、油料、柴炭，开办手工业作坊，以及从事典当业、水上运输业等。到了民国年间，入桂粤商所经营的业务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粤商贩运入桂的主要是洋货，如棉布、面粉、卷烟、火柴、白糖等。入桂粤商有“洋广商”的绰号。粤商在广西采购的仍主要是米谷、油类、木材、药材、烟草、牲畜等农副土特产品，而这些土特产品销售的去向除米谷外，主要是经广州、香港销往国际市场。据《广西年鉴》

(第一回)“商业·产销·输出货物”中所载,该地所产的木材、柴、炭、竹及竹器、皮革、牛皮胶等全部销往广东。生猪肉的八成、烟草的四成、茶叶和香菌七成都销往广东。谷米在广东的销售地则主要是在顺德、鹤山、三水,原因是广州“销场多为洋米占领”。而在“输入货物”表中,绝大部分是洋货,这当然是“洋广商”在做这方面的生意。而真正在广东出产的货物只有:火柴广东九成,布广东二成,文具及仪品广东四成,瓷器六成,衣着类香港五成,广东、上海各半。

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民国时期入桂粤商在广西经营的主要行业有如下5大类:一是商业中介性质的经纪行、百货批发行和进出口行。据1933年《广西年鉴》“商业·店东籍贯”中统计,梧州、南宁、柳州的经纪商约有82家,粤商占42家;平乐先后有经纪行48家,除二三家外,皆为粤商所经营。二是洋货销售店和土特产采购庄。洋货店绝大多数仍由粤商经营,如南宁、柳州、梧州、贺县四地可知籍贯的共有89家,粤商经营的就占69家。第三是银号业。此行业最集中的南宁和梧州,1933年,具有存放汇能力的银号并知籍贯的共有57家,其中粤商银号有39家。第四是新式运输行业。早年入桂的轮船运输业被外国人所垄断。1908年粤商经营的“西江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提出“中国人乘中国船,中国货搭中国船”的口号,与外国人竞争,其后,粤商纷纷仿效,从而打破了外国人的垄断。1933年,梧州、南宁可知籍贯的航业公司有21家,其中15家是粤

商。柳州可知籍贯的汽车运输公司 7 家，全为粤商经营。第五是工矿业。传统的手工业之外，清末民初粤商在广西创办的新式工业，如机器采矿业、机器制造业、染织业、缫丝业、电力工业、火柴工业、制皂业等，在广西城镇各类工厂体系的形成中，“具有先河初开的地位。”^{〔12〕}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广西本地的商人在绝对数量上已赶上并超过粤商，但并未改变“无东不成市”的格局。

与湖南的商业贸易：在粤湘公路及粤汉铁路未修筑之前，广东与湖南的贸易量很小，主要是受交通的制约。在 1908 年建立郴州与乐昌之间的急件邮递业务之前，从郴州邮寄物品到广州，大约要 30~35 天时间才能到达，因为邮包要从郴州送到汉口、上海，再转到广州，绕个大弯。直接通邮之后，也需要大约 7 天的水陆兼程。这个例子大体可以反映粤湘之间交通的困难。

广东与湖南之间的行旅商贾，多半取道北江转入武水进入湖南。也有部分是取道小北江，即走连江口进入湖南临武，但走武水为多。其实走武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武水发源于湖南临武，经宜章入广东乳源、乐昌坪石，向东南流入曲江，可通航约 120 公里。据实地调查的人员说：“武水全段经行山谷间，急流奔驶，滩石嵯峨，自坪石至乐昌百余里间，因河床巨石堆积，有十数处成阶级形，致河水经此，如瀑布之倒折而下，相悬数尺，篙师稍一失势，则舟碎人沈，故此一段有九泷十八滩之目，沿途碎舟相望，使人心悸。”坪石以上，只能行小船，载重约二三千斤，上水顺风每天只

能行 50 里左右，逆风只能行 20 余里，还得拉纤而行，冬天还不能航行。虽然如此，商贾仍是选择这条路，其原因是“湘南粤北，万山盘错，在粤汉铁路株韶段未完成暨湘粤公路未筑竣时，陆路交通，崎岖不便，故行旅商贾，仍多取道于此。”〔13〕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大米产区，而广东则是缺米最严重的省份，因为交通不便的原因，销粤湘米，只能先集中于长沙、衡阳，再运到汉口、上海，转轮船运到广州，于时间运费均不合算，故粤湘虽为相邻省份，湘米销粤却很少，远不及安徽芜湖大米，更不如洋米。从越南、泰国、印度等国进口洋米方便快捷。洋米是由大公司经营，一有需要，“朝发电而夕则米船起身”。一般来说，广州商人订购洋米，从发电报到载洋米的船进入广州白鹅潭，只要一个星期就行了。而从长江中下游购买，二万石米常常需要 20 余天才能到。也正因为如此，广东与湖南的粮食贸易量很少。

在通衡阳的公路修筑之前，湘潭是广东与湖南贸易的重要枢纽。“各方商贾，相率而来……然皆不敌江西帮贸迁之广，势力之大，惟广东帮货产丰厚，堪与赣商角逐。粤之海味、葵扇、槟榔等食品，以湘潭为一大销场，每年销售不下二百万。而银珠、玳瑁、珠玑、翡翠以及化皮安桂之属，尤为珍贵，必逾岭峽由郴县零陵直下，以达长江流域，湘潭为输转之枢。”其他地区运往广东销售的商品，如衡阳的鸡蛋、莲子，江华的桐油、茶叶，宁远销往连县的猪鬃、鸡毛、红瓜子、麻等等，广东运往永明的“洋广货”，销往江

华的化妆品、纸烟，连县运到宁远的盐、火柴，运往临武的盐、洋油、布匹等。^[14]当然，广东销售于湖南最多的是盐，特别是当两淮有事之时，粤盐自然而然地取代淮盐成为当地食盐的主要来源。湘粤两省边境贸易最密切的地区，在湘为郴州，在广东为乐昌的坪石。贸易品以盐、糖、大米、鸡、鸭、鸡蛋、茶叶及杂货为大宗。“盐尤为湘南之主要品，湘人恒肩米、谷、鸡、鸭或鸡蛋之属，至坪石易盐而返，故坪石贸易之盛，不下于乐昌县城也。”^[15]

1936年9月粤汉铁路终于通车，广东与湖南的商业贸易从此大为改观，抗战期间又修通了从韶关通衡阳的公路，并成为重要的运输孔道。湖南所需的食盐，基本上是由广东供应，棉纱的大部分也来自广东。1942年10月统计，韶关每月运往湖南的盐约有3万担，洋布、棉纱约数千万元，土烟约2000件。从湖南输入韶关的主要是棉花、土布、桐油、豆类、茶油、牲口以及石膏、湘莲、针菜等。战后上述商品仍是广东与湖南之间的主要流通物资。

与江西的商业贸易：历史上广东通中原的路线，比骑田岭郴州路更多用于商运的通道是大庾岭虔州路。由北江入潏水，可达广东与江西交界的乌迳圩。由乌迳至江西信丰有一条60余华里的古道。称为乌迳路，可达江西信丰，再转水道运输进入赣江，新田、乌迳沿河岸上有盐店牙行211间，来往乌迳道至南大坊的牛车每天约100辆，乌迳河下有木帆船500艘，有谓“日屯万担粮，夜行百只船”。^[16]故这条通道不仅是粤盐与赣粮交易的重要通道，也是广东与闽西和中

原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不过，由于淡水流域植被极差，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塞，春夏水量丰富时，前往乌迳圩的木船只能载二三千斤，秋冬季节则只能载千余斤，与武水的情况相似。但是，随着轮船为主导的海上运输兴盛，这条运输线的贸易地位已大为衰退，不再是沟通广东与中原和内地的通道，只是地区间的贸易运输道路而已。1934年，南雄至信丰的公路建成通车，这条运输通道已完全弃用。

由于山岭所隔，广东与江西之间的贸易受到限制。如江西也是个产粮的大省，广东是缺粮大省，但与赣省相邻的粤北、粤东北山区并不缺粮或缺粮不多，在粤汉铁路建成之前，赣米输粤基本上是通过长江或湘江转入长江水道，再转由海道运来，因为这一缘故，输入广东的赣米为数不多。直到抗战期粤北与赣省交通大为改善，赣米也成了广东粮食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年间江西其他物产输粤的大宗商品有钨砂、桐油、香菌等。1917年德国传教士在大庾首次发现钨矿并暗地开采之后，因利润丰厚，开采和贩运钨砂很快就兴盛起来。但此后都是私人经营，其中便有不少广东商人涉足投资开采和贩运。1928年该省将钨矿开采收归省营，采取官督商办的办法，招商承包，结果由粤商钜安等7家公司联合投得，组织利济公司，每年缴交矿税22万元。其后因钨砂价格不断攀升，利之所在，政策也不断地变，唯一不变的是，年复一年，大量的钨砂经广东运到香港出售，有公开的渠道，更多的是走私。桐油输粤，主要线路是由从龙南运到和平，从虔南运到南雄，再集中广州出口。^[17]至于香菌等其

他农副产品输粤，则与广东相邻的县份基本都有输出。在30年代大力修筑粤赣之间的公路后，如兴宁经平远至江西寻乌、龙南经坝子接江西虔南、忠信经和平至江西定南等公路在抗战前与抗战期间先后修筑，对于区域间的商业贸易往来也起着不小的促进作用。

广东输往江西的最大宗的商品是食盐以及煤油、汽油等进口的油脂类产品、洋杂货等。与广东相邻的一些县市，均有不少粤商在当地开设店铺，从事两省土特产的经销。“挑盐担上江西”，是相邻地区农民在农闲时寻生活的一个门道。大批的农民为经营粤赣贸易的粤商当挑夫，用肩膀将食盐、煤油、洋杂货等挑到江西，以赚取微薄的运费帮补家用。赣州是广东商人在江西的聚居地之一，据抗战期间对赣州广东人的统计，其时侨居该地的广东人约1500人，经营商业的约为700余人，主要经营京果海味、洋什货、布店、米店等，战前京果海味店有7家，货物来自广东、浙江等地，年营业额在10万元以上。经营洋什货的达30家，但营业额远不如京果海味，也不如布店，这是因为当时这类商品的来源已非战前可比。这些商号的货物大都来自广东，部分来自浙江和湖南。

与福建的商业贸易：粤东与闽西相连，虽然两省也为高山所隔，但潮汕地区与南闽一衣带水，又属于同一语系，两地的关系有如以西江相连的广府语系地区。另外汀江自东向西，汇入韩江上游。故粤东与闽西，特别是汕头与闽西汀州地区的经济关系较他处为密切。汀州各县中，与汕头往来较

多的县份为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定等县。据福建方面的估计，1920至1930年的11年间，汀州属经汕头输出的纸类每年约650万元，经汕头输出的烟类每年约为150万元，汕头本身不产烟，其每年输出的烟基本上来自闽西（特别是平和、宁化的烟，大都是运到潮州销售）。加上其他商品，如竹笋、香菌，平均每年约有900万元。^{〔18〕}经潮州运销其他地区的大宗商品还有永定和上杭的纸（包括神纸），1934年仅上述两县输出的纸就多达13万担，大多数运往潮州，再运销其他地区。连城和武平的木料，每年输出约22万元和36万元左右，也是大多数在潮州销售。^{〔19〕}

经汀江运输的贸易在两省的贸易额中只占小部分，更大的交流来自海上口岸间的贸易。汕头与厦门近在咫尺，距福州也很近。在汕头北港线与各商埠的贸易额中，汕头与上海和天津的贸易额最大，其次便是福州和厦门了，每年都有数百万元的贸易数值。由于水上运输方便之故，口岸之间直接贸易之外，诏安、东山、云霄等沿海的县与汕头的商业来往也不少。如诏安的糖、花生油，云霄的金枣、木炭、花生油，龙溪的水仙花，德化的瓷器，漳浦的花生油等，都是不经过福州转口，而是直接销往汕头。潮汕地区销往福建各地的商品也很多，如潮安出产的布鞋占据了厦门的市场，潮阳和庵埠的土布，潮阳的薯粉等，也都是销往福建的大宗商品。

广东人喜欢喝福建茶，福建乌龙、水仙等品种的茶叶在广东有很大的市场，仅水仙茶一种，每年在广州的销售量就在1000担以上。广东人还是福建茶叶出口的主要代理商。

“外洋茶庄以广东帮为优，盖纪律整肃，资本亦雄厚，故销英美者全操此帮之手，其性质与上海之出口洋行相同，乃一代办性质。”仅在福州一地，就有 10 家广东人经营的茶庄，在厦门也有数家。^[1]茶之外，每年在广州市场销售的福建土纸达 14000 余担，其他大宗商品如闽侯的漆器，龙溪的水仙花，宁化的烟，都有直接运到广州出售。广州运往福建销售的大宗商品主要有水泥、土布、绸缎、胶鞋等。

注释：

- [1] 陈庆秋：《佛山商业概观》，载广州《大光报》1946 年 12 月 26 日。
- [2] 《民国二十二年本省经济概观》，载《新广东月刊》第 13、14 期合刊，1934 年。
- [3] 本表载于广州市商会 1934 年出版的《市商会周刊》第 7、8 期。资产总额未列毫、仙。奥加可为酒精（alcohol）的英译名，该行业经营酒精、火酒。
- [4] 资料来源：广州市商会编《广州商场年鉴》第 81 页，1947 年版。
- [5] 资料来源：《广州大观》第二编，第 73 页，1948 年。
- [6] 《广州市故衣业现状》，载《经济月报》第 1 卷第 5、6 期合刊。
- [7]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商业志》第 754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8] 参见《江门沦陷区商业概况·江门市重要行业平时营业情形与最近概况表》，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1 年。
- [9] 资料来源：《广东经济年览续编》第四章《商业·曲江商业统计》，时间为 1941 年 12 月。

- [10]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 361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11]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 376、378 页。
- [12]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 383、384、386、387 页。参见《广西年鉴》（第一回），广西统计局编，第 365~437 页，1933 年。
- [13] 《粤汉铁路株韶段经济调查报告书》E4 页，出版时间不详。调查时间从 1933 年 9 月开始，历时 5 个月，故该书约在 1934 年出版。
- [14]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 120（丙）、第 121（乙）~147（乙），1935 年。
- [15] 《粤汉铁路株韶段经济调查报告书》K2 页。
- [16] 刘兴洲：《乌迳路的兴衰》，载《韶关文史资料》第 19 期，第 223 页，1993 年。
- [17] 《江西年鉴》第 934、799~804 页，1936 年版。
- [18] 张果为、杜俊东：《福建历年对外贸易概况》，载《福建经济研究》（下册）第 44 页，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1940 年。同书另一文：翁礼馨《非常时本省省际贸易之检讨》的数字则是：每年由广东进口的价值是 253.5 万元，出口广东为 236.8 万元，相去较远。从附录《广州市物品标准调查表》中可以看出，仅在广州销售的福建土纸和水仙茶就超过 200 万元，故翁文中的数字实为过低。
- [19] 参阅《福建省统计年鉴·各县物产产销概况》，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1937 年。
- [20] 《福建省建设报告》第 121 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49 辑。

第六章 商业管理与商业经营

第一节 商业行政管理

清末广东的商业管理机构除粤海关外，设有商务厅，后改为农工商分局。民国建立，广东设立实业部，王宠佑、利寅为正副部长，主管农工商事宜。部之下设实业科。1915年改为商业厅，专管商业。其后近10年的时间里，广东经历二次革命以及龙济光祸粤、护法战争和桂系据粤等战乱，省政权更迭频频，商业行政机构被撤销，商人设商团以自保，商事由各行业自行管理，实质上各行业也只是代当权者收商业税而已。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设立商民部，广东则成立商务厅，由宋子文任厅长。时值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发生，广东各界议决与港英政府经济绝交。由于香港是广东商品进出口的主要中转地，与香港中断经济联系，势必影响广东特别是

广州的对外贸易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进出口。为了维持商业市场与商业运作，国民政府制定了单独对英的政策，即除英国之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政策不变。商务厅则制订了相应的计划，该计划书共 15 条，包括奖励商家运入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大米与燃料；鼓励和保护北江煤炭的开采；筹设生丝检查所，促进生丝直接外销；保护水上运输，设法增加轮船直接进出广州；改良货币，开办本省汇兑，畅通与上海的汇兑；组织公共货仓；设商品陈列所，开办商品展览会，登记商标；筹设消费合作公司和公会；保护国货以及修正公司条例，普及商业注册等。^[1]以上计划的重点是确保粮食、燃料供应。此外该厅所做的其他主要工作有引导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设立各级商民协会；设置保商卫航局，保护水道运输，撤销征收河道保护费，减轻商人负担以维护省内外贸易；又检查和取缔不合理的杂费等。至于部分较长远的规划则在其后几年中才得以逐步实施。

1926 年，广东商务厅改为实业厅。陈济棠主粤后，撤销实业厅，商业行政由建设厅第四科管理。此期间，根据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商会法、公司法、票据法、工会法等，组织整理各级商会、行业公会，整理商业注册和商标注册等。

陈济棠治粤期间，在工商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政策是大力发展省营工业，设省营产品推销处，对一些与广东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商品实行专卖制度。这些措施的最主要目的当然是开拓财源以增强陈氏集团的经济实力，进而扩充军事实力，从另一角度说，也是增强广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

能力，而对一些商品实施统制，如对食糖的统制，则是与发展省营工业相配套的措施。

1931年开始实行的食糖统制首先是提高洋糖的关税，使进口洋糖的成本提高而降低与土糖竞争的能力。其次是效法传统的食盐统制的做法，制定一系列政策以保证本省食糖的生产与销售。如规定由政府制糖，农民种蔗，商人运销。政府在广州、惠阳、揭阳等地设厂制糖，划定种蔗区域，糖厂周围30里农民所种的蔗只能卖给省营糖厂，不能卖给他人，也不得自行制糖，政府给予较优厚的价格收购甘蔗。蔗糖产品出厂，须向国货推销处糖业部领取出厂许可证，否则作私运论；对于舶来食糖，营运商必须向糖业部领取人口许可证，方准入口。领有许可证的糖须存入公仓，需要运销时，须领取运销证，才可以提取。糖商存糖必须登记，销售5斤以上须具发货单，否则作私糖论。选择信誉较好，实力较雄厚的10家糖业商店为全省糖业营运商，组织联合办事处，再由运销商在各地组织分销商负责推销事宜。

1932年制订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中，有“保护民营实业三年施政计划”的内容。省政府重点给予保护的民营工业主要是在国内外占有有一些市场的商品生产，如火柴、土制煤油、手电业、树胶（主要是制鞋业）。主要措施是提高同类的进口商品的关税；限制新厂的设立，规定各厂的生产额和产品的价格，避免或降低同业竞争造成的损失；各厂产品的制造、管理、运销受政府监督指挥。当年的这些措施曾经对民营工业起过保护性的作用，如对土制煤油业的政策

就是其中一例。

广东燃料进口历来被亚细亚、美孚、德士古三家外国煤油公司所控制。1930~1931年间，由于金价上涨，进口煤油价格高昂，土制煤油业趁时而兴，1年间新设立的炼油厂达160余间，遍及广东各地。但是由于柴油仍需向三家洋公司购入，这三家洋公司于是趁机提高油价，使土制煤油业立即陷入困境。随后有三家本地商人进口柴油，供给这些厂，土制煤油业才稍得复苏。而三家洋公司于1933年4月在广州白蜆壳设炼油厂，且降价与土制煤油竞争。初出产时每罐定价4.20元，比土制煤油便宜0.40元。土制煤油被迫随之降价，但毕竟实力不如洋公司，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于是，在油商的要求下，政府对炼制煤油的高度柴油的进口实行登记，规定“凡贩卖家购运特种柴油进口后，只限供给于已注册立案之制炼厂号，其未注册立案者不得售与，否则以私卖论。”^[20]不久，洋公司在广东设立的炼油厂也获得注册。于是竞争更是变本加厉，至10月份降至每罐2.80元。为保护土制煤油业，省政府规定给土制煤油予补助，每罐津贴1元，另外，进口的柴油每吨征收4元登记费，亦发还2元，以示优待。这样，土制煤油所受的压力得以缓和，与洋公司出产的煤油价格大致相平。至1935年，土制煤油基本上占据了广东的市场。次年，洋公司在广东的炼油厂只得停产，改为直接进口煤油与土制煤油竞争。

除上述各种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之外，广东省政府在这一阶段采取了一些扶持商业的政策，如废除了一批苛捐杂税、

奖励商人投资运输事业、倡导小城镇之间的商品交流、准许商人开采矿产以及扩大城市市场等等，这些措施对商业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政府官员仓皇北撤，负守土之责的党政军首脑人物全部被撤换。1939年1月省政府改组，为调整广东战时贸易，适应抗战的需要，根据中央指令设立广东省战时贸易管理处，由省政府直接管辖。设正副处长各1人，下设总务、营业、运输3组。其主要任务是统筹物资的运销，以稳定全省物资的供求，本地物品的输出，防止走私资敌等。营业范围包括主要土产及工业品的输出；经营商人不能充分供应的生活生产的必需品；办理商家或团体委托购买及运销的物品；办理仓库业务等。至是年底，该处确定了4条贸易路线，即曲江至香港、曲江到湖南长沙、曲江至三水芦苞、曲江至罗定。根据营运路线设立办事处和营运站。先后设立的有香港、老隆、芦苞、罗定办事处，沙鱼涌、淡水、惠阳、河源、老隆（后取消）、泗伦、禄步等营运站、购运所，并设一些仓库、车辆修理场等。

战时贸易管理处成立之初最紧急的任务是解决粤北米荒。因韶关定为战时省会，一时人员聚集，粮食供应极其紧张。该处动员全部车辆从江西、湖南紧急购运大米，部分供给驻韶关的团体，部分用以平抑市场价格。其后，该处集中力量于抢运沦陷区的物资。在仓皇北撤之时，大量的物资被主动破坏或遗弃，一些则被掩藏。这些物资大都为粤北所无，故需尽可能将这些物资抢运出来。另外，从沦陷区抢购

战略物资，也是该处的任务之一，特别是汽油、煤油、棉纱等。购运军事与工业用品、生活用品，主要是从香港、澳门采购燃料、电讯器材、交通器材、卫生医药用品、车辆以及与邻省的贸易事宜等。又举办省会公务员消费供应社，对公务员供应生活必需品。对桂类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所谓桂类产品，即西江一带的罗定、郁南、高要等地出产的桂皮、桂枝、桂油、桂花等，历来是广东大宗出口商品，每年经港澳运往国外的价值近 1000 万元。抗战初期，由于敌军封锁沿海，运输困难，一些不法商人便乘机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偷运出口。1940 年年底开始，对桂类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同时，省政府对一些重要物资实行专营制度，限制粮食以及生猪家禽等出口，颁布《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非常时期取缔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等一系列法令。

1941 年 10 月，成立广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贸易管理处并入该公司。其职能与战时贸易管理处大体相同，但其主要的工作并非是从事贸易管理，而是从事经营活动。其业务范围最主要的是进口机器、汽车、棉纱及电机器材等，出口中药药材，又以桂类产品为大宗。运输方面设有东江、北江、南雄 3 条运输线，配备车船，并在沿线设有仓库作为储存货物之用。

战时广东贸易管理混乱，主要体现在机构重叠，职权划分不清。如在广东的贸易管理机构很多，属于中央的有贸易委员会广东办事处、财政部广东货运稽查处、第四战区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物资收购处等，还有广东省银行信托部也

从事类似的贸易管理事宜。

随着战争的延绵持续，抗战后方的商品供应短缺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广东抗战后方与国外的商业贸易基本上中断，各种因素促使物价上涨。广东省政府根据中央的命令，于1942年底制定《广东省实施管制物价暂行办法》，开始对物价进行管制。最先进行价格管制的商品有粮食、盐、食用植物油（包括花生、茶籽、菜籽）、食糖、燃料（包括木柴、木炭、樟木油、酒精）、纸张6大类。后来扩展到棉花、棉纱、布。其后桐油、苧麻、茶叶等均被列为统制物资。除了规定上述物品的价格之外，相关的措施是对工资、运输价格以及房租、地租等，均实行价格管制。实施物价管制的地区为韶关、曲江、仁化、乐昌、南雄、始兴、连县、阳山、乳源、英德10县。其后，又制定了《广东省议价实施办法》，对未实施物价管制的县份，除沦陷区及敌我反复争夺的县份之外，一律实行议价。议价范围包括日用重要物品、工资、运费、租金。由各县市成立价格评议会，对本地的物价、工资、运费、租金等价格进行评定。价格一经评定，除非物价上涨或下降超过原定价格的30%，或经过3个月，生产成本有重大变动，才可以重新评定。凡是违反物价管制相关规定且情节严重的，可视为违反国家总动员法而受到惩处。

抗战胜利后，广东的商业政策特别是对外贸易管理政策曾不断更改，令商家无所适从。1946年3月4日，政府宣布开放外汇市场，订定汇率为一美元合法币2020元。指定

9家银行办理外汇事宜。商家凭海关进口签证，即可凭单向银行申请换外汇。推行《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将进口商品分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及禁止进口三大类。申请购买外汇，只需要证明进口商品属于前两类就可以了。但是，较大笔外汇的申请必须经上海中央银行外汇审核处审核，这样，多了个转折，一些商品申请时可以进口的，到结汇时却成了不准进口了。这种办法使商人和银行向黑市扒进港币，并为出口外汇开逃避之门。

由于入超巨大，外汇基金急剧减少，1946年11月17日，南京政府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将自由进口贸易废止，改为许可证制度。除禁止进口的商品外，进口商品一律改为许可输入，并实行输入限额分配制。对进口商家进行登记；由香港、澳门输入的商品，除生产器材及5种限额分配商品仍须报上海输管会审批外，普通货物在港币2000元以下，五金零件、建筑材料价值在港币5000元以下，肥田料、小麦面粉在港币6000元以下，可以向指定的银行申请输入许可证，并可以申请购买外汇，但一天只能申请一次，不得以一批货物向两家银行申请。1947年2月3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输出入临时管理委员会广州办事处正式成立，进出口商须经该会核准合格才可以从事进出口贸易。是时经核定的进口商家中，广州、九龙共573家，汕头129家，江门17家。输管会对进口贸易的限制更为严格，规定每位进口商每星期只准向指定的银行申请输入许可证一次。是月底，规定每星期申请的货物总值不得超过8000元，超过部分如属特殊需

要，须经上海输管总会审核。其后还有过数度变化。在此情况下，商家对办理新手续存观望态度，加上输入限额以及要送到上海审批，时间拖延，再加上2月份发生金融风潮，黑市外币价格飞涨，与官价外汇相差甚远。所定的港币人口结汇价也与市场价差距太远，结汇价每港元为法币3000元，而市价仅为2000元左右，相差1/3，进口商不愿向指定的银行申请购买外汇，愿冒风险的则从走私进货，其他则大多持观望态度。导致1947年1、2月份的进口额大幅度减少。

进口限制的政策必然会影响到出口，商家大都是进出口兼营，进口受限制，出口业务也就无法进展。加上金融动荡，成本高涨，出口贸易根本无利可图，而且风险大，于是大都情愿将资金转往香港，从事投机事业。鉴于进出口低迷，为了促进出口，政府曾采取给出口商补贴的办法。如1947年2月6日开始，施行新的出口结汇办法，规定根据出口商品的价格，在结汇时一律给予100%的补助费。可是，此项政策却引起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对中国输往美国的货物提高关税，于是这项政策只实行了10天，就匆匆取消了。至5月，在广东实行进出口货物抵消制度，即申请进口外汇必须以出口外汇抵消。

1947年7月开始，广东正式实施输入限额分配制。1947年9月16日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华南分会在广州成立，10月颁布《华南区进口商登记暂行办法》及《华南区工厂申请直接配给输入额登记暂行办法》，规定所有办理进口的商家、工厂都必须重新登记。为了能够取得所谓合格的资

格，各商家、工厂无不千方百计奔走活动，请律师，请通商各国驻广州的领事出具证明。有人估计，仅各种送礼应酬等等，平均每位厂商花费不下 400 元港币，以 3000 家计，总数不下 120 万港元。结果是，向该会申请登记的商家及工厂共 3000 家，获准合格的仅有 900 余家，不及申请的 1/3。也就是说，2000 多家白忙一场且花费了不小的一笔活动费，最后一无所获。其次，这次审查登记到 1948 年 2 月才公布，3 月中旬才将合格厂商的配额核算清楚，3 月下旬开始接受各厂商的输入申请，4 月初才陆续发放输入许可证。也就是说，从 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3 月足足 5 个月期间，按规定是不能进口货物的，因为没有输入许可证。大批依靠进口原材料的工厂势必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停工，但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各厂家、商家依靠走私进口维持运作。

输管制度实施以后，工商界全面窒息，自然引起了工商界厂家的强烈愤慨，他们认为输管会没有根据广东经济的特殊环境和厂商的实际需要，做机动的处理，甚至对一些不需要外汇和自筹外汇进口机器和原材料的急切的申请，也不敢审批。在进出口厂商资格的审批中，得到批准的大都是豪门资本和有各种关系的人物。另外，按照相关规定，未获得资格认定的厂家，不准经营进出口业务，不能进口其所需的机械与原材料，而走私进口又属非法，这无异迫使厂家关闭和破产。还有，由于进口配额数量太少，在分配配额过程中，官僚资本得到特别的照顾，而民营商家则完全处于劣势地位。钢铁进口配额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战后经营废钢铁进口有高达 50% 的利润，而进口这类钢铁的主要中转站是香港，不仅华南，就是华中的钢铁进口也大都经香港，且当时对这类进口物资并无任何限制。因此，不少商家将进口的钢铁存放在香港，等到有恰当的买主时再直接运入。在输管会华南分会成立之前，广州有两家进出口商就已经购有 8000 吨钢铁存放在香港。输管制度开始之后，这批钢铁按正常交税也不能进口。这两家商人向输管会呈诉，说明这批钢铁是在新政策推出前就已花巨款购入，而且接受了广州等地的一些工厂的订单，如果不准进口，不仅要遭受巨额损失，而且会失去信用，商号必然会濒于破产。另外还特别说明，目前工业和农业生产急需用钢铁，不予进口，影响极大。输管会广州分会认为商家的理由充足，便将商人的呈诉转呈上海输管总会。总会批复也认为这类钢铁有必要输入，可予商家配额，由广州输管分会酌情办理。然而，当时广州输管会内派系斗争激烈，江浙财团势力很大。此外，当时一些工厂和商人也在申请进口钢铁。更有些官僚机构，如广州市党部，也以经费困难，获上级党部的批准经营进口以解决经费困难，于是，围绕进口钢铁配额展开了一番背后的角逐。输管会主任朱晖日本来是想给商人配额，至此也不敢做主，最后由输管会会议讨论决定。会议讨论的结果大出人们意料，配额给了官僚垄断的公司，而且理由堂皇：既然进口钢铁是解决工农业生产器具之用，不如委托中国农械公司广州分公司办理，说该公司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于是，商人的所有努力全部付诸东流，除了市党部之

外，所有配额分给了该公司，而中国农械公司是宋子文家族为背景。

以进口钢铁的事件作为导火线，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反输管运动，广州市商会、市参议会及各工厂、公会联合起来，攻击输管会华南分会。该会主任委员、前第四军骁将朱晖日成为替罪羊，被迫下台，但取而代之的仍是大权在握的宋子文财团的人物。

1948年3月，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华南分会奉令改为空头机关，另设输管会广州办事处办理输管事务，继续接受进口厂商资格申请登记。但是，由于实行限额分配制度，每季分配给华南的进口额很少，商家、工厂皆急需进口，形成僧多粥少之势。

1949年6月，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终于被裁撤，配额制度也随之取消。财政部公布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采取加强外汇控制，将进出口挂钩的办法：将进出口货物分为准许进口、暂停进口、禁止进口、禁止出口4大类。规定出口商应将其输出商品所得外汇的20%（后改为10%）交给中央银行或其指定的银行，经审核后发给出口证明书。另80%（后改为90%）也交给中央银行或其指定的银行，换取等值的结汇证明书。

第二节 商业税收

在南京政府统一全国税制之前，广东的税制与全国各地

差不多，捐税沉重且混乱不堪。宣统年间遵照清廷度支部的规定，广东曾对全省财政收支状况做过详细调查，于宣统三年编成《广东财政说明书》，该书对当年广东的各种商业税记述详尽。对于广东捐税名目之多，有个很好的概括：“查各属收入款项，有同一货物而曰税、曰捐、曰饷，如鱼税之外有鱼厘、鱼饷，酒税之外有酒捐、酒甌捐，牛税之外有牛捐、牛单、屠牛捐，渡饷之外有船税、船捐、船饷，名目歧异，税率轻重亦各不同。甚或一邑之内，一物之征而税、捐、厘、饷皆备。大概加抽一次则另易一名。设立一名，则办公有费，挂号有费，给票有费，经征、催征有费。取之民者什百，归之官者什一……征收之时期不同，缴纳之处所不同，经征之人亦不同。吏役追呼于门，员友络绎于市，利归中饱，而民之被扰终岁无已时矣。”^{〔3〕}

民国初年广东的税收混乱与上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是民国初年广东政局混乱更甚于清末。如是时广东军队多，且相当是外来部队，而军费普遍不敷，只得借收取地方税收以维持，于是出现各地驻军与地方势力勾结，把持地方税收的现象，使省政府无法正常收税，财政因之短绌。直到陈济棠控制粤局之后，打破驻军与地方势力对税收的控制，改为承包商公开投标，由财政厅直接管理，另给驻防军一定的补助。

就商品流通与销售方面的捐税而言，在改收营业税之前，广东商业的主要税收是百货厘金，这里的“百货”是各种商品货物的总称。百货厘金分为坐厘和行厘两种收税方

式。坐厘是对坐贾，即向商店征收的税。征收方式一般是由厘务局核定各行业应缴纳的厘金总额，再由当地各行业内部较有资产势力的行头承包承缴。各商店缴交的数额一般按销售额多寡分摊。摆卖小贩、肩挑的游贩等小本经营者则免于征收。行厘是对行商征收的税，即是对货物运输过程中征收的税。民国初年广东全省设有专门征收行厘的厘厂 27 处，厘厂之下又有厘卡、厘哨等，分布于全省水陆运输的交通要道上，对来往的货物征收厘金，征收金额一般是按货价每两银抽 2 分。

按规定，行厘的征收方式是，货物在运输行程中，经过第一个厘厂时缴交厘金，在经过第二个厘厂或厘卡厘哨时查验，其后无论行经多少厘厂，都不必再交费。但事实是，逢关有税，遇卡抽厘。从连江口柴船交纳捐税情况的调查报告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略窥一二：

从连江口运柴往广州销售，每条船只沿途要缴交的捐税有：1. 连江口缉私卫商费 13.5 元。2. 连江口民团费 3.4 元。3. 连江口巡查费 4.4 元。4. 连江口送帮茶费 0.8 元。5. 大樟口民团费 0.4 元。6. 黎洞查验费 0.6 元。7. 大庙峡民团费 0.4 元。8. 横石缉私卫商费 9.65 元。9. 横石民团费两次共 2.4 元。10. 横石送帮茶费 3.4 元。11. 黄洞民团费四次共 5.2 元。12. 白鹤汛民团费 1.2 元。13. 白庙送帮茶费 1.2 元。14. 清远缉私卫商费 13 元。15. 清远警察费 1.8 元。16. 石角缉私卫商费 1.6 元。17. 大塘三军九师廿七团护航队 8.6 元。18. 芦苞缉私卫商费 8.4 元。19. 芦

苞过关费 17.4 元。20. 芦苞专利火船费 38 元。21. 马房至河口民团费六次共 7.2 元。22. 马口柴捐 30 元左右（视所载柴数量而定）。23. 河口过关费 22.2 元。24. 河口检查公债票费 10 元。25. 河口警察费 0.6 元。26. 河口海安公司 1.8 元。27. 河口至西南专利公司 4 元。28. 河口清沙费 0.6 元。29. 西南缉私卫商费 9.15 元。30. 西南洲尾出口费 18 元。31. 西南至广州拖旅费 100 元。以上 31 处共征收 336.9 元。柴船空船从广州回船到连江口，沿途还要在 24 处交费，共 169.2 元。^[4]

以上是 1926 年的调查报告。广州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柴炭，主要来自北江和西江一带，沿江的捐税之多之重，非常人所能想像，广州柴价由此居高不下，长期保持在每元 60 斤左右。柴商因不堪名目繁多的抽剥，告状到省政府，政府派人调查，撤销沿江的关卡，减少了部分税收，加上水上匪盗经多次清剿而有所减少，至 1928 年，柴市有所好转，大体上维持在每元一百斤左右。

广东的税收，除了国税外（如关税、盐税、铁路专税等），省税的不少项目是由商人承办，这是广东在征收捐税方面很特别的地方。承包方式很多，就时间而言，可分为有期限和无期限两种。就地域而言，或承包一州、一府、一县，或几个县，或某一特定地区。就承包者面分，既有一人承包，也有几人共同承包，也有一人承包后，再分给若干其他商人，或以更高的价格转包给其他人。坐厘的征收，多半实行招商承办，“包抽厘金，包缴认饷”。即某项货物的厘

金，由某商人负责承包，先由商人与财政厅议定固定承包额，由他们派人到各地根据承包章程所定的条款征收，征收章程是承包商自行拟定的，交财政厅核准施行。除了定期缴交议定的数额，实际抽征的厘金余额，无论多少，均归承包商所有。行业厘金承包多半由本行业有势力的商人或公司、同业公会承包。除了行业货物厘金承包外，还有地域厘金承包、厘厂厘卡承包等，名目繁多。

厘金对商业的损害已饱受诟病，而将厘金再行承包，对广东商业带来的损害可谓雪上加霜。首先，承包者获得承包权后，又往往以更高的价格再包给别人，获得承包者无不想方设法搜刮，借官方的势力鱼肉百姓。如东莞金鳌厘卡，该卡为水上运输要道之一，平日来往民船不少。按以往规定，东莞本地往广州的轮渡不抽厘；陈村、佛山各地货物运往东莞不抽厘。来往船只一般只交查验费，数额从数毫至10元不等，这些措施对当地的工商业有保护的目地，对商业运输也提供了方便。1921年承包给某人后，无论外地本地来往的船只，一律查点货物，征收厘金，“导致莞城各渡不敢运输”，“市廛空虚，几以歇闭”，引发商民不满，告到县政府。^[5]其次，承包捐税的做法，使广东的税收大约有一半进了承包人和与之有关系的人的私囊。据有关人士估计，每年广东捐税归入私囊的数额大约在5000万元以上，与广东省每年的捐税收人大体相当。1929年，国民党政府拟裁撤厘金，有人认为，裁撤厘金每年将使国家少收9000万元的税收，但厘金办理人员的勒索，每年便使国家损失18000万元

以上。

承包捐税的做法也使广东实业发展受到阻碍。凡能够获得某项承包的人，都是与主管机关或某某要人有关系，承包后获取的利润要分摊，才能够取得承包权。如某师长写信介绍某人承包一项小捐务，一年之内，得到10万元的酬谢，他用这笔钱在东山新河浦建一座豪宅。又如广东著名的大赌商、大烟商霍芝庭承包烟赌捐务多年，获利数以千万计，某年大年初一到陈济棠宠妾莫秀英处拜年，给莫秀英的儿女们每人一封“利是”，每封内均是一张10万元的支票，^[6]这次红包总数达100多万元。人称广东的捐税承包是最黑暗的买卖，主管者与承包商之间的相互勾结自不待言，承包商之间相互倾轧，更是司空见惯。不论委办与商承，凡是钻营得到一些捐务，一定大获厚利，所以一般资本家，能结识官场的，都莫不视为获利的捷径。因此，广东有资本的人，大都想方设法承揽捐务，而不肯将钱投资实业，这也是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

30年代之前，广东政局动荡，战事不断，外省军队你来我往，使广东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作为财政收入重要一环的商业税也不断加重。以生丝的捐税为例。广东生丝出口，都是从农村运到广州再出口，这一过程需要交付的捐税有进口税和出口税两大类。所谓进口税，即生丝进入广州所收的税，分为广州西税、厘金、台炮经费等。出口税即从广州运往外国时所征收的税，包括关税和内地税。从1920年至1928年数年之间，因各种名目的加征加抽，上述税全部大

幅度提升。如厘金 1919 年每百斤征收洋银为 6 元 8 毫 5 文，至 1928 年为 17 元 1 毫 9 仙。台炮经费，1919 年每百斤仅征收银元 5 元 1 毫 4 文，至 1928 年升至 10 元 3 毫 6 仙 5 文。其他各税也大都翻了一番。1928 年粤海关华洋贸易报告中说：是年“生丝出口，增多 4%……鉴于近年来丝业所受种种困厄，而本年成绩犹能若此，洵堪令人注意也。本省有等丝厂，开设已有 10 年之久，现因税捐过重，停止营业者，其数占 1/3。因生丝一物，例为奢侈品，是以每担抽大洋 100 元；而在上海，每担不过抽收 30 元耳。”¹⁷

1931 年元旦，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厘金制度，改收营业税。营业税之外，另有印花税、盐税等。广东征收营业税以资本总额、营业总收额、营业纯收入、报酬金额 4 种为课税标准，但侧重于资本额课税，课税范围共分 32 个行业。由于商业营业税属于地方收入，更主要的是在此后的数年期间，广东与南京政府的关系相当微妙，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因此，虽然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陆续全面推行税制改革，而广东省政府却一直以各种名义推迟实行新的商业政策，虽然国民政府财政部多次催促，广东也只是在少数地区试办而已。是年 9 月 1 日开始，先在广州市举办。次年设广州市营业税局，新会、开平、台山合设一局，南海、三水、番禺合为一局，中山、汕头则独设一局。其他地区并未实施新税制。是时，陈济棠政府正力图推行新政，实施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对于怨声载道的厘金制度，也不能不做出改革的姿态，故废除苛捐杂税作为三年施政计划的

一部分。广东所撤销的厘金，首先裁撤的是行厘，坐厘并未同时废除。从1932年陈济棠第一次巡视东江，至1934年，仅省当局下令裁撤的苛捐杂税就有296种，尚不包括各县自行撤销的捐税。^[8]但这只是多如牛毛的税收的一部分。1936年陈济棠下台，政归中央，广东省才正式实施税收统一。对课税范围进行规范，合并为25个行业，以营业额为课税标准。1937年调整课税机关，将全省划为8个税务区，在广州、汕头、江门、惠阳、韶关、高要、梅县、海口各设一税务局，将原有的营业税局并入。1938年7月，又将上述税务局全部取消，改设各县市税务局，负责征收本县市的税收。

省政府迁粤北之后，按照规定设直接税局，下分粤东、粤西、粤南、粤北和粤中五个分局。1941年各县市均设直接税分局，次年又改称广东省税务管理局。管理范围除了营业税、印花税等原有的税项之外，还负责货物运输的检查和货税的征收。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便陷入持续不断的内战中，国统区经济恶化，商业全面萎缩。但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支持内战，又不得不加紧搜括。修路要钱，征兵要钱，救济要钱，义警要钱，各式各样的临时摊派要钱，而这些钱相当部分是依靠向商人榨取，还有各种名义的义捐等，商界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广州市商界曾因此发生以“打倒”商会理事长为号召，实则发泄愤怒的“倒何运动”。

广州市理事长何辑屏是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广州

市参议员，又是国大代表，参加各式会议，在这些场合中，当权者为着应付“戡乱建国”的宣传场面，动辄要参加者当场表态输捐。何氏为了配合当权者，不得不处处以身作则，口头认捐，且数日颇巨。这些捐款当然都分摊给下属各行业公会。然而，何氏所控制的大都是较小的同业公会，拿不出多少钱，与邹殿邦一派控制的盐业、钱业、米业、花纱、土布业、参茸药材业，实力相去甚远，而且经营艰难。于是该派内部的商人认为何氏没有为商人谋利益，支持何氏登上理事长宝座的一批得力干将反过来发动内讧，与反对派共同发起“倒何运动”，公开喊出“打倒”的口号，并列举何氏的6大罪状，主要有：借理事长的地位，以经营私人商业；对一切捐税问题，多不站在商人立场讲话；对于输入配额的请求，未能尽力为商民力争；不时以种种名义，向商界进行捐款，以巴结权贵，等等。这次内讧由于当局的干预很快就平息下去，省市当局以“戡乱建国”非常时期需要稳定现状，而何氏又“一切均能配合政府推行”为由，将这场风波平息。^[9]从这件事可以略见是时商界所遭受的来自苛捐杂税的压力。其后还发生一件影响不小的事，就是广州市进出口商会理事长何雅各跳楼自杀。此人与何辑屏是华南输管会的成员，代表广州市商界的利益。其自杀的原因之一是承受不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以一死求解脱。

进入1948年之后，省财政更加困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不断调整税率。货物税收每月公布一次新税价，是年各项税目，都先后调整达10多次。如调整比较少的筵席

捐，从1月至11月，共调整了7次，每次均提高1倍以上。11月16日再调整1次，税额照此日之前的基础上再增加10倍。还有各地为了“戡乱建国”而普遍开征“自卫特捐”、“戡乱费”、“救济费”等等，可以说是当政者败逃前的最后搜刮。

第三节 商业经营

广东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方而起过领头和示范的作用。商业方面也是如此。鸦片战争之后，海禁大开，赴海外开拓谋生成为广东人的一种风气，这些海外赤子有部分是从从事商业活动，在长期与外国商业界的交往中，逐渐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并应用于本地的商业活动中。进入民国之后，广东商业逐渐形成新式商业与传统商业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受西方新式商业管理经营方式的影响，民国期间广东的商业大都逐渐摆脱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向股份制公司的模式转化。通常是由参与者集资认股，设立股东会议决定该店号的经营方式、经营项目、股东与管理者的权利职责划分、利润分配等重要事项，而经营权则委托给另选的管理者。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新式的百货商店的开设，并在广东以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东最早以公司形式经营的较大型的百货公司是1907年开业的光商公司，以及1910年开业的真光公司。但具有领先意义和巨大影响力的则是先施公司和

大新公司。

先施公司和大新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成。其资本来源大多是从华侨中募集，部分是在当地公开招股，设董事会、经理部、商品部等职能部门（如大新公司西堤分公司于董事会之外，设有司理，即总代办，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另有部门经理、总办货，以及店员、打杂等等）。对于所用职员也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但是有别于传统商店之处很多，如出售的货物一律标明价格。而当时几乎所有商店都没有将商品标明价格，都是售货员与顾客讨价还价。购买货物不论多少，一律开具收据。使用女售货员。雇员除获取固定薪酬之外，公司还负责食宿，星期日休假。^[10]公司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个人营业额的多少作为职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公司还专门聘请有法律顾问。以上这些，都是当时国内商业界的创举，都对于广东乃至全国的商业经营模式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这些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在当时都是别开生面的，被商业界视为异端，以致公司在招聘员工时，经营洋杂货的老手都不肯应聘。

另一种方式是投资者直接管理经营，占股份半数以上的人担任最高管理者。举凡资金的运用、店员的聘任，货物的购买销售、制定价格甚至债权债务等，均由投资者掌握。据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 1934 年的调查，广州市众多的合股商店多半采取这一管理模式。这类商店一般由司理、买卖手、掌柜、打杂、后生、伙夫组成。司理一般由占有最大股份者担任，其余合伙者当副司理。对于人员的组成、聘任、职责

等大事，或由正司理决定，或集体决定，大体上视乎股份占有情况和最初的约定而有所分别。副司理一般兼掌柜，兼管交际、收账、账目管理等。买卖手、打杂等多聘用外人。当然，因经营规模大小，各行业运作差别等因素有所不同，上述只是大体而言。这类商店在经营上，虽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但新式商业的色彩越来越明显。大批的经营进口产品的商店成为洋行的基本客户，代销洋杂货、油脂类产品，从购销差价中赚取商业利润。

上述商业管理模式中的一些具体运作情况，从土布业可略见一二：土布业是广东的一个大行业，传统的土布织造是农家自纺自织自销，进入民国之后，广州才有机织的纺织厂，才逐渐产生专营土布的商家。就广州市而言，因花色品种选择等原因，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土布的零售商并非向厂家进货，而是向土布批发商订购。土布批发商店集中于上九路一带，该地成为广东土布的重心，也是桂、赣、湘等土布客商光顾的地方。这些土布商店的组织情况大多为合伙生意，每店设司理 1 人，多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担任，统管全店事务，月薪约 40 元（大约的数字，抗战前的工资。下同）。司库 1 人，管理现金出入，月薪 20 元，也有由司理兼管。买货手 1 人，负责到各厂购货，责任重要，月薪 30 元。出江 1 人，负责向客户收账及推销，月薪 20 余元。卖货手 2 人，负责招待客人及议价，月薪 20 余元。司账 2 人，管理账册，月薪 20 元。什工 2~3 人，伙头 1 人，任送货、打杂伙食之责，月薪约 7~8 元。全店合计约 12~13 人。员工除月薪之

外，年终还可分红。

民国时期广东商业虽然受西方的商业管理经营模式的影响，总体上逐渐改变，但传统的商业经营方式依旧大量存在。据1928年4月的统计，广州市商店将近34000间，而从业人员仅为67000余人，每间店不过两人，可知小本经营的商业仍占重要地位。“夫妻店”和家庭式的小商店仍相当普遍。许多商业，特别是工商结合的商店，前店后厂的经营形式仍很普遍。如广东的米店大都有兼制酒出售的传统（一些小城镇的米店还养猪），所卖的酒大都是用米酿制，米市不好时，用于酿酒，可以减少损失。1933年广东省工业试验所对广州和佛山被认为营业额较多、较有名的酿酒店进行调查，这些店都是以卖米为主，酿酒为副业。店后的工场里，一两个师傅带几名助手，以米作原料，数十年如一日，每天自早至晚酿制“双蒸酒”等种类的米酒，其管理和经营方式完全是旧式的。^[1]这种自制自卖，前店后厂的经营店铺在诸如制鞋业、肥皂业、土制煤油业等行业中，民国期间一直大量存在。

前店后厂小商品自产自销的形式之外，民国年间还大量存在的是与高利贷的封建资本相结合的商业，以剥削农民和小生产者而赚取利润的旧商业经营方式。其中纸商的经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广东土纸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北江一带，广州和佛山的商人在韶关、南雄、始兴等地开设纸店收购土纸，再运到广州出售给纸行。当地制纸的农户每年立夏前砍竹，因为要请工人和购买石灰等，几乎每年都要向纸店借

贷。纸商借款给农户，或全部现金，或一半现金一半粮食杂货，贷款的利息为3分，到时以纸抵还。纸农借贷之后，所产的纸只能卖给该纸商，如纸商对交来的纸不满意，则农户须将纸存放于该纸商店内，再另找买主。这样，农户的纸就完全被纸商控制，而纸商之间又互相串通，故意压价。然而，北江的纸商也有自己的苦衷。其中之一是收到的纸运到广州、佛山卖给纸行，至少要10多天以至数月，卖出后按惯例还要15天以后才能拿到钱，因为周转困难，300元资本只能做100元的生意，常常不得不向纸行借钱，付8厘的月息。^[12]广东土纸业在20年代之后生存艰难，除了制造技术落后之外，价格长期企高不下影响销路，也是一个原因，而造成价格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沉重的高利贷也有很大的关系。

与土纸业经营相似的行业不少。如粤西、南路是广东食油的主要生产基地，以出产花生油为主。该地油业经营也完全是传统的方式。油商每年向榨油行贷款，或预先接受榨油行的“抛沽”，即预先商定油价，按照此价钱先付一笔钱给榨油行。油生产出来之后，油商按约定前去收花生油，不管当时市场价格或高或低，都按预先约定的价格收买。这样一来，如果当年花生歉收，花生价格远远高出原先的预期，经营榨油行的只有破产。故当地的油商老于世故，操纵市场，而榨油行的经营者则随聚随散，从而影响了粤西和南路的油业与外来食油的竞争能力。

各行业组织、管理形式有所不同，但在经营形式上却有

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是受传统经营习惯的影响。如上述纸商行、油商行的预先将资金贷放给客户，在收到货品时扣除，这种方式称为“栏信”，即各种从事批发生意的栏、行为了竞争，广事招徕，采取这种贷款的方式。贷款的时间长短，利息的高低，由双方商定。也有一些是无息贷款的，但都限于来源紧俏、竞争激烈的商品。“栏信”多半带有浓厚的高利贷色彩，是旧式商业中常见的经营方式，经营者多半是富商，集地主、官僚、高利贷者于一身。一些传统的行业，如上述的纸业、油业、水果业、蔗糖业、鱼业中较常见。比如广州的竹木店大多集中于泰康路。该地的商店大多与粤北的一些山区农户有长期的信贷关系，每年定期向自己的客户贷款。每年竹木收获的季节，便组织人马，几十人，甚至百来号人成群结队地前往粤北山区砍竹伐木，运回广州。

广东商业界最普遍的经营方式是“赊销”，也可以说是广东商业界的普遍风气。潮汕地区有“无赊不成商”的谚语。批发商与零售商，批发商与生产者，零售商与顾客之间，都多半实行“赊销”的方式。即顾客前来购货时可以赊欠，先将货物赊给对方，按约定的时间清还货款。或先交部分现金，剩余的按约定的日期交款。如果是现金交易，则多半有“退九九”或“退九八”的行规。^[13] 赊期在各地和各行业有所不同。有5天一结，有10天半月一结，甚至一个月或一个季度结算一次。也有以传统的节日如端午、中秋、冬至作为结算周期。如广州纸商收购北江来纸，都是按例由纸店运货前来，验收货物后15天才结算付款。但广州纸商将

纸批发给外地商家，则有所不同，由买货的店号开列购货清单，说明交货地点，纸商接单办货，寄往指定地点。收货后如认为货物成色不好，或有其他问题，可以向纸商函询，在结算时将原定的货价略为折扣。结算时间，远道的顾客，如香港、澳门的顾客一般是一年结算一次，而广州附近的顾客则分数次，即在传统的节日分开结算。是时一般由店主亲自前往各处收账，一来与老顾客联络感情，二来结识新客户，拓展新业务，同时还有顺便了解外地市场情况的目的。在店主无法外出的情况下，才另派亲信前去收款。大体来说，像土纸这种存放时间长，不易变质的货物，才有较长的赊账期，而普通消费品，如米谷、蔬菜、瓜果等的赊欠期都不会很长。

米粮业的经营也有相似之处。以米糠行的销售方式为例。广州米糠行将米批发给零售商，一般都是先赊账，将米谷货给对方，交款日期并没有限制，但多半是20天或半个月交款。而且是对买卖手信用，即对前来直接办事的人信用，而不是对店家信用。批发数量一次最少10包（每包170斤），按期交款，则交款时按九九折收钱；逾期交款，则要加收，加收多少视拖欠时间而定。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资金周转困难的商家很多，超期不能清款，呆账的现象也必然会多一些。作为应变措施，米糠行随之改变信用期限和对象，除了对买卖手信用外，还要求对商店信用。清款期限也一般缩减到7天。7天内结账九九折，7天之外则没有折扣。18天后仍不结账，则认为有意拖欠，在同业公会内

公布其姓名。如再不清结，则全行立即与其断绝交易。米糠行公会定期派人到各店检查账簿，如发现有过期不结账的买客，而店家不将其公示，或虽经公示断绝交易的顾客，仍然与其往来者，则罚款 10 元。

在经济萧条，商业不景气的年代，如 30 年代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民众购买力薄弱，赊销的商场习惯也被迫改变。如江门市场，作为货物的重要中转地，该市市场以栏家为多，米谷栏、果栏、猪栏、京果海味栏等都是江门的大行头，以对外地客商批发为主要业务，多属较大批的买卖，为了竞争，赊销是该地商场的主要经营方式。在 30 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各地的商家破产倒闭的不计其数，不但无法按期清账，根本上就是没钱可还。由此连累了该市的商家，欠账数万元的为数不少，他们本来资本就不多，至此资金无法周转，虽然账面上还有大笔资金，实际上濒临破产，故当地商场有“纸上富贵”的戏谑。又如台山县，该县美洲华侨众多，是个号称富足的县份。在经济危机期间，美洲国家限制华侨汇款，侨汇大幅减少，市场资金短绌，商店纷纷倒闭。该地商人商议对策，一些地区由商会出面，颁布禁止记账赊销的条例，规定本地的商场商店，门市生意无论批发零售，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原则，不准徇情赊欠。店与店之间凭记账取货的，一律于一个月内存清账，违反者要受到处罚。潮汕商界赊欠成风，形式多样，但一场大战将一切都改变了。抗日战争使该地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挫伤，战后民生凋敝，民情也随之大变，以前的赊销几成陈迹，商业往来，一

经议定，必须先交一二成定金，收款人则必须出具单据。

“栏信”、“赊销”之外，广东商业界盛行的另一种传统经营习惯是佣金制，特别是大买卖的批发商业。生产者与批发商之间通常是采用这种方式。生产者将货物悉数交给批发商，批发商代其销售，价格高低与批发商无关，批发商只收取佣金。

经营茶叶的批发商，其经营方式类似于平码行，只收取佣金。茶叶户来货，收取4%的佣金。售给零售商基本上是赊销，当时结算付款的很少。如果不是立即付款，则按约定日期结账。一般是1个月为期，每次赊销至少在100斤以上。1个月结账的，照例给双重回扣。即先给4%回扣，结账时再给1%，俗称九六折再加九九折，另外还有1%的秤头。2个月结算的，则不给1%的回扣。3个月结算的则只给3%的回扣。

佣金制度在农产品行业中极为普遍，特别是容易损坏和霉烂的物品，如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损失，故多半交给批发商。这类批发商长期经营，在固定的集市中有相对稳定的客户，对推销产品更为有利。如水果栏交易，有大栏小栏之称，大栏即批发商，是代生产者将产品推销，收取佣金。小栏即零售商，又称拆栏。广州的水果批发市场集中于一德路永安约和增沙蔗栏一带。大栏代生产者售货，只收佣金，价格高低与其无关。其佣金的体现方式是：货物售出后交钱给生产者时，按九五折再加九七折计算。如货物卖出后实得100两银，九五折为95两，再九七折则为92.15两。还要

扣除银毫补水以及交税，到生产者手里约为 89 两银。除此之外。因为水果容易损坏和霉烂等原因，生产者将水果交给栏家时，不同的水果在过秤时还要打折扣。如南华李 130 斤算 1 担，糯米荔枝、龙牙蕉 104 斤为一担，黑叶荔枝、酸橙 110 斤为一担。这是通常的情况，因为水果收成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有大年小年之分，气候条件好，水果丰收，折扣自然要高得多。反之则价格高，折扣低。小栏与大栏的交易，则一般以九五折再九八五折计算。如小栏按货价本应交 100 两银，以上折扣后只需交 93.575 两银（未扣除银毫补水）。^[14]

畜产品的贸易与水果蔬菜交易相似。据 1930 年的调查，广州市平均每天杀猪 1300 余头（供食用而屠宰的牛平均每天只有 121 头，羊仅有 18 头），本地猪之外，东江猪集中于元运中约，西江、北江及南路猪集中于六二三路金利大街一带。每天清晨 4 时左右开市，八九点钟收市。栏家也是代卖收佣金性质，对客户包收包结。以净重九五折计算货价，结算银钱时再以九八二折计算。^[15] 运费、猪粮以及雇用人工的费用等另外按惯例计算。

商业习惯与经营行业而异，多半是长期形成的，一些行业的习惯近乎“陋习”。如饭店茶室的习惯与其他行业大不相同。该行业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职工除工资之外，还有所谓的“下澜”^[16] 费。顾客消费的店里自制的饮料、瓜、果、芥酱等收入，归店员所有。每日收入必须除去这部分，才是每日实际的营业额。店员的工资很低。以 1926 年饭店

工人为例，候锅工和生砧板工每月只有 12 元，熟砧板工 10 元，堂上 8 元，煮饭 6 元，打杂 2 元。从民国元年至 1926 年的 15 年时间里，广州市的物价指数上涨了 71.8%，这些人的工资却从未提高过。而同时期，广州市打扫街巷的工人的工资也从民国元年的每月 6 元提高到 9 元，打扫马路的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月 10 元。但实际上，饭店工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下澜”收入，一般都高出工资的数倍。一个管楼面的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六元，而实际收入可达八九十元。这种行业习惯使员工免不了会在额外收益方面下工夫，从而影响了正常的营业。

进出口贸易的经营。由于广东与港澳毗邻，金融方面又与香港有密切联系，故广东的对外贸易机构与他省不同，与港澳有密切的联系。据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的调查，1933 年香港的办庄约 200 余家，广州有专办进出口的办庄仅 20 余家；另外，制造业厂商和大商店兼办进出口的，也有数十家。是时正是广东进出口贸易的低潮时期，但从数字上也反映出广东在进出口方面对香港的依赖性。到 1937 年，广州有办庄 30 余家，经营进口的商家约有 100 多家，专营出口的商家也大约有 100 多家（抗战后经营进出口的商家增至 400 多家）。

商品进口方面：进口商多兼营批发与门市零售。进口方式分为直接向外洋订购、向在香港和广东的中国办庄订购以及在港粤的外国洋行订购 3 种。由于进口商对国外的情况不熟悉，与国外厂商缺乏联络，故不经中间商而直接向外洋订

购的比较少。而从国内其他省市进口商品，则多半是由进口商自行办货或设在当地的办庄代办。如广东的纱商早期经营的棉纱以洋纱为多，20年代之后则以进口沪纱为主。需要购进棉纱时，纱商直接与上海纱厂联系，将纱价、运费、手续费等通过银行汇寄，纱厂接到汇票之后，即按办货清单将货付船寄发。只有商业往来时间长、信誉好的老顾客，才可能先办货寄发，后寄汇票。但一般在一两个月之内应将款项汇寄，不能超过3个月。进口洋货，则大部分是由办庄和外国洋行等中间商代购。

国人自设的办庄专代客商选办洋货及推销土产。办庄的总号大都设在香港或国外，广东各主要城市设分号或联号。专门经营某一种商品的多称为“行”，如海味行、参茸行。专门与某国或某地贸易的多称为“庄”，如与南洋贸易的“南洋庄”，与美国贸易的“金山庄”。另外还有“杂货庄”、“丝庄”、“茶庄”、“珠宝玉石庄”等。一些进出口商在国内外大都有固定的主顾。1937年经办庄代购的进口货物约值2500余万元，其中洋米进口占了绝大部分，约为2000万元，其余主要是参茸、海味、洋纸、木材等。托办庄购货，普通给佣金1%，也有以货物差价的形式支付佣金。

经洋行采购，可分为直接向洋行购买和委托洋行代购两种。清末民初粤商对国外商情不了解，故直接向洋行采购的形式最为普遍。洋行犹如批发商，预先从国外厂商中购运货物到广东，再出售给广东的进口商，运费、关税等都由洋行自办。洋行多半居间操纵，牟取暴利。随着国人对外情的逐

渐了解，直接向洋行采购的商品仅限于国外厂商设在广东的洋行，如煤油、汽油之类。其他洋行仅居中间人的地位，代进口商撮合，向外洋订货，获取大约 2% 的佣金，其余手续由进口商自理。抗战前，广州进口的颜料染料、罐头食品、机器、电器用具、钢铁、煤、洋布，完全由洋行代购。洋纸、木材、西药、化学原料等，则大部分由洋行代购，再加上直接向洋行购人的煤油、汽油等，总计经洋行进口的商品约占进口总值的 70%。至于直接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则占很小的一部分。

进口结算方式：经营进口的商家一般都是与较熟的洋行或办庄做交易，除了对进口货物更为放心之外，于资金上能得到更多的通融。如果是长期客户，双方合作愉快，在托洋行或办庄办货进口时，则只需向他们提交货物清单，不必预先交清货款，甚至不必交款，更不必担保。洋行或办庄根据购货清单电告国外厂商办货运来。假若与洋行、办庄平素没有交易，或是信誉不佳，洋行、办庄便会要求预先交清款项，或交部分货价，另外以抵押品做担保。委托香港的办庄或洋行办货，手续也大体相同。货物付运后，办庄或洋行将提货单寄给进口商，货物运抵后港方另派人前来取款，或由进口商在香港的联号代付。因此，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商家才委托不相熟的办庄和洋行办理货物进口。不过，广东商界历来极注重信誉，能通融则通融，要客户交抵押品的绝少。

以上为普通商品进出口贸易的方式。民国期间广东进口

最大宗的货物是洋米谷和国产米谷，贸易方式则不同。广东进口的洋米主要来自越南、泰国、缅甸等国。这些国家有不少经营米谷出口的米行，他们向当地农户收购稻谷后，碾成白米，运到香港发售。向中国出口米谷的商家在香港设有米行，每日两次开市。香港南北行街、米街是华南洋米运销中心。广东办理进口洋米的米糠行在香港也都设有支号，并有专门的买手，每日派人到米行竞投。一般情况下，买手们共同推举一人与米行的卖手议价，商议成交后，即为各买家的统一价，而米行大都是在原货价的基础上加 2% 的价格卖出。各买家在议定的统一价格基础上，如对货物不十分满意，可以单独与卖手再讲价钱，请求减低成价一毫或数仙，称为“讲古”。“买手之杰出者，每以能多量‘讲古’为能手。盖成盆则众人一致，而‘讲古’则各逞才能。”^[17]成交之后，在海上交货，将米谷卸下木船（广东人通称为米舢，每艘约载重三四千包，由小火轮拖运）运入。交货之后，米行开列发货单，买手随即将发货单寄回。商号接到货单后，7 天内将款汇香港结账。购买洋米另有一种是期货交易，即米尚未运抵香港，米行先将货物开盘发卖，只标明大米商标、船名。这种交易是凭信用交易。

民国年间广东进口洋米绝大部分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销售。运输方式约 80% 是用米舢运入，约 20% 搭附香港至广州的客轮运入，经广九铁路运入的几乎没有。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木船极多，可以直接到香港一带海上接运洋米，也可以直接运到珠江三角洲各地，运输方便，

运输价格也很便宜，每担大米运价一般是 0.12 元，^[18] 而轮船搭运，每包为 2 元。每担洋米抽关税 1.728 元（洋米开征关税之初每担为 1 元，经三次加二后为此数字）。

国产大米的采购与洋米不同。在粤汉铁路开通之前，只能依赖海上运输，故米谷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芜湖米为多，其他各省的米则集中于上海采购。广东人在芜湖设有办庄，专门从事米谷的收购。广东较大规模的米商也在上海设有坐庄，这些从事米谷生意的人被称为“广帮”。芜湖的办庄都在上海物色了一家商号，代其办理货物接驳、汇款等手续。当广东方面需要购买米谷时，将拟购的品种、数量电告办庄。办庄采办到足够数额后，即托上海的商号向太古、怡和或招商局等公司订雇轮船，议定运载数量、装货与抵达日期、价格等（每艘轮船约装载二三万包，由芜湖直接运到广州白鹅潭，每百斤运费约 0.35~0.4 元）。货价先由办庄向银行或钱庄按揭，随即将汇票发给上海的代办商号，由商号将钱交给联号的银行或钱庄。广东米商则须在约定期间将款汇还给上海的商号。进口的国产米多半为未碾的稻谷。广东进口的国产米最主要的销路是潮汕地区。

商品出口方面：抗战前广州专营土产出口的商家也约有 100 多家。商品出口的方式也可分为直接出口、售与办庄及售与洋行 3 种。1937 年前后由广州直接出口纱绸只占 42%，其中部分属邮寄出口，部分是由出口商自办经营，在四乡收购纱绸，再经晒焙、染色加工、包装，直接运到南洋出售，不必经过中间商。另外，草席的 10% 也是由出口商直接从

生产者和小商人中购人，装运出口。这部分主要是粤西、南路的草席，直接运到南洋出售。由生产者直接卖给办庄或洋行出口的货物主要是草席和爆竹，也多半输往南洋一带，占出口总值的小部分。而牛皮、纱绸、蔬菜、鲜果、桐油、鸡鸭毛、土纸、锡等，则由出口商向生产者和小商贩收购再出口。

广州、江门、汕头等城市均有不少国外或香港联号的办庄。办庄经营，皆有相对固定的进货客户和销售客户。如国外某客户要购买某种商品，向该地的联号订约，先将货价、运费、手续费等汇来，办庄接到汇票后，才接单办货，付船寄出。办庄所得的利润是购销之间的差价和佣金。经办庄出口的货物多销往香港、南洋、美国等地，主要供当地华人华侨消费。如干鲜蔬菜、干鲜果品、中药药材、土纸、爆竹、木材，基本上都是售与香港办庄。这部分物品部分在香港销售，其余由香港办庄办理出口，输入美国、南洋等华侨较多的地区。此外，纱绸、桐油、鸡鸭毛也大都售与办庄。生丝出口，传统的做法是丝厂委托出口丝商代售，厂方付给1.5%的佣金。但抗战之后，生丝出口受统制，由贸易委员会广州办事处收购，再售与沙面的洋行。钨、锑等矿产，原来也是售与洋行为主，自从实施政府统制之后，均由政府收购，再售给香港或沙面的洋行。其中产自江西、湖南的钨砂，产自湖南的锑，均直接运往香港销售。而广东出产的钨砂则多卖给沙面的洋行。

与进口的经营方式大体相似，出口商一般都与相熟的办

庄和洋行做贸易。双方将货价、品质、数量等谈妥之后，出口商即代办报关纳税等手续，货物付运后，即凭提货单向办庄、洋行收款。买主在香港，则将提货单邮寄香港，到期派人赴港收款。直接输出的货物，一般是款到货发，也有信到发货，买主收到货后才付款。

进出口货款支付方式，现金收付及记账较普遍。记账方式的结清期限，有一星期一结，一月一结，一季一结，甚至一年一结等多种，视乎买卖双方的关系及具体情况而定，但以一月一结较为普遍。相对而言，商品进口因办庄、洋行资本都较雄厚，故订货记账的较多。而出口商经济相对短绌，故现金支付的较普遍。但在时局动荡，特别是战争年代，则是现金支付为主。

由上可知，抗战前广东进出口贸易大半被洋行所控制，由本国办庄经营的只占小部分，而不经中间人的直接贸易更是微乎其微。据当年的调查统计，进口商品给洋行的佣金以2%计算，1937年付给洋行的佣金即达179万元。出口物品虽然不必由中方支付，而由外国厂商付给洋行佣金，但如果由国人直接办理出口，则这部分佣金不致流入他人腰包。也以2%计算，1937年洋行所得的佣金约为98.1万元。两项相加，合计277.1万元，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因为广东进出口多假手外人，人们普遍认为洋行操纵市场，牟取暴利，经营进出口的华商受洋行的欺骗等等。但调查者调查广州、香港150余家进出口商后，140多家认为各洋行除得其应有的佣金之外，并无操纵情形，仅有数家较小的进出口

商，间或受洋行之欺。认为进出口商利用洋行在国外的关系和组织做生意，比直接由国外购买或直接出口较为有利。调查者认为：“在目前情形下，洋行制度对于粤省对外贸易，非尽不利，其对于粤省对外贸易的操纵程度，亦非尽如外间想象者之深刻。”^[19]

注释：

- [1] 《广东商务厅商务行政计划书》，引自《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1912~1928），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
- [2] 《广州之工业》第155页。
- [3] （清）广东清理财政局编订，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整理：《广东财政说明书》第7~8页，广东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 [4] 《连江口下柴船苛税调查》，载《广东商民》第3期，第16~18页，1927年。
- [5] 李炳球：《东莞厘金述略》，载《东莞文史》第30期，第39、43页。
- [6] 罗翼群：《广东官商勾结舞弊之见闻》，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卷）第471、47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 [7]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766页。
- [8] 《广东省三年计划推进中苛捐杂税之废除》，载《统计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
- [9] 凌茹：《广州市商会倒何运动内幕》，载香港《经济导报》第54期，1948年。
- [10] 《先施公司二十五年经过史》，参见商业考察团《先施有限公司粤行之调查》，载《省商学生》第3期，汕头市岭东商业学校

编，1935年。

- [11] 陈尧典：《调查本市及佛山制酒工业报告》，载《广东建设厅工业试验所年刊》，1933年。
- [12] 工业试验所北江调查团：《调查北江纸业报告书》，载《广东建设厅工业试验所年刊》，1933年。又见《岭南学报》第1卷第1期。
- [13] 现金交易，每元退1分，称为“退九九”。每元退2分，称为“退九八”。
- [14] 园艺股：《广州市蔬果贸易调查报告》，载《广东农林》1931年第1期，广东建设厅农林局编。
- [15] 畜牧兽医股：《广州市畜产品调查报告》，载《广东农林》1931年第1期。
- [16] 澜，在这里意为淘米水。
- [17] 陈启辉著：《广东土地利用与粮食产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与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印行，为《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之一种。原著成书时间约在1937年左右。参见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广州之米业》，1938年。
- [18] 同注〔17〕。据广东粮食调节委员会编，1935年1月出版的《广东粮食问题》一书所载，土米的运输较洋米运输贵。如由香港运米入穗每担1毫5仙。而内地水路运米入穗，石龙至广州为1毫8仙，梧州为3毫至3毫5仙不等，水东为8毫，韶关为2毫5仙。若由铁路从韶关运米入穗，则是每担4毫6仙。这也是洋米长期压抑土米的一个原因。
- [19] 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第12~13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第七章 物 价

第一节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的物价

民国成立后的将近 20 年时间里，中国的物价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在稳定中逐渐上升。广州的情况与各地相似，也是在稳定中缓慢上升，平均每年上涨幅度仅 4% 多一点，略高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平均水平。涨幅较大的年份都是广东政局动荡的时期。虽然龙济光入粤后一段时期曾有短暂的政局稳定，但却是在残酷的虐杀政策下的稳定，隐藏着随时爆发的危机，加上他的搜刮政策，故在其统治广东的 3 年（1913.8~1916.8）时间里，广东财政收支从民国元年的略有盈余，到 1916 年，财政不敷数有 1319 万元，发行债券和借债为 1300 余万元。这期间，物价涨了 18% 左右。

1916 年 8 月龙济光被逐往海南岛，广东政局

被旧桂系控制。旧桂系治粤政策较龙济光略平和些，但没有什么改变广东经济状况的新政策，另一方面，广东几乎成了旧桂系的金库。这几年广东每年财政均超支 1100 万元以上，1919 年和 1920 年均 在 1500 万元左右。旧桂系退出广东后的 4 年里，广东的财政支出略有减少，1924 年曾减少至 1212 万元多，超支仅为 245 万元，为 10 余年来的最低点。

此后广东的形势有很大变化，主要是广东逐渐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外来的军队大增，军费开支大增。此前广东的军费开支每年约在 1500 万元左右，最高年份是 1921 年，为 2359 万元，1924 年也只有 621 万元。1925 年陡然增至 3594 万元，1926 年更达到 8327 万元，该年度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广东财政超支达到 4064 万元，为前所未有的。

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述数字也可见一斑。此期间除与陈炯明部多次战事之外，还有商团叛乱、刘杨事件等。政府开支大，财政困难，为此面不得不增加税收，这些都是促使物价上涨的因素。故 20 年代中期，广东物价每年涨幅都在 6% 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 10%。1926 年 7 月之后，国民政府北迁，广东政局渐次平稳，物价才开始回落。

在各类物价中，米价在 1922 年之前，除个别年份之外，每年均低于总平均指数。其后每年略有上涨，涨幅在 5%~10% 之间。但 1923 年之后，米价基本上都高于总指数，其他食品类除个别年份外，也始终低于总平均指数，低于 3%~

5%。衣料类除个别年份外，也低于总平均指数，低于5%~10%。但燃料类、金属与建筑材料类则除个别年份外，均高于总平均指数。尤其是燃料类，持续上涨，一些年份涨幅超过20%。建筑材料指数高于总平均指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涨幅度有所减缓。杂项类指数有升有降，变动不大，略低于总指数。要而言之，广东的燃料及金属、建筑材料多依赖进口，特别是燃料，且操诸洋行，价格受制于人。米类和其他食品也大量进口，但办理此项进口者多为华侨，且商家多由香港商行进货，故受外人掣肘抽剥的情况要少一些。衣料类的价格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省纺织业的崛起，既弥补了舶来品不足时的空缺，也形成与洋货争雄的局面，从而抑制了衣料类价格的上扬。

1912~1926年广州批发物价指数（1913年=100）^①

类别 年份	米类	其他	衣料类	燃料类	金属及 建筑材料	杂项	总平均	银元 购买力
1912年	111.5	95.9	96.8	91.5	99.3	96.6	98.0	109.0
1913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0
1914年	95.6	102.9	106.1	108.4	102.7	107.0	103.6	96.5
1915年	107.4	109.1	107.1	104.8	124.4	115.8	111.8	89.4
1916年	108.7	113.7	111.6	118.8	139.9	120.8	118.7	84.2
1917年	92.8	117.9	115.0	147.9	152.9	123.6	123.2	81.2
1918年	108.6	127.0	119.9	157.9	150.4	124.1	129.4	77.3
1919年	132.8	129.1	124.2	156.6	149.1	124.9	132.9	75.2

(续表)

类别 年份	米类	其他	衣料类	燃料类	金属及 建筑材料	杂项	总平均	银元 购买力
1920年	126.1	131.0	129.4	149.8	139.3	124.6	132.4	75.5
1921年	133.5	140.3	132.8	169.0	151.5	126.5	140.5	71.2
1922年	147.4	145.7	137.0	179.6	156.8	132.1	146.6	68.2
1923年	156.6	149.4	142.2	184.2	168.6	138.3	153.1	65.3
1924年	173.8	158.1	147.1	204.5	174.3	148.1	162.0	61.7
1925年	179.1	166.8	154.2	235.0	177.7	176.5	172.0	58.1
1926年	187.6	168.0	152.7	232.6	174.7	175.5	171.8	58.2

银元购买力大体上是随着物价波动的幅度而波动。在实行法币制度之前，广东的币制系统是以毫洋为单位，以白银为本位，实际上却是银元、银两、毫洋、纸币并行流通。银元种类很多，除了中央银行发行的银元之外，还有各省自铸的银元，又有多种外国银元在广东流通，如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鹰洋）、英国银元、荷兰银元等。纸币也是多种多样，如潮汕地区就有多种货币，甚至有商家发行的货币。在省内市场上流通最普通的是毫洋，特别是双毫，为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主要币种。但毫洋并不能作为对外汇兑的货币。所称的外汇，实际上就是指港币。港币在广东有特殊的地位，它盛行于广东各地，广东对外贸易，都是以港币结算。由于币制的缺陷，银币种类繁多，重量、成色混杂，交易收付均不方便。纸币则随意滥发，贬值成为家常便饭，挤

兑、停兑的事也不时有发生，货币失去信用，人民对其自然没有信心。这些因素都给港币占据广东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银行、钱庄、商家以至私人都以香港纸币作为支付和收藏的货币。

这 10 多年间广东物价上涨的情形，从与华北和上海的物价指数对比中也可以看出来。

广州、上海、华北、批发物价指数⁽²⁾

年份	广州指数	上海指数	华北指数
1912 年	98.0	94.35	—
1913 年	100	100	100
1914 年	103.6	107.16	99.57
1915 年	111.8	97.11	102.38
1916 年	118.7	105.28	110.43
1917 年	123.2	99.5	119.01
1918 年	129.4	109.67	122.37
1919 年	132.9	109.55	120.68
1920 年	132.4	119.1	132.36
1921 年	140.5	131.41	132.35
1922 年	146.6	123.87	128.61
1923 年	153.1	128.14	134.49
1924 年	162.0	122.99	139.34
1925 年	172.0	124.75	144.81
1926 年	171.8	125.63	148.85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之外，广州的物价指数上涨都高于华北和上海，1925年比上海高出27.19%，比华北更高出47.25%。

从一些商品的价格变动可以具体了解物价变化的情况。

广州出口商品价格比较表⁽³⁾

商品品种	单位	1912~1921年	1922~1931年
纸伞	每百把	27.00元	38.00元
本色土布	担	84.00元	113.00元
棉长袜和棉短袜	担	103.00元	138.00元
棉毛巾	担	90.00元	105.00元
棉汗衫背心	打	6.00元	8.00元
橡胶底布鞋	每百双	50.00元	65.00元
桂皮	担	7.00元	14.00元
烟叶	担	26.00元	34.00元
草席	每卷40码	10.00元	10.00元
茶叶	担	40.00元	49.00元
爆竹	担	34.00元	44.00元
花生油	担	18.00元	20.00元
木器	担	31.00元	38.00元
银器	斤	42.00元	45.00元
象牙制品	斤	12.00元	19.00元
纸扇	每1000把	22.00元	32.00元

从上表对比可以看出，1912~1921年的10年，与1922~1931年后10年之间，广州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了28%多。棉制品中除了毛巾之外，其他品种都上涨了34%左右。这是广东

棉织品最好的年景，从此之后，便受到经济不景气和舶来品的严重冲击。其他商品中，只有国外所无的且无关大局的桂皮的价格翻了一番，作为大宗出口品的草席居然在 10 年间价格纹丝不动，而同一时期的物价总体上上涨幅度超过 35%。也就是说，以织草席为生的农户在这 10 年里日子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另外，广东出口大宗的生丝的价格，新 14/16 号精丝，1922 年每担价格为 1980 元，1923 年上升至 2420 元。1924 年由于美国转向日本市场购买，每担下降至 1170 元。1930 年 10 月最低报价为每担 650 元，1931 年又上升至 900 元。

再看看这一时期进口商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广州进口商品价格比较表^[4]

商品品种	单位	1912~1921 年	1922~1931 年
原色棉纱	担	68.00 元	100.00 元
水泥	每包 90 斤	4.00 元	6.00 元
沥青	担	55.00 元	100.00 元
铁条	担	5.00 元	8.00 元
铁钉	担	8.00 元	13.00 元
铜片	担	41.00 元	68.00 元
镀锌铁片	担	17.00 元	23.00 元
白糖	担	8.00 元	12.00 元
烟叶	担	54.00 元	95.00 元
纯碱	担	4.00 元	7.00 元
润滑油	担	21.00 元	27.00 元

(续表)

商品品种	单位	1912~1921年	1922~1931年
石蜡	担	12.00元	22.00元
牛皮	担	70.00元	120.00元
藤条	担	10.00元	23.00元
煤	吨	12.00元	19.00元
汽油和挥发油	加仑	0.75元	1.00元

上表所列商品，前后 10 年平均价格上涨了 65%。上涨幅度大大超过出口商品 28% 的增长幅度。这里有各方面的因素，比如市场供求关系的因素。如水泥、沥青、铁条、铁钉上涨幅度都在 60% 以上，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广州及广东各地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修筑公路，拓展街道以及建筑房屋，导致建筑材料需求持续增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1929 年实行关税自主，进口商品的关税大都大幅度提高。其后，1930 年关税实行金本位，1931 年又提高部分商品的关税，这都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涨。除表中所列之外，机器增长 20%，纸张增长 40%，电器材料增长了 30%。本来进口的电器越来越多，但由于电力供应的原因而妨碍了它的增长。如作保暖和烹调用电器，随着都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因为这种电器的功率较大，常常引起供电中断，以致当局下令禁止使用这类电器。在所有进口商品中，价格下降的只有智利进口的肥田料硝酸钾，由于日本和德国的硫酸铵的竞争，价格从每担 12 元下降至 8 元。

1927~1937年广州批发物价指数表⁽⁵⁾ (1926年=100)

类别	米类	其他食品	衣料	燃料	金属及建筑材料	杂项	总指数	银元购买力
物数	16	55	32	17	37	23	180	—
年份								
1927年	102.2	108.1	93.2	107.0	97.0	95.4	100.8	99.20
1928年	97.6	103.6	92.9	87.2	94.6	94.9	96.8	103.30
1929年	103.5	104.8	92.4	85.7	90.6	95.5	96.7	103.40
1930年	113.4	106.1	93.7	97.2	97.7	101.4	101.4	98.60
1931年	102.1	118.9	106.8	109.0	111.3	123.0	112.6	88.11
1932年	95.54	121.05	101.9	129.75	113.41	128.70	113.79	87.88
1933年	84.02	109.12	91.60	111.19	113.20	122.23	104.54	95.65
1934年	74.64	100.24	76.77	109.91	99.84	111.54	94.28	106.07
1935年	77.95	96.45	63.29	100.49	81.71	98.60	84.63	118.16
1936年	104.19	117.40	90.02	117.36	94.20	118.49	105.40	94.88
1937年	115.91	134.74	102.07	127.48	112.02	127.69	120.52	83.47

广州的物价在长期持续增长之后，于20年代末开始回落。1926年北伐之后，广东不再是政治、军事的中心，特别是广东境内的长期动乱终于暂时停止，虽然其后有诸如“张黄事变”、“张桂联军”攻粤等等，但都是小范围的军事冲突，不再如过去那样旷日持久的对垒和拉锯战，或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广东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也有所减少，环境的安定对于物价的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故1928年和1929年

连续两年物价指数下跌，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1930年虽然有所回升，但升幅不大。1932年较1931年猛升了11.2%，而1933年之后却又持续下跌，这里面的原因很多。1931年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广东在这一段时期内经济建设投入较大，其次，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发生，但尚未对广东形成重大的影响，即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尚未对广东经济造成严重威胁。1933年物价比上年度猛跌9.25%，其后两年几乎以同样的速度下跌，1935年比1932年少了29.16%。这几年正是世界经济危机对广东经济影响最严重的年份，大量的国外商品，包括走私商品，占据了广东市场，金融枯竭，商业萧条，大批工厂和商店倒闭。直至1936年和1937年，物价才强劲反弹，1936年比1935年急升20.72%，1937年又比1936年上升15.12%。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当局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统一全国的币制。虽然是时广东还是港币和毫券的世界，但法币在确定对外汇率，稳定对外汇价，对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有积极的作用，而全国经济环境的改善，也对广东经济起促进作用。其次，是时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广东的商品出口重新呈强劲之势，这都是促使物价上扬的有力因素。虽然1936年发生“两广事变”，导致陈济棠下台，广东政局改弦更张，但这次事变为时不长，陈济棠手下的陆、空高级将领在蒋介石的离间下纷纷投靠南京政权，时局以陈氏被迫仓皇走避香港而告平息，未造成全局的动荡，对广东经济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从而有1937年的经济继续增长。

分别而言，米价则几乎全视进口数量而升降。进口量过多，则价格下跌，进口量少，则价格上涨，互成反比。1932年和1933年，与广东粮食进口有关的国家和地区大都粮食丰收，而又适逢经济不景气，故大批粮食运往广东，使广东的粮食价格下跌，但与总指数的升降相比，1931年之前，大都比总指数要高，1931年之后，则历年均比总指数低。燃料类虽亦时起时伏，而势较平和。与其他物品相比而言，早期价格低落，低于总指数较多，后半期则高于总指数。其原因是燃料生产的竞争，以及省政府对该行业实施有效的管制所致。衣料类及杂项类，升降之势与总指数大略相同，不过前者之升降在基价之下，而后者之升降在基价之上。金属与建筑材料类，与总指数数量相接近，几相傍而行。

广州与上海、华北相比，升降有迟速的差别，但趋势大体相同，因同是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及物价地理平衡的原理。下表大体上反映了广州与华北、上海等主要商贸地区物价波动的情况。

上海、华北、广州物价指数变动对比百分率^[6]

年份	物价指数变动对比百分率		
	华北比上海	广州比上海	广州比华北
1926年	100	100	100
1927年	98.7	96.6	97.8
1928年	106.2	95.2	89.6
1929年	106.3	92.5	87.1
1930年	100.9	88.3	87.5

(续表)

年份	物价指数变动对比百分率		
	华北比上海	广州比上海	广州比华北
1931年	96.7	88.9	91.9
1932年	100.4	101.2	100.8
1933年	97.3	100.7	103.5
1934年	95.1	97.1	102.1
1935年	99.1	97.8	88.8
1936年	102.0	97.1	95.3

在1926年之前，广州的物价指数基本上高于华北和上海，但经过1928年和1929年的连续下跌之后，广州物价开始低于上述地区。1932年和1933年虽然反而略高，原因是上海和华北是时物价已大幅下跌，而广州下跌较缓之故。但是，无论如何，这一阶段广东人的生活较民国初期没有那么艰难。

这一时期广东物价相对稳定，但人民的收入曾长期低于物价的增长。民国元年，广州工资指数略高于物价指数。其后，从1913年至1925年长达13年的时间里，广州市工资指数的增长一直落后于物价指数的增长。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平民百姓的生活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这段时间正是龙济光和旧桂系先后统治广东的期间。1913年龙济光入粤，是年物价指数仅比工资指数高0.7%，从1915年开始，至1919年，物价指数大约维持在高于工资指数10%左右，其中1918年差距最大，为12%。1920年粤军回粤，此后两

年，经济略有好转，两者的差距也有所缩小；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物价与工资指数的差距又开始拉开。至1925年全粤政局基本稳定，国民政府成立，开始进入平稳时期，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广州的物价增长摆脱了长期高于工资增长的局面，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7]当然，这一时期是工人工资增长较多的时期。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工人工资增长的大体情况。

广州市各行业工人工资增长对比表^[8]

行业	单位	1922年	1931年
木匠	日	0.90元	1.50元
泥水工	日	1.00元	1.80元
技工	日	1.00元	1.80元
轿夫	日	0.80元	1.60元
刺绣工	日	1.00元	1.80元
铁匠	日	0.70元	1.30元
金匠	日	0.80元	1.20元
女织工	日	0.45元	0.60元
裁缝	日	0.60元	1.20元
油漆工	日	0.80元	1.50元
海员	月	12.00元	20.00元
人力车夫	月	20.00元	30.00元
邮差	月	13.75元	21.75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大幅度的增长。泥水工、技工、刺绣工的工资提高80%；油漆工、轿夫、裁缝超过80%；海员、人力车夫、邮差等在50%~60%之

间；女织工的工资提高最少，只有 33%。这是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然而，从 1922 年到 1931 年这 10 年时间里，广州的物价上涨约在 26% 左右，生活必需品增长的幅度更低。也就是说，工人工资增长的幅度高于物价增长的幅度，而且超出较多。

工人工资增长主要是在 1927 年之前，也就是大革命高潮时期。据统计，1922 年广州的工会组织约有 100 个左右，到 1926 年猛增至 480 个。“这些工会的会员由 5000 至 5 万人不等。1924 年至 1926 年之间，工会在本省各地据有支配地位，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每日都有发生，给雇主造成极大困扰和损害，其中许多雇主不得不结束业务。为免受工会的影响，资金雄厚的商行都迁往港澳经营。”^[9]

第二节 抗战期间及战后的物价

抗战爆发前，广东的经济形势正处于稳定上升发展的时期，物质相对比较丰富，物价也比较低廉。以 1937 年上半年广州市场的平均价格计，上等白米每斗价格为法币 1.16 元，猪肉（五花肉）每市斤不过 0.29 元，鸡蛋每个 0.03 元，食盐每斤 0.06 元，食油每斤 0.30 元。是时广州最低工资的工人，如中山大学最低工资的工人，每月工资约在 15 元以上，养家糊口也还不成问题。教授每月工资约为 300 元左右。省级行政人员中，普通科长月薪约为 260~280 元，这批人的生活更是大可优哉游哉。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欣欣向荣的广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战争初期广东虽然远离主战场，但日本随即占据珠江口的三灶岛修筑机场，并对广州市和广东沿海城乡实施轰炸，给广东造成严重的损失。1938年10月日寇入侵广东，广东当局守土无方，让日本人轻易地占据了广东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广东工业精华尽在沿海一带，当局并未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经济设施实行内迁转移，此时被破坏殆尽，部分则被日寇占据，自然更谈不上事先经营战略后方的建设。粤北属广东经济落后的地区，新式工业几乎是空白，日用工业品大都靠外地输入，故粤北工业连最基本的日用品生产也落后得可怜。以肥皂生产为例，据1940年底建设厅对全省工厂的调查，省营设于曲江沙头村和东河坝两间工厂，前者员工7人，年产肥皂18000箱，价值313200元；后者员工8人，出产量未统计，但价值仅38690元。另外，民营制皂厂中，南雄产2372箱，乐昌1012箱，均仅销于本县。另外，牙刷厂年产24000支。如此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加上洋货进口已相当困难，故这类承平时期的普通商品，此时却货缺价高，便不奇怪了。据1941年的调查，广东后方的工厂“大都是采用旧式或改良方式手工业的生产方法，别的且不说，就以曲江而论，除了机器工业合作社用旧机器及利用木炭发动机外，其余各业大都用手工生产……如果把简单机械也当作机械化时，那么广东非手工业工厂仅占30%，手工业最少占70%。”^{〔10〕}

粤北粮食原本差可自给，随着沦陷区人民的大量迁入以

及韶关成为省会之后，大量的军队、机关、学校人员的到来，当地生产的粮食远远不敷所需，不得不从湖南、江西等地大量购入，但毕竟要受到战时的运输能力制约，故米粮食品等生存必需品价格高昂是必然的。

上面所述是从商品的生产与需求不平衡说明战时物价高企的原因。当然，战争导致庞大的财政支出，收入却锐减，为了促进内地工农业的发展而扩张银行信贷，也是助长物价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说来，1939年初定曲江为战时省会，是年及1940年初日军两次进攻粤北之后，广东抗战后方在战争相持阶段曾有较稳定的时期，1944年日寇为改变海运不通状况，全力打通粤汉铁路，1945年1月曲江终于陷落。

曲江零售物价指数表（1940年1月=100）^{〔11〕}

时期	食品类	衣着类	燃料类	什类	总指数	法币购买力
1939年12月	92.60	103.08	90.04	96.81	93.35	107.12
1940年1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40年6月	159.23	113.55	122.70	195.96	143.90	69.49
1940年12月	271.46	147.69	201.56	246.72	231.30	43.28
1941年6月	463.58	223.64	275.81	423.58	366.05	27.31
1941年12月	741.09	401.53	602.12	677.15	650.37	15.38
1942年6月	1510.01	923.05	1024.58	1765.61	1320.05	7.58
1942年12月	2439.55	2007.49	1769.52	1374.25	2065.82	4.84
1943年5月	3917.51	3432.46	1882.68	2670.86	3085.52	3.24

从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20余年间，广东的物价除了经济强劲复苏的1936年和1937年之外，其余年份即使在多事

之秋，年增长率也不过 10% 左右，但在抗战期间，物价却像翻筋斗，仅上表所列，3 年半的时间，总指数增长了 30 多倍。但如果与抗战后方的其他地区相比，则属于中等水平。如以 1940 年 12 月为例，曲江的批发物价总指数为 636（1937 年 6 月为基期，下同）重庆 1143，成都 1063，昆明 1206，桂林 607，梧州 543，福州 493。同一时期法币购买力，曲江为 15.72，重庆 8.75，成都 9.40，昆明 8.29，桂林 16.45，梧州 18.40，福州 20.25。

上表中，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资增长率最快，食品类增长了 40 多倍。实际上，该时期广东农村生产状况还是比较稳定，据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广东英德、兴宁、封川、茂名、灵山等地农村的调查，除了英德受战事影响较大，农民所付的物价指数高于所得物价指数之外，其他各县的农民所得物价指数大都高于所付的物价指数，农民的购买力不弱，说明广东抗战后方农村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广东省政府为加强农业生产，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增加农业贷款等，但是，由于广东生产条件的限制，内迁人口剧增等，导致食品类的物价高涨。衣着类增长与总指数相近，燃料类最低，也有 20 倍左右。战前广东燃料过分依赖进口，煤炭开采严重落后，此时加强开采，柴炭就地取材，不过，靠舶来的煤油、汽油等则是价格奇昂，且多半是有价无市，木炭、酒精成了发动机器的替代品。

在此期间，政府曾采取多种措施控制物价，如 1939 年开始对重要物资实行控制，对商会和同业公会实行严格管

理，以管理其购销行为，其后又评议物价等，1942 年底省政府颁布《广东省实施管制暂行办法》，对物价进行限制，等等。另外，1941 年开始实施对工资评定、限制、管制的政策。在此之后，广东省省级公务员的真实薪金指数一直受控制，大体上维持在 1937 年上半年平均水平的 10%~15% 之间。虽然有平价物资供应，但与战前优裕的生活相比，此时可称为清苦了。

各重要城市主要物品价格对比表（单位：法币元/市斤）^{〔12〕}

物品	地区 时间	东江			西江		北江		南路	
		兴宁	惠阳	丰顺	高要	开平	曲江	连县	茂名	梅篆
大米	1940.6	0.54	0.52	0.73	0.29	0.41	0.16	0.16	0.41	0.51
	1941.12	1.23	—	1.34	1.26	—	0.89	0.63	1.47	1.61
	1942.2	1.90	—	1.70	1.52	1.90	1.43	0.80	0.85	2.03
生油	1940.6	1.37	2.11	1.83	1.48	1.76	1.20	1.15	1.56	1.79
	1941.12	5.49	—	7.07	5.25	—	3.50	3.18	5.22	5.00
	1942.2	8.25	—	8.40	6.40	8.60	4.58	4.30	6.65	8.18
盐	1940.6	0.39	0.46	0.29	0.58	0.54	0.43	0.85	0.39	0.31
	1941.12	2.47	—	2.44	3.55	—	4.70	6.15	1.97	2.38
	1942.2	4.28	—	4.04	3.68	2.20	6.83	9.50	2.04	2.13
猪肉	1940.6	2.17	2.19	2.61	1.21	1.43	0.90	0.75	1.83	2.00
	1941.12	5.67	—	7.34	3.90	—	3.60	3.15	7.77	6.88
	1942.2	6.35	—	6.83	4.65	4.80	4.75	8.20	8.55	8.55

(续表)

物品	时间	东江			西江		北江		南路	
		兴宁	惠阳	丰顺	高要	开平	曲江	连县	茂名	梅篆
煤 油	1940.6	1.33	1.24	1.42	1.08	0.89	1.50	1.49	0.80	0.78
	1941.12	13.55	—	14.25	13.90	—	15.25	10.80	9.33	7.00
	1942.2	19.40	—	25.45	19.00	27.00	17.75	15.50	11.63	12.63

上表时间的选择：1940年广东战局、政局均相对稳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广东失去了最主要的进口渠道，由此导致物价的暴涨，以短时间内的价格差异对比，以凸显太平洋战事对广东物价的影响。

对比战时广东各地物价，从中可以看出各地物价差异之大，地区之间价格可能相差1倍以上，如曲江、连县与开平、兴宁等地米价的差距，甚至可能相差2倍以至3倍或更高，如连县与茂名的盐价相差4倍多。上表清楚地反映出商品产地与内地市场之间存在的悬殊的差价，如上述盐价，离盐场越远，价格越高，这在和平时期也是一样的。但相差如此之大，比如曲江与连县同属粤北地区，但价格仍有较大悬殊，说明了一个因素，就是运输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抱有余补不足，或抱多补寡，是商品流通的功用，价格差距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差距大而无法扯平或使之尽可能相近，是由于流通渠道不畅通。战时运输困难导致商品流通受阻，是地区物价差距的根本原因。曲江的米、油、肉的价格比后方的

其他地区要低，是因为曲江为战时省会，不得不首先保证该地的物资供应。另外，曲江与湖南的交通改善之后，农产品的供应较其他地区更有优势。表中所列显示，煤油价格暴涨最快，而到1942年9月，价格又几乎翻了一番。如茂名为41.09元，兴宁为39.30元，曲江为28.00元。价格之高，令人咋舌。战前广东煤油的价格每斤约在0.10元之内。战争导致舶来品稀少，价格奇昂，于此可见一斑。

沦陷区的物价：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与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商业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一方面是商人大都逃往内地或港澳，商店关门，当地的居民也逃走大半，广州市居民更是十之八九逃往乡下。其次，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物资实行严格的控制，最重要的商品如食粮、食盐、煤油、汽油等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然后再根据实际需要交给伪维持会、伪商会配给指定的商店，按规定的价格出售。普通商业的活动局限于蔬菜、果品、肉类、饮食、药材等小买卖，也就是说，其商业活动局限于维持居民最低的生存必需。1940年和1941年是沦陷区商业的恢复时期，是时日本人想方设法诱使商人回归。1940年8月伪省政府才成立，是年冬才将商业管理权交给伪政府。1942年至1944年是沦陷区商业较为稳定的时期。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侵略者气焰甚嚣尘上，在港澳的商人也不得不回归本地，这些因素都使商业有所恢复。

日本人通过发行“军票”来达到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目的，自然也是控制广东商业的主要手法。在广东发行的

“军票”分为10元、5元、1元、50钱、10钱、1钱几种（10钱即相当于法币的1角，1钱即相当于1分），宣布“军票”与日元等值，但又不能兑换日元。日本人强制推行“军票”，禁止法币和毫券在市面流通，但“军票”与法币的兑换却漫无标准。刚入广州城之初，规定与法币的比值为1:2，对广东毫券的比值为1:3。由于人民对“军票”带着怀疑的态度，次年2月将兑换率改为1:1.2，对毫券兑换率为1:1.5~1.58。此后曾多次更改兑换率，都是强制推行，直到1942年7月24日伪广东省政府宣布停止法币的兑换，禁止法币流通，再进而禁止港币流通，“军票”也随之结束了它所扮演的角色，中储券成为沦陷区唯一流通的货币。

控制了金融和市场之后，日本人在沦陷区强制推行带有殖民统治色彩的物价政策就轻而易举了，也就是说物价的波动并非按照市场规律，而是按照占领者的意愿波动。正因为如此，相对而言，战争前期和中期沦陷区的物价升幅比预期升幅要小一些。据广州日本总领事馆公布的数字，1943年3月份广州日常用品零售价指数（以1939年3月为基期），土产品为427.1，煤油、汽油等输入品为885.2，总指数为604.8。其中，太平洋战争以来总指数的增长为112.7。根据伪广州市政府所公布的数字，仅1942年1~9月之间，广州市物价总指数就上涨了250.3，其中米粮类最高，为383.9，燃料类为171.6，衣料类为191.2。另外，据曲江广东省银行经济调查室的调查资料，1940年4月，广州市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军票1元，可买到上等米1斤

14 两，中等米 2 斤 6 两，糙米 4 斤。猪肉 1 斤为军票 1 元 3 角，食盐每斤为 1 角 2 钱，柴每百斤 5 元，煤油每斤 6 角 2 钱，汽油每罐 43 元 5 角。

为达到掌握物资和控制物价的目的，日本人在沦陷区实施强制收购物资的政策，对一些重要的物资采用低价强制收购。如 1940 年 7 月，日本人在中山县向粮商强制收购稻谷五六万担，每担的价格仅为 16 元军票，相当于市价的五成左右。日本人收购粮食的办法大都是按地区指定专人负责，后来则指定专门的粮商收购，这些粮商必须按规定的价格向当局缴纳规定数量的粮食。对生丝的政策也显示出强烈的殖民色彩。在太平洋战事之前，日本通过与美国的贸易获取战争物资，而生丝则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从占领珠江三角洲之初，即想方设法掠夺广东的生丝资源。强制丝厂复工，所产生丝必须交给日本人，每担约 800 元，次年，价格被压到 700 元一担，而当时香港的丝价约为每担港币 1800 元。1941 年，收购价格更被降到每担 600 元，而当时香港丝价约为法币 80000 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美国的贸易停止，生丝的战略价值不再，日本人也就停止收购，广东的丝厂也随之几乎全部倒闭。又比如水泥，广州生产的水泥在战前已是热销货，战时更是被日本人控制为其战争服务，多余部分才作地方建设及民用，其价格相差非常大。如 1943 年 7 月的价格，官用价每吨 3500 元中储券，民用价则是 31000 元，不久又改为 41000 元。^[13]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战时物资紧缺，物价波动是正常事，日本人为达到稳定

物价的目的，不惜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如1944年3月中旬，战局对日本人和汪伪政权不利的消息已无法以谎言掩盖，又正值青黄不接时期，市面物资紧缺，市场窒息，而广州又连续受到飞机的空袭，传言不脛而走，从12日开始，市场物价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波动。11日齐眉白米每斤21.10元，至18日就已升至41.60元。猪肉每斤从100元升至144元，20日更升至177元。松柴从194元涨至800元。阴丹士林布每尺从100元涨至133元。花生油每斤从127元涨至200元。日本人与伪政权当局立即联手采取措施，停止黄金和期货市场以及找换店的交易，最主要的措施是对商店存货进行登记，对米、谷、生油、花生仁、糖类、面粉、豆类、麸类、火柴、棉纱、棉布、黄金、铜铁13类商品全面登记，要各商店负责人将现存货物数量填于调查表内，再由调查队复核，如发现货物未正常出售，最轻的处罚是政府可以贬价收购。若定性为囤积居奇，则不仅仅是吊销营业执照一类，而是封店抓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日本人是如何对待被认为违反他们的物资管理政策的商人的，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窥豹一斑：某水果店的老板与伪商会会长是合作伙伴，为会长的公司（日本人授意设立的早期与香港贸易的公司）购买水果运到香港出售。一次在与人谈话中，说到运送柑到香港出售，因为广州话“柑”与“金”同音，引起误会，被人向日本人告密，说他运黄金到香港。结果立即被捕，不由分说地受吊打酷刑，等到说清楚时，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然而，无论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如何使用极端手段，随着其末日到来，物价最终不可遏阻，飞速狂涨也就无可避免了。

1943年10月至1945年2月广州批发物价指数（1943年1月=100）^[14]

品类 年月	粮食类	肉食类	燃料类	棉纱类	衣料类	建材类	五金类	纸类	总指数
1943.10	355	422	440	477	345	710	1048	629	530
1943.12	334	363	489	658	382	508	1278	692	560
1944.6	895	1158	1431	1806	1277	2383	5398	2632	1960
1944.12	5894	5963	7441	10697	6565	21745	14011	8703	9486
1945.2	9832	9310	9287	10091	8069	20815	15377	20069	12086

上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抗战后期沦陷区窘蹙的经济形势。1943年与1944年有巨大的差异。1943年尚可勉强维持，随着日本人在战场上连连败退，已无暇顾及占领区的经济，伪政府只能在狭仄的区域内挣扎。经济窘困所表现出来的首先是日常必不可少的物资的紧缺，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12月一年之间，粮价上涨了将近18倍，肉食涨了16倍多，燃料涨了15倍多，棉纱涨了16倍有余，建筑材料则高达43倍，达到令人惊讶的高度。至次年2月，粮食等物资价格继续大幅攀升。其后，日本人封锁消息，事实上，日本人投降前数月，广州物价处于不断暴涨的状态，3月下旬米价每担上涨2000余元。4月初1个星期内，米价、

金价涨了1倍多，米价有时一天上涨10多次。5月上旬，又是暴涨期，5月3日一天内，竟然涨了2/5。8月日本投降前，广州的柴价约为每担14000~15000元。

解放战争时期的物价：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这一阶段，广东的物价起伏极大。而这种起伏大都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局势的变化而变化。1945年8月16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遍各地，原本持续上扬的物价，立即急剧下跌。原因是此前正值物资异常紧缺，物价居高不下，商家无不极力囤积以观察物价变化。胜利的消息一公布，形势急转直下，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战争结束，交通通畅，物资流通不再如前之阻塞，物价必将暴跌，故大都将囤积的商品抛出，使物价一时间急剧下降。9月中旬，随着当局宣布停止伪币流通，进而公布200元伪币换法币1元，后方的游资向广州等城市转移，以大量的法币购物，城市的物资本来就紧缺，游资的聚集使城市的物价又大幅上扬。此后，广东的物价长期居高不下。如1946年1月，广州的面粉每袋价格高达法币154267元，同一时期，北平则为8800元，上海为3925元。大米每斗广州16946元，上海为8500元，南京为6917元。20支棉纱，每件广州为1553333元，上海为655000元。^{〔15〕}

上述物价高涨是战后的正常现象，是战时物价的延续。当时广州经济正处极度困乏之后，各类商品的供应还刚处于恢复阶段，而人口急增，又届春荒前期，米价高是正常现象。其后，物价总体水平受到控制。如果能顺应民意，给人民以休息生养的环境，致力于经济民生的建设，物价当可趋

于稳定。但是，蒋介石集团以为凭借武力可以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悍然发动内战，而战争的进程又刚好与其意愿相反，旷日持久，军费开支庞大，财政赤字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统区内的物价也随之直线上升，最后导致不可收拾。

1947年初，广东省政府调查统计局曾将抗战前广州的物价与当时广州市的物价作简单、直观的对比，其结果颇为令人吃惊。

广州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对比表（单位：法币元）⁽¹⁶⁾

名称	品质花色 与牌号	单位	1937年 1~6月平均	1947年 1月平均
大米	新兴白米	市斗	1.16	7627.50
面粉	沙士坚牌	市斤	0.13	794.00
猪肉	五花肉	市斤	0.29	2454.17
猪油	板油	市斤	0.35	2250.67
鸡蛋	本地鸡蛋	个	0.03	230.00
盐	湾白盐	市斤	0.06	279.83
糖	省营砂糖	市斤	0.20	1450.00
酱油	中等	市斤	0.07	748.33
豆腐		市斤	0.02	246.67
蔬菜	各类平均	市斤	0.03	279.00
阴丹士林布	晴雨牌	市尺	0.11	2058.33
白土布	2尺2寸宽	市尺	0.06	1183.33
冲哗叽	国产双鱼牌	市尺	0.10	1990.00

(续表)

名 称	品质花色 与牌号	单位	1937 年 1~6 月平均	1947 年 1 月平均
呢鞋	国货呢中式男鞋	双	1.54	24666.67
皮鞋	生胶底男装	双	2.80	36116.67
线袜	三骨绿宝牌	双	0.14	2783.33
房租	一平方丈房间	每月	8.40	18123.33
柴	松柴	市斤	0.006	63.00
食油	花生油	市斤	0.30	2134.50
水	自来水	120 斤	0.01	200.00
肥皂	棕榄视	块	0.18	1800.00
毛巾	22 寸长 9 寸宽	条	0.18	2066.67
牙膏	先施牌	支	0.14	1116.67
茶叶	六安茶	市斤	0.30	2566.67
理发	甲等理发洗头	次	0.14	3133.33

上表所录都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资，其价格与战前相差都在数千倍乃至上万倍，大米为 6575 倍，猪肉 8463 倍，鸡蛋 7667 倍，蔬菜 9300 倍，柴 10500 倍，自来水价格竟然高达 20000 倍。与生活费指数相比，同时期（以 1937 年上半年平均为基期），广州市工人的消费总值是：1937 年 1~6 月为 22218，而 1946 年 12 月为 96378，生活费总指数为 433783.42。广州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 1945 年 9 月为 45380，1947 年 1 月为 667842。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属于比较高的，略低于上海、北平、天津、济南等几个城市（最

高的是青岛、太原、台北等市)。

但是，1947年1月广州的物价虽高，但只属于阶梯式逐渐攀升形式的高点，还不是跳跃式的腾飞阶段。2月，广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潮，受此拖累，市场物价剧烈波动，又适逢春荒，粮价暴涨，如2月10日白米每担为13万元，11日竟然暴升到28万元。受此影响，汽油由每加仑7000元升至37000元，报纸每份由200元升到300元。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严厉打击囤积行为，一方面由湖南等地购进一批大米，暂时压制因粮食短缺引起的物价冲击波。是年上半年物价上涨了198%。此后广东金融风潮不断，对物价形成了沉重的压力，加上国民党在战场上处处失利，广州的物价由此蒸蒸日上。1947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的物价进入持续暴涨的新阶段，从7月到12月，广州物价上涨了826%。

1948年是物价狂涨时期，2月春荒时期，饭店的饭价也是一日三易，早饭每碗5000元，午饭每碗6000元，到了晚上，每碗已是7000元。以6月份的各项商品为例，是月11日至30日之间，齐眉米每市担由700万元涨至1398万元。上海兵船牌面粉每袋从675万元上涨至1312万元。五羊牌士敏土从每包190万元上涨至409万元。仅仅20天时间，价格就翻了一番。7月，广州的金融风潮再掀高潮。是月18日，中央银行宣布发行500万元的大钞，大钞还没有在广州发出，市价已同脱缰的野马在狂奔，中午，港币黑市价突破百万元大关，3天之内，法币贬值了95%。4万元面值的钞

票，如同1万、2万元面值，被市民称作“湿柴”而拒绝使用。因为广州中央银行拒绝兑换4万元面值的小票，而做小生意的平民百姓收的都是这种面值几万元的“湿柴”，这样一来，引起市民恐慌，称“湿柴”烧干了贫民的血汗。于是，市场上出现折价兑换1万、2万、4万元的买卖。兑换1万、2万元面值钞票为5折，4万元钞票为8折。而做这种生意者被称为“湿柴商”。

1948年8月19日，法币终于寿终正寝，作为挽救经济筹码的金圆券面世，当局规定以这天的物价水平为标准，物价长期冻结，不准变动，当然也包括金圆券的兑换率。但是，广州的物价在金圆券问世后立即暴涨了1倍，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这是因为法币在广州的价格比上海等地高，新的比率则将全国划一，从而促使物价上涨。后来当局进行了调整，各类商品的价格才最终确定了下来。^[17]然而，人为强制限价必然导致市场窒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的“限价”政策停止，被压抑的物价立即狂升，当天广州市场的物价即上升了30%，次日再升50%，11月3日又升了80%~100%。此时，东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被歼灭而结束，而华东战场又形势危殆，消息传到广州，广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涨价风暴。从11月6日至12日，一周之间广州物价基本都上涨1倍以上，并出现大涨大跌的现象。从11月1日开始，物价呈上升势头，6日开始暴涨，7日和8日之间，各类物价基本上都升了1倍，9日达到高峰，这几天之间，米价涨了200%，花生油

价涨了 180%，糖类 170%，盐 150%，棉纱 140%，布匹 350%，工业原料和燃料约为 140%。10 日，米价继续上涨，其他物品开始回落，但下降幅度仅 30% 左右。综计一周之间，齐眉米由 80 元（金圆券，下同）涨至 195 元，猪肉从每斤 8 元涨至 20 元。下表仅选列几种物品的价格变化，可以略见这段时间广州市物价疯长的情况。

1948 年 11 月上旬广州物价比较表（金圆券：元）

品名	限价价格	限价时黑市价 (10 月 31 日)	11 月 5 日 市价	11 月 12 日 市价
齐眉米(担)	20	90	115	195
雪米(担)	15	68	89.5	174
土榨生油(斤)	0.65	3.20	4.80	21
白糖(担)	36.8	83	142	250
片糖(担)	25	58	65	115
猪肉(斤)	0.50	4.20	6.20	20
20 支棉纱(条)	813.75	1250	2370	—
哥士的(桶)	—	980	1400	2500
白药(桶)	—	350	650	920
煤油(桶)	140	315	550	800

上表清楚地反映了 11 月物价风暴时价格腾升的状况。必须说明的是，表中 12 日的价格并非是这段时间内的最高价格，而是涨价风暴逐渐平复向下回落的价格。这场涨价风暴中价格的高峰是 11 月 9 日，如土榨生油达到了 38 元，白糖为 350 元，白药为 1500 元，煤油为 1130 元。

1948 年 1 月至 12 月，官方公布的物价上涨倍数为 667

倍，而实际上涨倍数应在 1480 倍以上，^[18]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出 1 倍以上，比 1947 年上涨 10 多倍。与 1947 年各月物价指数比较，也相当惊人。由 1 月份的 9 倍，至 12 月份增到 879 倍，而且是逐日大幅度上涨。

从全年看，1948 年广州物价上涨势头最强劲的是黄金、港币、米粮、花生仁等。港币上涨了 3205 倍，黄金上涨了 3095 倍，丝苗米上涨了 2316 倍。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商品上涨值大都超过 2000 倍。

由于物价上涨大快，早晚市价相差太远，平民百姓为了有饭吃，都是清早赶快上肉菜市场。而肉贩则尽量限制卖出数量。百姓常常买不到花生油，便买猪油，没有猪油，就将烧肉做油，于此可知抢购风潮之严重了。“8·19”后政府对商品严格限价，而且价格定得太低，如广州的牛肉每斤 0.4443 元（不久改为 0.50 元），猪肉最初也定为每斤 0.361 元（后改为 0.50 元）。猪肉比牛肉便宜，主要是有湖南的生猪南运。限价之后，立即出现了肉荒。市场上买不到牛肉，牛肉都转入地下出售，肉基本上都是卖给了熟客，价钱比官价贵 100%~300%。猪肉也只有早晚两市可以见到，买肉要搭骨头，且只能买几两。至 10 月，黑市价格不断上涨，在市场上销售不能赚只有亏，偷偷卖给熟人，被官家抓到要坐牢，于是肉贩干脆不做生意，将猪肉做腊肉，将牛肉做成牛肉干，运往香港卖大价钱。是时，刚好粤湘双方因棉纱交换问题弄得湖南方面有些不满，作为报复性的措施，就是限制生猪运入广东，于是弄得广州市场上没有肉卖。

广州基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 (1937年1月~6月=1)⁽¹⁹⁾

1947年~1949年3月

时间	类别	总指数	食物	纤维	燃料	金属	建筑材料	杂项
	项目	22	11	2	2	2	2	3
1947年								
2月		10852.0	11456.8	7440.0	13234.9	24636.7	6031.0	6955.0
3月		11032.3	11436.6	8214.7	16450.0	33272.3	6021.6	6922.5
4月		12510.0	12589.7	15606.1	18417.5	27411.9	5702.0	6953.8
5月		16463.9	16160.0	24276.1	26905.0	47593.3	7492.8	8794.6
6月		21504.8	21121.0	24507.7	32433.0	55633.8	10955.3	9582.5
7月		26353.8	26771.9	26683.8	35914.2	58492.5	15575.4	18379.5
8月		35123	36622.0	34613.1	41305.5	71220.0	20942.0	12830.0
9月		37325.8	37169.1	35034.2	60667.1	89628.0	30860.0	12577.1
10月		48634.0	47030.0	55320.0	85140.0	161223.0	38650.0	17564.0
11月		66428.0	65545.0	77685.0	125220.0	233184.0	37925.0	21550.0
12月		89613.0	90234.0	102121.0	162993.0	305143.0	41199.0	26193.0
1948年								
1月		118176	123610	110736	188470	398019	46930	30675
2月		192700	209425	142220	315757	633343	62557	37536
3月		281754	295427	229753	512888	1080725	121886	55126
4月		407997	425390	360767	786600	1637320	170896	68462
5月		653630	691200	547763	1148270	2505770	212681	192727
6月		968660	996120	872920	1803542	2631917	361458	542762
7月		2603000	2690000	2391000	4701000	8595000	914000	1265000
8月		4383000	4618000	3533000	6030000	12248000	1756000	2424000
9月		297.5	298.7	288.6	606.7	946.2	141.2	206.1
10月		494.0	511.8	336.8	970.4	2029.1	200.3	304.8
11月		1581.6	1762.2	461.6	2636.1	6347.9	813.7	664.4
12月		3892.1	3811.0	3145.6	8831.6	13858.7	2778.6	2156.7
1949年								
1月		13270.6	13022.1	11583.3	24470.6	33350.8	9891.0	5882.4
2月		124928.6	122613.3	107135.0	244122.2	274418.8	94018.0	61257.1
3月		465500	452200	389418	1007535	1006395	355483	228642

从法币购买力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货币贬值的情况。以100元法币购买力的变动看，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黄牛2头，1945年只能买鸡蛋2个，1946年只能买固本肥皂1/6块，1947年可以买煤球1个，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大米0.002416两（以每斤16两计），1949年5月只能买大米0.000000000185两，即一粒大米的2.45/1000。^{〔20〕}

随着国内战争的演变，至1949年初，长江以北大部分已江山易手，2月南京政府迁穗，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南京、上海随之解放。此阶段广东的物价出现多次反复，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和谈，市场也在观望中。解放军渡江前夕，广州金融市场因企望和平有实现的可能，市场也曾有一小段的沉寂。随着和谈破裂，广州涨风再起，港币在清明节前还徘徊在3500元左右，到4月6日，银钱业还在休假期间，港币已翻过4500~4700元，7日达到5800元。5月2日，港币最低价为112000元，最高价为210000元，收市价为185000元。5月6日，已到了1300000元。一月之间，涨了370多倍，涨率之高，令人不寒而栗。至此，港币已统治了整个广东市场。据当年金融界人士的统计，1949年4月港币流入中国的数量达到587301991元，其中流入广东的则为411111394元，于此可知香港纸币在广东的地位了。^{〔21〕}

金圆券发行之初，广州官定的价格是1银元兑金圆券2元，至1949年6月22日，兑换率已改为1银元兑5亿元金圆券，而黑市价则是1银元兑换将近8亿元金圆券。金圆券

至此几同废纸，市场拒用金圆券，广东省各市场也基本上是以港币为本位。鉴于当时的货币状况，6月，广东省当局为稳定金融，发行新货币“大洋券”。先发行面值1角、5角，再发行1分、5分几种，随之又发行1元、5元、10元、100元面值的大洋票。规定大洋票币值与政府铸造的银元等值，可作为缴纳本省捐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通用货币。但是，此时广东正处于解放前夕，大洋券发行量很少，流通地区也限于广州一带。

解放军渡江之后，表面上看商品价格仍在上涨，实际上广东物价已大幅度下降，主要是货币币值下泻所致。仅5月份，花纱价格就下降了15%，20支新城纱由1320元港币下跌至1100元港币，笨重的商品下跌得更惨，原值15000元的汽车仅能卖到1500元，电风扇、收音机、印刷机等只能卖到原价的1/5。随着华南解放指日可待，各项物资的价格也不断地下跌。

注释：

- [1] 资料来源：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编《统计汇刊》，1930年。
- [2] 资料来源：贾秀岩、陆满平著：《民国价格史》第6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
- [3] 资料来源：《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085页。
- [4]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083～

1084 页。

- [5] 资料来源：《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186页，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另外，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也有关于广州物价的调查，两项调查略有不同，参见《广州市批发物价统计汇刊》。1937年银元购买力指数为5月份的数字。
- [6] 资料来源：贾秀岩、陆满平著：《民国价格史》第40~41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
- [7] 资料来源：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统计科编《统计汇刊》1928年第2期（工资指数号）。
- [8] 资料来源：《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086页。
- [9]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 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086页。
- [10] 赵元浩：《论目前广东轻工业》，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4期，第256页，1941年。
- [11] 资料来源：《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3期，1943年。
- [12] 资料来源：广东省政府统计室编：《广东统计季刊》第3期，1942年。各月份的价格为平均价。其中开平县为该县长沙镇的物价。
- [13] 《广东省政府建设厅一年来之工作及将来之计划》，载广州《建设季刊》第1卷第1期，第68页，1945年。
- [14]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月报》各期的数据编写。
- [15] 贾秀岩、陆满平著：《民国价格史》第517页。
- [16]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月报》1947年第4期的资料选择编制，原题为：《广州市公务员生活必需品价格》。
- [17] 广州市限价时所定物价的标准，并非是以8月19日的物价水

平折合金圆券，而是根据港币的比价与上海汇价拉平之后的比率作为评定的标准，因法币在广州的价值比上海高，故根据这一标准所定的价格比上海为高。在评定价格中，曾发生种种风波，省参议会长林翼中甚至向蒋介石告状。故所定的价格曾有多次变动。

- [18] 林燮寰：《一年来华南经济的回顾》，载香港《经济周报》第8卷第2期，1949年。
- [19]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4期，1949年4月。另：1948年8月份的数字为截至19日的平均数；1948年9月份起改为1937年1~6月=100。
- [20] 贾秀岩、陆满平著：《民国价格史》第417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
- [21] 伍连炎：《香港英籍银行纸币流入广东史话》，载《银海纵横——近代广东金融》（《广东文史资料》第69辑）第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八章 商业团体、从商 经验与商业道德

第一节 主要商业团体

广东商界早在唐代就有“行”的组织，宋、元至明初称“团行”、“公所”。清代负责本行业事务的头面人物称为“行头”、“行长”。行会组织大体上局限于各行业内，行会之间很少联络。由于商业利益冲突的关系，从商者大都对于本身的业务讳莫如深。“各行之中不相交通，即一行之中，亦隐若敌国，互相倾轧，互相猜忌。”^{〔1〕}为处理和协调相互关系，同行业内一般都有小组织，由数位在本行业中较有实力的人发起，征询同行商店的意见，得到半数以上的商店赞同，便可组织成立。“行头”、“行长”大体上都是雄于资财或是富于经验者，老成持重，深孚众望，受各商店推举主持行业事务。这种组织一般都有章程之类，但条文均极简单，大体上规定同行业中征集一定的资金，在适当的地方

设立行业会馆，作为本行业集议的场所，就算成立了行业组织。由于当局没有颁布商律，各行业依其环境和需要而组织，因而行头各不相同，无所谓系统，也无所谓成文法。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外国商人即在广东设立了商会。1834年英国商人在广州设立商会，1836年各国驻穗洋商成立了广州洋商总会，以维护和推进他们在广东的总体商业利益为宗旨。但在此后数十年间，广东商业界并未以为借鉴，成立全省或是全市性质的商会，而是依然故我，各自为政。1902年盛宣怀奉令与列强修订商约，外国官员与商人密切配合，对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准备周详，样样占先，而我方官员却毫无准备，处处被动。此事成为推动中国新式商会诞生的契机，1904年1月，清朝商部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附则8条，劝谕商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商人组织商会，责成地方官随时报知督抚，并向商部报告，不得阻遏。于是广东省终于有了第一个跨行业的商业组织“广东总商会”。

进入民国之后，广东各地，主要是商业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商界渐次设立类似的商会组织。这些地区性的商会大体上是以地区命名，如开平设立县商会之外，一些区另设有本区的商会，如赤坎商会。在统属上，开平县商会是广东总商会之下的分会，而赤坎商会则是县商会之下的商会分所，从而形成了三级商会。分会大都设立在县城之内，也有少数设在商务较为发达的镇，分所的会所基本上是设立在商务繁忙的圩镇内。一些较为偏远的商务活动少的县份在很长时期

都没有设立商会，直到抗战期间，广东省政府为了战时物资的统制以及调余补缺的需要，加强对商业的管理，1940年，下令所有县市必须设立商会，于是全省各地都有商会组织。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之前，广东商会虽然是三级体制，但只是名义上的体系与统属关系。实际上，设在广州的总商会与各地商会之间，各县市商会之间，甚至县商会与下属的圩镇商会之间，基本上没有经常性的沟通渠道，大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属于半封闭的组织系统。如以汕头为中心的粤东地区的商业运作完全是自成体系的，无须依赖于粤中区的商务运作。与设在广州市的“广东总商会”同年成立的“汕头总商会”不受广州的总商会管辖，完全是独立的，且与广州的总商会很少往来。

上述三级体制的商会组织之外，由于广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与商界有着较为特殊的关系，故广东的商会组织与他省稍有不同，即在早期成立的总商会之外，其后还组织成立过广东省商会联合会、广东商民协会等全省性的商会组织。现将广东的几个最大的商会组织介绍如下。

广东总商会：是广东地区成立较早的商会，也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广东商界势力最大的商会。根据清朝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的规定，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中山人郑陶斋、左筱竹发起组织。订简明章程19条，以“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兴利除弊为宗旨。”经费由会员筹集，凡缴交洋银10元之商号，即为会员。公举左筱

竹、张弼士、郑陶斋、许云图等 17 人为首届总董。^{〔2〕}报请商部核准立案。此商会虽名为广东总商会，实际上其影响只限于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并不能代表整个广东商界。其后数年间，汕头、海阳、中山、兴宁、梅县、东莞及太平、石龙等地先后成立商务总会或分会。1917 年广东总商会改称“广州总商会”。

据 1934 年出版的《广东商运沿革史》称，广东总商会有很多局限。“欲加入该会者，无论某一商店，能交千元为该会基本金，便可取得该会商董资格”，从洋银 10 元增至 1000 元，大概是后来的规定。出资人会者派代表一人，为该会商董，由商董互选正副会长，会长之下，选 10 人为坐办，主持会务。又称“故雄于资者，竟以商店名义，代表全行，以博取声誉（此中陋习为别省所无）。查该会本以行商为单位，惟多数格于千元之基金，未能加入，或因该会制度，多为强有力者主持，无敢过问，故由光绪中叶而至于今，亦毋〔无〕甚成绩。”^{〔3〕}因这一原因，加入该会者大都是规模较大的商行。广东总商会于清末民初在广东有较大的影响力，曾参与一些如发动认购粤汉铁路股权、洲头咀港建筑以及不少的慈善事业。

辛亥革命时期，为自卫而成立粤商维持公安会，以下九路布行为会址，成立商团军，以岑伯著为团长，有千余人。后在西瓜园建总公所及操场。其后民国多故，广东政局动荡，商会依仗其雄厚财力，致力加强其军事实力，发展至 3000 余人，依地域分为 10 团，分驻各区，遇地方有事，则

分守商场。1916年陈廉伯当选为团长，更致力于拓展商团力量。珠江三角洲一带不少地区商界也有组设商团。^[4]训练商团军的《商团模范队章程》所列的课程中，仅6个月的训练课，内容包括战术学、弹击教范、军制学、地形学摘要、实习射击、军刀术等，可见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自卫。并称：“吾国积弱之大原，即在于政商之分离……今日商界之要务，为在于资本不集，不在于商业之知识不充，所当速起以求者，即为团体之结合，参政之能力，政治实权之操握……一言以进曰，商人政治，为立国之要图。”^[5]至商团事变前，广州商团已有“常备军四千人，后备军四千人，枪械犀利，组织完备。”为扩充实力，斥资百万，秘密在欧洲购买德国步枪4000支，短枪4000支，子弹500余万发。事情最终遮掩不住，形成与政府在枪械处理问题上的纠葛，并与佛山商团纠结，以武力威胁政府，最后走上总罢市和军事对抗的道路。^[6]商团事变之后，商团被解散，发动事变的一批首要人物受到通缉，会内的一些顽固分子被清除。1931年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下令与广州市商会、广州商民协会合并，改组成新的广州市商会。该机构曾出版有《总商会报》（周刊）。另外，该会创办有《七十二行商报》，持续出版40余年，但此报后期成为广东代表商人利益的独立性的报纸。

广东省商会联合会：孙中山在南下组织护法政府期间，对广州总商会的所作所为不满意，认为“以该会商董，顽固性成，不通世务，且对于革命进展，多被作梗，思有以改组之，特派杨西岩主持其事，组设广东商业联合会。”^[7]1921

年成立，由刘焕任会长，1928年召开全省商会代表大会，改名为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推选广州总商会会长邹殿邦为会长，会址设在广州市商会内。商业联合会属于松散的团体，基本上没有起应有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迁韶关。1946年10月16日召开全省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到会代表129人，代表89个县市镇商会，超过全省144个商会的半数。选举25人为理事，推蓝逊为理事长。7人为监事。《广东省商会联合会章程》共7章42条，以“领导本省各县市区镇商会，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福利为宗旨。”任务主要有：工商业之改良、征询、调处与公断、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等。规定各县市区镇商会均应加入，并不得退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用记名方式选举理事、监事，从中再选出常务理事9人，常务监事3人，任期4年。^[8]抗战后编辑出版有《商业导报》。

广东商民协会：1924年，广东军政府颁布《广东各级商民协会章程》，成立商民协会。由国民党省党部商民部领导，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圩或市、镇或行、街或邑商民协会。章程21条。以互相协助，谋本地区全体商民利益，协助政府为宗旨。会员2人以上介绍，缴纳会费，遵守章程，即可入会。会员每年缴会费1元5角，其中本会、县或市协会、省协会各缴5角。另缴1元交省协会为基金。以全体会员大会为最高机关，选举5~7人组成执行委员会，5人组成监察委员会掌管会务。此级协会的职能主要是谋地区商务发展，商民自治自卫，调查本地工商状况，调解纠纷，并特

别注重于“政治运动之赞助及参加。”

第二级为县或市商民协会。定章程 22 条。宗旨、职能、会员资格等与第一级协会相同。商民代表大会由各地商民协会选派 1 人参加，超过 50 人增派 1 人，依此类推。大会每年召开 1 次。

第三级为省商民协会。章程 22 条。规定县市商民协会须遵守此章程及议决案，缴纳会费，加入本会。全省商民代表大会为协会最高机关，代表由二级协会会员每 500 人派 1 人出席。每年开会 1 次，选举 9 人为执行委员会，7 人为监察委员会，处理会务。下设文牍、会计、庶务、商务、政治、统计、交际、教育、宣传等科、股。

商民协会为大革命的产物，与当时工农运动高涨一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各地纷纷成立地区性的商民协会，参加者基本都是中小商人，1926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全省协会代表大会。广州市商民协会曾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农民协会、教育协会等组成“农工商学联合会”，支持省港大罢工。又于 1927 年 1 月召开“全市革命商民”组织广州市商民代表大会。会议由全市 6 大商民团体代表组成，先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其审查标准，以是否买办阶级，有无反动色彩为标准。”结果总商会的—一个代表被点名停止其出席。会后发表《广州市商民代表大会宣言》，并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商民“一致奋起，共同反攻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9]

由于商民协会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是为配合革命运动而

产生，当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也与其他大革命时期的民众组织的命运相似。广州“四一五”事件之后，商民协会领导的商民运动走向低潮，旧势力重新控制了广东商界。而国民党当局逐渐改变对商会的政策，对原有的商会组织采取利用和改造的策略。此外，各地原有的商会与商民协会机构重叠，如广州有几个商会并存（即总商会、广东省商民协会、广东省商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市商民协会），经常发生冲突，1930年，国民党中央对全国的商会组织进行改组，根据新的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工会法进行改组。商民协会由此结束。广东商民协会编辑出版有以宣传为主的小篇幅的《广东商民》杂志。

广州市商会：1924年成立。起源于1922年的铺底集议所和1924年的统一马路业权铺底维持会。会员为在广州市从事经商者，以商家为单位，以各行业行头和各街坊商店为系统，初期代表广州市中小商人的利益。由会员推选代表，代表选举董事，再由董事选举主任董事，革除会长制，采取合议制。由于中小商人不满意市总商会操纵控制，故一开始便得到中小商人的拥护，加入者上万人。1931年根据工商部颁布的商会法，与市其他商会合并，改组产生新的市商会，选出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7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选邹殿邦为主席委员。由于广州作为广东最大的商业市场这一特殊地位，广州市商会也在广东商界具有特殊的地位，该会主席一般都兼任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会长之职。沦陷期间在日本人授意下成立伪商会，由植子卿任会长。1946年8月15

召开广州市商会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理事会和理事长，会中两派曾发生严重的纠纷和激烈争论，最后选何辑屏为理事长。

《广州市商会章程》共 8 章 49 条，“以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之公共福利为宗旨。”任务主要是关于工商业之改良、征询、调处、调查、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等。会员分为公会会员和非公会会员两种。公会会员即各同业公会依法为当然会员。未加入同业公会的而已依法登记者亦可加入。非特殊情况不得退会。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公会会员可由同业公会理事、监事中派 5 人参加，而非公会会员则每公司或行号派主体人或经理 1 人参加。该会于 30 年代曾编辑出版有《市商周刊》。

民国年间广东商界虽然成立有各种地区性的联合团体，但这些团体并未按照其章程所定，在业务上加强联络，对于广东的各行业的商业运作及国际国内商业状况进行调查，提出改良建议，以及开展指导等等。其作用大体上还是停留在照章收纳商业税款，调解内部纠纷的范围之内，对于商业之外的事很少参与，特别是与政府相关的事，大都抱着避之则吉的态度，这是广东商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其时商人份子，只务营业，对国家大计，不特不敢论列，竟直没有政治思想，且畏官如虎，以不见官为吉利，故有‘官衙虽近咫尺，老死不相往来’，甚至社会之事，多是不敢与闻。大体通通拿着‘各家打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认作金科玉律，所以商界底下，鲜问时局，亦可见吾粤商人之醇厚也。”^[10]

此为清末广东商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广东商界在政治上曾发挥较大作用的组织是粤商自治会。

粤商自治会成立于1907年，其目的是“组织力量，按步实现其拓财货、扩商权，进而参与新政、兴商富国之伟愿。”^[11]组织者大部分是商界头面人物，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参与。该会拟有章程，成立了董事会，选举了会长、副会长。粤商自治会与后来广东商会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限于商界的事务，而是力图“参与新政”，意在发挥其在地方自治方面的权能。故该会成立后曾发起或参与不少的社会活动，如创办自治研究所，参与预备立宪运动；领导反对英国攫取西江缉捕权的斗争；因日本二辰丸走私军火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等等。该会在当时曾有较大号召力，每次大行动都能动员相当多的人参加。辛亥革命时期，对于推动广东独立曾起过一定的作用。^[12]但该会于辛亥革命后解散。

其后，广东商界也曾力图以其经济实力影响当局，通过对当权者施加压力维护商界的利益，特别是商团存在的时期，曾发动罢市试图左右省长人选。以罢市抗拒外来军阀骚扰的事更发生多次。但随着其势力的壮大，最后走到与政府对抗的地步。“商团事件”之后，商界对广东政治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在广东政局动荡的年月里，每逢省库支绌，需要大笔资金以应对紧急情况时，大都是向商界支借或垫支，采取的也不乏强制的手段，如1927年8月中央银行发生第一次挤兑风潮时。在此之前，广州中央银行为了支持北伐，不得不增

加纸币发行量，而库存现金又被行长宋子文抽调往武汉，导致库存空虚，信用动摇。广州“四·五”政变以及时局的动荡导致发生大挤兑，中行纸币市价一天之内下降了8%，各钱庄银号拒兑，商店拒收。为了稳定中纸的币值，广东当局强令向商业公会借款600万元，向银业公会借款400万元。商业公会和银业公会的头面人物最初希望当局减少借款数额，亲自出马与当局谈判，而当局不由分说，将他们拘留，并限令当天呈报各商户承担的数额，否则警察前往各店将账簿提走，将店内现金封存。抗拒或逃避者将被吊销商业牌照，财产全部充公。次日，全广州市的银行、钱庄都被保安部队和武装警察查封，不准营业。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商人只能俯首接受，乖乖认缴。

相对而言，在与政治无关，纯粹经济因素的纷争出现时，如当局颁发的政令对本身的生存环境和商业利益造成损害时，商界还是敢于向当权者抗争。

1929年税制改革，商界对当局制定的《广东省印花税暂行条例》大为不满，认为该条例弊害丛生，为病商场。中央所颁布的印花税则，本已分条、类、种，相当详细，而印花税局“犹恐搜罗不尽，每类每种之下，复加以签注，比附之广，深文之工，均较原列种类，倍为繁重。”比如催账单，本来规定没有收到款，此类账单不必贴印花。而税局则勒令一律要贴，不贴就要受到处罚。以致有同一货物，从购人到卖出，其间经过贴印花的有提货单、定货单、出货单、发货单、收银单、汇票、年节单、催账单等共九种之多。“漏贴

一分一角之税票，罚款或多至千倍万倍。”

广东的印花税税则规定，检查印花人员如检获违例单据，可以获得奖金，于是“官吏视收入为考成，员司视奖金为利藪。”检查人员“一进商店，倒荚翻箱，虽银库铁柜，随意封锁。”检查人员将账单簿据取走后，按规定须层层送审，才能判决。其间迁延辗转，常常要数月以至半年多，商店才能取回账簿单据。即使并未违例，但一些重要的单据不能拖延，商店急于取回，忍痛接受罚款，或向办事人员行贿。

此项条例公布之后，商会曾多次向当局提出异议，未获采纳。1933年5月1日，广州市商会与汕头市商会联函呈南京政府行政院财政部长宋子文，指出广东“竟以全国通行之税法，变为一省单行之税法，签注密于牛毛，执行苛于猛虎，在政府初以为暂行无碍，在人民遂陷于久病不痊……于是各国认为最良好之税制，吾粤民众，几认为最普遍之痛苦。”要求将广东省印花税暂行条例及罚则，迅予改善，另颁全国通行划一税法，以昭公允，而利进行。随后，财政部重新核定广东印花税的详细项目及处罚限则，对原有的条例和征收细则进行修改。^[13]

广东商会对当局的政策进行抗争的另一件较大的事件是反输管运动。1947年2月广东开始推行输入许可证制度，7月正式实施输出人管理制度，7月21日，广州市商会即行召集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讨论对策。随后向行政院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发电报提出意

见。意见书说，自从抗战胜利之后，广东人民力图复兴，如广州市商行纷纷建立，小工业如雨后春笋，虽然设备简陋，但给广州商场予一线生机，渐有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自从实施输入许可证制度和新的结汇制度之后，工厂因原料缺乏而停工，商行无业可营，影响地方经济，人民失业，而酿成武装分子走私成风。意见书中说，按照分配给华南的输入金额，平均分配给已登记的进出口商行，每月每个商行只有30.773美元（后来增加一倍），这笔钱对于一些直接与国外贸易的大商行来说，还不够一个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其次，在商品出口额的分配上也不合理。如输入管理委员会将煤油进口额的80%给亚细亚等3家外国公司，10%给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石油公司，另10%给上海已登记的进口商，而广东已登记的煤油商却不准进口煤油。出口方面，广东与他省不同之一是侨汇多，侨汇的相当部分是用于采购广东土产，新的结汇办法所定的汇率太低，结果是使从事此项贸易的商家亏空60%以上，以致99%的侨汇逃往港澳。还有，桐油、猪鬃等商品被统制，所定的官价太低，等等。意见书要求政府除本国已有生产的产品外，其余准许自由进口，或参照1937年广东进口总额（即法币253303333元）和物价指数上涨率，给广东平均每年1310万美元的进口额。工业原材料进口不必持许可证。侨汇按市场价结算等。^[14]8月15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访华抵达广州，广州市商会理事长何辑屏向魏德迈提供了《广州市工商业经济金融状况及意见书》，这份意见书也是针对输管制而发。其后，广州市商会

等商业团体多次向行政院、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与该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提出各种意见，要求取消输管制度，准许自筹外汇办理进口业务，实行进出口连锁制度（即以出口所得外汇购买进口商品等等）。这些意见书一部分得到采纳，如进出口连锁制度以及自筹外汇办理货物进口等。

商会是一个区域性的松散的组织，其内在的利益关系远不如同业公会那样密切，在营造和维护本身生存环境、商业利益等方面，同业公会要比跨行业的商会更积极和主动。同业公会都制定有一些行业的规章，以保护本行业的利益和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甚至有行业垄断的作用。以最普通的行业如故衣业为例，贩卖旧衣服是个非常普通的行业，凡是经济不景气的年代，故衣业便大行其道，繁荣昌盛。广州市故衣业发达，抗战前省外和乡下经营故衣的客商到广州进货，一般都是到板箱巷的故衣市场去购买。但是，要进入板箱巷故衣市场觅得一个档位却不容易。板箱巷故衣市场称为“有恒堂”，建于清朝咸丰年间，是行业中的人士为了集中故衣的各种品类，以方便外来客商采购以及同行内部相互交流而设。为此，该行订有规章，规定凡是在广州市经营故衣店3年以上并缴纳费用者，或是参与“有恒堂”建堂的有继承权的子孙，才得以进入该市场开设摊档。广州市的一些“大行头”如花纱业、米糠行等，基本上都控制在少数实力雄厚的人手中，对于试图加入该组织的商家设置了种种难以跨越的门槛，从而垄断了该行业。

由于利之所在，行业内部既有联合也有利益争斗，故大

多数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都是松散的联合，徒有空头招牌而已。但作为商会的下级组织，同业公会在协助开展和保护本行业业务，调解劳资纠纷，给会员予必要的帮助等方面，都是它应有的最基本的职能。特别是外来产品的冲击影响到本行业生存的时候，同业公会在谋求本行业生存空间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其中火柴业、土制煤油业、鞋业等几个半工半商的行业公会，在受到外来商品激烈竞争时，联合本行业全体成员的力量，采取统一行动，在保护本行业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

以火柴业为例。1924年，广东工会运动活跃，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的事经常发生，火柴工业当时正处于兴旺发达时期，工人的工资有了较大提高。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以后，瑞典和日本的火柴在广东大量倾销，以及大量走私品的流入，外国火柴以其价格低廉在广东大行其道（洋火柴因走私漏税等原因，每件仅售价6~7元，而土制火柴则需每件8~9元左右才能不致亏损），加上同业竞争，使广东火柴受到沉重的打击。该行业于1928年改组成立广东火柴商业公会，其后又易名为广东土造火柴业同业公会。各生产厂家鉴于环境恶劣，于是谋求行业中的团结，举全行业力量与外来火柴竞争。1930年，火柴同业公会向政府提出保护本省火柴行业的请求（其后该会又于1931年、1933年及1936年就保护本省火柴业向当局提出诉求）。省当局调查该行业情况后，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开征火柴内地消费税，规定所有在本省销售的土洋火柴一律每件交2元的税，使火柴的成

本大大提高。另外，本省生产的火柴则发还原料税（与内地消费税额大致相等）。1933年1月，同业公会“订统制生产之办法，确定各厂生产能力，然后参酌市场状况，于每月五日公布生产比率（由各厂家公同议定），以为标准，避免生产过剩之损失。”^[15]还成立粤省火柴联合推销处，各厂家生产的火柴一律交给该处统一推销，以防止同业间降价竞争，抵御外国火柴的倾销。还发行本行业的行情汇报，确定各类火柴的价格。至1933年，因火柴业的严重衰落而各厂全部停产，广州火柴积货达180余万元。由于行业的团结，通过努力，广东火柴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挣扎后，于1935年重新复苏，产品畅销国内市场。

与火柴业的处境相似，土制煤油业、鞋业也受到外来商品的强力挑战，也发生各商家为了生存而不惜制造劣质产品，从而使全行业处于困境的情况。这两个同业公会也曾向政府要求给予特殊的政策，对同业中的生产规模、生产数量和销售方式进行限制，对产品的质量有较规范的监督管理等等，从而保证了该行业在经济危机时期勉强维持下来。

从广州市行业公会构成，可以略见广东省商业行业的大体情况。

广州市各行商家统计暨同业公会地址一览表^[16]

行业	间数	同业公会地址	行业	间数	同业工会地址
粮食批发	209	六二三路404号	新旧家私	105	南华中路125号
粮食零售	699	同上	绒线	19	上九东积金巷64号

(续表)

行业	间数	同业公会地址	行业	间数	同业工会地址
糖面杂粮	159	一德路 442 号	生丝输出	6	高善西一巷 8 号
盐业	168	新堤 196 号	毛巾织造	82	带河路 185 号
油豆	22	贤乐里 12 号	纺织工业	160	恩龙路锦龙社 13 号
京果海味	103	浆栏路 74 号	针织工业	67	积金巷 2 号
酱料京果	108	龙津中土兴巷良园	织布工业	407	大德路 25 号
土榨油麸	25	十八甫南 91 号	机缝	380	惠爱中 221 号
罐头伙食	51	贤乐新巷 8 号	建筑	396	--
碾谷	28	越秀南路 11 号	棚商	99	纸行街王永和内
机制面包	8	--	杉木	229	大德路 407 号
猪栏	19	新堤 164 号	石商	21	八旗大马路 2 号
猪肉	292	--	海沙石矿	19	同上
牛栏	26	越秀南 22 号	砖瓦石灰	120	大德路 407 号
鸡鹅鸭业	75	光雅里 43 号	酸枝柚木	38	西来正街 17 号
鲜鱼	18	六二三路 476 号	汽车商业	43	丰宁路 109 号
咸鱼	38	一德路 356 号	运货汽车	35	太平北 265 号
牲鱼经纪	47	贤乐里 21 号	人力货车	63	一德路 382 号
酿酒	49	--	轮船	371	新堤 196 号
售酒	161	丰宁路花县公会内	装船	113	泰康路 68 号

(续表)

行业	间数	同业公会地址	行业	间数	同业工会地址
菜栏	129	小市东街 22 号	轮船什项	62	—
鲜果咸货	94	—德西旧云南会馆	承揽运送	50	西荣巷 19 号
茶业	69	十八甫南 91 号	机器工业	107	河南厂后街 18 号
饼饵商业	60	贤乐新巷 8 号	银行	26	长堤永安堂六楼
椰子槟榔	7	—	金商	250	上九路布行会馆
土烟叶业	19	十八甫 91 号	钱银	118	西荣巷 12 号
土烟切制	196	—	茶楼饼食	32	贤乐新巷 8 号
卷烟	109	棠栏路 74 号	酒楼茶室	239	—德西 502 号
汽水	41	丰宁路 118 号	戏院	19	—德中 486 号
纱绸布	137	上九路 30 号	旅业	181	—
匹头	189	扬仁中一号	保险	15	—
土布	33	上九路 20 号	报关业	88	西堤二马路 96 号
纱商	153	西荣巷 19 号	参茸药材	135	上九东 15 号
顾绣	26	—	南北药材	147	贤乐里 20 号
新衣	124	新胜街 17 号	熟药丸散	262	大德路 389 号
故衣	79	海珠南路 154 号	成药出品	136	上九东 15 号
新药	144	棠栏路 74 号	印刷	167	丰宁路 118 号
华洋百货	233	德星路积金巷 1 号	石印	20	富善西三巷 8 号

(续表)

行业	间数	同业公会地址	行业	间数	同业工会地址
钟表	188	泰康路 64 号	煤油工业	11	南华中联珠直 6 号
靴鞋	146	高第路 229 号	煤炭	38	德兴南 41 号
牛皮鞋料	152	新胜街 33 号	煤油类	119	广济医院内
化妆品	23	德星路积金巷 1 号	电池业	30	—
橡胶制品	40	丰宁路 12 号	木炭	47	中华中路魁巷 20 号
玻璃镜货	22	广济医院内	火柴商业	24	陈唐南 37 号
电器水喉	288	大新路 158 号	火柴工业	14	—
洋染料业	39	扬仁东 1 号	藤竹草席	338	海珠街 30 号
十洋颜料	83	杉木栏 48 号	西竹	4	—
五金	314	大德街 48 号	生花	14	—
度量衡器	52	杉木栏官埠 9 号	仪仗	17	越华路 67 号
电镀	83	长寿东 23 号	模型札作	71	—
化砂玻璃	46	贤乐新巷 8 号	木箱	51	大德路 407 号
文具书籍	71	光复中 62 号	麻包	56	杉木栏官埠 9 号
纸商	195	海珠南 183 号	洗染衣服	98	富善西三巷 8 号
机制饼干	8	惠爱东 301 号			

第二节 从商经验与商业道德

有人总结 20 世纪 20 年代广州市商业界的一些通病，主要有如下 6 点：对商品缺乏广告和装潢；个人卫生与仪容失检；对待客人缺乏礼貌；商业基础知识缺乏；顾私利而忘道义；缺乏信用。^[17]该调查人员举了一个颇有意味的例子：某人因想购某种物品，但遍寻报纸上的广告而不可得，后得朋友指引知道某商店有出售，于是欣然而往。刚进商店，便看见几个上身赤裸的大汉在店内嬉戏，对来客爱理不理。待到客人问起物品，店员才带着疑问的眼光对来客说：你是不是真的要买，这东西很贵的，你能不能买得起？再进而拿出物品掷到客人而前。这位客人一看果然是想买的东西，但却是旧货，且索价比平常要高得多，因求购心切，便要求换个新的，买了下来。可是，回到家打开包装一看，竟然是废品。

上述的例子在商业界是常见现象，在广州尚且如此，在广东其他地方更是普遍存在，可说是广东商界的通病。但是，如果说店员不讲仪容，不讲个人卫生，对顾客缺乏礼貌，缺乏商业基础知识以及没有商品广告意识，将商品广告视作额外耗费等等，是带有普遍性的通病的话，就商业信用来说，上述调包欺骗顾客的例子却只是少数的现象。总的来说，民国年间广东商界最讲究的还是信用，也正因为如此，“烂信”、“赊欠”的经营方式才普遍存在。比如潮汕商界有很好的受外人称誉的传统，就是非常讲究信用。如揭阳某经

营豆饼的商店需要向汕头某经营豆饼的批发商要货，只要由前往汕头的熟人，或是跑生意的，甚至是船夫传话，说明某商店需要豆饼若干，并说明交货的时间，汕头的商家就会如数将货物托船运过去，然后根据行规按时间派人前往揭阳收款。而揭阳的商家也会如数付账，绝不会以“口说无凭”之类的借口赖账。^[18]市场风云诡秘，价格千变万化，有些商人投机失败，商家前来收账，无法支付，但仍需履行承诺，结果自然是听任其清点变卖家产。这类的例子在潮汕屡见不鲜。也正因为如此，潮汕人常常能够以小本钱做大生意，并获得成功。

沿用传统的口头承诺的信用，商家之间，商人与顾客之间，都以遵守“一诺千金”为准则，商品交易没有必要的契约单据等手续，在广东商界是一种普遍现象。表面看，这种口头缔结契约的方式虽被认为是广东商人讲信用的优点，但也是一个重大的缺点，碰到一些事关巨额盈亏和损失的贸易纠纷中，没有必要的手续，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也免不了会有心怀不轨者利用口头承诺的缺陷，以逞其欺骗牟利之用心。一些交易虽有进货单、出货单一类的单据，但多半设置的项目不完善，最常见的是缺少确切的期限。没有期限，狡黠者利用其作牟取利益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在市场价格不稳定的时候，碰到价格低，便找各种借口拖延交货时间，以图上升到最理想的价格时才出手。这种现象在潮汕的一些货物，特别是肥料类的交易中较为常见。潮汕平原地域狭小而人口众多，水果蔬菜的种植发达，需要大量的外来肥料，特

别是东北的豆饼和上海的肥田料。种植作物的施肥讲究时效，适时施肥有事半功倍之效，相反，过了最佳时间再施肥，则是事倍功半，而肥料则可适当囤积，于是，一些从事该项贸易的商人便利用没有交货时间契约的空子，尽量控制肥料价格，以致潮汕的肥料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当地的“数期”，即还账、清账的期限，则是以豆饼、肥田料、米、大豆这几种最为严格。另外，缺乏必要的契约制度，对于与国外商家之间进行商业交往，显然是行不通的。

民国年间中国商业正处于传统商业经营管理模式继续存在，而新式商业经营管理方式正逐渐引进，并影响和改变传统的商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时期。上述的广东商业界的一些丑陋现象在旧式经营的商业中不少见，但在新式经营模式的商业中却是不允许出现的事。而这些新式商业模式的诞生，也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旧的商业模式。

在商业经营管理模式“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广东商人在学习西方的商业经营管理经验，用于改造中国传统的商业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和影响深远的示范意义。这些广东人经营的新式商业，主要是百货业，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有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等公司。

先施公司创办人马应彪，中山县人，早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经营“永昌泰”金山庄。在此期间，他对当地一家英国公司的经营方式很感兴趣，在与这家英国公司的业务往来中，注意考察其组织结构和商业运作方式，准备日后回国仿效。1900年，马应彪在亲友支持下，于华侨中集资港币25000

元，在香港创设先施公司，10年之间，公司资本增至20万元。由是不断扩充公司业务，1912年筹设广州分公司（长堤），1914年开业，191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设分公司，此后不断扩充，逐渐成为中国著名的百货公司。澳门十月初五街也有分公司；广西南宁、新加坡也曾开设分公司，后因故关闭。

与先施公司相似且在全国商业界影响巨大的是永安公司。该公司的创办人郭乐兄弟也是中山人，也是早期在澳洲水果店任职，后来开办永安果栏。1907年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附设金山庄，兼办进出口生意和华侨汇款。1913年开始筹办上海分公司，1918年开业，开业时轰动上海，每天营业额超过万元，顾客络绎不绝，一个季度的商品储存，20天即卖出过半。1919年的营业额达到455万元。

大新公司创始人蔡昌也是中山人，也是在澳大利亚经商，参与了先施公司的创办并任董事。1912年集资在香港开办大新公司，1916年在广州筹设分公司，建有13层的高楼，是当时广州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据广东省商业学校商业考察团30年代初的调查，设于广州西堤的大新公司（不包括惠爱路的分公司）的资本为400万元，仅百货部的营业额每天就超过万元，其经营兴盛可想而知。1932年大新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投资600万港元，建起了10层的大楼，内设电梯及冷气，其豪华新颖，引起轰动。

除上述先施、永安、大新之外，1926年广东人在上海创办的新新公司也是著名的大百货公司之一，与先施、永

安、大新号称“四大公司”。这些大百货商店店址都设在南京路，南京路由此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广州，由于大新、先施等公司的崛起，西濠路、长堤一带逐渐取代西关，成为广州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惠爱路一带，也因先施、大新等公司在该地设有分店而逐渐成为商业中心地带。在广东汕头、江门、中山等地，类似的新型百货店也不少。

以上新式商店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高层建筑，如1912年筹设、1914年开业的先施公司广州分公司有一幢5层楼房，楼上楼下均作为售货商场，改变了以往商业店铺都在楼下街面的传统习惯。天台辟为游乐场，铺陈奇花异草与珍禽怪兽，还设有电影院、戏院、茶室、餐饮以至照相馆、理发店等，凡能吸引顾客的各种措施，无不想方设法。先施公司还附设有一些生产商品的工厂，如汽水厂、化妆品厂、家私厂、制鞋厂、饼干厂、玻璃厂等，这些工厂生产的一些产品，如化妆品、玻璃器皿、家私等，都颇有名气。此外，公司设有东亚大酒店。这种以吸引顾客为目的，经营与生产相配套的做法为随后而起的新式公司所仿效。

先施、永安等大公司最初大都是在亲戚、朋友、乡亲支持下，集合少量的资金艰难创业，随着生意的发展，逐渐在华侨中募集资金，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公开招股。这种结构体现了广东商界的一个地方特色，这就是，不少在国外谋生的广东人投身于商界，在接触西方商业文化的过程中吸取了国外商业的先进经验，将这些先进的经验运用于改造中国的传统商业模式，他们集腋成裘，积聚资金，在艰难中进取，终

于取得成功。在管理形式上，这些公司都是学习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都是采用有限公司的形式组织，最高决策为股东会议，常设董事会、经理部、监察部、管理部等。有专门的会计师，聘请有法律顾问，采用新式的记账方式。先施公司最早是在香港开办，后来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分公司，初期这些分公司之间属于联号性质，1919年起实行合并，由香港总公司统一调度，总资本700万元港元（至30年代初，上海、广州分公司的资本都在千万元以上）。广州、上海两分公司设参事部。参事部的作用在于秉承总部的命令，对分公司的事务负责。这种结构使资金更加雄厚，利于资金周转，事权归于统一，而人才也可以相互调剂，货物采购和本身产品的销售等等，都利多弊少。为大型公司的经营管理提供了经验。

这些百货公司都以经营“环球百货”为号召，各国的名牌商品，如英国的棉布、呢绒、羊毛衫，法国的绸缎、化妆品，德国的五金器材、玩具，美国的丝袜、电器用品，瑞士的钟表，捷克的玻璃器皿，瑞典的搪瓷，日本的毛巾等，无不具备。这些公司除向当地的洋行进货之外，还在英、美、日等国设立办庄，或每年派人出国采购。^[19]不过，这些公司早期经营的商品中，本国的工业品占较少的分量，永安公司早期经营的商品中，国产工业品仅占2%，土特产、手工艺品占25%，其余73%都是洋货，这种情况到后期才渐有改变。^[20]这与当时我国工业落后相关。30年代初广东商业学校组织学生对这些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这些大公司的商品

结构已大有改变，先施上海分公司“九一八之前所进商品，国货占百分之二五，洋货占百分之七五，现则反为国货占百分之七五，洋货占百分之二五。”永安上海分公司“三年前洋货占六成，国货只占四成，今则国货占六成，洋货占四成。”^[21]

新式商店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实行货不二价，顾客购买物品不论多少，均开具收据。当时商业界通行的都是按货论价，讨价还价被认为是商场规矩，一桩买卖交完现金便告完结。先施公司创办之始，马应彪在联络亲友集资时，货不二价的经营指导思想便遭到普遍的反对，认为按货论价和讨价还价是商场规矩，这种习惯不容易改变，不二价的经营方法只能行于国外，但马应彪坚持认为传统的习惯也可以改变。^[22]也正因为提倡不二价的经营方式，在公司创办之初公开招聘人员时，凡是老于商务者均不肯应聘。公司不得不从乡下招聘年轻人，以练习生的身份开张营业。然而，一年之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广东商业界用人制度在民国之前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历来都是雇工制度，初入商店要经历2~3年的学徒阶段，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也没有固定的工种，店东可以随意支配干各种各样的重活累活。学徒满期，当上店员之后，与学徒时期相比，只是有了人身自由和微薄的工资而已。工作时间没有固定，这是商店的一个通病，没有固定的营业时间，近乎农家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更无所谓休息日。店员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劳累过度

使许多人不堪重负，影响积极性，自然也难以要求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民国初年广东新式商业则开创了用人的新经验。如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等都是公开招聘营业员，营业员都是从练习生做起，实行分级工资制。除了提倡女子从业外，还开创女售货员的先例。鉴于商业界对低层职员的待遇太低甚至苛刻这一传统大大影响了员工的积极性，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等大公司对低薪阶层职员的重视与关怀大为不同。首先，公司给职员工资的原则是不能低于其维持生活的所需；其次对于医疗卫生、教育、体育等方面都给予相当的考虑。如店员都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而且有休息日（先是每星期休息半天，后来改为每星期休息一天）。除了薪金之外，还给予食宿。公司一般都有专职医生，员工普通的疾病可以免费治疗。这些待遇均较传统的方式更有吸引力。

广东商业号称发达，但广东商业从业人员培养和训练则是严重滞后。民国初年，广东只有汕头设有商业学校，广州市直到1922年才设市立商业学校，每年培养出来的商业人才寥寥可数。故广东商业界人士绝大多数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由此严重影响了商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这些新式公司对于从业人员一般都会定期进行训练。训练分德、智、体三方面，德育训练指服务方式与服务态度的训练，智育训练则为业务学习，包括对部分员工的英文、算术等方面的培训，以及设置阅报室、音乐室，为员工提供工余的活动场所等。体育训练主要是组织员工开展一些体育活动等。由于这些用人的措施，使新式商业的从业人员与传统的店员有完全

不同的精神面貌，也有完全不同的服务态度。另一方面，公司对职员的管理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把每天营业额的多少作为店员考核的主要内容，这些管理方法对于我国商业管理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

新式的公司都很注重商品和本身产品的宣传，除了售货橱窗之外，都设有专门的宣传橱窗，向顾客和路人展示商品。橱窗一般是每星期更换一次，除了宣传本店出售的商品之外，还代厂家展示产品，收取费用。橱窗宣传曾出过一个颇有意味的笑话。1932年成立的振源公司是汕头市的一个新式百货公司，它也是归侨与海外华侨集资兴办起来的。该公司很注重橱窗的摆设陈列，以此招徕顾客。有一位南洋回来的华侨不时从公司门前经过，看到橱窗内摆有一个花瓶，花瓶上是山水人物画，其中人物所持的雨伞，下雨的时候就会张开，天晴的时候又会收拢。仔细观察了多次，都是如此。这位客人以为碰上了宝物，赶紧悄悄买下。但是，这花瓶带回南洋后，不管天晴下雨，雨伞都不会张开。后来回汕头，特地到振源公司询问究竟，才知道原来有两式形款一样的花瓶，差别在于一款是雨伞张开的，另一款是合拢的。橱窗陈列人员根据不同的天气摆出不同款式的花瓶。^[23]从一事例可略见30年代广东商界的橱窗艺术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

与内地其他地区相似，民国年间广东市场是国外商品的天下，广东商界也有大批人为外国公司服务，替洋行推销货物和收购土特产，这些混迹洋人圈的商人中，不乏正派的经纪人，但也派生出一批以媚外自肥的买办。一些人为了获取

洋人的青睐，不惜牺牲他人甚至国人的利益。潮汕抽纱的手工价格受到洋行的一再压制，就是一些不肖买办干的好事。潮汕抽纱的成本非常低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工艺上。它是作为潮汕妇女的家庭手工艺品，以其精美而在美洲市场上很受欢迎。因为语言上的困难，经营抽纱的洋行都是通过当地商人代理，早期抽纱的价格基本上是双方商定。因为洋人对情况不了解，故做工的费用一般都定得较高。潮汕妇女以操持家务以外的时间做些手工，即可帮补家用，一些家庭也因从事此项工作变得宽裕。后来一些替洋行做事的人给洋人献媚，将做抽纱的各项工序、所花的时间、材料及价格等等给洋人算了明细账，建议洋行压低收购价格。其后，由一家而数家，再进而所有洋行联合起来尽量压低抽纱的价格，抽纱的手工报酬因此逐年下降。

上述事例涉及商业道德范畴。商人重利，商人逐利，利之所在，如蚁赴膻，罔顾他人甚至于整体的利益。抗战期间南雄纸商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南雄县是广东省主要的产纸地，每年可产竹纸 20 万担以上。其中部分纸运销南洋、香港等地，作为造纸厂的原料，经过再次制作成高级纸，运销国内一些省市。曲江、南雄等地均有不少纸行，专门做纸的生意。每年纸行都预先贷款给农户，作为购买制纸所需的材料，如石灰等，以及请外地人作帮工，这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因为纸农大都相当贫苦，没有这笔钱就几乎无法生产。抗战期间，由于海上运输不正常，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洋纸来源断绝，使当

地纸业摆脱长期受洋纸压抑的状况。由于有传统的生产条件，使该地的纸张生产每年维持在 15 万担左右。抗战后方日用必需品几乎样样短缺，能够做到供求平衡的，大概只有纸类这一项了。但是，在 1943 年，南雄的纸张生产突然减少到只有 3 万担，使原本供求平衡的纸业陡然低落，连抗战后方的纸也出现供应紧张，其原因最主要是纸行商人不再给农户贷款，使许多纸农无法生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来统治广东市场的洋卷烟不能再进口，外国烟草公司改为加强在中国境内的卷烟生产，于是卷烟业一时成为当时最有前途的行业，南雄黄烟和许昌烟叶都被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于是烟业走了鸿运，1942 年 7 月南雄黄烟登场时，每包仅售 650 元，到 12 月中旬便涨至 17500 元，涨了将近 27 倍。而同期纸张却只是涨了不到 1 倍。于是 1943 年，唯利是图的纸行商人便不顾长期以来的合作惯例，将原来投资纸业的资金都转投烟业，不给农户贷款，使纸农遭受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位年逾花甲的纸农到工业合作社南雄事务所要求贷款，当听到无款可贷时，“便双脚大跳，热泪盈眶。他说我做纸已有六代，惟有今年最难，往年纸行可借，今年纸行不肯放。我的笋已高过人头，再不倒（砍），今年完了。”“这种悲惨的农村生产实况，赤裸裸表现我们要谈生产救国，第一步非活跃农村经济不可。”^[24]

广东的草席工人工资极低，生活很困难，20 年代草席市场状况较好时，一般的织席工一天可以赚取 0.4 元的收入，虽然很微薄，但尚可维持生活。随着广东草席在国际市

场上受到日本等国家的草席的竞争，出口量大不如前，且价格低迷，30年代之后，织席工一天只能挣到0.1元左右。种草者除草价低受损失外，还经常受秋季台风的袭击而毁坏收成。即使如此，草席商还是想方设法牟取最大的利润。如除获得正常的利润之外，还用不正当的手法牟利。就是向草席编织工支付广东的辅币，以广东的小洋作单位。但外国出口公司向草席商购买草席时，则以大洋为计算单位，支付港币，这样，草席商可以从币制兑换中另外赚得5%~6.5%。^[25]

商品掺假在民国年间广东对外贸易中是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各式各样的商品品种，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广东商界的名誉，也给生产者带来连带的损害。

粤海关十年报告中说：“农产品掺假目的在于增加重量或使产品外表色泽更好，等等，自古以来本省就一直使用这种办法。可是它对出口货物的影响，即使有也是很小的，因为这种掺假商品大都出口往香港，而香港必须依赖广州供应大量产品，因而不管这些产品掺假与否都得接受。目前还无希望根除这种弊端。大量出口国外的烟草和水草没有掺假现象。”^[26]应该说，当商品尚无可替代时，虽然产品掺假亦被迫勉强接受，但当有其他产品参与竞争时，这种掺假物便必然会遭到市场的冷遇。广东丝业在国际市场的每况愈下，个中就有掺假品在作祟。

潮汕糖业在民国初年曾占据中国糖出口的半壁江山，但到了20年代末，出口量仅为民国初年的1/10左右，以产糖

著称的潮汕地区反而成了洋糖的天下。其原因除了受到洋糖倾销的打击，蔗农因成守旧，不知改良之外，也与糖商有很大的关系。赴潮汕调查的人员在实地调查后揭示了这些奸商作伪舞弊的伎俩：“如制造白糖，每掺入白色之树薯粉，或购买洋糖翻制，因洋糖价格低廉之故。如制造赤糖，则取白糖澄下之糖汁、糖渣，用火烤干，掺以细沙白灰，再染以颜色，以图增加其重量……殊不知弄巧反拙，一经觉察，信用毫无，伤害根源，莫此为甚，糖价遂一落千丈。”^[27]也正因为品质低劣，连本地商家也对土糖不信任，认为洋糖远胜于土糖，特别是饼饵一类的制造商，大都不用土糖而用洋糖。其结果自然不仅土糖商自食其果，蔗农也免不了受到生产萎缩等连带性的损害。

商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是寻常事，战后广东商界在角逐广州市商会和广东省商业联合会的控制权时，曾演出了一幕幕令时人瞩目的闹剧。1946年8月广州市商会举行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市商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经过激烈的幕后竞争，以C.C.系为后台的何辑屏击败了多年来市商会的头面人物邹殿邦，当上了广州商会理事长。落败的邹殿邦一派代表广州市大商家，如银钱业、盐业、米业、花纱业、土制煤油业等“大行头”的利益，对于这一结果很不服气，邹派一些当选为市商会理事、监事的人也宣布退出，并不断活动，要求重选，但未能如愿。此时，南京方面正准备于11月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按规定广东方面必须召开全省的商会联合会代表大会，重新选举新的商会领导人，并选出代表参

加全国大会，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不得不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是时，省商会联合会仍然在邹殿邦一派的控制中。这次会议定于10月16日开幕，但直到10月15日，广州市商会还没有收到邀请出席的通知。外地的代表中与何派关系密切者趁机起哄，向省主席罗卓英等党政军要员上请愿书。直至开会的第二日，在省党政要员的斡旋之下，广州市商会才获准派5人参加。当晚省商联合会主席团在胜利酒店宴请代表，市商会则在南园宴请代表，时间都定在7点钟。这次会议的明争暗斗较市商会代表大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在省市当权者背后支持下，邹氏一派不得不退出选举，蓝逊当选为省商业联合会理事长。落选者又于次年4月组织“广东省商业协进会”，选举邹殿邦为理事长。该会以“协助全省商人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工商业之公共福利为宗旨。”凡在本省从事商业的人，经介绍均可成为会员，而不是如市商会和省商会联合会要以同业公会为单位。^[28]

如果说上述的闹剧给当地人以笑柄的话，那么关于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接轨一事，则被国内外同界视为笑话，也是反映广东商人狭隘特性的典型事例。

粤汉铁路从1902年勘测开始，后来分段修筑与通车，至1915年才勉强修到韶关。韶关至株洲一段因崇山峻岭所隔，直至1936年才修通。广九铁路分英段（香港九龙到深圳）和华段（深圳至广州市大沙头），全长188公里。从1906年起分段修筑和通车，于1911年10月5日全线贯通。该路是由中国与英国两国政府合办，经不断改进路轨和提

速，至30年代时速约为60公里，为全国铁路时速最快的一条铁路，广州至九龙全程要花2小时57分。由于与水路竞争，货运不发达，主要还是用于客运，因省港间往来乘轮船要慢得多。两条铁路因各种综合因素，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在广州市范围内相距不过4公里，按常理，接轨是必然的事。故两条铁路建筑之初，英方就计划两条铁路连接，初定广九路的终点在广州东山共和市（今广州市东山区共和路一带），但广东商界认为两路接轨将有害于广州市的商业，故最后将终点定在大沙头。1918年，交通部与广九铁路债权人中英公司就两路接轨再次会商，并由外国工程师实地测量规划了接轨路线，是由东山经小北路至黄沙总站相接。可惜当时广东战乱，计划胎死腹中。1921年粤军控制了广东政局，有关方面再次提出，向陈炯明表示愿意提供经济援助，此事因政局动荡而作罢。北伐结束后，旧事重提，1929年粤汉铁路与广三铁路完成了接轨。1930年南京政府曾打算以发行公债筹集资金，收购粤汉铁路私人股份，以完成两线接轨。其后香港华商总会也曾为两条铁路接轨而不断努力做各方面的工作，甚至上书交通部，力陈利害。但是，上述的努力不仅遭到广州商界的坚决反对，连广东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公开出来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广州市商界反对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接轨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如果两条路连接，那么由香港北运的货物经过广州市不必停留，广州便成为“过而不留”之地，从而会导致工商业的衰退。他们以东莞石龙为例，认为石龙原为广东商业

四大镇之一，自从建了广九铁路之后，石龙成了香港货物“过而不留”之地，市场地位大受影响，铁路接轨，将使广州步石龙之后尘；北江的商人不必到广州采购，广州各行业均大受影响；香港日趋繁荣，其货物直接北运，内地工厂多一劲敌，国货因之难与洋货抗衡；广东省的各项税收，将因之大为减少；原来依赖车船货物接驳而生存的工人，如船工、搬运工等，生活将大受影响，等等。最后的结论就是，粤汉与广九接轨，广州市的商业必遭惨败。^[29] 由于阻力太大，两条近在咫尺的铁路始终不能连接，直到“两广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驾临广州，曾召集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此时再也没有人敢出面反对了，争论了 20 余年却始终无法连接的路终于由新修筑的黄埔支线相连接。

注释：

- [1] 《广东商务局联合商群》，载《东方杂志》第 7 期，第 42 页，1904 年。
- [2] 《广东总商会章程》，载《东方杂志》第 12 期，第 154~157 页。
- [3] 《广州市商运沿革提要》，载《广东商运沿革史》第 6 页，1934 年。
- [4]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号》，1931 年。
- [5] 《粤省商团月报》第 2 期，第 5 页，1919 年。
- [6] 《广州总罢市的解决与商团联防》，载《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12 号，第 8 页。关于广东商团事件的研究成果不少，故不赘述。
- [7] 《广州市商运沿革提要》，载《广东商运沿革史》第 8 页。

- [8] 《广东省商业概览》第20~23页，1948年。
- [9] 《广东商民》第3期，第16页，1927年1月。
- [10] 《广州市商运沿革提要》，载《广东商运沿革史》第5页。
- [11] 李衡皋、余少山：《粤商自治会与粤商维持公安会》，载《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24页。
- [12] 邱捷所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一书中，《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一文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参见《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30年。
- [13] 《为印花税事呈院部文》，1933年《广州商业年鉴》附件。
- [14] 《广州市商会暨各商业同业公会请求输出人管理委员会改善输出人管制以拯工商危机意见书》，载《广州市商会周年特刊》，1947年。
- [15] 《广州之工业》第43页。
- [16] 资料来源：此表据1947年《广州商场年鉴》中《卅五年广州市各行商业家数统计》和《行名录》编制。
- [17] 高灵光：《关于本市商业改造的几种观察》，载《广州市市立商业学校九周年纪念特刊》第41~42页。
- [18] 参见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第58页。
- [19] 王相钦、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462页。
- [20] 王相钦、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462页。
- [21] 《省商学生》第5期，第6、9页。
- [22] 《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页，1924年。
- [23] 李蔚文：《30年代汕头市“四大公司”》，载《汕头文史》第10辑，第135页，1991年。
- [24]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第291~292页。
- [25]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448页。

- [26]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 1082 页。
- [27] 《调查潮糖报告书》，载《广东建设厅工业试验所年刊》第 238 页，1930 年。
- [28] 《广州商场年鉴》第 1~10 页，1947 年。
- [29] 漫云：《广九粤汉铁路接轨问题与广州商业影响》，载《市商会周刊》第 6 期，1934 年。

第九章 海关与走私

第一节 海 关

海关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而设，广东的海岸线绵长，港汊众多，进出口商业贸易发达，因而设置的海关卡口星罗棋布。广东的粤海关、潮海关的洋关和常关均开设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十七日。琼海洋关开办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初七日。北海洋关开办于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九日。三水洋关及其九龙、拱北两分关均设于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初九。

民国前广东的海关原属两广总督管辖，1913年民国政府恢复粤海关监督，设公署于广州素波巷（后曾迁天香街、广卫路，最后定址于沿江西海关大楼）。

粤海关原无洋关与常关的分别，随着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主权不断丧失，海

关的管辖及税收方式也不断变化。天津条约之后，广东海关与其他地区相同，海关分为洋关与常关两类。所谓洋关，是指专门负责征收洋船（轮船）的货税和船钞的关口。名义上是在粤海关监督下行政，实际上是由总税务司控制，也就是被洋人控制。所谓常关，是指专门征收国内贸易税的关口，有别于洋人控制的海关。常关又分 50 里内常关、50 里外常关及内地常关。所谓 50 里，即离洋人控制的海关 50 里为界线。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受西方列强所迫，为了保证赔款的落实而定。《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共计 9 亿 8 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归洋人控制的海关管理，海关 50 里之内的常关所收关税，作为赔款之用。但实际上，一些重要的关口，依当时水道运输的距离虽然超过 50 里，如陈村口、佛山口，因为是重要的关口，税源较充足，也在洋人的压力下划归海关管理。

海关税也分为洋关税、常关税两类。所谓洋关税，即以轮船运输的出入口货的税项，由税务司征收。常关税是对中国旧式帆船运输出入口货物所征收的关税，由海关监督派员征收。光绪二十七年（1901），潮海常关、琼海常关、北海常关、江门常关及甘竹常关的税收，划归税务司征收。次年，粤海关常关的税收也归税务司稽征。从此，由中国海关监督征收的关税只限于离洋关 50 里之外的关口、关卡而已。现将民国时期广东归税务司管理的洋关、常关和归海关监督管辖的常关卡口列表于下：^{〔1〕}

税务司管理的洋关及常关

洋关关名	所在地	常关关名	所在地
粤海海关	广州市西堤	粤海常关	广州市长堤
江门海关	新会江门	江门常关	新会江门
三水海关	三水河口	陈村常关	顺德陈村
潮海海关	汕头	潮海常关	汕头
北海海关	合浦北海	北海常关	合浦北海
琼海海关	琼州海口	琼州常关	琼州海口
九龙海关	香港九龙		
拱北海关	澳门马骝洲		

以上各关中，拱北、九龙、三水不收常税，陈村只收洋税。九龙关所属厂、卡有 8 个，即大铲卡、伶仃卡、南头卡、三门卡、沙鱼涌卡、盐田厂、叠福厂、南澳卡。拱北海关所属有 4 个卡，即马骝洲分卡、前山卡、三厂卡、石角咀卡。

归中国海关监督管辖的卡口，分为三大部分，即粤海关监督、潮海关监督、琼海关监督。这些关口机构可分为总口、子口、卡、分卡数类。

总口、子口按职能分为正税口、挂号口和稽查口。正税口负责检验进出口货物及征收关税。挂号口负责检查进出关手续及收取挂号费、消号费等。稽查口负责缉查走私。现将他们所管辖的口、卡分列于下：

粤海关监督所属口卡

口卡名称	所在地
水东总口	电白水东圩
梅宜分口	茂名梅菪圩
暗铺分口	廉江暗铺圩
黄坡分口	吴川上岭
石门分卡	吴川鸡笼山
电白分卡	电白县
雷州总口	海康县
大阜分口	遂溪县
沈塘分卡	海康沈塘圩
海安分卡	徐闻县
斗门分卡	遂溪县
麻罗门分卡	徐闻县
麻章分卡	遂溪麻章圩
福建分卡	遂溪福建圩
阳江总口	阳江县
织簧分口	阳江太平圩
闸坡分口	阳江海宁岛
开平总口	开平单水口
三峡分口	台山斗山圩
石龙总口	东莞石龙镇
印州分卡	东莞县
车站分卡	东莞石龙车站

新堪分卡	增城新塘圩
镇口总口	东莞太平圩
虎门分卡	东莞虎门
石岐总口	中山石岐
容奇分口	顺德容奇圩
市桥总口	番禺市桥圩
潮海关监督所属口卡	
口卡名称	所在地
府馆口	潮安县城外
东陇口	澄海县东陇
柘林卡	饶平县柘林
黄岗口	饶平县黄岗
东河卡	饶平县黄岗东河
西河卡	饶平县黄岗西河
靖海口	惠来县靖海
神泉口	惠来县神泉
甲子口	陆丰县甲子
湖东卡	陆丰县湖东
碣石口	陆丰县碣石
乌墩口	陆丰县乌墩
大德卡	陆丰县大德
汕尾口	海丰县汕尾
遮浪卡	海丰县遮浪
马鬃卡	海丰县马鬃

后门卡	海丰县后门
长沙口	海丰县长沙
平海口	惠阳县平海
港口卡	惠阳县平海港口
稔山卡	惠阳县稔山
墩头口	惠阳县墩头
琼海关监督所属口卡	
口卡名称	所在地
廉州总口	合浦县城外沙街
西场卡	合浦县西场圩
总江卡	合浦县城外总江口圩
南康卡	合浦县南康市
沙冈卡	合浦县沙冈岭沙冈圩
新圩卡	合浦县新圩
钦州总口	钦县城外
尖山卡	钦县尖山圩
长墩卡	钦县长墩圩
防城卡	防城县城
东兴总口	防城县东兴海傍街
竹山卡	防城县竹山海边街
琼州总口	琼山海口
铺前总口	文昌县铺前港
塔市卡	琼山塔市
清澜总口	文昌县清澜港陈家市

烟墩卡	文昌冠南市
沙老卡	琼东长坡市
林桐卡	琼东草塘村
乐会总口	乐会县博鳌港
万州卡	万宁县和乐市
儋州总口	儋县新英港
海昌卡	昌江北港海尾
海头卡	儋县海头港
北黎卡	昌江墩头港北黎市
陵水总口	陵水县陵水街
灶新卡	陵水新村港灶子街
藤桥卡	崖县藤桥市
坡头卡	陵水坡头港
崖州总口	崖县保平港
三亚卡	崖县三亚港
板佛卡	感恩板桥市
榕村卡	崖县乐罗港
临高总口	临高县新盈港
光村卡	临高县光村港
红牌卡	临高县红牌港

广东对外贸易口岸为九大海关，即广州（粤海关）、九龙、汕头、拱北、江门、三水、琼州、北海、雷州九关，外籍轮船可以在这些海关停泊和上落客货，而其他卡口则非直

接对外。

抗日战争之前，广东的对外贸易几乎集中于广州、九龙、汕头三关。广州是广东商业的中枢，北江、东江、西江的一部分货物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广东较为富裕的地区，其在广东外贸中占主要地位自不待言。九龙关输出的货物主要来自广州，输入的货物也主要以广州为集散地，这是因为香港作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中转地，广州进出香港的货物主要是通过水上的运输，相当部分货物是在九龙关检验货物和交纳关税，如米舩都是在铲卡验关，然后运入广州一带，故九龙关在进口货值方面大都超过粤海关，占广东对外贸易数值的首位，而出口总值所占的百分比则较低。广州关与九龙关两关的每年输出入货值总额，占广东对外贸易的60%左右。汕头则是粤东商品的吞吐总口，其每年输出入总值仅次于广州与九龙两关。至于其他各关，江门、拱北、三水等关出口的货物，大都出产于四邑、中山与西江一带，进口货物亦主要以这些地区为销售市场。这些地区旅居美洲的华侨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每年因侨汇带动的进口贸易为数颇巨，数值几乎与汕头海关相埒。经济危机期间，侨汇锐减，进口贸易大不如前。琼海关的情况与上述三关相似，该关为海南岛全岛进出口的总枢纽，在侨汇高的年代，也曾有上千万元的进出口货值。至于北海和雷州关，处于全省较为贫困的地区，其进出口数值在各关中为最低。

1933~1937年广东各海关进出口数值对比表^[2]

关别	进口		出口	
	平均数值	占总值%	平均数值	占总值%
广州	41138	23.1	50360	53.3
九龙	76472	43.0	7525	8.0
汕头	36059	20.3	21519	22.8
拱北	8155	4.6	2296	2.4
江门	7458	4.2	4596	4.9
三水	2522	1.4	722	0.8
琼州	3334	1.9	2591	2.7
北海	1645	0.9	2795	3.0
雷州	1134	0.6	2021	2.1
共计	177237	100.0	94425	100.0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鉴于沿海口岸被日寇占领，严重影响我对外贸易，于是决定增辟口岸，以开拓对外渠道。于1941年8月下令全国沿海35个口岸对外开放，准许外国轮船停泊和上落客货。其中广东有黄坡、乌坎、阱洲、汕尾、神泉、电白、水东、阳江、广海等12个口岸。事实上，自从广州陷落之后，日军封锁珠江，广东与香港的贸易联系不可能如以往那样运作，上述的一些非通商口岸已开始逐渐起着对外贸易货物上落点的作用，主要是沟通广东内地与香

港、澳门商业贸易的作用，这从当时广东外贸的运输线的改变可以看出来，只是没有正式宣布而已。这些新辟的口岸在疏通香港、澳门、广州湾三地的外贸方面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香港和广州湾沦于敌手，以及战争的深入，这些口岸的对外贸易也基本陷于停顿。

第二节 走私

广东有 2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岛屿罗列，港汊复杂，又与香港、澳门、广州湾 3 个自由贸易区相邻近，交界处蜿蜒错综，管理困难，于走私却极为容易。走私者以上述三个外国人控制的贸易区为基地，其中又以香港为渊藪。香港处珠江口外，水上交通极为便利，为华南进出口贸易的总枢纽。从广州湾、澳门运进内地的私货也大都先从香港取得货物，再转入内地。从总体上说来，东、西、北三江流域各县市的进口私货，主要来自香港。四邑、阳江一带的私货主要来自澳门。海南岛、雷州、钦廉地区的私货主要来自广州湾，少数来自越南。设置九龙关与拱北关的初衷，就是在于防范走私。

走私基本上与关税税率的提高及形成的价格差异相关联。海关设置伊始，便有走私，早期广东鸦片走私为最大宗。由于进口的一般商品都是统一的值百抽五的关税，港澳与内地的差价不大，走私又要冒风险，故普通商品极少走

私，走私的主要商品是奢侈品如燕窝、玉石等。1917年之前，鸦片可以借助条约的保护堂而皇之地从海关进口，而走私要冒很大风险，故走私虽有，而不至于到猖獗的地步。1917年禁止鸦片进口，受高额利润的驱使，于是鸦片走私也就非常猖獗。云南来的鸦片有夹在宣威火腿内从邮局邮递过来，也有藏于掏空的家私内运过来。

1929年中国开始提高关税，走私范围便从毒品、奢侈品扩展到众多的商品，走私之风开始兴盛。其后数年间，数度提高进口税率，内地与三个自由贸易区的商品价格开始有较大差异，走私之风于是乎日盛一日。粤海关关于提高关税后走私的报告中说：“当进口税被限制在值百抽五时，走私仍是小规模的活动。当进口税连续提高到现行制度时，走私活动也随之发展，成为固定性的‘行业’。1930年和1931年，海关变卖没收物品所获总金额，比1922年多10倍，比1929年多5倍。有充分理由推测，走私得逞的物品，其价值可能比没收的物品的总值多好几倍。”^[3]

走私中的一种是私枭的集团性的走私。私枭走私多半由奸商或当地有势力者组织，参与者人数较多，组织较严密。较有势力的走私集团与海关及缉私人员、轮船及铁路公路管理人员有联系，其走私数额巨大。如毗邻港澳的江门，由于交通便利，很早就有走私集团。“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走私之风更为猖獗，除原有的走私贩子外，更增加了一批新的军阀与官僚。这些有权有势的地方官借着职权，勾结奸商和‘大天二’，明目张胆地进行走私贩毒。”据两广盐运司缉私

舰舰长的回忆，在他任缉私舰舰长的两年多期间里，所干的全部是走私，替军阀、官僚、奸商载运鸦片、食盐、煤、枪支子弹等私货。省港大罢工期间，曾亲眼看过“十三只载私货的各种舰艇，一字长蛇似的从澳门拱北关，‘大张旗鼓’地走私进口。”^[4] 江门贩毒集团从清末开始便从事走私贩毒行当，数十年间势力越来越大，进入民国后更得到驻当地的军阀的支持，有专门的走私船，走私沿线上有地方势力作保护，毒品运入广东水域后甚至交给缉私舰运到窝藏地点。又如 1938 年破获的利用广九铁路的集团走私，也是轰动一时的案例。这帮人每日有 30 余人来往于香港和广东内地之间，有专人驻深圳和各车站接头，有专人在火车上指挥。这批人走私的物品主要是从内地运钨砂出口，从香港运糖、人造丝等货物进口。这伙私枭与各方面皆有关系，肆无忌惮之至，后来竟然试图贿赂收买中央派来的查缉走私的宪兵队，才被大白于天下。^[5] 一般的走私组织则多采用民船，绕过缉私海关关卡和缉私船的注意，趁夜运货进出。也有利用进口轮船或民船运私货到预先约定的海面、河面偏僻地点卸下，然后由接应的货艇、渔船趁夜运入。手法之多，层出不穷。一些地区的走私者公然与海关对抗，甚至放火烧海关。如遂溪东部麻章，因与广州湾相邻，设有海关分卡，“但一般商贾，走私颇炽，头颅可破，此业不可改。海关虽设，而私枭猖獗如故。海关商贾两方，屡起争端，于是商贾恨怒填胸，每有放火烧关之暴动，虽经严捕在案，而暴徒借外人为护符，常得逍遥法外。”^[6]

“两广事变”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也曾参与走私活动。1931年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并逐渐形成与南京中央不即不离的局面。其后陈济棠独霸南粤，为扩充势力而想方设法开拓财路，他们利用军舰、两广盐运司缉私舰及警船等进出境无需报关的特权，从香港运进货物，或直接运货物出境。南京方面对广东官方公然走私颇为不满，中央财政部关务署曾拟具严禁政府、军队船只走私等5项办法，粤海关税务司与粤海关监督商量，将办法抄送省政府有关单位确认，但均遭拒绝。⁽⁷⁾直到陈济棠下台之后，粤省归政中央，这一现象才有所缓解。

广东省地方政府走私的第一大宗物品是糖。广东为产糖区域，但也是销糖量巨大的省份，每年消耗食糖约230余万担。食糖进口高峰的年份，进口数值达到近2000万海关两，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也是个巨大的利益损失。从1929年关税自主到1932年间两次提高糖的进口关税后，其税额达到了值百抽百以上，目的是保护本省糖业。由此而粤港糖价悬殊，1932年粤港糖价相差约每担11元毫券，1937年竟相差21元多。私运进口的糖除去各项费用之后，每担获利毫券7~8元。甚至发现有人将私糖杂在土糖中，运到上海销售往华中一带。广东当局深知食糖经营有巨大的利润，故采取多建糖厂、食糖统制的办法尽量减少利益外流。建糖厂要大笔资金，而当时广东当局财政尚不宽裕，于是采取一边建厂，一边经营食糖进口，将所获利润作资金的做法。从香港购进大量太古糖和印尼糖，由海维、海周两艘军舰运载，缉

私舰接应，运回广州后交蔗糖营运商和分销商负责销售。^{〔8〕}通过这种武装走私的方式，省政府获得了巨大利润，但也因此备受讥诮。工厂尚未成立，已有货物出售。其货则由外洋购进，改装“五羊牌”（省营工厂出产的产品，一律称为“五羊牌”）。于入口之前，由缉私舰接运，既无关税，且省一部分运费，一转手已获大利。市上有名之“无烟糖”，即属此类。所谓“无烟糖”，即洋糖改装省营糖厂之糖，闻每担可获30元之利。^{〔9〕}糖厂建成投产之后，又采取食糖统制专营，以开拓财路。由于同时建多间糖厂，工厂的生产能力超过了甘蔗生产量，不免出现停工，于是利用糖厂有减免关税的优惠，进口粗糖加工后运到外省出售。甚至直接运进白糖再转到外地。

钨砂也是政府走私的另一大宗物品。利用钨砂专卖的特权收购钨砂，然后直接运送出口。其中仅“永福”号运输舰在1935年9月5日至1936年6月23日期间，走私漏税额即高达532万元法币。

抗战前私枭走私进口的主要物品为糖、煤油、毛织品、参茸、手表、人造丝、玉石首饰、人造染靛等。另外，台湾也是产糖区，日本人为了推销台糖，将糖运到广东沿海的岛屿，诱使内地奸商用矿产、大米等商品与之交换，从而更助长了食糖的走私。据估计每年走私进口的糖约在100万担左右。

煤油也是走私的大宗商品，1934年之后本省炼油业衰落，粤港煤油价悬殊，此项走私开始猖獗。走私者多半将煤

油运到沿海的山中存放，等待机会出售。估计 1934 年走私进口的煤油约为 700 万加仑。1936 年达 1200 万加仑，大约占粤省煤油销量的近四成。

人参、鹿茸等属贵重药材，容易携带，在关税自主之前便不乏走私之例。1929 年之后，税率愈高，报关进口的参茸愈少，1931 年至 1932 年关税最高时，报关进口的参茸仅有数千斤，只及 1929 年报关进口量的 1/8。就大体而言，每年报关进口的参茸大约为 60 余万元，而广东全省参茸行每年营业额在数百万元以上。

表类走私在未增税前已很普遍，自增加关税之后，报关进口的手表极少。1936 年为最高，也不过 500 余只，价值最高的 1933 年只值 8000 余元，不及上海的 1%。琼海关数年没有一只表报关进口的。有人断言，广东全省销用之表，90% 以上为私运进口。

还有一种走私是轮船水手及旅客挟带性的走私。香港、澳门及广州湾与内地近在咫尺，旅客往来，轮船进出，可谓川流不息，经此渠道私带进出口的私货为数不少。从香港、澳门回省的旅客一般都会买些洋货随身携带，自用自享，或馈赠亲友。当然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人借此牟小利。携带的多为干鲜果品、罐头食品、西药、丝绸、化妆品、自来水笔等，所带数量一般不超过海关所规定的限度，海关方而无法禁止。这种顺便携带的私货已渐渐成为惯例，因为来往人数太多，海关不可能个个都检查，于是一些不肖关员便借机索贿，对于部分旅客行李则完全不检查，从而助长了这一风

气。此外，居住于港澳附近的乡民，早上挑水果蔬菜到港澳出售，而后购买布匹、水产品以至大米、盐等物品，这些人回家时大都是绕过海关检查将物品带回。

船员也是经常带私货进口，这些人与海关人员均有联络，当海关人员上船查货时，船主除款以烟酒外，并将钱钞塞进检查员的衣袋或帽子内。而检查员对于船主的舱位则从来不查。因此，船主所携带的私货除日常用品、食品之外，一些笨重的商品如缝纫机、成捆的洋纸、沙发甚至鸦片也私运进口。据估计，抗战前广东每年由旅客和船员私带的进口货价值当在 2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之间。

出口走私主要的物品是政府统制和禁止输出的商品，最主要的走私品是钨砂。在各国扩军备战的 30 年代初中期，钨砂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国际市场上成为抢手货，价格也扶摇直上。在此前探明的钨砂矿藏中，以江西为最丰，广东次之，湖南亦有不少出产，但全部经广东输出。广东翁源、乐昌、从化、云浮、紫金等 10 多个县均有钨砂出产。广东省的钨砂专卖始于 1929 年，后因多方反对而撤销。1933 年 11 月，广东省政府正式实行钨砂专卖制度，统制方式是对钨砂生产和运销实行官方控制。

广东省建设厅规定：开采钨砂的商人必须预先将产量报告国货推销处（1934 年 5 月成立，该处成立前专卖事宜由建设厅管辖），并每月尽量将产品按公价售与国货推销处，3 个月内不按规定将钨砂售与国货推销处，则吊销采矿权。运销钨须有特许证，从省外运钨砂入粤，须预先向建设厅呈报

每月运钨数量，并将钨砂全部售与国货推销处，否则撤销特许证。3个月内不按申报数量将矿砂售与国货推销处，也撤销特许证，并按走私论处。但是，由于官方收购价太低，1933年广东官方规定的钨砂收购价每担仅36元，而当时香港钨砂价每担为140余元，走私钨砂除去杂费运费，每担仍可赚60余元。有人以几十元起家做走私钨砂的生意，几个月之间便赚了7000多元。^[10]因此，利之所在，虽有被枪毙的危险，铤而走险者仍大有人在。走私钨砂的形式很多，有将钨砂缝在棉衣中带过关的，有混于船的煤堆中，有的捆绑包装后系于船底运出，当然也有用民船武装走私的。水路运钨砂主要由汕尾、惠阳、宝安、中山、赤溪等地。陆路则是经广九铁路和岐关公路。钨砂运抵港澳后，直接出售给有关的公司。香港、澳门有专门的公司收购钨砂。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香港一些商人因为经营钨砂而成百万富翁，于是有专门经营此行者。因钨砂价格与国际形势变化相关联，价格起落很大，这些公司大都囤积以居奇。据估计，1933年走私出口的钨砂约13309担，值129.3万元。1935年为23478担，1936年59724担。这两年走私量大，其中有58800担为第一集团军不经海关而公开用军舰运输出口。1937年25285担，值507.1万元。

除了钨砂之外，铜、废铁、锰、铋、铅等矿砂也在走私之列。据估计，1936年私运出口的矿砂约值204.1万元，1937年约值261万元。

1933~1937年走私贸易货值与税收损失表^{〔11〕}（单位：法币千元）

年份	走私货价值			私运出口	税收损失		
	私枭贩运	旅客等私带	共计		海关税收	省府税收	共计
1933年	18148	23110	41258	—	19552	1577	21129
1934年	16741	22936	39677	1293	18654	8722	27376
1935年	15025	27289	42314	1203	21097	9478	30575
1936年	17352	26126	43478	4151	21639	11060	32699
1937年	12476	26875	39351	7681	17822	11300	30122

从上表可以看出，走私对于广东税收影响巨大。其中省政府每年损失税收约1000万元，占全省税收总收入的1/6，而关税损失尤其惊人，每年约2000万元，占广东省每年关税收入的70%以上。

抗战期间的走私：日寇于1938年10月入侵广东本土，广州、江门等口岸陷于敌手之后，广九铁路已瘫痪，珠江航道也为日军控制，贸易通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原有的走私路线也随之变化。走私商品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除了鸦片外，奢侈品走私逐渐减少，走私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国内紧缺而又与生活、生产相关联的商品。东江方面走私进口的主要以洋货、煤油、布匹、火柴、海味、香烟、糖类、毒品、化妆品、参茸为大宗。走私出口商品主要为钨砂、桐油、苧麻、茶叶、粮食、牲畜、锡矿、金银、猪鬃、鸡鸭毛为大宗。南路走私进口商品主要有煤油、棉纱、香烟、火柴、布匹、糖类、日用品及日本货。出口则多为桐油、金银、钞票、鸭毛、猪、牛、苧麻、猪鬃、桂皮及粮食等。西

江和北江走私进口的主要是煤油、汽油、布匹、火柴、香烟、纸、西药、人造丝、糖类、肥田料、鸦片、参茸、化妆品、海味等。走私出口商品主要是钨砂、桐油、茶叶、苧麻、猪鬃、鸡鸭毛、桂皮、钞票和粮食等。总的来说，煤油、汽油、布匹及洋什货是各地走私进口的主要商品，原因无非是生活所需而又依赖进口的商品在战时特别紧缺，价格节节上升。走私出口的除了战前走私的热门商品钨砂、桐油、猪鬃等与战争相关联的商品之外，粮食、家畜家禽等也逐渐成为走私的主要商品。其原因是沦陷区都是沿海地带，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广州、汕头历来都是广东消耗进口粮食最多的城市，战时又无法如平时那样运进必需的粮食，使这些地区在战时缺粮极为严重。

广东抗战期间的走私与战前不同之处还在于，战前走私基本上是局限于香港、澳门、广州湾 3 个贸易港与内地之间，内地其他地区之间的走私现象很少，多半是毒品走私。抗战爆发后，广东沿海被日军控制，原有的较大规模的以船只走私的现象有所萎缩。特别是广州、汕头、江门地区陷于敌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除了香港、澳门、广州湾与内地间的走私外，也有敌占区与抗战后方之间的走私。抗战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私更占了走私的相当大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广州湾、澳门受日本控制，进出口贸易几乎停顿，与内地的走私贸易也所剩无几，而沦陷区与抗战后方的走私占了主导地位。

沦陷区与大后方之间的走私，基于利润驱使外，推动走

私的有人为因素，也有敌我之间的经济战的出发点。日本人不但在占领区抢夺粮食等军需物资，而且向我抗战后方争夺这类物资。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利用占领区的地位，将其一些非战略性物资向我方地区倾销。如在东莞石龙、太平一带遍设杂货店，推销的都是日用品、奢侈品，如卷烟、海味、儿童玩具、布巾之类。在饶平黄冈等地，奸商大量从汕头、潮安、南澳等地运来敌货，或暗中买卖，或改换商标掩人耳目。甚至在远离沦陷区的梅县，也仇货充斥。“走私之在梅县，颇形猖獗。以致市〔场〕仇货充斥。其中有系伪装国货，亦有标明仇货者。多来自揭阳。商人来往采办，手续简单，获利甚厚。仇货之所以多，实基此因。查该县走私，以畚坑一带最烈。至于走私人物，大抵以本县及邻县行商走贩居多，正式商号，亦有多少。”^{〔12〕}而走私往沦陷区的基本上都是钨砂、桐油、粮食等战略物资或日常不可或缺的商品。“粤省奸商收购桐油、钨砂、白银、青麻、铜元、废铁以及粮食、生猪、鸡鸭等外运资敌。”^{〔13〕}

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军的势头已开始从甚嚣尘上变为每况愈下，不仅战略物资，就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越来越紧缺，沦陷区物价日益高涨。这一时期走私往敌占区的物资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由于敌伪所占的都是沿海平原地带，物产有所偏缺，比如广州所需的竹、木以及柴、炭等，历来都依靠粤北、西江及其他地区输入，战时广州的竹木非常缺乏，价格昂贵，于是乎这些在太平时期不为所重的物资也成为走私商品。比如棺材也成了走私运

往广州的热门商品。从化我方控制区的棺材价格每副为 196 元，而相邻的沦陷区则为 596 元（1942 年 11 月的价格）。于是棺材和长度在 5 尺以上的杉木板的走私相当普遍。

以下列举沦陷区和非沦陷区几种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对比，可以看出当时走私成风是时势的必然。从从化走私运往沦陷区私货的价格：钨砂当地价格是每担 650 元，获利 600 元；桐油每担 670 元，获利 620 元；水牛每头 1800 元，黄牛 1000 元，平均每头约获利 500 元；生鸡每斤获利 3.5 元；鸡蛋每个获利 0.34 元。这是 1942 年 4 月的价格。是年 11 月，当地钨砂每担 840 元，沦陷区则高达 2000 元；当地水牛售价每头为 2580 元，沦陷区为 3380 元，黄牛每头 1300 元，沦陷区为 2200 元。^{①④} 汕头历来都是缺粮食的地区，沦陷区食粮更为紧缺。因此该地走私粮食最为普遍。1942 年 10 月的价格，普宁大米每斗 40 余元，运往汕头可卖到 80~90 元，平均每斗获利 1 倍。杂粮则可获利约 60%~70%。从上述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差距也可以看出，抗日战争进入中后期，抗战后方人民生活固然艰难困苦，而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战时内地走私几乎没有组织，早期多沿传统的商业贸易路线运输，后来加强了各关口通道的检查，于是几乎都是采用陆路运输，一般走山间小道，趁夜挑运，并以各种方式逃避检查。如钨砂走私，走私者将钨砂装于埕内，以泥密封，上面插上荔枝苗，挑担运出。将桐油装在生油罐内，趁夜挑运过检查口。

大概是为了解情况，以便加强对走私的遏制，同时也着眼于与敌开展经济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有关部门对广东的走私进行过极详细的调查，对广东数十个县的走私路线有详细的纪录。下面仅列举惠阳、台山、遂溪、清远4个例子，以反映战时广东走私复杂纷繁，几乎无所不有的一个侧面：

惠阳为战时东江交通要道，商品集散地，走私漏税以及敌货洋货的输入，禁止出口物资的输出，均十分猖獗。由于地理的原因，该地区走私路线错综复杂，为东江各县之冠。其走私出入的主要路线有：由稔山、平海经三多祝，再分为两路。一路经黄沙、谭新庵、四和而入紫金。另一条经安墩松坑间而入紫金之线。盐灶背、下涌经湖涌、白茫花、平山、横沥分水陆两路，一入河源，一入紫金之线。澳头及沙鱼涌而葵涌而淡水之线。溪涌及大小梅沙，经黄竹坑而坪山淡水之线。淡水经永湖分两路，一经惠城出河源，一趋平潭或马安经横沥出紫金之线。盐田、沙头角合经横冈、龙冈入淡水，北趋惠阳城，出河源之线。惠阳经豆角岭转河源、灯塔、龙川接韶连平公路而趋曲江之线。

台山东邻新会，北西接恩平、阳江，南临大海，北连开平。自新会沦陷，澳门、三埠航线断绝后，县属之都斛、广海、沙头涌，因地濒大海，有航道直通港澳，货物都改从此进出。港汊分歧，走私路线复杂。其走私的路线有：由恩平之圣堂往那扶，或恩平之湾雷经沙头涌出海。有由阳春或新兴经恩平之崩底、清湾、那吉、白良趋县属那扶出海。其

他货物走私路线有：澳门趋中山石岐、江门、新会之棠下、司前、牛湾经县属公益入台城之线。有由新会之棠下，鹤山之沙坪经金冈入开平之单水口，分趋三埠，或经公益入台城之线。有由江门偷渡到新会属之礼乐到双水，水运到开平单水口入三埠之线。有由新会古井经天亭到大江入台城之线。有由三夹海口登广海转船入海尾到那金、三合，转船赴水南、水西分趋台城或三埠之线。有由三夹海口登斗山经大同市北趋三埠，或由大同市西北趋海口端芬、上泽、那金分入台城或三埠之线。有由沙头涌经深井、赤水、三合入台城，或由赤水经水南入三埠之线。有由海晏经深井、赤水、东山人台城，或由赤水经水南、水西入三埠之线。有由海晏、大隆洞、屯寨、大同分趋台山，或由大同向三合入三埠之线。有由都斛东岑口登陆经四九圩、五十圩入台城之线。

遂溪与广州湾毗连，在内地与香港、澳门贸易路线困难重重的时候，广州湾成为华南出海唯一干线，货运集散之区，而广州湾也成为日货推销内地的主要枢纽，因此遂溪走私规模为全省之冠。其最主要的走私干线有4条：一由广州湾法租界赤坎入县属寸金桥，经麻章趋廉江或广西出入，或由廉江经洋菁、中火圩、笔架岭趋志满出入广州湾，或由中火圩经城月趋法租界之太平出入。二由广西经灵山、武利转合浦之张黄、石康、南康转铁山，海运到江洪河头折经海康之客路市沈塘，出法租界之太平或合浦之南康、石头埠，水道越过安铺、乐民、新市、东山市出法租界。三由广州运经黄略华丰南门圩、白水塘、合水圩出入内地。四由法租界之

太平运经沈塘、海康出入内地。

清远扼北江上游之中点，货运便利，是敌我经济战的前沿阵地，禁止进出物品之走私颇为猖獗。其主要出入路线有由广州、南海沿河北上三水芦苞、大塘迳趋县属石角。而县城分趋内地之线有由广州番禺之赤泥、白泥、永平、大塘迳趋县属之石角。县城分趋内地之线有番禺经花县之象山狮岭，一趋清远之龙塘、琶江口、横石到英德，或由龙塘转洲心，分赴琶江口及阳山，或由龙塘转琶江口、横石赴英德之线。有由增城经从化太平坊，一趋从化县城，一趋清远龙潭线，一趋清远之龙塘线。有由从化温泉经清远之汤塘至佛冈，有由从化之派潭及温泉合趋从化街口，经从化县城、清远之龙潭，一转龙山市而佛冈，一趋琶江口、横石而英德出入各线。^[15]

以上只是选择叙述靠近香港、澳门、广州湾，且战时走私最主要最猖獗地区的一些走私路线，而清远、从化则是广州与粤北交通枢纽，沦陷区和非沦陷区走私的主要地带。这些地区都有复杂的走私路线，而所列的也只是主要走私线路而已。事实上，临海地区，特别是靠近香港、澳门、广州湾的地区，均走私成风，每个县份或走私区域都有复杂的走私网。而靠近沦陷区的县份，虽然敌我双方对进出物资检查均相当严厉，但走私之风仍无法阻止。一是双方都对输出物资检查严格，而对于输入的物资则大开绿灯。另外，战时走私基本上都是小规模，集团走私、有严密组织的走私只属极少数，如肇庆地区，因为此地是沟通港澳与粤北的最主要的通

道之一，故有集团走私，且这些集团也大都不无背景。其他地区的走私几乎都是一般小商贩的走私，且大都是以挑运的形式，为谋斗升以活命而已。

抗战期间，日本人在广东的走私也相当猖狂，抗战爆发之初，日本军舰在珠江口外游弋，对我正常的贸易进行骚扰，而日本货则在其保护下向广东各地肆意私运日货倾销。1938年10月占领广州之后，日军封锁珠江，禁止船只通行，日本船却以运输军用品的名义，肆意将各种洋货运入，不交关税。海关洋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控制了海关，广东沿海更成日本货的天下。

抗战胜利后的走私：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恶化，走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日本侵华使中国经济元气大伤，百业凋敝，人民渴求休养生息，内战爆发使国内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市场商品短缺，香港与广东内地的物价差距太大，助长了走私盛行。也因为国家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艰困之中，走私之风因之日盛一日，不少水客、旅客将私带的货物向商店推销，而一些商店为图利，指定某些商品，由水客在港澳代购代带，再按货价的比例给报酬。

由于物价不断上扬，不仅平民百姓生活艰难，连军队官兵和政府公务员也难以承受物价高涨的压力，使军队和政府机构官员也都参与走私。军队利用军舰，政府机关利用专用船，公然从港澳运私货。大量走私钨砂、金银、大米等物资出口，运进衣料、罐头、香烟等出售牟利。广九铁路在战后成为普通走私者的主要通道。抗战期间大批曾为抗日救国出

过力的军人、游击队人员在战后得不到安置，迫于生计，长年累月活动于广九线上，以走私维持生活。这些人“穿着军装，啸聚成群，各携私货，无票强行登车，挤满车厢车顶，路局无法维持秩序，海关难于执行稽查工作。”广九铁路石龙车站东边搭起了不少木屋竹棚，走私者在此歇宿，贮运私货，部分私货也在此交易。至于有组织的私枭，则多半采取武装走私。“在广州、市桥、东莞、增城、顺德等地专营走私〔的〕电扒、机帆船近 20 艘，配有武器，逢关过卡，能行贿则用钱开路，不能行贿则开枪抵抗。”^[16]

战后香港与内地相连的水上走私通道主要有：由九龙元朗、青山经伶仃洋北面入东莞的虎门、太平、万顷沙。经伶仃洋南面往唐家湾、海星门等地；由九龙大埔至沙鱼涌、溪涌，或大小梅沙；由大屿山、长洲、香港仔等地驶向惠阳坪海、海丰汕尾、陆丰甲子、惠来神泉及潮汕各地。澳门通往内地的走私通道主要有：从澳门经三灶岛至台山、新会及粤西沿海各地；从澳门到石岐、容奇、市桥、大冈洲等地。以上这些主要是私枭走私的路线。

上海《商务时报》1946 年 7 月 25 日报道广州市场情形，说“充斥市场的美国货，差不多 90% 以上是走私人来的。”^[17]据 1948 年出版的《中国贸易年鉴》所载，1946 年海关缉获私货的价值，粤海关为 75964 万元，九龙关为 57277 万元，潮海关为 51701 万元。分别列全国各海关的第三、第五、第八位。1947 年 1~6 月，海关缉获进口私货的价值，粤海关 128428 万元，九龙关 99750 万元，潮海关 92867 万

元，分别居全国海关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位（第一和第三位为江海关和台湾台南海关）。出口私货的价值粤海关为85618万元，高居榜首。九龙关为66779万元，居次席。潮海关为5480万元，居第六位。1947年1~10月，查获走私案件最多的为粤海关，有3654件，九龙关为3376件，这两个海关所查获的走私案件占全国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的40%以上。

事实上，九龙是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区，其走私数量自然远非上述数字。华南走私数量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的数字。而最可靠的估计，应在正常贸易额的两倍以上。

据海关公布的1946年香港与国内贸易的数额，自香港进口数额为法币6722072300万元，按中央银行汇率折合港币约为1亿港元。输出香港为11641586300万元，折合约为1亿7千万港元。香港出入口署1946年公布的对华贸易数字，从国内输往香港的商品价值为327215193港元，从香港输入的商品价值为301429103港元。与海关公布的数字相比较，自香港输入的多了2亿多港元，超出海关公布数字的200%。而输出香港多了15520余万元，超出海关公布的数字90%。这巨大的差额，就是走私的结果。另外，香港也有许多货物是禁止出口的，这些禁止出口的货物的输入，尚不在统计数字之列，故走私数额必然更大。⁽¹⁸⁾

据另外的资料所作的估计，1947年由港澳两地走私输入额为32600万港元，走私输出为10800万港元。1948年头5个月，粤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为3011宗，值法币1800

亿元。^[19]

1948年上半年，香港公布的输入华南的货值为4963万余元，折合法币约值56578亿元，同期华南公布的从香港经海关正常输入的总值为45690亿元，相差10888亿元，也就是说，这半年间华南从香港走私进口的货值约占进口总值的1/4弱。出口方面，香港公布的上半年从华南输往香港的货物总值为港币11169万元，折合法币约127326亿元。而从华南经海关正常输往香港的货物总值仅为62012亿元，走私总值达65314亿元，比正常贸易额还多3300多亿元。以上的数字只不过是官方统计的数字，而在统计之外的走私量自然远远超过官方的数值。1948年贸易管制较上年度更严厉，正当贸易渠道受阻，而工厂的原材料及生活必需品的输入不能不指望走私这一途径，故是年走私较上年度更为猖狂，普遍认为走私数值当在正常贸易额的3~4倍以上。这半年间，广州宪兵会同海关出动缉私达4500多次，缉获巨额走私案件200宗以上，逮捕走私犯612人，缴获走私物品总值约10000亿元。^[20]

广东走私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上述的海岸线绵长，交通便利之外，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内战使经济恶化，金融动荡，官价与黑市汇率相差太大。1947年2月官定港币汇率为2470元换港币1元，而香港黑市最高时曾超过10000元法币换港币1元，平时也在7000~8000元之间。官汇与黑汇相差竟达数倍，以致一些商品结算外汇所得的款，还不及货物本身的价值，难怪商人尽可能逃汇。此外，结汇的手续

麻烦，一些与银行没有关系的普通商人，无法及时得到所需的款项。走私可以逃避所有的捐税和地方性的苛捐杂税等，都是助长走私的因素。

与战前相比，战后广东走私已成为一种风气。走私者大都有严密的组织，据说出口商到了广州，走私组织便会自动找上门来，双方议定价格后，出口商便将货物交给走私者。走私组织给该出口商开一张香港某银号的单据作保证，此后货物如出现意外事件，全由走私者负责，出口商便可自由自在地只身前往香港。等货物运到香港后，出口商凭手中的单据向走私组织提货，同时支付运费和其他手续费，这笔费用数额视货物的价值和运往的地点而定，通常为货价的10%左右。这样，出口商可以逃避官价结汇以及各种捐税和麻烦的手续。同样，办理货物进口也可以由走私者包办，对出口商而言，可称方便之至。

走私者能够做到为出口商包办一切，俨然正式的进出口组织，可知走私组织已形成一张张网络。陆路有卡车，水上有船只，与海关人员甚至缉私人员，都有联系。走私组织大都与地方势力有联系，有些还有军界政界的背景，故其能到处畅通无阻。因为在广东走私如此方便，以致走私到上海的货物常常先走私到广州，再运往上海，就变为合法的进口商品了。^{〔21〕}

本阶段走私进口的货物主要是关税较高的商品，如卷烟、颜料、面粉、奶粉、罐头食品、糖精、汽油、西药、化妆品、毛织品、人造丝织品、棉纱、棉织品等。走私出口的

主要商品是农副产品，桐油、茶叶、黄豆、盐、银币、水果、花生油等。走私商品货物以桐油为最大宗。来自湖南的桐油，先运到长沙或衡阳，再到曲江装船运到广州。广西的桐油除小部分经北海和海口运往香港外，大多数先运到广州。桐油运到广州后，大体上分3条路走私出境。一是广州经大塘、东莞太平至香港。二是广州经增城运至香港。三是从广州陆运到新塘，再装船运到东莞太平出香港。而一些与海关不肖人员有直接联系者，则可以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只以一小部分向海关申请出口结汇，更大数量的桐油则运到另一个地方，以每桶4元港币的价格交给有关的检查人员，便可以装船运往香港了。据估计，1947年初，广州每日运往香港的桐油约有1000桶，香港的价格为每桶港币470元。这样，每月仅桐油便将近1500万元，大部分为走私出境，其偷漏数量可谓惊人。

鉴于走私日益严重，海关方面无力阻止，故多次向中央政府报告，请求派专门的力量制止。严重的走私也使国民政府为之不安，1946年特派专员前来调查。其后，海军派两艘军舰给粤海关税务司调遣，加强缉私。这两艘军舰活动于珠江口虎门一带，不久即查获军方用登陆艇、汽艇走私的大案。此外，行政院也特派宪兵队驻扎广九铁路。这些措施有暂时的遏制作用，但是，随着经济不断恶化，国民党统治已成崩溃之势，走私之风自然更是继续增高。

走私虽然造成国家税收的严重损失，但从另一方面说，对民生和民族工商业却不无有益的一面。某工业界人士说：

“当前政府对于输入限额之不切实际，如走私绝迹，国内大多数工厂均将因原料缺乏而迫不得已停工。现在一般工厂之所以尚能继续开工，原料源源供应，全赖厂方能购得限额以外之走私进口原料所致。”因此，“平心而论，走私输入，货物如属于生产器材，交通工具，工业原料及必需物资，对于工商业和民生方面也不无好处。”〔22〕

战败的日本迅速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私货的主要的输出者。1947年，已有少量的日本货通过走私进入广东各地，广州市惠爱中路、汉民北路的夜市摊档上，打着美国制造牌号的日本玩具、文具、玻璃器皿，价钱比美国货和本国货要便宜50%至100%。1948年更进入了各大公司的货架上。

注释：

- 〔1〕《广东全省海关及其卡口之调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0年8月1日。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编《统计汇刊》，1930年。
- 〔2〕资料来源：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第3页，所列数字为1933~1937年的平均数值，单位为千元，以及占全省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比。原表计算有误。
- 〔3〕《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124页。
- 〔4〕叶少林：《二十年代江门缉私舰走私情况忆述》，载《江门文史》第17辑，第61~62、66页，江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9年。
- 〔5〕香港《循环日报》1938年3月23日。此日香港各大报皆有报道。

- [6] 《遂溪县调查报告》，载《统计月刊》第1卷第9期，1935年。
- [7] 《广州海关志》第2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8] 莫应淮：《英商太古洋行广州分行》，载《广州的洋行与租界》（《广州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第88页，1992年。
- [9] 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1177页。
- [10] 许微笑：《走私鸨》，载香港《大风旬刊》第14期，第433页。
- [11] 资料来源：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第4章《粤省走私货值之估计》。
- [12] 《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卷第1期，第216页，1941年。
- [13] 桂林《扫荡报》1942年9月21日。
- [14] 《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1期第66、81页，1943年。
- [15] 参阅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广东办事处编：《广东省贸易消息》第7期，1942年7月。
- [16] 《广州海关志》第279、268页。
- [17] 转引自《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673页。
- [18] 《中国贸易年鉴》第109~110页。
- [19] 《广东省工商经济概况》第11页，广州工商经济社编，1949年。
- [20] 林燮寰：《一年来华南经济的回顾》，载香港《经济周报》第8卷第2期，1949年。
- [21] 《中国贸易年鉴》第111页。
- [22] 《广东省工商经济概况》第11页。

附 录

一、1912~1930年各国及港澳地区 输入广州商品价值表（关平两：万两）

	香港	日本	越南	澳门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1912年	2406	47	40	18	65	—	—	—
1913年	3036	20	47	13	62	—	—	—
1914年	3298	344	41	28	86	—	—	—
1915年	2466	34	38	36	30	—	—	—
1916年	2382	39	68	56	52	—	—	—
1917年	2621	101	25	41	—	—	—	—
1918年	2756	17	2	47	—	—	—	—
1919年	3002	27	31	45	—	—	—	—
1920年	3015	21	18	58	139	—	—	—
1921年	4043	21	6	80	—	—	—	—
1922年	5090	66	199	49	—	—	—	19
1923年	6704	60	545	76	—	—	—	—
1924年	4815	186	349	52	—	—	0.03	—
1925年	2606	381	268	22	5	2	0.06	21
1926年	1278	1742	1581	6	170	26	4	245
1927年	3589	359	123	16	14	1	2	6
1928年	3794	80	49	22	3	0.3	1	0.3
1929年	3018	92	68	21	—	—	—	—
1930年	4703	241	65	21	—	—	—	—

参见黄荫普、麦叔度：《民国元年以来广州市对外贸易之分析》，载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4卷第1号，1930年。

**二、1912~1930年广州输出各国及
港澳地区商品价值表（关平两：万两）**

	香港	日本	越南	澳门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1912年	4256	0.3	—	31	—	—	—	—
1913年	5560	3	—	31	—	—	—	—
1914年	4382	0.9	0.2	31	—	—	—	—
1915年	4173	1	—	38	—	—	—	—
1916年	5441	1	—	65	—	—	—	—
1917年	4957	0.5	—	42	—	—	—	—
1918年	4984	12	—	48	—	—	—	—
1919年	6430	4	—	33	—	—	—	—
1920年	5876	2	1	43	—	—	—	—
1921年	7085	2	5	41	—	—	—	—
1922年	8856	0.8	—	42	—	—	—	—
1923年	8877	0.8	5	99	3	0.3	—	—
1924年	8074	0.6	27	115	9	0.4	—	—
1925年	3904	194	233	123	63	1	33	22
1926年	1799	286	1232	33	85	0.6	0.8	14
1927年	6876	7	22	62	2	2	0.1	—
1928年	7263	2	10	59	—	—	—	—
1929年	7422	2	9	74	—	—	—	—
1930年	5932	3	7	63	—	—	—	—

参见黄荫普、麦叔度：《民国元年以来广州市对外贸易之分析》，载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4卷第1号，1930年。

三、1927~1936年广东进口商品价值表 (单位: 法币千元)

货名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平均值	占总额%
棉织品	11975	10185	9847	14098	11937	10015	5593	2200	2345	1842	8003.7	3.5383884
毛织品	5366	5395	3578	4903	4120	4069	2878	1951	788	686	3373.4	1.4913602
五金钢铁	8847	9259	9600	11172	16974	17248	14220	12238	12980	9981	12251.9	5.4164924
机器及电气用具	2278	1876	3520	4106	8134	4092	4106	10729	17140	8438	6441.9	2.8479258
米谷	84686	72439	62696	48783	64869	115620	117808	45239	34585	23775	67050	29.642408
面粉	4791	7381	7552	6759	9786	12903	11253	3340	3373	2674	6980.6	3.0860819
鱼介海产品	17055	16889	13305	14029	12653	12447	8478	5050	5893	4100	10989.9	4.8585697
糖	15019	22008	19766	24212	14821	9882	1503	842	1197	1831	11108.1	4.9108252
化学品、西药	6762	10085	12553	18852	13730	12716	10321	5913	6953	8797	10668.2	4.716348
染料、颜料	2828	2517	2598	2721	3727	1901	1159	995	1370	878	2069.4	0.9148695
矿物油	10606	10708	13238	17053	23901	23712	13356	7230	6591	7169	13356.4	5.9047653
木材	2232	2337	2670	2641	4742	6133	5341	3992	3290	2371	3574.9	1.5804421
纸	2935	3286	3517	3556	5096	5671	4174	3063	3194	3184	3767.6	1.6656336
煤	8305	8294	8138	8791	8491	9841	7220	3288	2929	1857	6715.4	2.9688386
麻制品	809	1034	1140	2414	3817	1253	2609	3544	4498	6246	2736.4	1.2097462
车辆船艇	605	1091	1468	2592	2051	3247	5772	2042	3276	4909	2705.3	1.1959971
其他	57448	64561	54302	57236	67400	63509	53378	44897	39867	41433	54403.1	24.051288
合计	242547	249345	229488	243918	276243	314259	269169	156553	150269	130171	226196.2	100

参见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 1939年, 长沙。

四、1927~1936年广东出口商品价值表（单位：法币千元）

货名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平均值	占总额%
生丝	72158	76388	61992	60528	45881	18874	22070	11348	8337	11241	40881.7	32.2232
绸缎	10564	10516	7062	5718	8292	6559	6464	4552	2295	2282	6430.3	5.068401
丝绣品	2671	3190	4913	4509	4041	1848	1785	1646	3014	1232	2714.9	2.1399
针织品	1029	1715	2205	4101	5516	7169	4948	5332	7529	11341	5088.4	4.010707
干鲜果	3639	4781	5003	5689	5464	3620	3545	3732	3359	3907	4293.9	3.384477
蔬菜	4570	4470	5481	5739	5252	5601	5989	5335	4575	5513	5253.5	4.14084
水产品	1916	2224	2445	2742	2624	2645	2017	1907	2173	1947	2263	1.78371
土纸	3615	3616	2883	3154	1826	1712	1702	1683	1956	2192	2433.9	1.918414
木竹藤	4338	4680	5539	5362	5349	1901	1789	1692	1681	1912	3425.3	2.699842
矿砂五金	1220	1445	3452	6369	4329	1858	4889	8608	7234	5578	4498.2	3.545508
桐油	201	69	135	98	200	53	160	79	2451	355	380.1	0.299587
药材	2619	2969	2920	2450	3115	2229	2379	2469	2827	2799	2697.6	2.126264
爆竹	3938	3916	3604	3265	2588	1381	706	798	639	731	2156.7	1.699924
牛皮	1197	1535	990	629	1165	539	775	634	808	1154	942.7	0.743042
草席	4297	4440	4502	6144	10081	2500	3499	3923	3110	3385	4588.1	3.616368
鸡鸭毛	934	1665	1547	3719	1428	1056	1324	1546	1255	1454	1392.8	1.097813
烟草	4118	4335	4787	3219	3398	1295	1408	1124	1448	819	2598.1	2.047838
其他	41934	43226	42873	43188	41487	31705	28997	25618	22579	26705	34831.2	27.45416
共计	165358	175480	182343	164854	152035	92535	94156	82026	75270	84547	126870.4	100

参见蔡谦：《粤省对外贸易调查报告》，1939年，长沙。

五、广州市外国商店调查表（一）

国别	商店名称	地址	经理人姓名	营业种类
英国	金孖素	同文路 74 号	叶滨	燕梳
英国	英国通用电器公司	长堤	李活	电器
英国	企公牛奶公司	三圣官街	汤臣	牛奶、货仓
英国	天祥燕梳分局	浆栏路	希路	燕梳
英国	省港澳轮船公司	西堤大马路	鸦士林	轮船、货仓
英国	保安于仁公司	拱日中路	安道	燕梳
英国	卜卑士	梯云东路	浩吉	酒吧
英国	太古燕梳分局	太平南桃李园内		燕梳
英国	噫行燕梳	一德路西		燕梳
英国	英美烟公司	长堤一景左便		卷烟
德国	谦信洋行	太平路	葛地	洋行
德国	德国药房	西堤	毛喇	药房
德国	兴华洋行	靖远路	善贾	洋行
德国	信亨洋行	西堤二马路	杜花臣	洋行
德国	礼和洋行	拱日中路	威士	洋行
德国	礼和洋行	六二三路	李文	洋行
美国	黄河行	拱日东路	霞厘	洋行
美国	美国保险公会	六二三路	桃石非	保险
美国	大来轮船公司	六二三路	茄品泰	轮船公司
美国	美国友邦人寿公司	长堤光楼		保险
挪威	宝林洋行	长堤	龙金诺	洋行
日本	华南银行	西堤二马路	宫田英仪	银行
日本	岳阳堂	西堤二马路	森清太郎	药品
日本	锦华洋行	西堤二马路	三浦治左丘门	洋行
俄国	律咖啡酒吧	六二三路	利湾邦	酒吧
俄国	万国咖啡店	六二三路	马利亚	咖啡店
俄国	大蒙地酒吧	十八甫南	亚哥路	酒吧

此表载于广州《市商会周刊》第 12 期，1934 年。燕梳为英文保险（insurance）的广东话译名。

六、广州市外国商店调查表（二）

商店名称	地址	商店名称	地址
太古洋行	沙面	渣甸洋行	沙面英界
开健洋行	沙面	汉运洋行	沙面
些刺士洋行	沙面	礼和洋行	沙面
保庇洋行	西堤广东银行4楼	捷成洋行	沙面
禅成洋行	沙面	达亨洋行	西兴行6号
天祥洋行	沙面英界	山打洋行	沙面英界71号
鲁麟洋行	沙面英界	顺利洋行	沙面法界17号
安利洋行	沙面	兴盛洋行	沙面英界26号
旗昌洋行	沙面英界	宝德洋行	西堤广东银行4楼
高德洋行	沙面英界18号	利华洋行	沙面英界80号
粤南洋行	太平南路220号2楼	瑞麟洋行	沙面英界65号
好时洋行	沙面英界65号	和记洋行	沙面英界4号
孔士洋行	沙面法界39号	汇丰银行	沙面
渣打银行	沙面	万国银行	沙面
佛兰西银行	沙面	台湾银行	沙面
横滨银行	沙面	德华银行	沙面
万国储蓄会	沙面法界	亚细亚煤油公司	沙面

(续表)

商店名称	地址	商店名称	地址
亚美银行	丰宁路	卜门内洋行	沙面英界 496 号
太平洋行	沙面法界 2 号	三井洋行	沙面
三德洋行	一德路 474 号	美孚洋行	沙面
美利洋行	沙面英界 32 号	信孚洋行	沙面
信亨洋行	西堤广东银行 5 楼	新夏巴洋行	太平北路
中源洋行	下九路 121 号	东利洋行	大新西路 435 号
东亚洋行	太平南嘉南堂 3 楼	咪咄洋行	沙面英界 39 号
的近洋行	沙面英界	金星洋行	六二三路 2 号 3 楼
联华洋行	沙面法界 9 号	天顺洋行	沙面英界 19 号
天成洋行	六二三路 103 号	松尾商店	沙面英界 80 号
夏也洋行	沙面法界 48 号	德惠宝洋行	沙面法界 20 号
德士府洋行	沙面上海银行 3 楼	毕爹利洋行	沙面法界 22 号
绵华洋行	沙面英界 50 号	慎昌洋行	沙面英界 40 号
西门子洋行	沙面法界 12 号	有余洋行	沙面英界 16 号
曹氏洋行	长堤光楼 4 楼	时昌洋行	沙面英界 85 号
谦信洋行	太平南路	志利洋行	沙面
昌华洋行	沙面英界 73 号	昌兴洋行	沙面英界 77 号
昌记洋行	沙面法界 54 号	大北毛厂洋行	沙面英界 35 号

(续表)

商店名称	地址	商店名称	地址
协和洋行	河南鳌洲正街	协昌洋行	西湖路 34 号 3 楼
兴祥洋行	沙面英界	陈南孖路洋行	沙面法界
免那洋行	沙面英界 62 号	英商泰和洋行	沙面英界
吻嗜士洋行	沙面英界 39 号	永胜洋行	沙面英界 63 号
高技洋行	沙面英界 85 号	老晋隆洋行	十八甫北约
立记洋行	永汉南	黄河洋行	拱日中路
利达洋行	西堤海关右街	利通洋行	嘉南堂 4 楼
洛士利洋行	沙面	同发洋行	沙面法界 28 号
同和洋行	沙面法界 49 号	城琴油公司	沙面法界
华轮洋行	永汉南 44 号	伊藤商店广州分店	沙面英界 71 号
和兴行	沙面	宏业洋行	太平南太平银行 4 楼
明华洋行	沙面英界 22 号	友信洋行	拱日中路 75 号
恒兴洋行分行	太平南嘉南堂 5 楼	万利洋行	兴隆路 27 号
隆业洋行	六二三路 226 号	广丰洋行	西堤二马路 7 号 2 楼
兴华洋行	靖远路	威信洋行	盐运路 27 号
力臣洋行	太平南嘉南堂 4 楼	亚运洋行	沙面英界
太平洋行	沙面法界 2 号		

此表刊于广州《市商会周刊》第 14 期，1934 年。原表有部分中国经理名，今从略。

七、汕头外国商店调查表

国别	商号名	营业种类	地址
日本	台湾银行	银行汇兑按揭	外马路
日本	大阪商船会社	船舶业	海关马路
日本	幸阪洋行	杂货石炭输入	同上
日本	汕头旅馆	旅馆业	外马路
日本	山口洋行	服装业	海关马路
日本	广贯堂	杂货药物代理保险	育善前街
日本	日华洋行	杂货药物输入	万安街
日本	比留多洋行	船舶代理	怀安街
日本	三井出張所	商况调查	广州街
日本	日龙药房	杂货药品输入	永平路
日本	泰利洋行	海运业	永安街
日本	大成洋行	烟业输出	升平横街
日本	三麟公司	酒精海产物输入	外马路
日本	大和药房	西药输入	海关马路
日本	神州洋行	酒烟贩卖	永平路
日本	明发洋行	砖瓦杂货输入	韩堤路
日本	义利洋行	糖蜜酒精输入	乌桥背

(续表)

国别	商号名	营业种类	地址
日本	华安旅揭	旅馆业	怡安街
日本	华潮冰制公司	制冰贩卖	沈赵路
日本	万源洋行	糖蜜酒精输入	荣隆街
日本	建茂洋行	海产物杂货输入	潮安街
日本	国信洋行	烟叶药品染料输入	怡安街
日本	台阪洋行	刻□烟草制造	永和横街
日本	自成洋行	海运业	潮安街口
日本	裕泰洋行	机械化学杂货输入	育善前街
日本	秋记洋行	酒精杂货贩卖	永平路金山街口
日本	三华洋行	海产物杂货输入	永安横街
日本	谦源洋行	酒精糖蜜陶瓷输入	永安横街
日本	广源洋行	茶商	荣隆街
日本	乾记公司	矿石商	通津街
日本	刘美泰	工业	新马路
日本	德美洋行	苧麻业	永平路
日本	平安公司	酒类石炭输入	新潮兴街
日本	叶发丰	杂货酒精烟叶	新马路
美国	三达煤油公司	煤油机油白蜡电油	外马路
美国	德十古煤油公司	煤油	海关前
美国	域甘公司	抽纱花边顾绣出口	外马路

(续表)

国别	商号名	营业种类	地址
美国	胜家衣车公司	缝纫机贩卖	至安街
美国	可良洋行	抽纱顾绣出口	崎碌
美国	美东洋行	同上	同上
美国	巴达斯洋行	待定货进口	同上
美国	马伯录洋行	抽纱出口	同上
美国	乔治洋行	同上	同上
美国	倍利洋行	同上	同上
美国	柯宝洋行	同上	同上
美国	萨升登洋行	同上	同上
英国	太古洋行	船舶业	怀安街口
英国	亚细亚煤油公司	煤油电油机械油白蜡输入	崎碌
英国	适宜楼	旅馆业	同上
英国	德记洋行	衣匹杂货输入代理船舶	海墩
英国	英美烟公司	卷烟输入	
英国	顺泰洋行	煤炭输入代理保险	海关路
英国	怡和洋行	船舶业	至平路口
荷兰	开健洋行	杂货布匹输入	升平马路
德国	新昌洋行	机器钢铁杂货布匹输入	同上
德国	美最时洋行	同上	同上

此表刊于《潮梅商会联合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29年。

八、广州市物品标准调查表

品名	花色牌号	单位	零售物价	每年在广州 交易价值或 数量约数	备考
大米	本省土米	每担	8元5毫	200万担	1933年物价
	安南暹罗米	每担	7元5毫	700万担	
	芜湖广西米	每担	6元5毫	200万担	近两年较少
面粉	绿兵船	每包	3元2毫6仙	48万包	
	麟凤	每包	3元2毫4仙	10万包	
	进宝	每包	3元2毫4仙	1万包	新到约销此数
黄豆	金元黄	每担	7元5毫	30万担	
豆饼	上海50斤庄	每担	4元8毫7仙	5万担	
花生仁	汉口生仁	每担	8元5毫	40万担	
	天津生仁	每担	8元6毫	38万担	
猪肉	上肉、五花	每担	35元	28万担	
鸡蛋	北江蛋	每百	1元8毫	250万只	
	本地蛋	每百	2元	200万只	
	天津蛋	每百	1元7毫	200万只	
茶叶	福建水仙	每担	60元	1000担	

(续表)

品名	花色牌号	单位	趸售物价	每年在广州 交易价值或 数量约数	备考
	本土六堡	每担	20 元	700 担	
	本土清远	每担	20 元	500 担	
棉纱	16 支人中	每包	240 元	5000 包	
	10 支金城	每包	215 元	3000 包	
	20 支富贵	每包	250 元	3000 包	
生丝	上等 13、 15 丝	每担	931 元	5328 担	均办洋庄出口
	普通 14、 16 括丝	每担	713 元	7992 担	
	普通 10、 22 括丝	每担	667 元	13325 担	
桐油	西江桐油	每担	25 元	18000 担	
煤	开滦 1 号大炭	每吨	25 元	10 万吨	
	印度大炭	每吨	28 元	7 万吨	
	荷兰大炭	每吨	29 元	8 万吨	
生铁	生铁	每担	5 元	5000 担	
锡	斗锡	每担	230 元	2500 担	

(续表)

品名	花色牌号	单位	零售物价	每年在广州 交易价值或 数量约数	备考
烟叶	鹤山烟叶	每担	35 元	3 万担	
	清远烟叶	每担	55 元	5000 担	
	南雄烟叶	每担	30 元	3600 担	
纸	福建土纸	每担	110 元	14000 担	
	南雄土纸	每担	38 元	4 万担	
	长江土纸	每担	28 元	25000 担	
水泥	五羊牌	每包	6 元 5 毫	90 万包	
	马牌	每包	6 元 5 仙	20 万包	
	泰山牌	每包	6 元 1 毫	8 万包	

此表刊于广州市商会 1934 年 7 月编辑出版的《市商会周刊》第 9 期上。据称此表是呈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作为编制物价指数表之用，是派专人向各公会和商店调查后编制。

九、广东全省各县市镇商会调查登记表*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汕头	市商会	林伟岩?			荻海镇商会	余进礼	
湛江	市商会	关奇山	赤坎中正路		海晏街商会	赵煜堂	
	西营商会	黄华南		新会	县商会	陆焯南	新会城
	洲区商会	朱鸿深	洲区复兴街		江门镇商会	卢霭云	江门镇东路
南海	县商会	徐悠泉	佛山长兴街	开平	县商会	张伯良	县城
	石湾商会	李应宇			赤坎商会	司徒声仰	
	九江商会	陈均辉	九江太平路		长沙镇商会	谭耀池	
	里水商会	何华生	里水市		苍城商会	张伯良	
番禺	沙湾商会	何矩			颍冈商会	黄昂柯	
	市桥商会	谢先表			楼冈商会		
顺德	大良商会	冯福	大良华美路		马冈商会		
	陈村商会	梁理如	陈村旧圩		长塘商会		
	容奇商会	梁振中	容奇圩开衫街	鹤山	县商会	冯崇培	
	齐杏商会	林符信	八区杏坛	恩平	县商会	吴纪钟	
	桂洲商会	杨敏达	桂洲里村李地街		圣堂圩商会	冯颂尧	圣堂圩商务公司
	勒流商会	廖秀山	勒流大塘街西约	高明	县商会	刘楚天	

* 本表根据 1947 年出版的《广州市商会周年特刊》中“广东全省各县市镇商会调查登记表”，参考 1948 年《广东省商业概览》中“所属各县市镇区商会一览”及广东省商会《商业导报》“广东省商会联合会所属各县市镇区商会一览表”编制。个别字迹漫漶不清，而后两表所录又不全，故只好用问号表示存疑。

(续表)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伦敦商会	郑觉生			合水商会	杨曜生	合水市东正街
中山	县商会	李德联	石岐孙文西路	英德	县商会	冯敏流	英德城打石街
	大涌镇商会	萧耀文			浚洸镇商会	邝国材	浚洸伯豪路
	大冈商会	陈伯豪	大冈乡新村	清远	县商会	卢德如	附城镇城内直街
	大黄圃商会	吴泽霖	大黄圃南边村		三坑商会	朱勃兴	
	石岐镇商会	黄金藻	石岐孙文西路		石角商会	杨遂如	下石角圩
	榄镇商会	卢帆音		连县	县商会	孔寿朋	县城抗日路
东莞	城镇商会	陈荣斌	城外阮涌		二区商会	周上进	二区星子厂文街
	常平商会	周仲梁			三区商会	黄天度	
	广裕圩商会	李煜和	常平广裕圩	阳山	县商会	曹云森	阳山县城南圩
	太平商会	方松轩		乳源	县商会	黄远谋	乳源县洲横街
	寮步商会	尹永保		曲江	县商会	崔伟	
	中堂商会	黄义存	新圩	始兴	县商会	梁颂骈	县城公教路
宝安	县商会	陶裕昌		南雄	县商会	陈品三	仓前街1号
	深圳商会	张荫民		新丰	县商会	潘仲荫	
从化	县商会	李光汉	从化街口圩	乐昌	县商会	谢佐	
增城	城镇商会	江张潮	湘江路	仁化	县商会	卜筱君	县城新横街
三水	西南镇商会	陈显时	西南三民路19号	高要	县商会	李启东	肇庆市
台山	县商会	黄仿周	西门圩		广利商会	冯又新	
	新昌镇商会	李显来	新昌南盛路		金利商会	孔仲文	

(续表)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新桥商会	何启据		惠来	县商会	方梦兰	
云浮	县商会	谢鲁升	东安镇		三区商会	林碓杰	三区隆江大街
罗定	县商会	陈公毅		普宁	县商会	方静庵	
	罗镜镇商会	叶宴林	罗镜大马路	大埔	县商会	刘理臣	
	泗纶镇商会	李次鸿			三河镇商会	周耀煜	三河市中街
广宁	县商会	杨上贤			高陂镇商会	张若愚	高陂镇大中街
	石狗市商会	赵寿田	石狗市	丰顺	县商会	吴璧垣	
	江屯商会	黄柏光			留隍镇商会	林鹤秋	
四会	县商会	张以莹	县城福隆新街	兴宁	县商会	陈辉廷	
新兴	县商会	梁次琦	县城秀濠路	梅县	县商会	郑伟	
	天堂镇商会	邝匡教			松口商会	李绍源	
郁南	县商会	吴滢英	县城大街	鱼岭	县商会	丘璧章	环城马路
	过滩商会	叶启贤		平远	县商会	丘振均	
开建	县商会	李醒汉		五华	县商会	张卓然	
封川	附城商会	黄鼎彝	附城锦衣路		安流商会		
	江口商会	蒋瑞南		龙川	县商会	杨贻亭	
德庆	县商会	陆梦觉			老隆镇商会	黄毅夫	老隆中正路
	悦城商会	罗汝铨		和平	县商会	谢槐斋	
郁南	都城镇商会	邓其祥		连平	县商会	颜菊泉	
惠阳	县商会	魏佐翰	县城商会路		隆兴商会	叶少仙	

(续表)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博罗	县商会	韩仲佳	县城中山西路		忠信商会		
	桔子圩商会	黄平初	桔子圩镇	茂名	县商会	麦学创	永镇街
海丰	县商会	陈亨	县城中山西路		南盛镇?	朱亮梅	
陆丰	县商会	陈列	东城镇		公馆商会	谭叔华	
	甲子区商会	方济弱			鳌头商会	吴伯寿	
河源	县商会	李德如		信宜	镇隆商会	李汝宝	
	观音阁商会	叶培生	观音阁上门	电白	电城区商会	严献之	县城东街
	回龙圩商会	李质脚	回龙圩东管街		林头商会	梁鸣盛	
紫金	县商会	陈家和	县城南门外		霞酒商会	罗演新	
	古竹圩商会	黄俊杰			羊角商会	郑琼英	羊角圩
	龙窝圩商会	占乃君			贺澜商会	朱锡俊	博贺圩上街
	黄塘圩商会	叶启东			望夫圩商会	吴熙辑	望夫圩
龙门	县商会	邓苏初	县城民权北路		水东区商会	潘忠诚	水东洗太庙
潮安	县商会	张嵩岳			沙湖区商会	黄牟芝	
	彩塘商会	吴守仁			蛋场镇	林耀	蛋场圩
	浮洋镇商会	李芝楨	浮洋市中兴街		马踏商会	陈家鉴	
	庵埠镇商会	李慎吾	庵埠市灯笼街	化县	县商会	劳承平	化县大街
潮阳	县商会	林次刚	中正路市内街	吴川	县商会	龙大远	黄浦市正街
揭阳	县商会	谢良才		阳江	县商会	廖永年	太傅路太傅祠
澄海	县商会				闸坡商会	袁超中	闸坡镇福安街

(续表)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县别	商会名称	理事长	会址
南澳	县商会	林联璧	隆西乡		织寮商会	许佩华	织寮镇东堡街
饶平	上饶商会	詹耀华	上饶洋较埔		沙扒商会	严仕鑫	沙扒澳中华街
阳江	儒洞商会	陈伯贤	儒洞圩广州会馆	海康	县商会	陈培元	雷州城南亭中路
	平冈商会	敖和惠		遂溪	县商会	梁熙和	县城旧商会
阳春	县商会	蒋藻生		徐闻	县商会	何仲权	
	合水镇商会	陈鸿飞		海口	市商会	毛泽海	
	黄泥湾商会	欧巨卿		文昌	铺前镇商会	陈玉江	铺前市中山路
	三甲镇商会	刘传功			文教镇商会	符益吾	文教市
	潭水商会	敖助扶			清澜镇商会	翁瑶光	清澜市
梅菪	市商会	谢麟图	克平路	定安	县商会	曾令坚	县城西街
合浦	北海商会	林次屏	北海中山西路	陵水	县商会	余云强	
	寨圩乡商会	陈用之	寨圩大街	万宁	县商会	冯茂权	
灵山	县商会	陈祥棋	附城镇复兴路		和乐市商会	李新青	
廉江	县商会	庞华廷	城东大街	崖县	榆亚商会	韩业兴	
	安铺镇商会	吴承烈	安铺忠义路				

主要参考文献

广东省商会联合会编：《广东省商业概览》，1948年版

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会编：《广东商业年鉴》，1931年版

广州市商会编：《广州商业年鉴》，1933年版

广州市商会编：《商事年鉴》，1934年版

陈梓秋主编：《广州商场年鉴》，广州商场杂志社 1947年版

广州工商经济社编：《广东省工商经济概况》，1949年版

广东省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经济年鉴》，曲江，1941年版

广东省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经济年鉴续编》，曲江，1942年版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林习经著：《广东贸易管理概论》，乐昌公益书店 1941年版

梁闾秋编：《广东商运沿革史》，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 1934年印行

广州港埠际商业年鉴出版社：《港粤埠际商业年鉴》，1948年版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吴大明、黄宇乾、池廷熹主编：《中国贸易年鉴》，上海独立出版

社 1948 年版

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 1998 年影印本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1947 年版

中国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商民部印行：《广东省各级商民协会章程》，1926 年

广州市立银行经济调查室编：《广州之工业》，1937 年

王相钦、吴大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朱英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赖定荣主编：《珠江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8 年版

蒋祖荣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年版

国立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广州市社会局调查处：《广州之新兴工业》，1935 年

伍顽立主编：《广东工业》，广东实业公司 1947 年印行

廖淑伦主编：《广州大观》，广州天南出版社 1948 年版

香港先施公司编：《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4 年

饶宗颐等纂：《潮州志》，汕头潮州志修志馆，1949 年

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广东省银行月刊》，1937 年、1946～1947 年

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委会编：《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1～4 卷，1941～1944 年

广东经济建设出版社：《经济建设》，1947～1949 年第 1～4 卷

香港经济导报社：《经济导报》，1947～1949 年第 1～150 期

- 香港经济日报社编：《经济周刊》，1948~1949年第1~35期
- 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统计汇刊》，1930~1931年
- 广东调查统计局：《统计月刊》，1934~1936年第1~3卷
- 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广东统计汇刊》，1939年、1940年
- 广东省政府统计处编：《广东统计月报》，1947年第1~5期
- 广东省实业厅编：《广东实业厅公报》，1926年第1~5期
- 广东省宣传处编：《新广东》，1933~1936年第1~41期
- 广州市商会编：《商业特刊》，1928年第1~4期
- 广州市商会编：《市商周刊》，1934年第1~22期
- 广州市商会编：《穗商月刊》，1948~1949年第1~4期
- 广州市商会编：《广州市商会周年特刊》，1947年
- 广州市商会编：《广州市商会第二周年特刊》，1948年
- 广东省商业联合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编：《商业导报》，1948年第1~2期
- 广州工商经济月刊社编：《工商经济月刊》，1947~1949年第1~4卷
- 汕头省立岭东商业学校编：《省商学生》，1930~1935年
- 潮梅商会联合会编：《潮梅商会联合会半月刊》，1929年第1~8期
- 广东省经济局编：《经济月报》，1943~1944年第1~2卷
- 广东省建设厅编：《广东建设月刊》，1933年第1~12期
- 广州市立银行经济调查室编：《金融经济月刊》，1937年第1~7期
- 《广东省政府公报·元旦特刊》，1940年、1941年
- 广东商民协会编：《广东商民》，1927年第1~3期
-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史志》，1989年第2期，1990年第1~3期

后 记

广东素以商业发达闻名中外，广州则在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和贸易口岸。但是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广东商业历史的学术著作甚少，已出版的与商业相关的学术专著基本上局限于对外贸易这一商业层面，且大都是提纲挈领性的，时间跨度很大。与商业密不可分的其他一些要素，如商业市场的构成和相互关系，商业管理和商业经营的模式、状况，各商业行业的运作形式及大体状况，行业间的关系等等，几乎都没有涉及。缺乏上述要素，不足以反映广东商业的全貌。

民国年间是广东省商业发展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一方面，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的加剧，广东商业市场已从沿海地带向内地纵深扩展，与之相关联的商业交通运输、工业和手工业、农业等支撑商业兴衰的行业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广东经济的剧变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又是广东商业发

展和历经磨难的时期，故研究这一时期的广东商业状况，更利于彰显广东特色。

笔者在图书馆工作 18 年，在爬故纸堆和“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时，逐渐积累了一批广东史料，因此，本书的写作方法大体上也是沿用老祖宗的方法，就是“论从史出”，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以叙述史学的方法，分类排比，力图勾画出民国年间广东省商业的概貌。另外，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来说，这种写作模式似乎较为适当。

本书之所以能付梓，与众多老友及热心人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选题阶段，学兄辛朝毅首先赞同和给予鼓励；中山大学郭小东教授不仅对全书的框架设计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撰写过程中给予诸多指导，且详细审阅了初稿；柏峰编辑则对书稿的写作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在搜集资料阶段，中山图书馆倪俊明研究员出力尤多，他的热心奉献精神和对业务的精通，获益良多的读者岂止笔者一人。此外，学兄吕克坚也赠送了极为必要和有用的书刊。在初稿完成后，省社会科学院王杰所长，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部赵殿红博士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笔者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知识所囿，故作品只能停留在“存史”的水平上。此外，因自身其他因素的制约，即使在史料发掘方面也未能达到笔者的祈望，但目前只能如此了，也算是一件憾事，尚望识者多多谅解。

